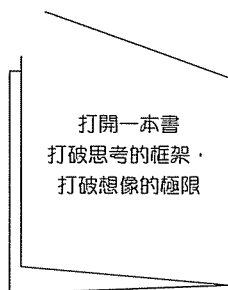




to be new and differ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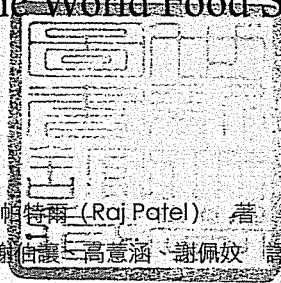


高寶書版

1011
865

糧食戰爭

STUFFED AND STARVED:
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



拉吉·帕特爾 (Raj Patel) 著
葉家興、謝伯讓、高意涵、謝佩妏 譯

98年度教育部
出版

〈國際好評推薦〉

長久以來最令我讚嘆的書。

——Naomi Klein, 《No Logo》作者

這本批評世界糧食體系的書來得正是時候……帕特爾以滿腔熱情投入這
本書的寫作。

——Bill Jamieson, 《蘇格蘭週日報》

我們不能吃得更健康、更美味，而且讓世界上的窮人有能力餵飽自
己？當然能，帕特爾替我們寫出了祕訣。

——J.B. MacKinnon, 《百哩飲食》作者

這本書我非常期待能上暢銷排行榜第一名。它敏銳地分析了為什麼一半

Break書系 BK 006

糧食戰爭

STUFFED AND STARVED: 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

作者：拉吉·帕特爾 (Raj Patel)
譯者：葉家興、謝伯讓、高慧涵、謝佩玟
總編輯：林秀禎
編輯：黃威仁
出版者：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Global Group Holdings, Ltd.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88號3樓
網址：gobooks.com.tw
電話：(02) 27992788

E-mail：readers@gobooks.com.tw (讀者服務部)
pr@gobooks.com.tw (公開諮詢部)

電傳：出版部 (02) 27990909 行銷部 (02) 27993088
郵政劃撥：19394552

戶名：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發行：希代多媒體書版股份有限公司/Printed in Taiwan

初版日期：2009年4月
初版三刷：2009年4月

STUFFED AND STARVED: 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 by RAJ PATEL

Copyright©2007 BY RAJ PATE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ORTOBELLO BOOKS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Global Group Holding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凡本著作任何圖片、文字及其他內容，未經本公司同意授權者，均不得擅自重製、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如一經查獲，必定追究到底，絕不寬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糧食戰爭 / 拉吉·帕特爾 (Raj Patel) 著. -- 初版. -- 臺
北市：高寶國際出版：希代多媒體發行，2009. 4
面；公分. -- (Break書系；BK006)
譯自：STUFFED AND STARVED: 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
ISBN 978-986-185-260-7 (平裝)

1. 國際糧食問題 2. 糧食業

431. 9

97023044

世界人口吃得過飽、另一半世界人口卻處於飢餓。帕特爾極佳地探討了這個重要的議題。我希望這本書能像《小就是美》一樣永遠流傳，而且有同樣大的影響力。

——Sue Baker · 《出版情報》

帕特爾的廣泛觸角，讓一般讀者也能了解糧食危機的全貌，並且聽到來自世界糧食體系最底層人們的心聲。

——《時代》雜誌

有關世界糧食體系的權威性報導。這是那種會讓你有所啟發、驚訝、憤怒並生出決心的書。

——Paul Kingsnorth · 《獨立報》

必讀之作。

——Craig Sams (英國土壤協會主席)

帕特爾對世界糧食體系的沙漏式比喻很有說服力。發人深省的好書。

——《澳洲書評》年度書籍

過去幾年，糧食體系成了眾多作家的關注焦點，包括《速食共和國》作者Eric Schlosser與《到底要吃什麼?》作者Michael Pollan。帕特爾對這個主題做了全面而有熱誠的研究，檢視企業力量與全球貿易市場如何傷害農民與消費者。他成功地將許多看似無關的議題連結起來，包括飢餓、肥胖、自由貿易、鄉村人口流失以及食品安全，描繪出被貪婪企業控制的食物體系的樣貌。

——《環球郵報》

他的文筆流暢生動，有熱誠與堅持，在學者中是少見的。他揭露企業如何販賣我們的食物，並如何決定我們吃什麼、不吃什麼。他據理力爭：要改變我們自己，就要改變世界；要改變世界，就要改變我們自己。兩者缺一不可，也都是不容易的事。……這本書的一個主旨就是，不論現行食物體系的缺失是發生在何時、何處，都已經有人起來組織行動、予以反擊。這正是本書傳遞的正面訊息，它不只是描繪駭人的景象而已。

——英國《晨星報》

備受推崇、真摯詳盡的全球糧食政治研究！

——《出版情報》

帕特爾的書提出了嚴謹的論述。他敘述現行糧食體系的歷史發展，證明現行體系是新近形成而不可能長久維持的。……他呼籲我們建立一個更健康的 world，更重要的是，一個公正的世界。

——Judith Rice, 《衛報》

本書大膽評估全球糧食市場的真實成本——這些成本不只包括社會、環境、政治，還有最重要的，人性。……它會讓你下次去超級市場時思考得更多一點——這是往正確方向的微小但重要的一步。

——Hephzibah Anderson, 《每日郵報》

憤怒、雄辯、震撼人心，本書有力地提出了一個公正的食物體系，讓每個人可以活得更健康。

——Jenny Lunnon, 《今日牛津》

〈推薦序〉

正視農業，才能解決問題

248 農學市集召集人 楊儒門

二〇〇二年台灣加入WTO的時候，大概很少人會去意識到，有一天會出現所謂的糧食危機。記得彭明輝老師在當時講過一句話：「十年以後，我們要吃什麼？」這好像無關重要的一句，不到十年，在七年後的今天，我們就因為物價糧價飛騰，而開始去想到、思考到：「有一天，我們要吃什麼？」

以前人常講：「台灣人什麼沒有！錢最多。」沒有的東西，進口就行。一片豪氣，總以為什麼都買得到，只要我們有錢就行！別人總像老太爺似的，伺候著我們。殊不知，全球糧食的生產總數，只有四％作為貿易用途，而且八〇％的交易量都掌握在ADM、邦吉、嘉吉、路易達孚這四家公司的手中。如果我們不去生產，那等於是把自己的喉嚨放在別人的手上，生死由人！看看「迦納」這個國家，再想想自己，有時，真是難以想像。

包括農委會和政府官員常講的是：「台灣的糧食自給率達九〇％。」這是事實嗎？應該

是「稻米」的自給率達到九〇%。大家忘了一點，台灣從五〇年代政策宣導「多吃麵、少吃米」、「麵粉代米」開始，就已經有慢慢將主食轉為麵食的習慣。到現在，每一年小麥的食用量，大約是一百二十萬噸左右，幾乎是全部倚賴進口。稻米的食用量大約是一百五十萬噸左右，一成左右是靠進口，自給率在九成左右。

稻米和小麥都是台灣的主要糧食，比率大約五五%比四五%。我們「只有」稻米一項有九成左右的自給率，而小麥近乎於零。所以台灣真正的糧食自給率是五成左右。而三十萬噸的稻米安全存量，實際上不到一個半月的準備額度。

復耕是不是像政府講的如此容易？隨便講講，明天稻米就會從田裡頭長出來了？是這樣子嗎？有三點是需要考慮的。一、台灣行之有年的「休耕政策」，造成了多少農民的轉業和農耕機械的淘汰，要如何找回農民和農耕機械？二、休耕地長年缺乏管理，病害、蟲害、雜草、老鼠和蛇的問題，要如何在短期間之內控制？三、因為休耕而缺少管理和維修的水利設施，要如何去做修復的動作？

另一點需要去考慮的是：「水資源的分配問題」。台灣只要發生缺水的問題時，第一個方案都是要求農業休耕配合。政策有：「停五供五。就是減半，分區供水。」農委會表示，由於農業忍耐缺水的程度比其他產業高，往往在旱災期間，民生和工業用水不足時，就需要農業用水的移用，農業則採取輪流灌溉，或是休耕的方式。但看看水利法第十八條是怎麼規定的

吧。用水標的之順序是：「一、家用及公共給水。二、農業用水。三、水力用水。四、工業用水。五、水運。六、其他用途。」政府做事有照法令走嗎？

就算上述問題都解決了，稻作種植下去後，生長期大約在四個月左右，這段時間都要老天保佑，不能有任何的颱風、豪雨、旱禍、蟲害……只要在其中一天出了天災，輕則短收，重則粒米無收。

正視問題的發生，而不是一味逃避、掩蓋，才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方式。積習已久，當引爆點來臨，真的就會發生糧食危機，那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糊弄過去的。要緊的是：政策方向在哪？配套措施為何？

看完這本書，可以給我們更深的思考，並鼓勵我們積極行動。

〈推薦序〉

令人深思的立體的糧食體系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劉必榮

初看這本書的書名，我會認為它是一本關於國際政治或國際經濟的書。可是把這本書讀完後，卻發現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作者把跟糧食有關的各個面向，從上到下，從裡到外，徹底地做了梳理，涵蓋了經濟、政治、農業、環境、文化等相關層面，使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糧食問題，不再是單薄的平面，而是一個立體的圖象！用功之深，令人佩服，也讓我們真正體會到，唐詩「豈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到底是什麼意思。

近一兩年，氣候問題導致糧食供需失調，能源危機讓許多糧食被拿去生產生質燃油（植物油價格漲了百分之八十，這是一個主要原因），以及燃油漲價造成食物成本上揚等等，都使糧價飆升。

以氣候變遷為例，澳洲的德尼利昆碾米廠本是南半球最大的磨坊，能生產足以供應兩千萬人每天食用的穀物，結果禁不起六年的乾旱，在二〇〇七年十二月關門了。雖然澳洲的科學

家也在研究少水的耕作方式，但因農人多已將水權永久轉賣給葡萄園，所以澳洲稻米生產已經減少了三分之一。這對糧食供給當然是一大衝擊。

也有科學家指出，下雨時間的改變、雨量的增加，比溫度上升對穀物的影響更嚴重。溫度上升，對北方的加拿大與俄羅斯稻米倒是有幫助的。但也不可能把這些稻米運到赤道附近，去餵飽非洲的貧窮國，因為路途太遠又顯得不實際。事實上，資料顯示，百分之九十的稻米，都是在種植地就消費掉了。過去二十五年，全球稻米的消費就大於生產，今若再加上囤積，問題就更嚴重。

為了確保糧食的供應，各國紛紛與糧食出產國簽訂密約保糧。像烏克蘭就和利比亞簽約，劃了十萬公畝的土地，為北非國家種燕麥。埃及和敘利亞也簽了以物易物的協定，埃及提供敘利亞稻米，交換敘利亞提供埃及燕麥。有的人因此擔心，這會不會因此造成新的殖民主義。

這些我們常關心的問題，都只是糧食問題眾多面向的其中一個，屬於糧食生產國家產量「減少」的一面。那「盛產」糧食的國家，情況又是如何？作者在書中詳細介紹了巴西的狀況，非常精采。

如果我們說美國是世界的市場，中國是世界的工廠，印度是世界的辦公室，沙烏地阿拉伯是世界的加油站，那巴西就是世界的糧倉。巴西已經投入耕作的土地面積有一萬七千五百萬

英畝，還可再投入三千五百萬英畝，使巴西可耕地的面積達到中國的六倍。巴西的農耕經濟規模也相當嚇人：美國中西部農場的地塊，一塊地大概是一千五百到兩千英畝，但是巴西中西部的一个現代農莊，卻可以達到兩萬英畝！所以他們是用GPS定位的自動轉向拖拉機在工作！

巴西的黃豆更是出口大宗。根據本書作者的調查，巴西在一九九五年的時候，就有每年將近兩千萬公噸的大豆被送往加工廠。書中講了一個例子相當鮮活，作者說巴西大豆之王瑪奇有一次充滿豪情地對美國大豆業者提出忠告：「停止種植大豆，轉種其他農作物，比如說玉米。世界對大豆的需求，就由我們來負責滿足！」我們不在現場，但經由作者所引述的對白，我們在腦海裡幾乎也可以想像出來，這個大豆之王在說這句話時，臉上有神氣！

可是作者卻用很多具體的例子，告訴我們巴西的經濟是被扭曲的。比如森林的砍伐，農作物的單一化，以及奴隸制度等等。這就好像當初荷蘭因為發現北海油田，結果弄得國家經濟都往石油產業傾斜，而造成經濟發展失衡，也就是所謂的「荷蘭病」。

作者的分析不止於此。他更往下分析，跨國企業在這種經濟扭曲中扮演什麼角色，美國和巴西種植大豆的農人，彼此之間有什麼相互被扭曲的成見（這是文化層面），以及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為什麼會被稱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社會運動（社會層面）。就這樣，政治經濟的分析，帶進來了文化與社會面向，讓這本書變得更豐富，也更有滋味。

此外，因為這本書講的是世界糧食「系統」，所以就要顧到「買的」與「賣的」兩端。就如同我在演講國際關係時，經常提醒台下聽眾，要有「立體」的國際觀。比如我們研究石油問題，就一定要包括三個部分：產油國（石油如何影響他們內部的政治與經濟？因石油而致富的大亨，如何化解或無法化解與政治領導人之間的緊張？油國如何在油田與油管之間保住自己的優勢？）、石油進口國（他們如何在全球搶油？衝突與合作之間，可有什麼定律？）以及買油與賣油之間的聯繫（石油帶來的國際經濟遊戲規則）。糧食問題也一樣，既然講到糧食的系統，就要有立體的思維，討論到賣的、買的，也要討論到中間的連結：這些食物是怎麼到我們手裡的。

怎麼到我們手裡（或嘴裡），當然得靠一套產銷系統。所以作者又用了一些篇幅，討論超級市場的出現，以及超市的商業模式如何影響我們的消費習慣。一下子，看起來好像很遠的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就又和我們日常生活連了起來。人們也才發現，國際關係其實跟我們並不遙遠。

因為談到選擇糧食的自主權（也就是糧食體系的接收端），作者在最後一章特別呼籲要重新取得「食物主權」。他建議幾種從個人出發的方法，比如「改變口味」、「吃當季、當地的食物」、「吃得符合農業生態」、「支持地方產業」，最後到改造農村、支持永續糧食建設等等。這些倡議又使本書看起來不像國際政治或國際經濟的書，而像一本某種社會運動的啟蒙

書。

這就是我一開始講的，這本書的多面向特色。往好的方面講，它非常豐富，而且是全方位，不同領域的讀者都可以在裡面找到自己有興趣的部分。往壞的方面講，就是主軸容易分散。這有點像電腦的超連結概念，從一個問題的討論或概念介紹，一下子跳到另一主題（比如談到超級市場，就可能有人一下子注意力會跑到超級市場的動線設計、超市的管理、沃爾瑪和A & P的經營模式比較、隱私權的保護等問題之上，而忘了作者其實在討論糧食問題），然後再跳回來。所以讀者在讀的時候，一定要牢牢抓住一個中心點，就是作者在談的是「糧食體系」，這樣才能在豐富知識的同時，不會迷失方向。

還有一個主題我們可以放在心裡的，是「權力」的概念。本書英文書名的子標題是「市場、權力與潛在的戰爭」，於是我們還要問，在這樣的糧食體系之下，「權力」在哪一方？為什麼在他那邊？如果這是一場潛在的戰爭，那麼在場上較勁的，是哪幾造？這幾造會不會變化？權力又會不會消長？產銷制度的決定權和權力關係之間的「因果關係」如何分辨？把這幾個問題放在心裡，然後慢慢讀這本書，時時合起書來想想，然後再往下看，會有更大的收穫。

所以我願意把這本書，推薦給所有對糧食問題有興趣的讀者。

〈推薦序〉

一個新生活的啟蒙運動

中廣董事長 趙少康

「全世界超重人口的數目（十億人）大於飢餓中的人數（八億人）」這句諷刺的敘述，就是本書開宗明義丟出來的問題。想想看我們每天吃了多少食物，卻很少思考它們的來源、生產與運輸方式，更別提整個糧食體系下的資源分配問題。為什麼亞洲和非洲會發生饑荒？為什麼全世界有層出不窮的農民自殺事件？在印度，那裡的人要銷毀數百萬噸的農作物或任其在倉庫裡腐爛，但另一方面，最貧困人口的食物品質卻是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以來最差的，這種兩極化現象是為什麼？還有去年登上國際新聞的海地，這個加勒比海國家在一個月內米價與豆價飆漲一倍，一年中物價飆漲至少百分之四十，引發群眾抗議、釀成暴動，總理因此下台；不只是海地，聯合國糧農組織評估全世界有許多國家處於糧食緊急狀況，甚至可能導致各地動盪、發生戰爭。這又是為何？

本書作者為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做了一個很好的比喻：沙漏般的食物體系。

作者認為，飢餓與肥胖是一體兩面的問題。將食物從農田送到我們菜盤中的生產鏈，把肥胖與飢餓的人聯繫在一起。販售食物給我們的大公司，在利潤動機的驅使下，塑造也約束了我們選擇食物的管道，同時影響我們認識食物的方式。以咖啡為例，喝咖啡的現代人多不勝數，大街小巷咖啡店林立，有人一天飲用不只一杯，彷彿一場「咖啡運動」。為了應付這麼多的需求，結果是全球咖啡生產量過剩九億公斤。你也許會認為，有這麼多產量，我們喝的咖啡應該會便宜吧？但是，從咖啡種植園到我們手中杯子裡的熱咖啡，中間的層層環節多著呢！

東非的咖啡農收成後，賣給當地中間商，中間商轉賣給咖啡加工廠，加工後的咖啡經過裝袋，再運到大型咖啡出口商，還要經過挑選、分級、保險、海運等環節。等到咖啡終於到達某大咖啡商的處理廠，每袋咖啡成本已經遠遠超過咖啡種植者所拿到價錢的十倍之多。然而更大的差別在這裡出現了：當咖啡終於烘焙出來，價格升至原產地價格的二百倍！

咖啡種植者和飲用者的人數眾多，咖啡加工商和出口商數量也很多，但這中間的配送鏈上存有一個瓶頸。咖啡農收入極少，必須省吃儉用才能勉強維持生活；擁有高度品牌忠誠的咖啡公司的利潤卻是有增無減。我們一般消費者在超市雖然看到繁多的咖啡種類，但咖啡品牌其實也就那少數幾家。這種情形在其他食品領域也是如此。在耕地到餐桌的中間配送階段，權力集中於很少數人手裡。這是因為，長途運輸、加工、裝車等流程需要大量資本，只有足夠多的資本才能玩得起這場遊戲。企業規模愈大，運輸和物流業務愈多，企業成本就愈低。總之，在

國際食物配送市場，家庭企業難以生存，小公司早就被大型配送和供應商兼併了。在由種植者到消費者之間的通道上，企業數目很少，因此這些企業擁有雙重權力，既控制種植者，也控制消費者。

稍微關心全球饑荒現象的人大概都曉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曾經研究，現代的饑荒其實不是因為糧食的缺乏，而是因為人們買不起食物。沈恩觀察一九四三年的孟加拉大饑荒之後，發現當時孟加拉其實不缺食物，反而有豐富的糧食資源。饑荒是因為人們都知道「物以稀為貴」，所以大量屯積糧食。而街頭那些人因為付不出錢買食物，才會死於飢餓。戰勝飢餓的唯一辦法，就是保障窮人的權益，讓他們能夠擺脫商人的詭計，突破這個沙漏一般的食物體系。

台灣的讀者也別以為糧食缺乏或其他糧食體系的問題離我們很遙遠，舉個例子吧，我們常常吃的豆腐、豆漿、沙拉油等豆類食物來源「黃豆」，台灣現在已經幾乎沒有種，都是從美國進口而來。讀者可以看看本書第七章如何討論「黃豆」生產與配送過程，這一章的敘述相當精采：原來黃豆產業的戰火早已跨越了國界，原來黃豆產業盛行奴隸制度，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吃的某些食物裡含有黃豆成分！

所以讀過本書之後，我們真的都該學習作者在最後一章的建議：要收回我們的主權，我們不應只當消費者，還要建立新的食物體系，改寫權力關係，讓種的人和吃的人都不再被剝

削。不管是改變飲食口味或支持地方產業，還有許多方法可以展開具體行動。這可說是一個新生活的啟蒙運動。這本書讓我們拿回知的權利，但如果不去努力，注定會失敗。

目錄 | CONTENTS

5	4	3	2	1			
消費者是我們的敵人——食品業之基本介紹	只是渴望麵包	你變成了墨西哥人	解剖農村	前言	〈推薦序〉一個新生活的啟蒙運動	〈推薦序〉令人深思的立體的糧食體系	〈推薦序〉正視農業，才能解決問題
137	109	77	47	25	趙少康	劉必榮	楊儒門

1 前言

肥胖與飢餓的空前矛盾

人類今日的糧食生產總量，超越了歷史上的任一時刻。然而在此同時，地球上處於飢餓狀態的人口卻超過十分之一。諷刺的是，伴隨著這八億飢餓人口的是另一個歷史記錄，那就是超重人口的數目達到十億人，遠大於飢餓中的人數。

飢餓與肥胖是一體兩面的問題。解決全球饑荒，不僅與克服糖尿病、心臟病流行有相同的解決之道，同時也是根除許多環境與社會病徵的途徑。將食物從農田送到我們菜盤中的生產鏈，把肥胖與飢餓的人聯繫在一起。販售食物給我們的大公司，在利潤動機的驅使下，塑造也約束了我們選擇食物的管道，同時影響我們認識食物的方式。這種束縛最明顯之處在速食連鎖店內，人們在那裡能做的選擇不外是滿福堡或麥克雞塊。就算我們覺得自己可以擺脫麥當勞等

CONTENTS | 目錄

致謝	393
10 結論	363
9 食物選擇我	321
8 超市巡禮	275
7 神奇的黃豆	215
6 化學的生活比較好？	161

連鎖店的束縛，其他的限制仍然存在於隱形體系之中。

即使我們希望買健康食物，一些吃了之後能夠遠離醫生的食物，人們還是被綁在這個創造了我們「速食國度」的體系裡。以買蘋果為例，在歐洲和北美，消費者能夠選擇的品種不過幾樣：富士蘋果、貝賓蘋果、史密斯青蘋果、金冠蘋果等等。為什麼是這幾種？因為它們看起來很漂亮——人們喜歡表皮光滑、無瑕疵的蘋果。這些蘋果的口味被大多數人接受，而且它們經得起長途運輸。從果園到超市的貨架，這些蘋果不容易因運輸過程中的碰撞而受損或破皮。經過上蠟和塗上其他化合物後，這些蘋果可以保持良好外觀，擺上貨架時看起來很漂亮。此外，它們易於種植，適合施用農藥以及大規模生產。同樣的這些原因，也讓我們很難在貨架上找到卡勒城、黑牛津、雷內特、西納普或傳統受人喜愛的蘭博蘋果。很明顯，我們的選擇並不全然屬於自己。超市裡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商品並非由我們選擇，不是由季節選擇，不會是我們想要的品種，不會包含所有的蘋果品種，也無法找到所有不同營養和口味的品種。事實上，食品公司的力量，決定了我們眼前的選擇。

食品生產商關心的問題，當然不只是超市貨架擺出的商品。他們在乎利潤，而這正是現代食物體系核心腐敗的關鍵。要了解少數人如何在食物體系裡影響多數人的健康，我們需要進行全球範圍的調查，從巴西的「綠色沙漠」到現代都市的辦公大樓，從人類最早作物的歷史到「西雅圖之戰」¹的抗爭。這樣的調查會讓我們發現：為什麼亞洲和非洲會發生饑荒？為什麼

全世界有層出不窮的農民自殺事件？為什麼我們對自己吃的食物成分一無所知？為什麼在美國黑人比白人更容易超重？為什麼在洛杉磯中南部有那麼多牛仔？而世界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又將如何讓我們重新思索食物，改變我們與食物的關係？

以符合環境永續發展和社會正義的食物消費和生產方式，來替代當前的食物消費和生產模式，將有助於解決飢餓及跟飲食相關的疾病。了解其中存在的問題，會給人更大的飲食自由，也讓人重新體會飲食的愉悅。這個任務非常緊迫，它的獎賞也非常可貴。

在世界上每個國家，肥胖與飢餓、貧困與富有之間的矛盾都正變得日益尖銳。舉例來說，印度一方面銷毀數百萬噸的農作物或任其在倉庫裡腐爛，另一方面，最貧困人口的食物品質卻是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以來最差的。一九九二年，當營養不良問題開始侵襲城鎮和村莊裡的最貧困家庭時，政府卻讓外國飲料製造商和跨國食品公司進入一直受保護的印度經濟。不到十年，印度就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糖尿病患者集中地：許多人（通常是兒童）因為吃了太多錯誤的食物而身體惡化。

印度不是出現這種矛盾的唯一國家。這是全球性的問題，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也存在。二〇〇五年，三千五百一十萬美國人不知道下頓飯的著落何在。然而，美國的食物其實是愈來愈多，也有愈來愈多人罹患糖尿病之類的飲食相關疾病。

人們很容易對這種矛盾習以為常。我們在日常生活所見的矛盾版本，只會讓人輕微不

快，例如在前往琳琅滿目商品的超市途中，我們會看到諸如「無家可歸、無飯可吃」之類的乞討標語。要安撫你不安的良心，也許可用這帖道德的鎮痛劑：窮人之所以餓，是因為他們懶；而有錢人之所以胖，是因為他們吃得太好了。這種通俗的看法由來已久。在每種文化中，或多或少都存在這類觀點，也就是將身體理解為一種公開的帳簿，上面記錄的是種種個人的壞習慣。但是，這種怪罪個人的語言卻無助於我們理解為何飢餓、富足、肥胖的共存現象是如此前所未有。

只有當被譴責的人有能力做出不同選擇，道德譴責才有效果。然而，飢餓和肥胖影響眾多人口，他們各有不同的背景，來自不同的地方，因此很難說是個人不良習慣造成的結果。我們之所以無法做出正確判斷，部分原因是我們對身體的認識已經過時。肥胖是富裕的同義詞這項認定在過去也許是事實。但如今，肥胖已經不再等同對個人財富的詛咒。事實上，肥胖人口有著許多共同的特徵。這裡舉個例子：墨西哥是平均國民所得六千美元的發展中國家，該國目前青少年肥胖人口的比例前所未有的高，而同時，墨西哥貧困人口的數量也在以同樣的速度增加。個人財富無法解釋為什麼某些家庭比其他家庭更容易出現肥胖兒童；關鍵原因不是收入高低，而是與美國國界的遠近。研究發現，住得愈接近美國，生活愈接近美國那種多糖、多脂肪飲食習慣的墨西哥家庭，他們的孩子就更容易超重。地理因素的影響如此關鍵，推翻了個人選擇能夠預防肥胖（或飢餓）的觀點。這重新讓人回憶起十九世紀末墨西哥總統、獨裁者迪亞斯

（Porfirio Diaz）的哀歎：「可憐的墨西哥啊！你離上帝如此之遠，離美國又如此之近。」

沒錢大吃大喝的人也可能肥胖，這是當前食物供應體系造成的異常現象。例如，在巴西聖保羅的貧民區，那些在兒童時期營養不良的人成年後更容易肥胖。由於童年苦於貧窮，他們身體的新陳代謝和吸收功能變差，所以當攝入低品質的食物時，身體更容易儲存食物中的脂肪。放眼世界，窮人都沒有選擇高品質食物的本錢。即使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情況依然如此。在美國，為此付出代價的往往是兒童。一個研究小組最近認為，如果當前的消費模式不進行任何改變的話，今日美國兒童的壽命將會縮短五年，因為終其一生，他們都要與飲食相關的疾病相伴。

消費者被引導去相信一種觀點：以個人選擇為基礎的經濟體制，能使人免於集體飢餓與肥胖的危險。但其實，正是「選擇的自由」醞釀了這些危險。能夠到超市購物的人可能不免會猶豫：要如何從從五十種含糖的穀類早餐中做選擇？要如何從十幾種味如白堊的牛奶中做選擇？要如何從麵包架上那些含化學成分的麵包中做選擇？要如何從滿山滿谷的高糖分食品中做選擇？舉例來說，英國可供兒童選擇的穀類早餐有二十八種品牌，每種都是針對兒童為主要市場。但在這二十八種穀類早餐中，有二十七種含糖量超過政府建議的標準，其中更有九種含糖量達到百分之四十。因此不足為奇的是，英國六歲和十五歲孩子的肥胖比例分別高達百分之八點五和百分之十，並且，這比例還在不斷攀升。見微知著，兒童穀類早餐只是龐大食物體系中

的一例。食品製造商有絕對的動機販賣利潤高的加工食品，即使加工食品的營養更低。所以超市裡穀類早餐的種類比蘋果種類多，原因就在這裡。

食物選擇也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人願意食用的水果、蔬菜和肉類相當有限。不過，一點廣告宣傳就能擴大我們食物選擇的範圍。譬如說，奇異果曾被稱為「中國醋栗」(Chinese gooseberry)，一九五〇年代末紐西蘭一家食品公司為了破除冷戰的偏見，把它改名為「奇異果」，隨之成功推廣到世界食品市場。奇異果曾經是沒有人熟悉的口味，但現在卻像已經存在久遠的水果。雖然新的天然食物進入人們生活的步伐緩慢，但食品行業每年在超市貨架上推出的新產品可是達到上萬種，有些還成了日常生活必備，甚至在經過一代人之後，人們會覺得難以想像沒有這些食品的生活。這說明了我們烹調的創造力是多麼有限，也說明我們並不完全知道自己每天吃的某些食物是如何生產、在哪裡生產，又為什麼會出現在我們的碗盤裡。

失落的世外桃源

王老先生有塊地，伊呀伊呀喲，

他在農場養小雞呀，伊呀伊呀喲，

這裡吱吱叫，那裡吱吱叫，

這裡吱，那裡吱，

到處都叫吱吱，

王老先生有塊地，伊呀伊呀喲。

——傳統兒歌

大多數人能馬上想到的食物生產故事，都幾乎來自童話故事或兒童電視節目。我們不會去重溫童年時聽到的關於食物來源之類的神話，也就毫不質疑地保留如下觀點：農夫把種子種到土裡，澆水灌溉，等待陽光出來，農產品就會大豐收。這確實是一種食物生長過程的描述，但卻掩飾了最重要的環節。粉飾太平的農村樂的故事裡還提到，農業填飽了全球窮人的肚皮。然而，當食物的出處被簡化為單一的生產線，我們無法理解的東西就太多了，我們甚至缺乏問對問題的能力。

例如，誰是糧食生產中的主角？農民？他們的生活是如何？他們吃得起什麼食物？只有提出這樣的問題時，我們才有可能明白：原來世界上大多數農民都在受苦。有些農民賣掉了土地，成為自己原來耕地的勞工；有些農民遷移到都市、甚至國外；還有些農民選擇了自殺。

問題還可以繼續下去。例如，農民種植什麼作物？大多數農民的選擇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像是耕地類型、氣候條件、距離市場的遠近、信用貸款，以及糧食生產中各種有形、無形

因素。沒有人可以舔舔手指，指向空中，就馬上判斷出風向，知道下一年要種什麼。假如種的作物是為了賣掉而非自家消費，大多數農民，尤其是「南方國家」（Global South，我在本書用這個詞來指稱窮國）的農民，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們必須種植市場所要的作物。

農業終究是受到市場遊戲規則的制約。不過這樣的說法也掩蓋了一項事實：所謂的遊戲規則更像是農民的刀俎。如果農民真的有選擇作物的自由，要做出選擇也並非易事，因為他們必須在多種變數中尋找最佳選擇，沒有太多出差錯的空間。市場以貧困來懲罰做出錯誤選擇的人。對已經負債累累的農民來說，一個錯誤的選擇將導致破產。銀行和農業批發商研究出新奇的方法來處理破產的農民。例如，通過契約農業或土地租種協議，把原屬於某個農民的土地抵押給該農民耕種。但農民們似乎都願意屈就，接受這種新的耕種協議，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其他選擇。由於銀行以查封土地來威脅，對於農民來說，任何耕種方式，就算是喪失土地權的租種協議，都比無田可耕要好一些。

當農民被迫在這些耕種協議做「選擇」的時候，其他可行的耕種方式已被排除在外。而就在農民可以選擇的耕種方式愈來愈少的同時，權大勢大的組織、企業、政府部門的選擇範圍卻愈來愈大。在食物生產的每個階段所下的決定，都牽涉到各種各樣的因素，包括顯性因素和隱性因素。例如，由誰選擇農藥的安全等級，又如何定義「安全」？誰來決定食物生產地？誰來決定農民和農場工人的薪資？誰來決定食物加工技術是否安全？誰從食物添加劑中獲利最

大，並確保添加劑的好處勝過壞處？誰可以確定世界上到底有沒有足夠的廉價能源來運輸和處理食物？

對消費者來說，這些問題似乎離我們的生活很遙遠，甚至像火星上的事那麼遙遠。然而，這些因素影響農民，也同樣影響到超市貨架上琳瑯滿目的商品。追根究柢，到底是誰決定貨架上食品的種類？誰來確定食品價格？誰花了上百萬美元的費用發現麵包的烘焙味道和名歌手安妮·藍妮克絲的歌聲會刺激人們購買？誰訂出了窮人無法承受的高價？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我們在超市狹窄通道裡看目不暇給的產品，在收銀台看到了醒目的折扣價格，還有供應幾乎永不中斷的食品，這些都是誘餌。「便利」這個字眼麻痺了消費者的神經，讓我們不再提出嚴肅的問題，不問個人的口味和偏好如何被牢牢控制，也不問我們在超市裡的選擇如何奪走了農民種植作物的選擇。

普通農民的悲歌

國際樂施會（Oxfam）最近的一份報告，提供了我們思考食物生產鏈裡權力運作的材料。我們來看看烏干達咖啡種植者賽古亞（Lawrence Seguya）的故事吧。他是這麼說的：「我想請你轉告你們那裡的消費者，他們喝的咖啡就是我們所有問題的根源。」很多人對他的說法有

同感。卡夫魯茲 (Salome Kafuzi) 和十二個孩子住在一個咖啡種植場，她說：「我們一貧如洗。我們不快樂。我們很絕望。我們買不起生活必需品。我們買不起肉、買不起魚、買不起米，只有番薯、豆子和香蕉泥……我們沒錢讓孩子上學。」她的丈夫彼得更直接把他們的處境歸諸咖啡的價格：「我記得基博科 (Kiboko，當地人對曬乾咖啡豆的稱呼) 曾賣過一公斤六十九美分。那時候我們高枕無憂。我們可以養家活口。對我來說，基博科一公斤最少也應該賣三十四分錢。如果一公斤降到二十九分錢的話，我們就沒法耕種了。」而基博科目前的市場價格每公斤只有十四分錢。

經濟學的供需定律會認為，這些咖啡種植者應該退出該行業，轉從事其他工作。但假設前提是他們有其他工作可做。一般來說，他們根本沒有其他選擇。種植業的低收入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可怕的自我剝削，這是所有活在餬口邊緣的窮人的辛酸。咖啡農不放棄，也沒有流浪到城市或者種植其他作物，相反的，他們種植更多咖啡，直到精疲力竭。他們必須省吃儉用才能勉強維持生活，有時，為了在絕望中生存，只能不情願地破壞自然環境。結果造成全球咖啡生產量過剩九億公斤。你也許會認為，有這麼多咖啡，我們喝的咖啡應該會便宜了吧？但是，從咖啡種植園到我們手中杯子裡的熱咖啡，中間的層層環節還多著呢！

賽古亞和家人住在一個適合種植咖啡的地方，那裡海拔高，地勢多起伏。換言之，他們的土地不適合種植其他作物。所以他們面臨的選擇很簡單：不是種咖啡，就是餓死。於是，他們選擇了繼續種咖啡。

他們以每公斤十四美分左右的價格，把咖啡賣給了當地中間商，中間商以每公斤十九美分的價格轉賣給咖啡加工廠。然後，加工廠索取每公斤五美分的加工費用，不過這價格也很難維持加工廠的經營。葛瑞緹 (Mary Goreti) 在基敦圖經營一家咖啡加工廠，她說：「現今利潤已經低得不能再低了，電費太高……而且沒什麼人送基博科來。由於價格太低，很多農民根本不把咖啡賣出去。如果咖啡價格持續這麼低的話，我的生意就垮了。每天才加工十袋咖啡，哪裡需要開一家加工廠呢？」但對她來說，不開咖啡加工廠又能做什麼呢？所以，葛瑞緹每天還是繼續開門營業，加工咖啡。

加工之後的咖啡經過裝袋，以每公斤二美分的運費運到烏干達首都坎帕拉，這時，咖啡的價格已達到每公斤二十六美分。但這層環節也沒有高額利潤。卡魯漢加 (Hannington Karuhanga) 是烏干達大型咖啡出口商烏干達咖啡公司 (Ugacof) 的經理，他從每噸咖啡中能賺到十美元的利潤，也就是每公斤一美分的利潤。但這是指優質咖啡的利潤。他說：「有些咖啡的品質太差，根本不值得長途運輸，將它們銷毀的成本還更低些。」運輸咖啡只是一系列複雜程序的一環，在咖啡進入烘烤器之前，還有挑選、分級、保險、海運等環節。等到咖啡終於到達倫敦西部的雀巢咖啡處理廠的時候，價錢已經升到每公斤一點六四美元了。在雀巢飲品加工廠門前，每袋咖啡成本遠遠超過咖啡種植者卡夫魯茲或塞古亞所拿到價錢的十倍之多。然而更

大的差價在這裡出現了：當咖啡終於烘焙出來，價格升至每公斤二十六點四美元，是烏干達咖啡種植園價格的二百倍左右。

就在咖啡農寅吃卯糧的時候，雀巢公司的利潤卻有增無減。二〇〇五年，雀巢食品和飲料銷售額達到七百多億美元。由於品牌忠誠度高，在市場上又占有支配地位，雀巢公司只要願意，完全可以提高咖啡的收購價格。但是，它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雀巢不是慈善機構，它是世界上諸多企業裡的一員，受資本主義市場規則的支配：也就是「低進高出」。由於規模龐大，雀巢公司有力量訂定交易條件，壓縮種植者、加工商、出口商及進口商的利潤。如果烏干達咖啡業破產的話，那也不成問題。世界銀行已經將越南引入全球咖啡市場，那裡的咖啡價格更低於其他國家。所以，不管在哪裡，咖啡農都在掙扎中生存，他們必須受到遙遠的國際市場的影響，互相競爭。對於未來，他們很難有什麼選擇，甚至根本沒有選擇。而同時，那些想要提高價格的農民，面臨來自食品產業巨頭的壓力。衣索比亞農民最近開始把自己命名的咖啡豆——西達摩 (Sidamo)、哈拉爾摩卡 (Hara)、耶加雪啡 (Yirgacheffe) 註冊為商標，希望將收入提高百分之二十五。但此舉幾乎一開始就受到星巴克的反對。星巴克一年營業額相當於衣索比亞全國歲收的四分之三。在本書付梓之際（二〇〇七年），衣索比亞農民和星巴克之間的爭端仍在繼續。

大型企業非常不願放棄對整個食物體系的控制。不過，雀巢、星巴克和其他食物大企業都有著冠冕堂皇的辯詞。他們以消費者或「消費者自由」之名，把種植作物的農民收入壓得很低，大大降低農民收入增加的機會。而且重點是，這招的確有效。在我居住的南非東部港口德班市的一家Pick & Pay超市裡，有一百零七種品牌的咖啡出售，在十五英尺長的貨架上，擺滿了形形色色的烘焙咖啡，而種類最多的就是雀巢。一眼望去，盡是雀巢的黑色包裝。

食物體系的瓶頸圖

咖啡種植者和飲用者的人數眾多，咖啡加工商和出口商數量也很多，但這中間的配送鏈上存有一個瓶頸。這種情形在其他食品領域也是如此。在耕地到餐桌的某個配送階段，權力集中於很少數人手裡。圖11說明了糧食從種植到消費過程中的權力集中情況。第一組數字是荷蘭、德國、法國、英國、奧地利和比利時幾個國家的加總數據。第二組數字顯示美國的類似數據，這些數字需要小心解讀。比如說，種植糧食以供應歐洲和北美市場的農民總人數，實際上遠比圖中的數字多。畢竟，數百萬農民和農場工人種植著各類供應出口的熱帶水果和蔬菜，而他們居住在世界上最富裕國家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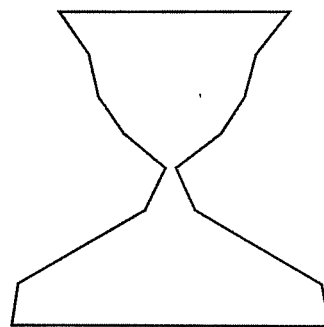
圖11沙漏中的瓶頸，正是食物體系的權力所在。由於種種原因，現今世界上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家企業買主和賣主。長途運輸、加工、裝車等流程需要大量資本，只有足夠多的資本

才能玩得起這場遊戲。同時，這也是個規模經濟的遊戲，企業規模愈大，運輸和物流業務愈多，企業成本就愈低。總之，在國際食物配送市場，家庭企業難以生存，小公司早就被大型配送和供應商兼并了。在由種植者到消費者之間的通道上，企業數目很少，因此這些企業擁有雙重權力，既控制種植者，也控制消費者。

觀察整個行業及其中大型公司的規模，可以衡量這些居於核心地位的企業的權力。二〇〇四年，食品零售商的總收入達三兆五千億美元，種子銷售商年收入為三百一十億美元，農用化學品行業的銷售額為三百五十億美元，食品加工業年收入為一兆二千五百億美元（可對比：二〇〇五年加拿大的國內生產毛額為一兆一千億美元）。如果這些行業的產出讓人營養過剩的話，二千四百億美元產值的全球減肥行業會樂意幫忙。至於在那些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國家，二十億美元的食品援助產業可以幫忙。這還沒有計算該行業背後的石油產業數字。與此同時，消費能力強的人卻彷彿讓卡路里變得廉價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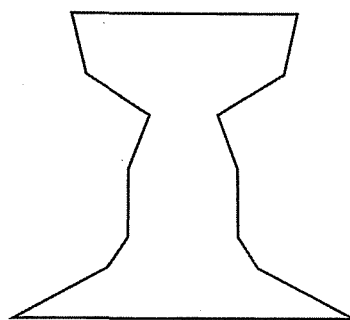
食物體系的核心企業由於規模龐大，可以不用遊戲規則來辦事。他們能影響遊戲規則。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組織裡，大企業經常向政府遊說，以創造對己有利的經濟環境。除了其他類型的協助外，貿易協定是政府幫助這些核心企業的重要途徑。如果某項海外投資項目有風險，由公共資金支持的出口信用機構或者世界銀行可以協助承擔這些風險，或者也可以說服某國政府承受該風險。如果某個國家以健康、安全或環境為理

荷蘭、德國、法國、英國、奧地利和比利時



農民／生產者：3,200,000
 供應商：160,000
 半製造商：80,000
 製造商：8,600
 買家：110
 連鎖超商：600
 經銷門市：170,000
 顧客：89,000,000
 消費者：160,000,000

美國



農場經營者：3,054,000
 農場所有者：2,188,957
 農產品原料批發商：7,563
 食品製造商：27,915
 食品及相關產品批發商：35,650
 食品飲料零售店：148,804
 消費者：300,000,000

圖1.1

沙漏：食物體系的參與者與權力集中情形
 （資料來源：Grievink 2003, US Census 2000, USDA2007）

由，拒絕接受某個特定產品，就有可能遭受直接的外交壓力。

為了避免官商勾結的指控，政府設法把干預食物體系的行為偽裝成符合國家利益的模樣。一般而言，提供援助的政府官員確實相信這種觀點，而公眾無疑也受益於某些政府計畫，例如美國羅斯福新政、歐洲福利國家和印度公共分配系統等。但政府的動機很少是單純的。舉例來說，政府對貧困問題的關心從來都是出於恐懼，而不只是擔心大批飢餓和憤怒的城市窮人透過政治組織來危害城市富人的安全。在二十世紀初的英國，商人兼政治家羅德斯就熱心於倡導殖民主義，藉以安撫街頭那些嚷著要麵包吃的憤怒工人。其他歐洲國家和北美也以各種方式制定糧食政策，以確保都市裡的飢餓問題不會引發內戰。

換個稍稍不同的說法是，目前的食物體系不是從天而降的安排方式，而是不同需求和渴望的妥協結果：食品企業追求更高利潤，政府顧慮社會動盪或選舉失利，都市消費者也有自己的需求和渴望。在這個說法底下，農村的人被忽略了，他們只是默默受苦。然而，他們正是目前領導建立新食物體系的人。他們必須這麼做，因為他們正面臨死亡。

追尋真正自由

沒有人會認為鄉村輓歌動聽，對垂死的農民更是如此。隨著愈來愈多作為抵押品的土地

落入銀行手中，被重新規畫和使用，全世界農民的自殺率遽增。然而，失去了土地的農民並沒有變得沉默。農民一直在反抗，並將繼續反抗下去。食物體系成了戰場，雖然很少人了解已有的傷亡到底多少。直到最近，消費者才開始為如何吃得好而煩惱，然而長遠以來，農民們卻一直為日漸消失的自由而反抗。從上千萬成員的印度卡納塔克邦農民協會（K R R S）到墨西哥農民組織，全世界有大批團體不僅在對抗這個食物體系，有時還在抗議中犧牲；他們也在為新的食物體系而努力，並且有尊嚴地活著。

例如，美國、印度和墨西哥的農民組織把對低價糧食的不滿，從農田裡帶到了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場外，帶到那些購買他們勞動成果的企業（例如塔可鐘〔Taco Bell〕墨西哥速食連鎖店），帶到從種子和農藥銷售中賺取利潤的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也帶到鼓勵農村私有化的政府部門大樓外。

在巴西，一百多萬無地可耕的農民組織起來，占據了大片廢棄農場。結果是，他們的生括比依靠政府規畫生活的農民更健康、更長壽、更文明。這一運動就是著名的「巴西無地農民運動」（MST），他們隸屬於「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這據稱是世界最大的獨立社會運動組織，成員有一億五千萬。加入「農民之路」的團體還包括人數達到二千萬的印度K R R S、加拿大的全國農民協會、韓國婦女農民協會、法國的農民聯盟（Confederation Paysanne）、莫三比克的全國農民工會（Uniao Nacional de Camponeses）等，眾多組織的加入使

得「農民之路」就像它反對的力量一樣：全球化。它是社會運動的混合體。有些成員沒有土地，有些成員擁有土地並雇用無地者；有些是小生產者，而有些是中型生產者。如果把加拿大的小農場放在印度，已可以算莊園的規模了。顯然，並非所有的農民都是平等的；農民組織也是如此。即使在同一個國家，龐大的差異也存在。以美國來說，黑人農民的生活就比白人農民困難。一九九九年美國農業部曾就一個大規模的反歧視訴訟案件達成和解，同意對聯邦政府長期以來農民補助一直歧視黑人的措施做出補償。然而，直到二〇〇六年，還有很多農民沒有得到聯邦政府的任何賠償。

在農民運動發生的地方，每個運動都面對特定的條件、限制、異議和武力等問題。然而，他們仍然能夠基於對國際食物體系的共識而聯合起來；也正是這共識促成我寫作本書。聯繫這些運動的並不僅限於共同理念，還有複雜而成熟的共同行動。二〇〇四年，當印度洋海嘯襲擊了印尼和斯里蘭卡農民和漁民，這些農民組織就積極協助災民重建。

如前面的沙漏圖所示，農民不是受食物體系濫權力量所苦的唯一群體。除了農民，消費者同樣也受到企業市場力量的束縛。當然，消費者地位與農民地位稍有不同，消費者可以透過改變消費地點來改變市場，即使其影響效果微乎其微。在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之間選擇，是大多數人的自由，不過這叫選擇嗎？許多社群組織正在為爭取更大的選擇權而奮鬥。他們努力重建選擇權，例如為有色人種建立非傳統的食物分配機制（加州奧克蘭的人民雜貨店），和重新

定義食物的概念（慢食運動）。一直以來，這些組織致力擴展食物體系，讓種食物的人和吃食物的人能拿回原本應有的選擇權。

當然，任何組織內都存在著矛盾。沒有純粹的意識型態可以自成血肉，也不存在完美和自由抗議的聖潔土地。我們都利用手中的工具締造自己的政治，在我們可以找到工具的地方締造政治。所以在本書裡，我也對書裡呈現的政治做出選擇。有些社會運動試圖讓歷史回到從前，想把農民們的不滿情緒轉變為保守的沙文主義和仇外行為。不過，本書不會提到這種導致美國「三K黨」出現的農村基進主義傳統。另外，追求「純淨食品」運動的歷史也不是毫無瑕疵。例如，英國土壤協會曾在一九三〇年代向英國法西斯聯盟提供農業方面的建議，兩個團體都熱中血液純淨和土壤純淨。一些環境主義者夢想質樸的農地和純淨的食物，沒有任何移民干擾，但這一夢想在歐洲和其他國家都沒有實現。美國的峰巒俱樂部²，便因為對移民問題持不同意見，最終導致分裂。

在本書中，我調查了那些針對食物體系的政治抗爭，它們帶有國際主義色彩，抗爭對象是企業全球化的趨勢；它們的視野廣闊，對移民的態度是接納而非排斥。雖然農地裡的處境令人絕望，不過，反抗運動一直存在著，而且在種子交流、文化交流及成功經驗交流的過程中互相融合。這些運動並非只是要代替糧食體系中淒涼故事的結尾，更是要不斷提醒人們，選擇是可以創造和想像出來的。除了回到從前，還有新的路可走。只要我們以冷靜的眼光審視現在的

位置與過去的失敗，就有新的可能。

本書章節簡介

本書以農田裡的選擇為起點，穿越世界食物體系的縱深，最終討論我們盤中食物的選擇。我觀察農村社群、企業、政府、消費者、行動份子和社會運動如何形塑食物體系。這個由不同群體的选择加總所形成的體系，造成了許多過飽的人和許多飢餓的人。食物體系的兩端是肥胖和窮困，而建構這體系者成了少數超級富有的一群。有時候，選擇造就了新的方法，讓人們更自由，與別人、與周圍世界更緊密地聯繫。而有時候，選擇只是更加淒涼。下一章，我們會調查農民自殺問題和破壞全球農村的力量。城市人很難看到農村的暴力事件；不論肉體暴力還是經濟暴力，都對農村社群產生巨大的影響。而在城市，我們看到農村荒廢後透過移民，包括國內移民和跨國移民，對城市帶來何種影響。第三章會檢視這些移民問題，並將它們放在貿易協定——改變現代農村最強大的工具之一——的脈絡中來討論。

貿易協定的歷史與食物援助、開發與叛亂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第四章討論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食物體系的演進。食物體系的設計是為了食物的重分配，以保證系統本身的穩定，卻沒有考慮過世界上最貧困人口的需要。第五章將對食物體系的大贏家（即農企業）進行

近距離的觀察。第六章說明這些農企業如何利用種族、科學和發展的觀點，進入了政府權力中心，繼而控制了生命最重要的源頭：種子。在此過程中，國家的歷史被改寫了，讓人們相信沒有其他選擇。第七章舉出具體的例子，以了解這些力量如何體現在黃豆（地球上最重要的作物之一）的種植過程中。

愈來愈多人是在購物中心與食物體系相逢，而不是在農田或工廠裡。於是第八章會討論超市這種最新、最強大的農企業。第九章反省一個問題：我們的口味是如何形成的？當前食物體系是如何限制人類的的生活，而不只是限制所謂的消費者？最後一章提出建議：要收回我們的主權，我們不應只當消費者，還可以建立新的食物體系，改寫權力關係，讓種的人和吃的人不再被剝削。當然，沒人能擔保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努力最終會成功，但若不選擇嘗試去做，我們注定失敗。

1 編按：一九九九年世貿組織在西雅圖舉行會議時所引發的「反全球化」群眾抗爭運動。

2 譯注：Sierra Club，是美國著名的環保組織，一九九〇年代該組織對於移民問題出現紛爭。一派人士認為，人口過剩是環境惡化的主因，因此他們主張穩定、甚至減少美國以及全世界的人口。另一些人則認為移民的問題與該組織的核心目標關係不大，捲入移民政策的爭辯反而可能削弱該組織能夠爭取的廣泛支持。

2 | 解剖農村

蹺蹺板，瑪潔莉朵的蹺蹺板，
傑克就要有新主人；
他每天只賺一美分，
因為他手腳都遲鈍。

蹺蹺板，瑪潔莉朵的蹺蹺板，
賣了床睡在乾草上，
如果不是髒婆娘，
為何賣床睡泥地？

——傳統兒歌

「閃耀的印度」的背後

孩子們在遊樂場上，一邊玩著盪鞦韆一邊唱著這首兒歌。隨著鞦韆上下擺盪，他們輕快活潑地唱出：蹺蹺板，瑪潔莉朵的蹺蹺板。他們只唱第一段，像唱祈禱文一樣唱出歌詞，不理會歌詞的含意，只是跟著蹺蹺板上下大聲唱出愉快的調子。第二段的歌詞從記憶中除去了，就像大多數孩子（以及住在城市裡的多數人）對鄉村生活的理解一樣。當我們偶爾想起農村的時侯，我們的印象是和諧、寧靜和無趣。為了保持田園樂曲裡的農村印象，農村的真實意義被遺忘、被消毒、被修剪，以符合都市人的觀點。但對本書而言，將鄉村生活美化毫無意義。要理解食物供應鏈過程中的限制，我們必須了解農村裡的抗爭帶來的傷亡，以及關於食物體系的不同思考和重建模式。

世界多數人口現在居住在城市裡，而城市影響農村的面貌。但農村也同樣反向影響城市，並且一直如此。可以拿來舉例的國家有很多，而一個具有普遍性且能引起人們興趣的例子就是印度。經過多年抗爭，印度終於在一九四七年脫離殖民統治而獨立，開始白手起家的奮鬥歷程。就某種程度來說，印度已經成功了。如今，在其他國家人們的眼裡，許多工作飛向印度，大批高技術工人永不缺乏，他們願意在低工資的條件下就業。資訊科技業的新貴們大肆炫耀該行業的增長率（二〇〇四至二〇〇八年之間為每年一九%），並招手歡迎政府在教育投資



中創造出的大批人才。許多宣傳都基於這些迷思。在二〇〇四年的大選，印度執政黨人民黨甚至競選文宣上印著人民的笑臉，以「閃耀的印度」（Shining India）為口號，歌頌經濟上的成就。但他們最終在大選中落敗。

當然，「閃耀的印度」口號還是反映了部分的事實。如果你到海得拉巴和班加羅爾的機場附近兩英里左右的地區看看，會看到不少「閃耀」的例子。美國甲骨文、微軟、諾威爾、英特爾、IBM和印度的資訊系統公司Infosys都在周遭擁有嶄新的辦公大樓，閃耀在薄霧裡的陽光下。印度安得拉邦的首府海得拉巴是一個快速變動的城市。從機場到商業園區到政府總部這條資金流通的走廊，被美化得相當漂亮，讓城市的老居民都無法辨識。夜晚時分，年輕人從辦公室裡走出來，成群深著緊身牛仔褲、騎著摩托車的青年呼嘯而過，像是遊行隊伍一樣；剪著短髮的女孩們騎著二百CC的摩托車，要從客服電話中心去咖啡館。這的確是種進步。然而，即使在同一城市裡，也不是每個角落的情況都如此。海得拉巴六百萬人口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在貧民窟裡，他們來到這個城市，夢想尋找更好的生活，但他們加入這些大學畢業的精英行列的希望，卻是愈來愈渺茫。

如果關於城市進步的描述掩蓋了城市的貧困，那麼，對印度農村的敘述則抹煞了生活艱苦的可能想法（除非是救贖性質的描述）。就像美國從「心臟地帶」傳出感人肺腑的故事，英格蘭的舊稱「阿爾比恩」（Albion）總是充滿農村風味，印度也有類似的感性描述：「印度母

親」。在這些故事中，國家的生命都誕生於農田之中，驕傲的現代國家（雖然城市人口多於農村人口）都以農村為根源。現實卻與城市人對田園生活的幸福想像頗為不一致。隨手舉些零星的例子：在美國，農村人口中死因與毒品相關的人數多過城市的人；在英國，農村年輕人以自殺結束生命的多過城市年輕人；而在印度，進步和完美的故事也都與農村無緣。

離開海得拉巴五小時外的地方，遠離了金錢、光芒和寬頻，在印度的農田裡仍然可以看到短髮的婦女及光頭的兒童。當我在一個炎熱雨季的下午見到瑪薩雅（Parvathi Masaya）的時候，她的短髮使她與村子裡的其他婦女看起來非常不同。她正在用樹葉做免洗碗盤，被我中斷了工作。與我談話時，她的六歲小兒子在她身邊搓揉著她的沙麗服，而八歲的大兒子在附近的一個教室裡，對著黑板與同學一起朗讀。

瑪薩雅的一天很漫長。她早上五點起床，為兩個兒子準備早餐，再做一些家務：洗衣、整理、運水。孩子們必須在八點半前到校，她要把兩個孩子送到學校，然後趕往鄰居房外的「盤子工作室」。下午六點半，她下班回家，將孩子從鄰居家接回來，然後在晚上十點到十一點之間上床休息。這份做樹葉盤子的工作報酬很低，每天只有二十五盧比（合零點五美元）。這點錢根本不夠她餵飽兩個孩子。「我曾在飯裡加上辣椒，讓飽的感覺持久些，但後來孩子們受不了。現在，我父母會貼補一些錢給我。」瑪薩雅自家有四英畝的土地，但目前並沒有實際耕種。「我要等到兒子們學業完成。也許再等四年之後，大兒子十二歲，他就可以下



田幹活了。雖然城市裡的薪水會高一些，但我一個人沒法去那裡，否則誰來照顧孩子呢？所以，我只能做盤子。但我們會活下去。」

她並沒有因此責怪任何人，她說：「我不憤怒。生氣又有什麼用呢？如果我憤怒的話，我就不會回來了。」

農作收成高峰時，她的家庭年收入曾達到一萬二千盧比——相當於每天收入接近零點七五美元。那時候，她的丈夫克斯塔（Kistiah）還活著。二〇〇四年八月十一日，克斯塔抬頭凝視萬里無雲的天空，陷入了絕望。從二〇〇〇年以來，他的債務愈來愈重。因為降雨不穩定，地下水已經完全消失。他試試種種稻米，於是申請了一些貸款鑽井打水，先是從當地一家銀行借了八千盧比（合一百八十美元），然後從瑪薩雅稱之為「鄰居」的一個本地放款者那裡又借了九萬盧比（合二千美元）。他在田的周遭鑽了三口井，但都徒勞無功，沒有鑽出一滴水來。然後，到了八月份第二個星期，仍然沒有一滴雨從天而降。他的作物在田裡快枯死了。

那天晚上，其他人都上床睡覺之後，克斯塔起了床，從架子上取下一個小小的塑膠袋，一種綠白相間的袋子，顏色有點兒像印度的國旗，但在袋子底部印有蔬菜的品牌圖標。與印度國旗不同的是，袋子中間印的不是車輪，而是標著「毒藥」字樣紅白相間的菱形標誌。他把袋子裡的顆粒倒進杯子，和水充分溶解之後，一口喝了下去，然後躺在瑪薩雅的身邊。

這是一種名為「福瑞松」（Phorate）的有機磷酸酯農藥，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高危險農

藥。由於毒性過高，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認為它沒有安全使用的方法。但是，這種農藥在印度仍被廣泛使用，安得拉邦農民的使用量就占印度全國使用量的三五%。克斯塔在攪拌這種農藥時，揮發出的氣體便通過皮膚和肺滲入了他的身體裡。他喝下之後，毒性堵塞了他全身的神經感受器。他的呼吸肌肉瞬間麻痺，可能在窒息之前就已經陷入了昏迷，因而不可能有強烈掙扎。他悄無聲息地死去了，身邊的妻子和兩個兒子睡得正香。

瑪薩雅在二〇〇四年八月十二日剪短了頭髮，悼念她死去的丈夫。

克斯塔在村子裡受到眾人的喜愛。村民代表韋卡特許(Narasimha Venkatesh)說：「他有點沉默，是個好農民，是個好人。」村民哀悼克斯塔的死，但他不是唯一自殺的農民。官方很難得到全國農民自殺率的準確數據，不過在有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安得拉邦，有記錄顯示每年自殺的農民到達數千人。而這不只是安得拉邦的問題而已。孟買市民的食物來自附近的內陸地區，那裡的農民自殺率正飛速上升。這個問題甚至也已經影響到印度的糧食生產重地。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省是印度高科技農業「綠色革命」的中心，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期間，這一地區有三分之一的農民面臨著「毀滅與生存危機」……這一現象開始於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在一九九〇年代變得日益嚴重——當聯合國公布這樣的報告後，立即讓印度政府顏面無光。這問題更進一步惡化。最新數據顯示，旁遮普省的就業率也在遽增。誠如一家報紙所言，對於那些本應在印度美麗新農業未來之中繁榮的農民來說，這個悲哀的結局是「綠色退步」。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印度農民因貧窮自殺。有些農民沒有自殺，他們只是賣掉自己的腎。在馬哈拉施特拉省阿姆勞蒂區的辛那普村裡，農民們甚至建立了「賣腎中心」。「我們……邀請了總理和總統參加我們賣腎商店的開業典禮……我們的腎是唯一可以賣的東西。」一個農民如是說。

辛那普不是唯一的例子。許多村民將自己的全身上下都標價求售。即使在鄉村裡面，不平等也依然存在。除了普遍存在的男女不平等之外，擁有土地的農民和一無所有而只能出賣勞動力的農民之間也存在著重大差異。一般農民可能以自殺結束生命，沒有土地的家庭則一直面臨飢餓的威脅。

也許有人要把導致自殺的絕望情緒，解釋為印度農民性格的一部分，解釋為印度政府的失敗。但隔海與印度相對的斯里蘭卡也上演著同樣的悲劇。以全國平均來看，農藥中毒是斯里蘭卡醫院裡死亡案例中的第六大死因，而若只看人口達二百七十萬的六個農業區域，農藥中毒死亡更高居首位。

東亞地區也有類似的悲劇。在中國，「五八%的自殺是喝農藥所致」，全國每年有兩百萬次企圖自殺的個案。在一九九六至二〇〇〇年中國八百八十二例自殺抽樣中，上班族和學生占自殺人數的一六·九%，家庭主婦、退休人員和失業人員占四分之一，而農村勞動者竟占了一半以上。同時，農民也是最有可能因其他傷害而致死的一群。中國農村人口自殺率是城市人

口的三倍，而婦女的自殺率又略高於男性。

自殺率上升並非貧困國家獨有，在富裕國家，我們也可以看到自殺人數升高的現象。以澳洲來說，自殺率增長最急速的地區是農村。在英國，農業是所有行業中自殺率最高的。正如英國全國農民聯盟發言人所說：「全英國每位農民都能說出至少一個從事農業的朋友、夥伴或同儕，因擔心未來生活而自殺的例子。」

一九八〇年代美國農業危機期間，中西部地區出現了大量自殺事件。俄克拉荷馬州心理衛生部門的區域主任華萊士（Glenn Wallace）在談到那個時期時，提及了如今「南方國家」農民熟悉的那種感覺：「失去或眼看著要失去農田的感覺，比最愛的人死亡更讓農民難過。當出售土地牌子掛在祖先傳下的田產上，那種罪惡感超過了他們能承受的範圍。」全國的統計數字目前很難得到，更令人驚訝的是，全面性的研究仍然沒有開始。雖然中西部的自殺率似乎過了一九八二到一九八四年間的頂峰，但其他許多現象仍然沒有改變。例如，農村婦女的負擔是男人的三倍，她們要在農田和其他地方工作以補貼家用，回家後還要照顧一家大小、參與鄰里活動。至少有二五%的美國農村婦女都處於同樣的境地。同時，美國的農村地區呈現不成比例的貧困化趨勢。一九九九年，在美國最貧困的五十個郡中，只有一個是大都市。在城市地區，與毒品相關的死亡率在過去十年大大下降，但在農村地區卻激增為三倍。農村地區最嚴重的困頓徵兆或許已經緩和，但慢性的問題仍持續困擾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

扭曲的謊言

當人們重述自殺故事的時候——雖然這些故事很少被重述——死亡像是句號般，結束了死者的故事。但是家人的生活還要繼續下去，農村還要繼續生存。這些自殺事件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社會的悲劇。如果我們從社會的角度去看這些農民，他們的自殺不是生命結束時的句號，而是一個社會群體在生存掙扎過程中留下的悲劇性的省略號。在農村地區，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悲劇的重擔並非生而平等。女性承受的衝擊最大。例如，在印度南部的一個地區，一項研究發現年輕男性的自殺率在每十萬人中約五十八人，但年輕女性的自殺率為每十萬人中有一百四十八人。相較之下，英國的自殺率每十萬人不到五人。我們不能把農民的自殺只簡單看成一串可怕的小插曲；更合理的看法是將它們視為一個更複雜而悲慘的畫面。這是印度農村長期問題所顯現的急性症狀。

昌德拉（Mangana Chander）是一個堅強而坦率的女性，以印度政府的分類，她屬於「部落」的人。她住在一個叫做尼熱拉克爾坦達（Nerellakol Tanda，意思是水流不斷的地方）的村莊，距離海得拉巴市有兩個小時的路程。這個村莊有二十七戶家庭，耕地面積都小得可憐，他們能否使用土地還要看地主高興與否。從那小片耕地得到的收成根本不足以餵飽家庭，所以他

們做出了與愈來愈多農村家庭同樣的決定——遷移到城市。「我們共有十五個女人，有時候會去海得拉巴的工地幹活，」昌德拉說，「婦女一天能賺八十盧比，男人一天賺九十到一百盧比。人們都固定在一個地方等工作，如果有大房子要蓋，就會有人到那裡找工人。沒工作的話，我們就不吃飯。我們持續有工作可做的時間並不多。所以，我們每個月有十天在城裡，十五天在田裡，還有五天休息。」昌德拉是幸運的，她的債務不多。一年前她借了二千盧比（合四十五美元），現在這筆錢已經因複利而增加到接近三千盧比（合六十八美元）。她的孩子們在上學，她希望他們會有一個比她更好的未來，但她也不敢肯定。「城裡人知道我們活下來有多不容易。」

在這種條件下生存的婦女，特別是喪偶的婦女，必須辛苦地謀生。有時候，大家庭裡的家人會伸手相助，比如瑪薩雅的家人會資助一些錢讓孩子們有飯吃。但在有些情況下，家族成員反而會加重這些婦女的災難，他們會把土地交給死去丈夫的兄弟耕種，把遺孀和孩子當奴隸一樣使用。在有些省分，只要能夠提供符合補償條件的證明，政府會給這些遺孀一定的補償——有些省分的補償條件多達四十多項。在有些個案中，村長除非能因補償而得到好處，否則不願意提供自殺證明。這些家庭拿到債務救濟後，他們才能還清負債。欠債不會因借款人死亡而得到豁免。而且即使得到政府救濟款，這些家庭也很難有足夠的錢來恢復長期穩定的經濟狀況。所以，新寡的女人被迫到城市謀生，為城裡人幫傭、做建築工人，有時甚至要賣淫。

如果自殺和婦女的掙扎不為人所知，部分原因是由於其存在證據被大大剷除了。根據政府的官方說法，農民和婦女的生活不可能很艱難，因為印度的貧困人口已經減少了。農民，特別是農村婦女，是印度最貧困的人口，而「閃耀的印度」這個童話故事需要窮人完全消失。在印度，這個目標已經透過一種神奇的統計工具而實現。

一位來自印度農村的學者、曾經獲獎的記者賽尼斯（P. Sainath）多年來堅持不懈地追蹤印度農村貧困人口的生活，並探究他們如何被寫成了創意小說。舉例來說，一九九〇年代初，印度政府任命一組專家尋找全印度貧困人口確切總數的計算方法。在經過一番討論、調查、辯論和磋商後，專家宣布印度人口的五分之二為貧困人口。印度政府的反應和大多數其他國家的政府一樣：聲稱自己找到一組願意做出相反證明的專家，說貧困人口的實際數字要低得多。政府透過一種過時的統計方法，宣布印度的貧困人口比例不是五分之二，而是不到五分之一。雖說如此，「在印度政府發現國內貧困人口減少的不到九個月之前……（印度政府）提供了一份文件（給哥本哈根的一個國際捐贈會議）說三九·九%的印度人處於貧困線以下。不過，這麼說終究是為了得到捐贈。貧困人口愈多，獲得的捐贈也就愈多。」

經濟學家帕特耐克（Usha Patnaik）深入分析了這個讓印度貧困人口從一九七〇年代就消失的統計學花招。她追溯與貧困緊密相關的一個核心特徵——飢餓——並依此校正了她的觀察數據。一九七〇年代，有一半以上的印度人口被劃入貧困人口。二十年以後，在一九九三至

一九九四年期間，這一數字下降到僅略多於三分之一。這個進步可不小，但主要是由於官方大大降低了貧困的認定標準。在一九七〇年代，貧困線的基準是每天攝取二千四百卡路里的食物；而在一九九〇年代初，貧困線的基準卻變為每天攝取一千九百七十卡路里的食物。到了一九九九至二〇〇〇年，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被劃為貧困人口——這降幅真令人刮目——但每天攝取的食物已低於一千八百九十卡路里。帕特耐克說：「到了第六十輪（調查）的時候，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貧困線）可能低於一千八百卡路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農村人口落入貧困線以下。」今天，印度官方的貧困數字是大約二七％的人口，但若更準確地基於每天攝取二千四百卡路里的標準，將有四分之三的人口落入貧窮線之下。換句話說，也就是大約有五億人口沒有被算入貧困。為了達到貧窮人數減少的目的，政府只需把規則稍微修改，就能大肆宣揚現今和未來的繁榮。這就是「閃耀的印度」神話的由來——官方對貧困人口的劃分與事實完全矛盾。對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來說，工作機會更多了；但對那些根本沒機會受教育的人來說，情況完全不同。

自由市場的陷阱

如果你們想要吃飯就必須繳納地租，繳了地租就可以有地耕作。是的，他們是有地耕作

了，但到了哪天收成不好時，就不得不向銀行借款，到時情形就不同了。你瞧，銀行和金融公司無需靠耕作謀生，因為這怪物不呼吸空氣，也不吃肉；它們只呼吸利潤，吃利息。如果沒有利潤或利息，它們就跟你沒有空氣或沒有肉吃一樣要死去的。這真令人痛恨，但事實就是如此。事實就是如此。

——約翰·史坦貝克，《憤怒的葡萄》

凡是自殺的農民都是被債務逼迫，這定律在美國和印度都是一樣的。曾經研究印度農民自殺現象的旁遮普大學經濟學教授吉爾（S. S. Gill）甚至做出如下預測：「如果一個農民有五英畝耕地和十五萬盧比（合三千四百美元）的債務，我敢說他早晚一定會自殺。」以安得拉邦為例，八二％的農民都有負債。他們借第一筆錢的原因，多半是為了投資於耕地和作物（當然，像其他人一樣，他們也可能因結婚或籌醫療費而借錢）。負債的動機是來自企業家精神。由於受到政府（以及我們見到的大型種子公司）現金收購作物的鼓勵，農民多半選擇種植那些能在市場上買賣的糧食，例如棉花和花生，種稻米和甘蔗的則少一點。

在印度的自由市場改革之前，政府會提供糧食補貼的最低價格，因此農民可以預先知道，如果一切順利的話，種植某類作物可以得到的經濟回報。如果天公不作美，政府還有一套援助支付體系和農產品公共分配制度，為需要的人提供便宜和健康的食物。自由市場被允許有

限度地運作，而政府會建設基礎設施，為新作物提供灌溉設備，並擴大服務範圍：幫助農民進行市場研究，提供新種子、新技術和新作物的資訊。這是自由市場和政府援助的結合。

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這套為農村貧困人口提供支援的體系開始出現鬆動。在改革和自由化的旗幟下，政府開始廢除這套雖不完善但關乎生計的重要援助政策，使農民暴露於毫無限制、困難重重的自由市場體系。不幸的是，對處境已艱難的農民來說，自由市場既沒有提供任何幫助，也沒有讓他們重新分配到任何好處。與改革前的體系相比，自由市場導致價格下跌，對農民的支援也愈來愈少。農產品市場的進一步自由化也使城鄉收入差距更拉大。長期以來農民所仰賴的政府支援消失了，他們的處境因此一蹶不振。安得拉邦的農民福利委員會提到，在此同時，城市地區吸引了國外投資，建起了玻璃帷幕大樓。結果，農村收入與城市收入差距日益擴大，一九九三年之後的十年間，農村收入下跌百分之二十，城市收入卻提高了百分之四十。

這裡有一個重點值得我們深究。也許長期而言一切會改觀。也許城鄉收入的差距雖然讓人遺憾，但只是前進過程中的一個小波折。也許我們在全球所見的不平等只是暫時現象。有套經濟學的思想實驗做出了如此預測：設想人們居住在兩個分別叫做農村和城市的地方，城市裡薪水很高，但是一開始人口很少，而農村的收入很低，主要人口集中在這裡。整個社會的不平等程度並不嚴重，因為幾乎所有人的收入都是一樣低。

接著，設想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當城市和農村人口各占一半時，也就是像目前世界上的人口比例一樣，你會看到不平等突然驟升，如同過去幾十年內世界上發生的情況一樣。這現象很容易用數學推導出。如果一個地方的薪水較低，另一個地方的薪水較高，而且這兩地的人口各占一半，那麼不平等自然會存在。我們能想像到，未來所有人都會湧向城市尋求高薪。不平等的程度會降低，因為所有人的收入都很高。換句話說，可以不必擔憂眼前的不平等現象，因為長期來看，問題終將圓滿解決。正是這樣的邏輯延緩了人們對不平等的種種擔憂，而全球的不平等程度還在日益提高。

但這個邏輯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安得拉邦的數據顯示的不只是不平等程度日益提高，也顯示出農村的貧困正在加劇。農民的狀況正在惡化，絕對水平和相對水平都是如此。第二，我們還不清楚從農村流向城市的農民是否真為高薪的受益者。雖然城市的吸引力可能是源於更好生活水準的憧憬，但沒有人能保證一定過更好的生活。正如帕特耐克的忠告：

誰都無法想像那些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之後找工作的情形：在改革時期，製造業失掉大量的工作機會，僅一九九〇年代，印度的第二部門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就從二九%下降到二二%。也就是說，印度正在經歷「去工業化」的過程。

換言之，那種「閃耀的印度」口號不僅帶來了農村大量的自殺事件，也使得城市裡藍領工作機會進一步減少。而這些工作機會本來可以留在印度，因為印度的工資比較低。但是這些機會沒有了。印度跳過了工業發展的階段，變成了世界軟體業巨人。在這種知識經濟社會裡，卻只有一小部分印度人口能夠獲益。

絕望之後

我在與卡納塔克邦的農民運動領袖雷迪 (Sheshar Reddy) 談到農作物價格的問題時，他發現我對農民自殺問題感興趣。「我兒子自殺了，」他說，「他是個善良的孩子。他在世的時候，總是開著家裡的拖拉機幫助村民。但我想他是擔心娶不到老婆。我不敢肯定。有一天因為身體不舒服，他去了診所。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自殺。但是，他在那天自殺了。」我必須仔細傾聽，才能明白雷迪說的話，因為他的聲音微弱而顫抖。「我自己也經常想著要自殺，」他繼續說，「如果不是為了農民運動，我想我會的。」

卡納塔克邦農民協會 (K R R S) 是世界上最大的運動組織之一，雷迪是此協會的主席。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這個協會基於互相依賴的原則成立，現在已經有卡納塔克邦的數百萬農民加入。按照雷迪的說法，協會成立後顯著降低了該地區的自殺率。這也許是真的，而且我

們有理由相信雷迪的話。社會運動為那些需要幫助的鄉村提供了實質的支援和協助，同時也給農民帶來了希望及改變現狀的承諾。K R R S 一直在幫助印度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農民運動，通過抗議、互助、新農業方案和農村教育等方式，來應付其成員所面臨的挑戰，例如，他們將 WTO 的憲章草案翻譯成當地語言，分發到農民手中。一九九二年，卡納塔克邦農民就對這個草案有過辯論和討論，那是在 WTO 一九九九年西雅圖會議之前七年，當時世界上大多數人都還沒意識到 WTO 的威脅。

然而，農民運動的會員身分並無法使他們免於絕望。農民自殺的一個最重要事件，是二〇〇三年發生的南韓生產者運動領袖自殺。下面這段話是他在自殺那天發放的小冊子裡說的：

有一次，我走進一個農民的家，他因欠下無法償還的債務而喝了劇毒藥物結束生命。再一次，我傾聽著一個遺孀嚎啕大哭而無能為力。如果你是我，你會有什麼感想？……寬闊而平坦的道路、大片的公寓樓房和工廠廠房，覆蓋了幾千年以來人們耕作的稻田。過去，這些稻子是所有日常必需品的來源，包括食物和原料。如今，稻子的生態和水文功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重要，然而，稻田還是被毀掉了。在這種情況下，誰會在乎我們農村的生命、社區的傳統、設施和環境呢？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日，當WTO部長級會議在墨西哥的坎昆舉行，南韓的農民、也是農民運動組織者李京海（Lee Kyung Hae）爬上了貿易會場後面路障附近的一個防護欄。他彈開隨身攜帶的紅色小刀，大叫著「WTO逼死農民」，並用刀子朝自己的胸膛刺去。幾個小時後他死去了。幾天之內，從孟加拉到智利、南非、墨西哥，數以萬計的農民為他哀悼，以遊行的方式團結在一起，發出怒吼，要求國家支持農業。他們的口號是「Todos Somos Lee」（我們都是李京海）。

李京海一生是積極活躍份子。一九八七年，他參與成立韓國先進農業協會（Korean Advanced Agriculture Association）。他經營的「首爾農場」（Seoul Farm）位於韓國長壽，原來是一片無情的荒地，鄰居都不相信他能實現建立牧場的抱負。李京海上過農業專校，並結識了妻子，畢業之後他們回到家鄉開始了農業工作。他安裝一個小型的纜車，以便在冬天把乾草運到山上。他開創了當地電子籬笆的潮流，把自己所有時間都花在田地和農耕上。「首爾農場」成為一個培訓學校，一九八八年，聯合國贈與他農村領導者的獎勵，以肯定他的貢獻。結局差點就是如此完美。但是，南韓政府決定取消澳洲牛肉的進口限制，使得事情改觀了。澳洲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出口國，澳洲政府一直是牛肉出口業的強大支持者，南韓在進口澳洲牛肉上的讓步，不僅是史坦布羅克（Stanbroke）和澳農（AustAg）之類的澳洲企業的勝利，也是嘉吉澳洲

（Cargill Australia）和日本肉產（Nippon Meat Packers）等大型經銷商的勝利，後兩者分別代表美國和日本的利益。

韓國政府明白，隨著澳洲牛肉以更低價進入國內市場，生牛的價格也會下降，因此他們鼓勵農民增加飼養牛隻的數目，所需的經費可以透過貸款解決。李京海接受了政府的建議。但是，牛肉價格一直很低，為了償還貸款的利息，李京海不得不賣掉一部分的牛。他甚至每個月都賣掉幾十頭，用賣牛得來的錢償還貸款，竭力想保住土地。最後，他還是失去了。有生以來第一次，李京海哭了。後來家人發現他躲在電影院裡偷偷哭，他不願意讓別人看到他的眼淚。

WTO殺了李京海？

我到韓國了解更多有關李京海的死因。李智慧（Lee Ji Hye）是他三個女兒之一，在他去世後，她說：「他自殺不是為了成為英雄，或者讓別人關注他自己。他以死來表明韓國農民的困境——這是他從親身經驗體會到的。」她聽到父親死訊的時候，人在半個世界以外。而姜基甲（Kang Ki Kab）當時在場。姜基甲是農民，現在也是南韓立法院的成員。他曾經是韓國農民協會的鬥士，了解農民政治的最新發展情況，是擁有小片田地的稻農。和李京海一樣，他擁有關

於韓國農民困境的第一手資料。他如此描述：

陽光、空氣、水和食物是對人類來說最重要的四大元素，也是人類生命的最基本原料。上帝把這四種元素定為所有人都可享受的東西，所以人們才能活下去。他沒有想過我們會獨占這些元素——然而，因為這些元素太充裕了，人將它們看成微不足道的東西，不當一回事。推動WTO的那股趨勢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全球化。根本的矛盾是貧富的兩極分化，窮人愈來愈窮，富人愈來愈富。有人也許會說這是競爭的自然邏輯。但如果你有理智和良知，就會認為WTO應該消失。農產應該被視為一種人權。人要活著就必須有吃的。你不能把糧食商業化，那是違反人性的行為，不僅反社會，而且反人類！

那麼，這跟李京海在WTO的自殺有什麼關係呢？

我說這些，是因為我希望你們理解貿易體系對韓國農民的影響。WTO的政策對農民來說就像一顆炸彈。他們甚至無法靠農產品生存。以前，一年的收入相當於十一袋米。現在，十一袋米價值七百美元，只相當於一個月的薪水。在大多數農業城鎮，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是七十幾歲的老人。由於無利可圖，他們都負債累累。他們都還不起債務。

在各種因WTO而產生的影響中，債務是最重要的一項。農民債務問題是全球性的，我從世界各地的農民口中得知了這一問題的輪廓。第一筆債務不成問題——的確，它是生活更好的保證和希望。但是，當第一筆債無法償還的時候，債務人的夢想就開始破碎了。一九九六年以來，身為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南韓，農村都因債務而崩潰。由於必須不斷找到新的資金來源，村民們發明了借貸俱樂部，為彼此的貸款互相擔保。他們頻繁地用自己的土地再抵押，以至於除了自己人以外，再也沒人願意借錢給他們了。所以，他們利用了韓國的傳統，利用一種社會化的金字塔銀行系統。這個系統涉及貸款、土地轉抵押和重新貸款，藉此使虧損中的農場盡可能得到資金、維持營運。這個借貸系統是聰明的，也是絕望的。它延緩了土地被債權人收回的時間。但系統本身極不穩定：某個農民拖欠還款，整個俱樂部的成員都會受到影響。當一個成員破產，另外一個人不能及時還款，再下一個人處於破產管理狀態，就會觸發連鎖破產的危機。

美國農民也面臨同樣的處境。美國家庭農場聯盟（National Family Farm Coalition）的農民和領導者奈勒（George Naylor）說：「對大多數農民而言，事實顯然是，商品價格低於一九七〇年初，但二〇〇〇年農耕和家庭消費支出的物價水準，使得靠耕作養家糊口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其他行業中，也許企業所有人會逃避、放棄或轉行。但是農民耕種的土地是父輩留下來的，從出生就一直是自家的財產。如果祖先留下來的遺產在某一代人手中丟掉，必定是難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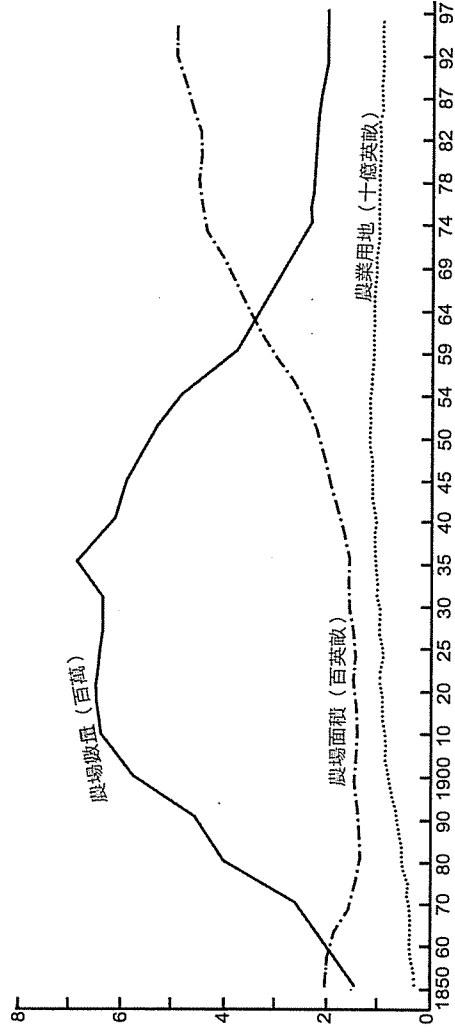


圖2.1 1850-2000年美國農場規模和農場集中化

(資料來源：Hoppe and Wiebe 2003)

假設你是一位農民，最近才進入自由市場，就以南非為例吧。你要尋找可以讓你收回到某種作物上的投資。或許你決定不再種植糧作，而把所有的耕地都種上棉花——因為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六年期間，棉花價格很高。然而，之後的六年，隨著世界最大的蘇聯紡織業急遽收心的工具——價格訊號。

那麼，這些農民為什麼還不起債務？顯然，部分原因是大多數農產品的價格一直在下降。但是，低價並不是世界末日，至少在短期內不是如此。我們有解決低價的辦法。如果知道自己種的作物只能賣出低價，你可以先做個計畫，例如，轉種其他作物。不過，最大的諷刺就是，農民要判斷市場來決定種什麼作物，但在加入世界市場之後，卻失去了對市場效率保持信心、安於家庭。

最近才開始。農民被迫離開土地，從一九三〇年代美國大平原地帶的沙塵暴時就開始了。幾十年來，美國農場的數量在減少，農場的規模卻一直在擴大。債務一直是農場規模擴大和農民家庭毀滅的唯一原因。為了使農場更加賺錢，還要在經濟惡化時期償還初始貸款，農民負債累累，把他們耕作的土地都做了抵押。當銀行前來沒收土地時，有些農民選擇自殺，因為失去了家族世代擁有的財產而感到恥辱。美國那些自殺身亡的農民，以及二十年後重蹈美國農民覆轍的印度農民，都具有相近的特徵：人到中年、誠懇勤勉、受人喜愛、略顯靦腆、安於家庭。

縮，棉花價格狂跌。如果你是種糧作供給本地市場消費，那麼你知道，收成好時，你種的糧作賣不出太好的價錢，但由於產量足夠，所以總體收入不會太壞；當每個農民都種很少，糧食的價格會升高，你的收入也不會太差。但是，如果你是種棉花為了出口，你就要承擔一系列自己無法控制的力量所可能帶來的風險，以及你無法理解的風險。美國是不是向棉農提供了補貼，讓他們的棉花以你永遠都無法企及的低價出售？俄羅斯紡織品價格的暴跌，是不是會因中國市場需求量的增加而得到抵消？甚至，當棉花市場恢復正常，匯率是不是會降到讓你的棉花可以出口的水準？如果缺乏有效的最低價格系統，你根本沒有任何保障。換言之，市場全球化已經有效地把種植的控制權從農民手中奪走，轉移到那些可以決定市場發展的人手中。

陷於窘境

市場並非總是由市場力量所決定。或者委婉地說，市場力量不只是供給和需求而已。「沒有看不到的拳頭，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就無法發揮作用……沒有麥克唐納·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麥當勞不可能興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如此評論道。弗里曼忘掉的一點是，槍口並非總是對準恐怖份子（或者那些跟恐怖份子長得相像的人）。大多數情況下，死於槍口下的是平民。特別是在「南方國家」，貧困

人口直接處於身體傷害的威嚇之下，在他們想要行使權利的時候更是如此。全世界的農民團體在反對非法挪用他們土地的行為時，或提高聲調來對抗不正時，都會被地方或國家的力量以公開或秘密的方式當成目標，而威脅者卻通常不受懲罰。

違法的威脅多得讓人難以想像。

在南韓，農民於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走上街頭，抗議稻米進口自由化。姜基甲那時已進行了二十八天的絕食示威，試圖阻止這一政策。但是，自由化法案最終以一百三十九對六十六票多數通過。以擅自使用暴力而惡名昭彰的首爾警察與農民發生了衝突。許多農民在衝突中受了傷，包括一位被警察打了頭部的四十三歲農民全永哲（Jeon Yong-Cheol）。那天晚上，他回家後，很快就病倒了。九天之後，他死於腦溢血。

在巴西，將農民領袖作為打擊目標一直是政府和某些私營企業的長期計畫。過去二十一年裡，僅從官方資料來看，就至少有一千四百二十五名農村工作者、領導者和活躍份子被暗殺。其中，只有七十九個案子被移交法庭進行審判。在二〇〇五年這一年，巴西農村地區就有一千八百八十一起衝突，造成超過十六萬個家庭的安全受到威脅。此外，有三名工人在農場過勞死，七千多人實際上處於奴隸的狀態。

類似的壓迫事件在其他許多國家上演，從菲律賓賓到宏都拉斯，從哥倫比亞到海地，從南非到瓜地馬拉。在這些國家，當農牧團體和工人想集體堅持自己權利時，他們要面臨當地警察

的介入、受雇槍手、甚至司法的冷酷無情。對有些農民來說，加入某個農民運動無異於被宣判死刑。然而，儘管存在各種壓迫，農民運動仍在繼續擴大。

農民已經集體反擊了。從美國農民作家貝利（Wendell Berry），到印度卡納塔克邦的 K R R S 農民運動的創始人南均達斯瓦米（Nanjundaswamy）教授，異議的聲音和觀點一直存在。已故的南均達斯瓦米教授的女兒珠姬·南均達斯瓦米（Chukki Nanjundaswamy）在世界各地傳遞父親的觀點：「我們想要的只不過是公平的價格。我們沒有要求更多。我父親稱之為『科學的』價格——包括耕種成本、勞動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價格。除此，別無其他。」

K R R S 的另外一個農民成員維沙塔納拉亞南（Vesatanarayanam）說：「我們向世界傳遞的訊息是：我們農民需要自己站起來。我們不需要經濟援助，我們知道如何根據自己的資源去做這件事。我們不想依賴 WTO、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世界銀行。」他還提到其他幾個影響印度經濟改革的國際組織（這一內容將在第四章詳細討論）：「他們帶給我們的，無非是損壞我們的生活。我們不是乞丐，我們是創造者。我們有自尊，我們也可以自力更生。我們能夠控制自己的資源。」然而，要做到他說的這些，他們必須正面挑戰目前控制著資源的勢力，並將之瓦解。

到底是誰的命令？

「這不是我要做的事，我也是沒有辦法的呀。如果不做的話，我會丟掉飯碗。要是我把我打死了，你又會怎樣呢？他們會判你死罪。在你未死之前，他們就又派了另一個傢伙坐在拖拉機上，照樣還是要把房子撞倒的。你們要打死我？你們是弄錯了對象啊。」

佃農說：「啊，是這樣的呀？那麼是誰叫你來的呢？我找他去，他應該是要打我的人。」

「你又弄錯了。他是奉銀行的命令來的。銀行命令他說：『把那些人趕走，否則你就滾蛋。』」

「喔，銀行有行長，有董事會，那麼，我把槍裝上子彈到銀行去理論好了。」

司機說：「人家告訴我銀行是從東邊那裡接到的命令。他們的命令是：『你們得叫土地生出利潤，否則就得關門大吉。』」

「照你這樣說，到底最後是誰的命令？我們到底應該向誰開槍呢？我不想讓那個害我要餓死的人比我晚死。」

——約翰·史坦貝克，《憤怒的葡萄》

與糧食體系最頂端的千百萬農民一樣，李京海的性命是被別人的選擇所決定。牛的價格不是他能控制的。決定市場發展的力量，將他玩弄於股掌之間。他和他的農民運動受到民選代表的漠視，於是他選擇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即使如此，自殺地點也不是他的選擇。WTO是在墨西哥政府邀請下，選擇坎昆舉行二〇〇三年度部長級會議。不過，李京海可以選擇時間。韓國中秋節是他們豐收和紀念祖先的節日，在那天，李京海用他的刀子刺進自己的胸膛。

但，是什麼殺死了李京海呢？李京海過去也曾在WTO前身²的大樓前自殺，他用刀子劃過胃部，以此來抗議GATT對農民苛刻的要求。但事後他表達悔意，稱之為「衝動而缺乏控制的行為」。我們也許只將他的自殺歸咎於他不穩定的個性。然而，即使李京海拔出了刀子，我們仍不屑關注那些除了他本身個性以外的因素。問題在於，我們願意看得多遠。一九七〇年，一名叫做全泰一（Chun Tae Il）的年輕人發起韓國勞工運動，後來同樣以自焚的手段抗議，而鼓舞了後來的運動者。在他去世後出版的傳記中，他的死被描述為「母親殺了他」。然而，在今天，我們能夠如此解讀，他決意為勞工運動而死，是混合了浪漫主義和誓死維護權利的堅持。李京海的死或許也是如此。他最後留存的小冊子裡的遺言，不是常規的經濟學分析，雖然他的話確實是基於經濟的現實。他的分析正視全球化對人們所造成的成本，因此就像是對人性的讚頌。他的陳述不是什麼「再見了，殘酷的世界」之類的話，而是嚴肅而犀利地批評了一直影響他和其他農民的那些力量。如果看一眼李京海留下的遺言，仔細品味、甚至批

評，就或許能理解，他的舉動是他索回自己身體控制權的一種方式，唯有如此，他才能挑戰那個阻止他這麼做的體系。而那個體系遠遠超過WTO的範圍。

印度是我們討論的出發點，不過我在本章所說的，更是全球小農面臨的危機。這危機對手無寸地的農民，尤其是貧困的女性農民，是更難應付的。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雖然WTO因為貿易自由化而受到譴責，但它不是農民面臨的唯一重要的問題。糧食體系是由各種不同的條約和組織所形成的網絡。在墨西哥，作為WTO原型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是被墨西哥政府主動擴大到農業領域，而與美國政府原來的建議相違背。在印度，農業自由化的決定是一杯本地與外來理念所混合的雞尾酒。沒錯，WTO受到許多國家的譴責，許多政府一邊嘆氣、一邊解釋他們非常願意支持農民，但是WTO不允許他們這麼做。這些政府卻忘了說，是他們自己選擇把雙手綁起來的，是他們自己選擇了無能為力。為什麼政府會如此選擇？貿易是如何在國家發展的大架構中找到位置？這是下一章要討論的問題。

1 譯注：麥克唐納·道格拉斯是為美國空軍設計和生產軍機的公司，佛里曼暗示自由市場只有在財產權得到保障的條件下才能運作與繁榮，這就需要一個由軍力為後盾的政治架構。

2 譯注：WTO前身即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簡稱GATT。

3

你變成了墨西哥人

在李京海死後短短幾個小時之內，這個消息就透過電話、傳真、網路以及人們的口耳相傳，傳遍了世界各地的小型農業經營者網絡。印度、泰國、巴西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的農民紛紛團結起來，以遊行的方式抗議WTO，表達他們對李京海的懷念。在這次不幸事件的中心墨西哥，當地農民為李京海所唱的悲歌是最響亮的。一半的人用英語表達心中的哀悼，另一半則是以西班牙文喊出「我們都是李」以及「李沒有死，是WTO殺了他」。

其中情緒最強烈的歌詞就是：「李！兄弟啊！你已經成為墨西哥人了！」它很值得我們去理解背後的涵義，並了解它所產生的力量。在墨西哥農民的眼中，李京海已經跨越了國界，成為與他們擁有共同農業經驗、共享生活與死亡之道的同胞。李京海對自由貿易的抵抗，以及他在破產之後遭遇的絕望困境，對墨西哥農民來說都是如此熟悉，因此，李京海就像他們的同胞手足一樣。身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發源地，墨西哥一直是自由貿易的試驗先

驅，特別是糧食的自由貿易。因此，只要我們能了解墨西哥為何會成為某些貿易行為的試驗者，同時觀察其國內社會對這些貿易的後續動作與反應，就能理解南韓、墨西哥、印度、甚至美國等世界各地的農民為何能在彼此身上找到那麼多相同點。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成立與發展

由墨西哥、美國、加拿大共同簽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所有自由貿易協議的始祖。雖然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非世界上第一個經濟協議（歐盟在更早之前就已經是自由貿易地區），但它是第一個把兩個富裕國與一個明顯比較貧窮的國家緊密結合的協定。不只如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還包括了農業方面的協議，墨西哥最窮苦的階層因此被迫與世界上生產力最高、受政府高度補助的農業區塊相互競爭。這項貿易協定的主旨在於：藉由與富有國家互相交流所產生的火花，自由貿易、企業與美好的生活將跨越國界，從活力充沛的國家流向較弱的一方。對某些墨西哥農民來說，這些火花的確點燃了一盞富裕的希望。那些土地較大、離美國較近的農民，確實因此更接近有錢的消費者。較有錢的農民由於容易取得豐富的資金與專業知識，便能生存下來，有些人甚至飛黃騰達。大體上看，墨西哥的農民在這項協定的庇蔭下得以接觸商機龐大的美國園藝市場，他們靠著便宜的人工與土地，種植出美國消費者所需的水果與

蔬菜。然而，新鮮蔬果的市場競爭相當激烈，就算有地利之便，墨西哥的蔬果供應量仍然只佔了美國總消費市場的百分之二左右。只有那些擁有豐富資源與各項協助的農民才能在市場上與其他抗衡。

相較之下，遠離國界並且遠離有錢人的小農就沒有這麼好的際遇了。事實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給了大部分貧困農民沉重的一擊。這是因為在三國協議的過程中，這些小農的作物遭受了輕蔑與忽視，被認為是沒有競爭力的。這作物就是玉米：協約簽訂時，墨西哥共有百分之六十的耕地種植玉米，關係到全國三百萬個生產者的生計，約占墨西哥人口的百分之八。墨西哥是世界各地的玉米種類起源地，直到今日，普遍種植的玉米共有四十種，其他的玉米品種也有數百種之多。它不僅是人類的主食，更代表了一種認同與社群的連結。

明眼人一開始就知道貿易自由化將對玉米生產造成重大的打擊。美國農民出售玉米的價格遠遠低於他們的種植成本。舉例來說，在二〇〇二年，美國玉米的售價為每蒲式耳一點七四美元，但種植的成本卻是每蒲式耳二點六六美元。由於美國政府長期支持本土農業，對農民的機械設備、肥料、銀行貸款與運輸成本設有補助措施，因此，當自由貿易出現之後，有政府大力支持的美國玉米顯然將摧毀墨西哥窮困農民生計。墨西哥的玉米生產成本比美國玉米高出許多，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仍然在這種優劣明顯的情勢下，由美墨兩國政府共同簽訂了。

種種跡象都不太好。幾乎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展開的同時，也就是一九九四年一月一

日，墨西哥披索的幣值狂貶，對美元的匯率下跌了百分之四十二。雖然墨西哥玉米的價格一開始曾經大幅上升，但實質價格卻自此之後一路下跌。然而墨西哥農民並沒有因此減少玉米產量，反而比以前增加。從供需原理來看，這種情況就顯得很奇怪。價格應該是社會上最偉大的訊息傳遞者，它明確表達出大眾對某項產品的需求程度。當某項產品的價格下跌，就表示該產品的產量太多，因此，生產者最不應該做的，就是繼續大量生產。

不過，個體經濟學理論的確能夠預測出這種恐慌情境。這是因為全球市場不可能在短短一天之內就重新洗牌，必須經過一段時間，人們才有辦法根據市場訊息來重新分配資源。我們可以把價格改變後的時間切分成三個部分：即時、短期以及長期。在即時階段，即價格突然改變時，吃驚的生產者發現自己無力扭轉情況，只能繼續生產。在短期階段，生產者開始改變產量，然後到了長期，市場的供需才會達到平衡。

在墨西哥，玉米的價格下跌時，農民感受到的訊息是政府不伸出援手，把責任推給他們，農民只能想其他辦法自力更生、餵飽一家大小。在這種情況下，墨西哥農民選擇生產更多的玉米來對抗價格下跌，希望藉由高產量來提高收入，以負擔得起各項高漲的物價。雖然自由市場理論認為農民要投資其他作物，但現實是，只有少數人有能力轉種。缺乏資金、技術及物流網絡，加上受限於貧瘠的土地，沒有良好的灌溉系統，只有原生的玉米才能生長，這些都導致農民沒有太多的選擇。於是，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展開之後，那些可以提高產量的農民就只能提高產量。

能提高產量。

而有些農民便陷入了絕望。墨西哥跟印度一樣，農民的自殺率愈來愈高。一九九〇年，農村地區的男性自殺率為每十萬人中有三點九個人，女性自殺率為每十萬人中有零點六個人。到了二〇〇一年，農村男性自殺率提高到每十萬人中就有六點一個人，女性則是每十萬人中有一點二個人。這是根據總人口所計算出來的比例，研究顯示，若單就農業人口來算，自殺率很可能會更高，而且與自殺有關的死亡人數通常會被低報，因為在天主教國家，自殺被視為一種恥辱。我們不該把自殺當成社會上各種不幸的唯一指標，因為自殺不但毫無掩飾地反映出令人痛苦的貧窮與絕望，更會讓我們消極地認為那是不可避免的。為了降低自殺人口，我們必須幫助那些努力求生的人，讓他們免於每天所受的苦難。在墨西哥幾個以農業為主的州中，自殺率都很高：二〇〇一年，坎佩切州的自殺率為每十萬人中有九點六八個人，塔巴斯哥州則為每十萬人中有八點四七個人。這訊息告訴我們要追溯問題的根源，而不是只把它當作一個結果。

農民的痛苦與不幸或許並不令人意外，因為，生產者原本就不是貿易自由化的必然贏家。的確，自由貿易的基本精神就是讓生產者在市場上競爭。在自由市場機制的運作下，同類型的產品只會有幾個生產者在競爭，因此價格會下降。於是，少數（生產者）的獲利會減少，市場會把這些利潤重新分配給多數（消費者），也就是說，消費者可以買到比較便宜的商

品。

這種經濟模型之所以能產生力量，是因為它假設市場就像一個金字塔：在上位的少數者壓榨著底下的多數者。問題是，農業體制並非金字塔。在農業體制中，有很多人處於上層，而這些人通常比他們的顧客還要窮困。對扮演生產者角色的窮困農民與農場工作者來說，產品價格若是下跌，收入便會跟著驟減，於是乎，他們的消費能力就變得很低。

這些情況都是可以事先預知的。畢竟，它正是我們心目中期盼的經濟改變方式：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透過這個過程，沒有效率的生產者會被淘汰，有效率的人則得以成長茁壯。那麼，「沒有效率的」貧窮農民該怎麼辦呢？主張自由貿易的人認為，透過貿易自由化來把市場做大，就能提高社會整體福利，而那些因市場改變而受到傷害的人也可以重新分配到一小塊資源來因應這些變化，同時為嶄新且未知的將來做好準備。然而，尤其是對「南方國家」來說，貿易自由化並沒有將利益重新分配給窮人，也沒有為那些因市場變化而失業的人提供其他有意義的工作或是重新訓練他們。這是因為自由貿易其實是屬於此種政治哲學：政府的介入（即便是提供基本的權利保護）就是一種不當干預與無效率的表現。這也導致了大部分推行貿易協定的國家的貧富不均程度會提高。即使整個世界都變得更有錢，但大多數窮人卻被拋在後面。現代資本社會的創造性破壞，幾乎就像它字面上的涵義一樣，將摧毀那些無法保護自己的人，以及那些被認為對社會沒什麼貢獻的人。也就是說，這些象徵我們經濟與政治時代達

到高峰的貿易協定，非但無法讓社會利益重新分配，反而讓不平等的情況更加嚴重。因此，墨西哥農民的艱苦遭遇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隨著玉米價格下跌以及後來的過度生產，或許有人會認為城市地區的中產階級將能買到更便宜的玉米；因為他們正是那多數的消費者，神奇的自由市場競爭不就應該為他們帶來許多好處嗎？然而，只有很少數的人才會買生的玉米來吃。大部分玉米還是要經過加工。墨西哥人最常吃的是玉米餅，傳統上，玉米餅是由婦女手工製作，要先放到石灰水中煮熟，製作過程頗為繁複且需要很多人力。這個過程不僅可以讓玉米容易脫殼，而且石灰水的鹼性還能讓玉米釋放出於鹼酸和其他營養成分。接著沖掉石灰水，把玉米磨碎、做成玉米粉糊（masa）之後，就可以做成玉米餅了。

當玉米的價格下跌，或許有人會覺得玉米餅的價格也會跟著下降。其實不然。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展開之後，玉米餅的價格是上揚的。一九九四年一月，每公斤玉米餅的平均價格約為零點五披索。到了一九九九年，玉米餅的價格上漲了七倍之多。如果我們只是將價格解讀為社會成本與需求的反映，一定會對這種情況感到很訝異。事實上，有很多原因使得自由貿易無法為消費者帶來更低的價格。一部分是因為披索貶值之後造成的通貨膨脹，幾乎所有商品的價格都開始上漲。但是通貨膨脹並非唯一的因素，況且這也無法解釋為何玉米餅會特別容易受到通膨的影響。

回想一下有如沙漏一般的糧食體系吧。許多生產者並不是直接將產品賣給城市消費者，而是賣給少數幾家食品加工業者（這些業者就代表沙漏的中間部分）。消費者並沒有直接因為玉米價格下跌而獲利，這些中游廠商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在墨西哥，玉米主要是用來製作玉米餅。而在玉米餅的市場中，只有兩家食品加工業者：吉姆薩（GIMSA）和明莎（MINSA）。它們共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七的玉米粉市場。吉姆薩在墨西哥的磨粉業的市占率高達百分之七十，它隸屬於古瑪薩企業（Gruma SA）。古瑪薩是成立於墨西哥的跨國企業，營業額為二十二億美元，它跟蜜生食品（Mission Foods）一樣是美國玉米餅業的龍頭。墨西哥政府改變了補助磨粉業者的政策，讓這兩家大廠商合計得到的補助提高了：從一九九四年的二十億美元提高為一九九八年的五十億美元。除此之外，墨西哥政府決定刪減為窮人所設的社會安全體系，使人們無法繼續在國有商店裡買到便宜的玉米餅和基本食物。

少了政府的補助，窮困家庭在食物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隨著物價的飛漲，窮人遭受到的打擊最大。結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導致一百三十萬墨西哥人被迫離開家園、到外地謀生。大量的勞動人口湧入城市，造成工資下跌百分之十。以女性為戶長的家庭之貧困程度則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墨西哥當初會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為了替消費者帶來便宜的商品，並期望能提高市場的效率。如果這項協定非但沒有達到這些目的，更可能為窮人帶來可怕的後果，那麼問題

就會變成：「為什麼政府要推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回顧它的背景以及墨西哥的歷史。

有錢人才能享用的玉米

他們說肚子餓，只會歎息著說出一些陳腔濫調，說什麼飢餓可以推倒石牆，說什麼就連狗也要吃東西，說什麼肉是為了滿足口腹之欲，說什麼神降下五穀不是只為了讓富人享受。他們用這些陳腐的說詞來表達不滿的情緒。

——莎士比亞《科利奧蘭納》（Coriolanus）第一幕第一景

這個故事可以追溯到一九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有一批由美國幾家頂尖學術機構培養出的新一派經濟學家，開始進入墨西哥政府工作。在這些學術機構中，最重要的就是芝加哥大學，它是「新古典經濟學」以及自由市場主義的誕生地。這些受到新古典經濟學與政治觀黨陶的學者，取代了那些只在國內受教育、通常有接受法律訓練、自二次大戰以來掌管國有企業的官員。新的官員有能力一展身手，因為他們跟國外的重要政治人物與組織都已經建立了聯繫；他們認為在快速全球化以及巨額負債的雙重衝擊之下，墨西哥經濟體必須與國外機構接軌

才能找到生存之道。跟接受本國教育的官員相比，這一世代的經濟學家更懂得運用策略並善用更多資源。他們崛起之後，墨西哥政府開始思考如何「發展」國家經濟，思考哪些政策可行、哪些政策不可行。

「發展」知識的主要提供者，也相當支持這群新興的墨西哥官員。《金融時報》在一九九二年報導，這些知識提供者包括了世界銀行。我將在下一章深入探討世界銀行這個組織。簡單地說，它是全球最重要的貸款機構，一舉一動都與經濟成長息息相關，同時，世界銀行對負債的開發中國家也有強大的影響力。對當時的墨西哥政府而言，它因此成了非常重要的夥伴。世界銀行曾發出這樣的聲明：

當墨西哥總統卡洛斯·沙林納斯（Carlos Salinas）決定全面改革墨西哥過時的「耕地法」，農業部官員立刻打電話給他們在世界銀行的朋友徵詢意見……世界銀行草擬了一份大綱交給墨西哥政府，墨西哥政府也做出回覆。草案就這樣一再修改。最後終於制訂出一項憲法修正案，並經由國會通過……在墨西哥，幾乎沒有人反對政府與世界銀行這樣的緊密合作。過去十年來，世界銀行為大部分的墨西哥經濟改革策略提供了深入的意見，例如一九八五年的貿易開放，一九八九年的債務政策，還有現在的教育、農業與環境方面。在最近一個會計年度中……世界銀行核發給墨西哥的非貧困貸款比其他國家還多。舉例來說，墨西哥的貸款總額

為十八億八千二百萬美元，比巴西多了九億二千七百萬美元。

與世界銀行接觸，讓墨西哥跟世界銀行的金融資源與相關財務知識接軌，正是這些受美國教育的新興官員所能帶給墨西哥的好處。不過他們並不是只靠這樣來影響墨西哥的政策。所謂危機就是轉機，墨西哥的財政危機（尤其是在一九八〇年代早期）正好是輸入「新思維」的最佳契機。

歷經一九七六年的披索貶值之後，墨西哥試圖振興國內經濟：出口石油，並以這項收益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借來更多資金。但在一九八二年，石油價格下跌、國際利率提高，美國經濟也開始衰退，使得墨西哥披索再度貶值。這年的債務危機讓墨西哥開始進入「緊縮」時期；相當然爾，這項緊縮政策也是由美國政府與受美國教育的墨西哥官員所共同制訂的。在此期間，政府的公共支出大幅刪減。不僅農業方面的支出嚴重緊縮，對窮困農民的支援方案更是被刪到不留餘地。例如在一九八八年，超過一萬個農業灌溉計畫遭到擱置。農民的貸款額度減少了三分之二，貸款單位也從國有機構轉成私人銀行。最後造成貧窮的農民收入低且還款風險高，沒有人願意借錢給他們。

政府認為抗貧計畫有助於保護社會下層的人民。但是，這些社會計畫本身也面臨「緊縮」，經費每年減少百分之六。一九八八年，墨西哥開始推行「國家團結計畫」（National

Solidarity Programme, PRONASOL)，宗旨是協助窮人，但該計畫明顯偏重城市地區，住在城市裡的窮困家庭每年所獲得的食物津貼最高可達一百四十五美元，鄉村地區的窮人則只能獲得十美元。

另一方面，並非所有的農業都面臨「緊縮」。外銷農業能帶來美金，因此它便成為墨西哥快速擺脫經濟危機的一個辦法。在披索瘋狂貶值後的經濟恢復時期，農產出口業迅速成長，速度比其他產業還要快，但同時，國內的飢餓與貧窮問題也在加劇。事實上，在外債談判期間，墨西哥將關稅從百分之四十降到百分之十。對於某些需要大量的機械化、資源、貸款、物流管道以及中間業者（才能把穀物銷售到世界各地）的外銷農業，這場經濟危機並不是什麼災難。然而對原本就不富裕的農人而言，在一九九四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展開時，他們的貧窮程度竟比一九八四年還要嚴重。

抱持著新思維的新興墨西哥官員，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視為上天賜給他們的禮物。正如社會學家莎拉·巴伯（Sarah Barb）所觀察的：

在沙林納斯政府當政時期（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四年），政府在討論與規畫政策時，向來不把群眾利益當成主要的考量因素。同樣的，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期間，政府也刻意迴避墨西哥中小型企業的需求，以免阻撓協定的進行。最後，這項協定跟許多中小型企業的利益背

道而馳。相形之下，墨西哥國內最精銳、最有勢力的八項產業則在自由改革的談判過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特別是有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而且影響力不止於此）。然而，真正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其他自由改革方案的並不是這些國內企業，而是政府官員。官員首先推動自由改革方案，然後才成功拉攏了大型企業，進行後續一連串改革動作。

換句話說，墨西哥政府是根據理論來推行糧食的國際貿易。就連美國也十分驚訝墨西哥政府會以糧食為談判主題。美國擔心自由貿易的經濟影響力將使農民益發貧窮，而讓墨西哥的農村地區陷入不穩定。但是墨西哥的談判人員再三保證不會發生這種事。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過程，代表了墨西哥政府的承諾果然很脆弱，原本要保障窮人生計，後來卻在技術官僚的手中轉向，變成獨厚富者。這可說是假民主之名的結果。但它也是墨西哥政府欣然付出的代價。因為玉米交易自由化的條件之一，就是墨西哥政府可在十五年內（一九九四至二〇〇八年）逐步改變本國玉米與國際玉米的價格差異，同時限制玉米的進口量。換言之，任何超過進口限制的數量都要課稅。然而，在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八年間，當墨西哥進口的美國玉米數量超過限制時，政府都選擇不課稅，理由是進口美國玉米可以抑制通貨膨脹。他們少收了多少關稅呢？二十億美元。

曾經是農民

小寶貝啊！小寶貝！

我可以把你高高舉起，

也可以把你的腿砍斷，

我記得你的初吻，

你第一次起雞皮疙瘩，

你第一次戀愛，

我可以帶來雨水，

只要十披索，只要十披索。

——偶然在墨西哥市捷運上聽到的

墨西哥市是全球第二大城市，人口總數高達二千萬。街道上瀰漫各種噪音與氣味。不論你從墨西哥的哪個地方來到這裡，都可以在路邊找到你最熟悉的地方小吃。有著濃濃巧克力醬汁的墨西哥傳統菜餚，從普埃布拉來的墨西哥三明治，尤卡坦州的玉米捲餅等等，都可以在這裡發現。墨西哥市的中心是著名的索加羅廣場。廣場的一邊是總統府，裡面有一整面牆是畫家

迪亞哥·里維拉的壁畫，畫滿了從古到今的墨西哥歷史。畫中的左上方繪有馬克思，他一手拿著《共產黨宣言》，一手指向未來；在隱約可見的猩紅色黎明中，將會有工業、電力以及觀測台，而在馬克思的指尖處，將出現一大片單一栽培的農田景象，田裡排了一列一列的樹，看起來就像商場裡的走道。

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之後，這種蕭條、無人居住、死氣沉沉的農業景象真的出現了。這就是二〇〇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墨西哥市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的原因，共有超過十萬個農民走上街頭表達對政府的不滿。這場抗議活動是由一個名為「農村再也無法承受」（El Campo No Aguenta Mas）的聯盟所策畫，索加羅廣場聚集了前所未見的抗議人潮。其中一個口號寫著：「我們是靠玉米維生的人，我們拒絕被淘汰。」另外還有：「要農村，不要貿易！」這些農民運動聯盟中，有些長期親近政府，有些則是一直強烈反抗政府，但在這一天，他們全都聚集在一起，要讓政府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不只希望獲得政府認同，更要求平等。這些農民不僅自己走上街頭，更帶著家人、帶著對墨西哥歷史的記憶：從一九一〇年主張「人人有土地」的大革命；到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政府在某些地區推動保護自耕農的政策，以實際的行動扶持貧窮的農村；一直到最近墨西哥政府對農民的背叛。一位來自聖路易波托西的農民岡薩雷斯（Luis Sanchez y González）說道：「總統在競選時做出許多承諾，但一項也沒有實現。我把票投給了福克斯先生（Mr. Vicente Fox），但是我現在真的無話可說……。」

農民在前往墨西哥市的途中，強烈感受到市場的不公平。來自契亞帕斯省的農民培瑞茲（Sara de los Reyes Pérez）注意到城鄉市場不平等的情況，以及兩邊價格的極大差異：「我們出售的產品價格每天都在下跌。當我們抵達墨西哥市，想買一杯咖啡來喝，一杯竟然要七披索。在契亞帕斯，我們每公斤的咖啡豆只賣兩披索……我們來這裡就是要做出改變。」國際間的不平等也是農民抗議的目標。當農民得知歐盟對境內每頭牛的補助金額比三個墨西哥農民的每日所得還要高時，都覺得十分驚訝，同時也對自己的處境感到屈辱。此外，讓農民同感悲哀的是，農村的土地與社會漸漸凋零，年輕人紛紛到大城市或「到北方」尋找機會，留下年邁的父母與祖父母在如死城一般的家鄉，就好像吹笛人把所有墨西哥的年輕人都帶走了一樣。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促使了許多墨西哥人從鄉村遷徙到城市（他們最後常住進日漸擴大的貧民區）。有些人則甘願冒著更大的風險，躲避邊界警察的追捕，前往北方尋找更好的生活。這條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從城市跨越邊界到北方的軌跡猶如農民的不歸路。農民雖想要更好的生活，但他們其實希望這種生活能發生在家鄉、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農村再也無法承受」聯盟後來甚至為了抗議活動的失敗而對墨西哥市民道歉，他們認為自己「寧可與十萬農民一起過一天，也不願一輩子與五十萬個被沙林納斯、柴迪洛（Ernesto Zedillo）與福克斯政府所放逐的移民為伍」。墨西哥農民運動要爭取的，是讓農民能在家鄉生活，不必搬家也不需移民。他們要求工作、支持、安全以及城鄉平等。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要求重新分配。然而

政策明顯對農民不利，於是這些移民發現自己不僅被迫離開家園，更不得不冒險前往美國。他們從美國匯回大筆的金錢：二〇〇六年，透過正式銀行管道從美國匯款到墨西哥的金額就高達二百三十億美金。

墨西哥人這種遷移正屬於從鄉村到都市、從南方到北方的全球化移民趨勢。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尚在初步討論階段時，來自德州的億萬富豪、也是美國總統候選人裴洛（Ross Perot）曾預測墨西哥的低廉人力將形成一股「強大的吸力」，將美國的就業機會全部吸走。在全球各地，這股強大的吸力也出現在城市，它吸引了大量的農村人口。目前全球農村人口總數為三十二億，到了二〇二〇年，這個數目會開始下降，而城市會變成人口成長的重心。現在居住於都市的人已經超過農村的人。不過對南方國家的人而言，如果有辦法搬遷，他們寧可遷移到更富裕的國家，因為在富國的賺錢機會比城市更多。能跨越國界的移民最重要的事就是讓家鄉、親人與同胞能夠生存下去。二〇〇五年，全球移民送回自己國家的資金總額超過了二千三百二十億美元。這還只是從正式管道匯出的金額而已。據估計，非正式的匯款可能比正式管道高出百分之五十。這些資金遠超過富裕國家援助貧窮國家的金額，許多南方國家都是靠移民這些錢才能生存。

農村人民選擇以抗議行動來反映貧窮的生活，希望政府注意到他們的困境，阻止政府把他們推向絕望的境地。例如在奧薩加和契亞帕斯出現的農民暴動，就是因為長期受到政府漠視

所引起的，這些農民是早開始種植玉米的，也是最貧窮的一群人，他們就是墨西哥原住民。一般說來，墨西哥甚至整個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比其他族群更容易陷入貧窮、教育程度較差，健康也比較不好。墨西哥政府就跟其他國家的政府一樣，對原住民的需求視若無睹，讓這些貧困的人沒什麼發展機會。於是，原住民只好選擇離開家園。

遷移的型態各不相同，但不變的是農村人民（通常是年輕人）會離開自己的家鄉、國家，有時冒著極大風險到富裕的國度。而家庭為此付出代價。正如一個墨西哥婦人說的：「孩子想念他（父親）啊，但他在那裡（美國）畢竟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他們每個禮拜都付給他薪水。儘管金額不多，我每兩個月都能收到這筆錢。」每個月在自己的國家賺到錢，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奪走的一項人民權利。移民是世界各地的農民對農業經濟自由化所產生的不安回應。從南韓到墨西哥到南非，農村人口都逐漸老化，因為年輕人不是去城市賺錢，就是到海外謀生。不管是墨西哥人前往美國，或是瓜地馬拉人到墨西哥、東歐人前往英國、辛巴威人去南非、摩洛哥人到西班牙，這些人都曾經是農民、都有自己的土地。

越過邊界

我們會在這裡，是因為你在那裡。

——移民反對種族歧視的傳統口號

邊界是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影響最深的地區。如果自由貿易協定注定會激發出各國企業之間的火花，那麼「邊界」這條顯示出國與國之間最大潛在差異的界線，就是火花最熾烈的地方。因為，儘管金錢與貨物要跨越國界並不是一件難事，但是「人」想越過邊界就不容易了。在美墨邊界，美國國土安全部撥了六千七百萬美元給波音公司，請他們在亞利桑那州與墨西哥的邊界設計一道長達二十八英里的「虛擬圍牆」。在墨西哥最靠近這道隱形界線的地方，變化可說非常劇烈。位於富國與窮國的交界，自然有許多工作機會。不過，這些工作機會仍然只屬於那些占盡先機的既得利益者。擁有土地與財富的男人靠著園藝事業發大財，但在美墨邊界附近的奇瓦瓦州華雷斯城卻有淒涼的對比：數百名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帶來的外資工廠工作的婦女慘遭殺害。自由市場竟是如此建立在這些婦女的屍體上。

金錢與貨物不是唯一能越過邊界的東西；文化也能。在墨西哥，人們吃的東西也因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而產生了變化，特別是在市場打開之後，有更多高熱量的食物進入了墨西哥市場。這導致了快速增加的肥胖現象，正如我在第一章概述中提到的，愈靠近邊界的家庭，愈容易出現體重過重的小孩。

現在，墨西哥人不僅吃下更多的食物，食物種類也跟以前大不相同。墨西哥的速食麵消

耗量已經超過了豆類與米食。可口可樂消耗量也比牛奶高。而這背後有更大的隱憂。目前，墨西哥每十個人之中就有一個人患有糖尿病，墨西哥每年花在糖尿病的醫療成本高達一百五十億美元。墨西哥人取得食物的方法也變了。超級市場已經大舉入侵墨西哥。墨西哥沃爾瑪的生意非常興旺：墨西哥人每花十披索買食物，就有三披索是在這裡；光在二〇〇三年，墨西哥人在沃爾瑪減重食品上的花費就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而專家預測還會再增加。

許多人認為，這股從墨西哥北方延伸到南方的肥胖風潮，代表了上面對下面的剝削；上面不只是指美國，也指墨西哥的精英階層。在最近抗議總統大選選票被操縱的行動中（兩位總統候選人為卡德隆與奧布拉多），選民們不只在國內各大廣場表達不滿，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更有大批民眾聚集到墨西哥市的每家沃爾瑪。據說墨西哥沃爾瑪的最大股東阿朗戈（Manuel Arango）曾故意造謠中傷左派的總統候選人奧布拉多。因此，為了打擊這個象徵墨西哥精英階層的右派金主，抗議人士同時做出了實際與書面的宣示。每家墨西哥沃爾瑪都被抗議人士占領，超市的結帳人員袖手旁觀（有的甚至加入民眾的行列），而抗議人士推著裝滿商品的推車，手上拿著樂事洋芋片上下搖晃，把洋芋片當成打擊樂器一樣，一邊唱著「他們不應該通過」以及「不要買這些垃圾」。

在國界另一邊的美國的心臟地區，美國農民也有自己的煩惱，跟墨西哥農民的苦痛是相連的。墨西哥在一九八二年爆發金融危機時，美國農民也捲起一股自殺潮。這兩件事同時發生

並不是巧合，它們都跟一九七〇年代的低利率有關，當時全球各地都受到石油美元的強烈波及。石油美元是指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出售石油所賺得的美元。在七〇年代，由於石油價格飆漲，石油輸出國家的個人或政府都因此大賺一筆。賺到錢之後，他們將這些錢投入國際金融市場，導致市場資金太多，利率幾乎被調降到谷底。而美國與南方國家是舉債最嚴重的國家。於是美國政府積極鼓勵農民提高產量，以賣到看似貪得無厭的全球市場。美國產量增加後，其他各國也紛紛跟進提高產量來競爭，造成全球農產市場供過於求，價格大幅滑落。這讓農民陷入了「生產的惡性循環」：農民必須償還貸款，但產品收入又低，只好借更多錢來購買機械設備、農藥、甚至付土地的租金。農民就像踩在一台快速運轉的踏步機上，產生的動能永遠趕不上消耗的能量（收入永遠抵不過生產成本）。

這種投資當然撐不了多久。到了一九八〇年，美國農民花一美元的種植成本，只能收入零點九七美元。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三年間，美國農民種植十五種主要作物的土地面積共增加了百分之十六。但是經濟風暴的威力實在太大，農民抵禦不了。一九七八年，農民的貸款利率是百分之二點六，到了一九八〇年已提高到百分之五，一九八二年更達百分之六點二。風暴所及，甚至連城市與鄉村地區的銀行也宣告破產。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六年之間，農業與相關產業共有超過一百萬個工作機會消失不見，唯獨食品加工業出現榮景：義大利麵條、早餐穀片、巧克力餅乾、蘇打餅及香腸加工業所需的人力大幅提升，而城市裡的食物銷售業所提供的

就業機會是全國就業成長率的兩倍。但同樣在一九七八到一九八六年期間，農村的貧窮度卻從百分之十二增為百分之二十，農民自殺率躍升。幾乎所有的國民福利統計指標都指出：幸福指數最低的一直是美國農村地區。

錯誤的解釋

跟墨西哥農民的情況比起來，李京海的絕望處境或許比較類似一九八〇年代的美國農民。但是，美國的農業抗議人士似乎不太同情國外農民的類似處境。有一位時事評論者曾經提出並回答了這個問題：「誰殺了加州？」他的結論可能只有一小部分是李京海贊同的。他說，殺了加州的是：

「全球自由貿易及其造成的貿易赤字……扼殺了數百萬個製造業的工作機會，數以千計的工廠被迫關閉，企業紛紛外移到墨西哥、亞洲與中國。現在，加州已經提前面臨「第三世界化」的危機。然而，布希的共和黨政府跟前任的民主黨柯林頓政府一樣，都看不清自己對我們國家做了什麼好事。

而且，這種情況不是只發生在加州。整個美國都是這樣……除非我們能成立一個願意放棄自由貿易狂潮的國會，來拯救美國的製造業，否則加州的處境將會出現在全美各地。但布希總統顯然對此視而不見，連他的父親老布希也一樣。」

這段話是布坎南 (Pat Buchanan) 說的，他是美國的「傳統保守派」。他把加州的衰退歸咎於貶值所造成的債務上升（高達三百八十億美元的預算赤字），以及「毫不限制來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毫不抵抗墨西哥的侵略」。這論點讓民主黨與共和黨幾乎都感同身受。對於同情工人的民主黨或共和黨黨員來說，布希父子或是柯林頓的經濟政策都沒什麼差別。事實上，布坎南並不是唯一這樣看待移民的人；佐格比 (Zogby) 公司在二〇〇六年初調查顯示，有百分之六十六的美國人認為政府開放移民的比例過高。

儘管有許多人都注意到自由貿易已經對美國的工人造成傷害，尤其是對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的勞工，但是布坎南或許把加州的情況講得過於誇張。加州這個世界第六大的經濟體似乎還活得好好的，只要看看加州人民賺多少錢就知道了。在布坎南發表這個悲觀評論的一年之後，加州人的平均收入增加了一千五百美元。在一九九七至二〇〇三年間，加州的經濟成長率高居全美第三，僅次於亞利桑那和愛達荷州。農業是加州排名第四的出口產業，前三名分別是電腦業、運輸業與機械產業；在二〇〇五年，加州的農業出口值約占其出口總值（一千一百七十億美元）的十分之一。加州的農業產量是全美第一，比第二與第三名加起來還

要多，美國有三分之一的食物是加州供應的。這些統計數字真是驚人。加州農地有幾乎百分之八十接受灌溉，共一千萬英畝，在二〇〇二年的農作銷售額高達兩百五十億美元；其中，占加州農場總數百分之一的八百六十八個農場的銷售額就達到一百一十億美元。加州是小型農場的集中地，但你別以為它們是原野上的小農舍。想一想高科技吧。我們一般認為只有資訊科技業才會有的彈性生產體系、即時運送系統、精緻的量身服務以及靈活的資金運用等特色，都出現在加州的農業經營上。加州在食品體系居於領先，不論是資金、生產、加工、零售，甚至網路訂購服務都表現優秀。

而移民一直是加州農業的重要支柱，正如他們對加州資訊科技業的貢獻。原住民以及後來的中國人、日本人、菲律賓人、墨西哥人、旁遮普人與奧薩加人，先後來到這塊土地，同時帶來了他們的食物、技術、種子與專業知識。儘管這些社群遭受嚴重的種族歧視與排斥，他們仍然共同為加州奠下深厚的農業基礎，並且努力讓它成長茁壯。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在偉大的加州過著美好的生活。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分享這個大產業的利益；肩負這體系辛苦工作的勞工，生活是岌岌可危的。加州的貧困人口比美國其他州還要多。在農業體系內，農場工作者因工作而死亡的比例是其他職務的五倍。而他們的時薪只有七點六九美元。這還是「合法」工作者所享有的基本工資。非法打工者的薪資當然就更少了。外籍勞工的實質工資在一九九〇年代持續下降，某些地區甚至是三個勞工搶一個工作。如果說移民有對人造成傷害，那麼受傷最直接的就是移民自己。過去二十年來，移民的湧入使得工資下降。另一方面，這顯示了美國的農業工作機會被外來勞工大舉占領。

在美國，外籍勞工通常會找一些美國人不太願意從事的低薪、低技能的幕後工作（例如婦女會找紡織或是清潔、打掃之類的工作）；在農業領域也是如此。很多美國人還清楚記得，在二〇〇六年五月一日，一百多萬個外來移民（不論是合法或非法）進行了「無移民日」大罷工。這次活動直接影響到許多的食品製造業與服務業。世界第六大的食品與飲料業者泰森食品（Tyson Foods）不得不關閉美國的數家工廠，還有一些工廠也被迫減少人手；其他企業如普度農場（Perdue Farms）、哥雅食品（Goya Foods）、卡士爾爾肉品（Cargill Meat Solutions）與麥當勞，也都跟泰森一樣因為外籍勞工的罷工活動而蒙受損失。

這種罷工並不常見，因為大部分移民對於工作環境或條件沒有什麼選擇的權利。他們的工作情況都受到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人員的掌控。ICE曾經以「防止美國公民的身分遭盜用」的理由，突擊檢查猶他州海倫市的史威福特肉品包裝公司（Swift & Co.）。史威福特是全美第二大肉品包裝公司。「盜用身分」的意思就是使用假的社會安全號碼，而盜用別人身分的外來移民每月所賺取的工資會有一部分進入該美國公民的社會安全帳戶，未來沒有機會把錢拿回來。有很多人因為這項罪名而被驅逐出境。即使有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史威福特有系統地雇用非法勞工，在本書出版時，這家公司仍然照常營運，絲毫不受突擊檢查的影響。

冒險來到美國的移民往往最容易受到剝削，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甘願承受這個風險。在加州，農村勞工一直都很貧困。一九三〇年代，記者與公共知識份子麥克威廉斯（Carty McWilliams）就做了一段典型且令人深思的總結：

沒有人在看過加州鄉村的情況之後，還能否認那可怕的事實。就算把它描述為真正的法西斯主義也不為過。法官盲目地否定被告的憲法保障權利，並在大約收成季節時裁定他們為無業遊民，而刑罰就是要他們去收割。這時候提上訴也沒有用，因為當法院接受上訴時，農作物早已經收割完了。

作家史坦貝克也呼應麥克威廉斯的這份厭惡，他寫道：

即使人們沒有在工作時，也不會抱怨還要餵馬吃東西。但是對那些在我們的土地上工作的男人和女人，我們卻不斷抱怨為何要付薪水給他們。是不是因為這個國家太愚蠢、太邪惡、太貪婪，以至於不願餵養那些幫助我們成為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人？難道要等到飢餓變成憤怒、憤怒變得一發不可收拾的時候，我們才會覺醒嗎？

美國作家辛克萊（Upton Sinclair）也支持他們的看法。一九三四年，他代表民主黨競選加州州長，提出「終結加州貧窮」的主張。在加州這個民主黨票倉，他原本應該獲勝，卻在共和黨有系統的猛烈攻勢中敗下陣來；而且，反對他的不只是富有的共和黨員，還包括了民主黨員。當然，選舉政治不可能為那些沒有投票權的人提供支持。對於非公民身分的農場外籍工人來說，抗爭必須用自己的力量開始。美國農場工人聯盟（United Farm Workers）就是這樣一個自救組織。

一九六二年，農場工人聯盟積極爭取農場工人的工人身分與尊嚴，以及集體談判的權利。這項運動幾乎立刻遭到農場主的反對：運動組織者被開除，其他工人也被威脅。在用盡各種抗爭手段之後，農場工人聯盟開始抵制為加州業者帶來大筆財富的主要作物：加州葡萄。

為了反對這項抵制，葡萄業者成立「工作自由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緊緊咬住農場工人聯盟的組織幹部，不斷騷擾、威脅，有時候甚至毆打。在媒體上，葡萄業者付了兩百萬美元給懷特克與巴克斯特（Whitaker & Baxter）公關公司，進行一連串宣傳，呼籲加州人民共同對抗這項抵制運動，一起來吃「禁忌的水果：加州葡萄」。當有數千加州人選擇拒吃加州葡萄時，業者開始轉向那些沒什麼權利選擇食物的人。他們成功地請求美國國防部購買消費者不要的加州葡萄，直接送到越戰士兵的口中。一九六八年，美國軍方購買了六百九十萬磅的新鮮葡萄。到了一九六九年，軍方已經買了一千一百萬磅，並將運送到越南的葡萄數量提升了五倍。

在一九七〇年代，農場工人聯盟仍不斷被剝削、打壓。對他們而言，最大的打擊並非來自農場主，而是來自其他的工會，更悲哀的是，來自他們自己的勝利。在農場主與卡車司機工會¹的聯手之下，農場工人聯盟受到了來自聯盟內部的打擊；農場主與卡車司機工會在強烈的種族偏見下達成密約，私下破壞了農場工人聯盟談好的協議。農場工人聯盟仍然努力奮鬥，終於獲得一項勝利：加州成立了農業勞工關係委員會，農業勞工的身分和權利獲得了認可。但是嚴峻的失敗又隨之而來，因為委員會的設立也透露出一個訊息，即改變的力量已經不在農場工人手中，而是在最不可能承擔這個燙手山芋的人身上：政府。在等待委員會運作時，工人運動漸漸失去了衝勁。今天，這個經濟體仍然在剝削農場工人（或許有一點點好轉），農場工人聯盟也仍繼續為農場工人的權益在奮鬥，爭取一些小讓步，例如廁所與自來水。

許多跟我一樣住在加州的人，都被「吃本土食物」的風潮席捲，而以上這個故事恰好殘忍地提醒我們，「本土」並不一定等於道德。不過，加州確實有個地方是「本土」代表道德的，那是一塊由移民創造出來的神祕花園。

將農業帶進天使之城

布坎南曾經哀悼加州這個農業之州。加州雖然歷經了「第三世界化」，但這過程卻也同

時激起了農業體系中的勞工保護運動。過去，勞工曾奮力爭取身分認同；現在，他們仍然在努力。最費力爭取勞工權益的就是外來移民，他們沒有任何政黨支持，獨力對抗有錢有勢的農場主，有時還必須抵抗州政府的武力鎮壓。然而，移民不只爭取到勞工權益而已，他們還建立了沒有種族歧視的環保社群的模式，那不僅是加州的先驅，更指引著整個世界。

在洛杉磯國際機場的飛航路線下，是洛杉磯南中區整齊如棋盤格的街道景象。從飛機的窗戶向下眺望，一個又一個灰色的街區緊緊挨著，中間點綴著一點綠意，接著又是一個個緊密相連的灰色區塊。在兩千英尺的空中俯看這區的感覺，就像大部分洛杉磯居民跟這裡一樣保持著遠遠的距離。洛杉磯南中區最惡名昭彰的就是各種族間的緊張與暴亂，所以大部分的中產階級都對這裡敬而遠之。在這個奇怪地區中，我們可以發現影星黛瑞·漢娜為了捍衛此區農民而將自己綁在樹上的抗爭歷史²。在良知的驅使下，好萊塢的人站出來保護南中區的三百五十個家庭：大部分是來自中南美洲與亞洲的移民，而且在美國最大的都市花園中工作。

在洛杉磯南中區四十一街和阿拉米達大道（Alameda Avenue，西班牙文，意為樹木林立的大道）路口，有一塊約十四英畝的區塊，它的東邊緊鄰著倉儲與照明產業，西邊是低層建築的聚集地，整區被包圍在揮之不散的煙霧與繁忙的火車行列之中。過了阿拉米達大道之後，一片寧靜的景象映入眼簾，各式各樣的植物隨處可見。我只能分辨出幾種簡單的植物，像是豆類、草莓、洋蔥、玉米、黑莓、大片種植的香菜、華盛頓蘋果、石榴等等。其他都是我不知道

的植物。自從一九九二年洛杉磯暴動之後，一個名叫阿弗利多（Alfredo）的「牛仔」就在這裡努力耕耘著；這塊土地原本被洛杉磯市政府徵收為垃圾焚化爐的預定地，但是後來市府被迫把土地還給居民。阿弗利多和他的兒子荷西（José）為我展示了他們種植的各式香料與蔬菜，包括 papalo、pipicha、chipilin、overas、chayote 等等（要把這些植物名稱譯為英文，對我來說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對阿弗利多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讓荷西了解這些植物，他說：「了解植物能夠讓人重新與大自然結合在一起，同時將祖先的一切傳承下去。很多無家可歸的人帶著孩子在街頭遊蕩。除了這裡，他們還有什麼地方可去呢？」

荷西說：「我在這裡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但是其他的孩子就沒有地方可去，街上到處是幫派。」南中區混亂的街頭與犯罪情況實在令這對父子擔憂，他們朋友的小孩就有好幾個加入幫派。幸好，農園對年輕人的吸引力比把他們推入街頭的力量還要大。阿弗利多又說：「對這裡的居民以及關心食物的人來說，這塊土地很重要。我們必須花很多錢才能在市場上買到幾類在這裡種的食物。但事實上，這裡種植的很多食物並不是到處都買得到。此外，這裡是人們聯絡感情、認識新朋友的地方。在洛杉磯要找到這種自然的環境是很困難的。聽到風穿過葉子的聲音，就覺得很美好。」

這片農地上大約有一百到一百五十種植物，真可說是城市沙漠中的綠洲。在洛杉磯南中區，你很難看到什麼綠地。跟洛杉磯其他區比起來，這裡每一千人所能共享的綠地只有零點三五英畝，其他地區則是一點五英畝。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為這個農園帶來了各式各樣的植物，他們又予以混合配種，讓農園更加多樣化。這塊原本被市政府放置不管的土地，現在已經變成一個綠意盎然、寧靜安祥的天堂。在這裡，可以看到父母與祖父母坐在樹蔭下乘涼、彼此說笑、吃零食，孩子與孫子則快樂玩在一起。這幅快樂的景象也是移民的收穫。

但這塊土地也陷入了麻煩。市政府當初徵收時，它幾乎沒有什麼價值；現在，他們打算以五百萬美元的價格（雖然市價為一千五百萬美元）重新賣給開發商。但是，拉抬土地價格的最大功臣其實是辛勤耕耘的移民。儘管移民社群為這塊土地付出了許多、儘管他們試著努力籌更多錢想買下來，並積極透過合法的管道爭取自己的權益，甚至也找好萊塢的明星支持，希望能吸引更多注意到他們的困境。然而，他們仍然再次被趕了出去。

我們必須記住，儘管移民遭受到各種如寄生蟲、騙吃騙喝等歧視的封號，但仍然堅忍不拔，為這塊土地帶來豐富的歷史、文化與創意。一旦這個價值被人遺忘，社會將走向無理的排斥。舉例來說，如果沒有世世代代的移民，英國就不會有如此豐富的食物種類。美國更是由移民建立起來的國家，移民還驅逐了原住民。然而，即使這些移民跟以前的移民一樣，都是為了逃離一蹶不振的農村經濟，跨越千里來到美國，並且帶來了豐富的記憶與文化，但似乎還是一些移民注定要努力奮鬥，才能在這個新家園中爭取到同樣的權益：土地、平等與正義。

李京海再現

這就是李京海會變成墨西哥人的過程。由於經濟情勢的改變，尤其是一九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讓美墨兩國的農業社群發生劇烈的變化。雖然貿易承諾帶給窮人很多好處，雖然經濟確實有了成長，卻把窮人完全拋在腦後。為了不被這個世界拋棄，貧困的人只好採取各種方式來自力救濟。他們組織抗議行動，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甚至離鄉背井到其他地方，這些奮鬥的血淚都在本章出現。當食品體系邁向貿易自由化，這些結果都是可以預見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數百萬墨西哥人抗議的焦點；李京海的抗議對象則是WTO。

我們已經看到，在邁向更合理、更有效率的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低技能」的生產者，特別是農業生產者在貿易的作用下變成了碎屑。在下一章，我將討論今日的食品體系是如何被各方勢力塑造出來，其中有的是刻意創造，有的是意外，有些則是純粹以商業利益為考量。我也將探討農村的窮人為何長久以來一直是食品體系下的犧牲者。

1 譯注：Teamsters Union，成立於一九〇三年，是美國最大的產業工會，代表航空工業及其他相關工業中的卡車司機和工人。

2 譯注：二〇〇六年，黛瑞·漢娜為了聲援洛杉磯南部最大的農莊，希望它不會被商人夷為平地，便在農莊內一探胡桃樹上留守抗議達二十三天之久，最後被警方拘捕。

4 只是渴望麵包

希蘭捎訊息給所羅門：你說的那件事我已經考慮過了，你要的香柏與冷杉，我都會照辦。我的僕人會將這些木材從黎巴嫩搬到海邊，並從海上運送到你指定的地方卸貨。你將會收到這些木材，而你要成全我的要求，供給食物給我的家人。於是，年復一年，希蘭就如此運送香柏與冷杉給所羅門，所羅門也一直提供兩萬份的麥子和清油給希蘭的家人當作食物。上帝依照祂的承諾賜給所羅門智慧；希蘭與所羅門之間則彼此立約、和平相處。

——聖經列王記第五章第八至十二節

以上舊約聖經的例子描述了一樁西元前一千一年左右的交易，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記載的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行為。當然，在今日的全球食品體系中，國際貿易的玩家不是只有國王而已，交易項目也不只有小麥、木材與油，負責搬運貨物的人也不被喚作「僕人」。但是，不論

古今，貿易都是指世界上的某一個地區提供資源給另一個地區，其中也參雜著國家政治與經濟因素，因此，所羅門與希蘭的協議其實跟現代國際貿易有一樣的意義。希蘭這種從國外引進食物的想法，就是最早的貿易觀念。從某方面來看，貿易是降低食物價格的一種技巧，也是增加貨物產量的一種方法。透過國際的食品交換或以物易物，人們不僅獲得了新的嘗試與感受，也享受到便宜的價格。本章將解釋我們為何以及如何能享受價格低廉的食物，也將解釋誰為此付出了代價。

有關提神的神祕歷史

法律懲罰了從公用土地偷走鵝的民眾，卻讓真正占有公用土地的罪犯逍遙法外。

——無名氏

現代的世界食物體系源於歐洲，更準確地說，它起源自英國。兩千多年來，龐大的貿易帝國曾在中東與遠東地區不斷興起又衰落，但是，歷史上最早的全球食品網絡，卻是出現在近代英國與其殖民地之間的頻繁交易管道中。這個網絡首先串連了英國的各殖民地，接著延伸到英國國內，特別是鄉村地區。從十五世紀開始，英國鄉村經歷了「圈地運動」：圈地前，貧窮

的人民原本可以使用公有土地，圈地後，這些土地都變成有錢人的「私有財產」。農村的窮人發現自己再也無法使用公有土地，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力。這場經濟改革對社會造成很深遠的影響。對沒有土地的人來說，他們擁有的選擇極少。公共用地被有錢人劃為私人財產之後，許多原來的「自由」農民只好到城市裡找工作。留在農村裡的人則只能為地主耕種，賺取微薄的工資，而且晚上還要做其他工作才能勉強維生。另一方面，對那些地主而言，這種從封建制度轉變為資本經濟的過程帶來了非常大的效率與利潤，也讓他們有足夠的財富去擴張欲望：向國外採購食物。

為了滿足英國貴族與富豪的需求，各種珍貴的食物紛紛自國外引進。這讓倡導素食主義的錢尼（George Cheyne）十分悲痛，他在一七三三年將這種奢華的風氣稱為「英國人的病」：

自從我們的財富增加之後，我們就從世界各地搜羅了各式各樣的物資，造成了暴動、奢侈，產生了浪費……接著，無所事事與充裕生活所引發的新疾病將會增加，而且其增加的速度將會和疾病的改善速度一樣快，對於這種情況，我們應該不會感到意外才對？

不過，國際食品貿易不只是讓有錢人愈來愈胖而已。隨著貿易網絡日益寬廣，以及十八與十九世紀的工業與國家改革，新的農業交易方式將人們帶往一個新的時代。這樣的措詞或

許有些強烈，但是我必須說，國際貿易的影響力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兩個世紀之後，我們無法想像如果沒有國際貿易，飲食生活將會變成什麼模樣。舉例來說，想一想你最近喝的無酒精飲料。二〇〇五年，全世界共消耗了一兆四千七百億公升的無酒精飲料，平均每人喝了二百二十七公升。你最近喝的那罐飲料裡面可能含有咖啡因和甜味劑，也許是高果糖的玉米糖漿，也許是阿斯巴甜或是糖。今日，在全球人口所消耗的清涼飲料中，以含咖啡因的飲料最受歡迎，不過它可能跟你以為的不太一樣。可樂、咖啡和瓶裝水的市占率都在升高，但人們喝最多的還是茶飲：二〇〇五年，平均每人就喝掉了五十七公升的茶。

今天有很多飲料都含有茶或糖，然而對國際貿易來說，茶與糖都算是新的主角，在最近兩百年才在亞洲以外的地方受歡迎。英國人直到今日還常常在茶裡面加入牛奶和糖。不過，一杯好茶所含的水、糖、牛奶與茶葉這四種成分，只有牛奶與水是在十七世紀以前便出現在英國的飲食文化中。糖並不是原產於歐洲。對一六六〇年代的偉大日記作家佩皮斯（Samuel Pepys）來說，茶則是很新奇的飲料。至於糖，食物政治學大師明茨（Sidney Mintz）在其《甜味與權力》（*Sweetness and Power*）一書中，對糖的角色演變做了一個總結：

西元一〇〇〇年時，歐洲很少人知道蔗糖的存在。但是後來他們很快就知道有蔗糖這個東西；到了一六五〇年，英國的貴族與富豪已經餐餐都少不了糖，糖出現在藥物中、變成文學上的比喻、象徵了權貴。雖然糖又貴又稀少，但最晚至一八〇〇年，它已經變成英國人民的飲食必需品。到了一九〇〇年，英國人每天吃下的熱量中就有五分之一來自糖。

糖所代表的上流地位加深了人們對它的渴望，即使糖是白色的，但它的甜味與高熱量仍然吸引著大家。當新興的中產與勞工階級對糖的需求日益升高，有頭腦的生意人發現糖的市場已經成形，可以開始賣糖了。最重要的是，把糖加到茶裡面（糖可以帶走茶的苦澀，而茶的溫和咖啡因在糖的襯托下更讓人著迷），再混合牛奶（讓茶變得更香濃可口），就成了一種風靡並改變世界的飲品。

為了生產茶葉與糖，農業掀起了一場最血腥的改革風暴，那就是：大型農園。先進的農耕技術與固定的單一栽培方式，帶來了新的社會型態，不管是耕地、砍收甘蔗、摘取茶葉，都有取之不盡、用過可拋的無數南方國家的人可以工作。根據一六四五年（長達兩世紀的奴隸制度就是從此時開始）的記錄顯示，為了在南美巴貝多生產蔗糖，業者購買了一千名奴隸。當時的評論家預估業者會購買更多奴隸，因為製糖產業是如此賺錢，人力是如此低廉，以至於只要十八個月，業者就可以把購買奴隸的成本全部賺回來。

跟蔗糖一樣，英國需要的茶葉也必須從國外引進。印度與中國這兩個種植茶樹的地方，因此被納入國際貿易的網絡。英國政府與東印度公司每年都因買賣茶葉而賺取豐厚的利潤

（這件事後來成為北美殖民地、尤其是波士頓地方反抗的對象）。這體系讓大英帝國的飲茶風氣更加盛行，不到兩百年，茶就變成英國最著名的飲料；只要一說到茶，就會聯想到英國。丹亞（C. W. Danyer）在十九世紀末寫了一篇有關茶飲風潮的評論，藉機批評消費者的品味：

令人擔心的是，大部分英國人對於茶都沒有什麼品味。人們對茶飲品質的唯一要求只有顏色與濃度；他們喝到的完全只是糖與牛奶的味道。人們並不會感到絕望，因為糖與牛奶只占飲食的小部分；但是，這兩樣添加物卻讓人們活在茶葉商的控制之下。

關鍵是，茶後來成為勞動階級的飲食重心，對女性的影響尤其深刻。茶加上牛奶與糖之後，就變成一杯既有咖啡因又有碳水化合物飲料的飲料，很能為消耗大量體力的工作提神並提供熱量。丹亞也注意到男、女對茶飲的不同需求，他說：

工廠女工在工作時，身邊隨時備有一壺熱茶，這些女孩也常常跑去店裡喝茶，每天五、六次，每次都喝個一便士的茶，加上一便士的糖。而且她們一定要喝最濃的印度茶，儘管醫學證明喝過量的茶會對她們的神經與消化系統產生嚴重的影響。

在倫敦，被剝削的都市勞工每天都把茶當成熱量補給的來源；在食品體系的另一端，加勒比海地帶辛苦工作的奴隸則都是嚼甘蔗來獲取足夠的熱量，以應付一天的工作。雖然茶對工人來說很重要，但還有另一種飲料也十分受工人喜愛，它比茶更營養，而且生產原料在英國國內就能得到，那就是啤酒。茶在英國能夠建立起如此重要的地位，必須歸功於幾個因素。大英帝國建立廣大的殖民地之後，糖的取得變得更容易，英國人因此培養出愛吃甜食的口味，而且英國陰冷的天氣也總是讓人特別想吃熱的東西。環境與審美習慣有助於普及甜的熱飲。再者，經濟的蓬勃發展也讓茶的供應不虞匱乏。為了確保企業不斷供應茶與糖，帝國的勢力是必要的；在印度與中國主要是為了茶葉，在加勒比海則是為了蔗糖。這兩大地區都曾經受到英國的主宰。還有，宗教也跟茶飲風潮有關：在禁酒以及新教徒的工作道德規範下，啤酒與琴酒被驅逐到工作場所外。對貧窮的工人來說，茶有一個重要的優點：「窮人只要靠兩盎司的茶葉就能撐過一個禮拜……冷冰冰的飯菜只要配上一杯熱茶，感覺就像一頓熱騰騰的大餐。」從工廠到收容所，曾經盛極一時的啤酒，如今被禁止在工作時間飲用，被遠從半個地球之外運來的茶所取代。

說了這麼多故事，並不是要我們去緬懷可以一邊上班一邊飲酒的日子。只要看看南非的情況，你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南非的工廠曾經採行「上班飲酒」制，雖然一九六三年政府立法禁止了，但直到今日，我們仍然可以在少數葡萄園裡看到這樣的工作方式。其結果就是造

成南非有很多兒童患有「胎兒酒精症候群」，幾乎每一千名兒童就有六十人罹患這種疾病，比例是全球最高的。隨著啤酒在工人的生活漸漸式微，茶與糖的買賣趁機興起。如此一來，茶飲不但改變了人們數個世紀以來的口味，也讓「世界工廠」的勞工吸收到較少的營養以及更多的咖啡因。這可被視為「紅牛」(Red Bull) 飲料的起源。茶就是原始版的「卓特」(Jolt，一種咖啡因含量很高的可樂)，它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與碳水化合物，甜甜的又提神。就像「紅牛」飲料的老闆奧地利人馬特希茲 (Dietrich Mateschitz)，賺了很多錢一樣，當年的茶商與糖商也獲得很多財富，而且貿易過程更殘忍。

國際貿易改變了整個世界；高度資本主義在大量剝削的基礎上，從世界各地搜羅了各式各樣的商品。為了提供便宜的食物給歐洲城市，奴隸是整個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在美國、加勒比海與巴西的農場經濟體系中，非洲奴隸就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全球食品體系的運作包含了兩個過程，那就是建立殖民地與強迫開拓市場。略奪型殖民地長久以來提供熱帶食物（糖、茶葉、咖啡、水果、油），加上來自拓殖型殖民地的溫帶食物（穀類、肉類），這些豐沛的食物資源匯集成全球糧食市場中的一股洪流，不只流回英國，更流向全世界。

拓殖型殖民地能夠成功，是因為歐洲的農業商業化將小農逐出了家園。歐洲把這群開拓者送到新占領的土地上。從南非到辛巴威（昔日的羅德西亞），從阿根廷到加拿大，這些地區都被納入新的農業體系之下，發展為生產力高的農業區，以配合蓬勃成長的工業地區。這些殖

民地常會被美化為歐洲的「家庭農場」，然而，其實是為了讓歐洲大都市獲得更多更便宜的食物，殖民地的經濟體才會被設定成出口農業。到了十九世紀末，就連草原上的小農舍都可能是「一種日益商業化的操作，農業完全被掌控在精密的收支平衡、預測及國內外貿易政治之中。」

在其他（熱帶）國家，建立殖民地沒有可行性或必要性。在此情況下，英國人率先發展出穀物貿易，將英國的土地與勞力的自由市場體系帶到這些略奪型殖民地。最早推行的就是印度。英國人有系統地破除印度存在已久的封地制度（每當農作物收成不好，地主就有義務餵養他的佃農），利用電信與輪船的科技，讓印度鄉村裡（為了預防乾旱而設置的）的穀倉跟全球穀物市場連結在一起。印度的穀物被徵收、送往英國的穀物市場。一旦農作欠收，佃農再也不能期望地主會給予免費的食物。在新的英國體制下，佃農必須工作才能賺取食物。但結果卻造成了農村的嚴重饑荒與貧窮。當天氣發生異常，造成農作物欠收時，好幾百萬的農民就為了努力種出能出口到英國的穀物而死亡。戴維斯 (Mike Davis) 就曾指出這種所謂的「合理措施」與現實情況的強烈反差：

雖然英國人堅稱他們把印度從「永遠的飢餓」中解救出來，但是當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引述一篇一八七八年發表於頗具聲望的《統計學報》的研究文章時，不只一位英國官員感到震驚。這篇文章提到，在英國統治印度的一百二十年間，印度共發生了三十一次嚴重的饑荒，但

在受英國統治前的兩千年間，印度史上只有十七次的饑荒記載……幾百萬人死了，不是因為他們生活在「現代世界體系」之外，而是因為他們被迫融入這種經濟與政治結構。他們乃是死在輝煌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

英國直接從熱帶國家奪取食物資源，以及在殖民地地區扶植出口農業這種新商業模式，英國終能餵養她日益壯大的勞工階級，而對於過程中的人類傷亡，幾乎毫無愧疚。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是當時英國殖民部的部長，他在一八九六年的伯明罕商業總會中，明確提到大英帝國行為背後所具有的競爭精神：

如果我們繼續消極下去……大部分的非洲都會被我們的商業對手占領……透過我們的殖民政策，只要我們得到一個新的領土並努力經營，就要把它發展成文明的中介，是世界貿易的跳板。

取得領土之後，接下來就要進行第二步驟：重整殖民地的內部權力狀態。藉由工業的力量，英國逐漸發展出新的帝國勢力，成為世界工廠。於是英國的工業家變得更有權勢。英國日漸工業化，進口食物的比例也日益增加。例如小麥，國外的小麥價格遠比英國國內的小麥價格

還要低。然而，小麥的進口關稅非常高。課稅的依據是所謂的「穀物法」，它對擁有土地的貴族非常有利，因為他們能趁機把國產小麥價格提高。但是，昂貴的小麥卻直接傷害到英國的勞工，也間接影響都市裡新興的中產階級。一八四八年，「穀物法」取消了。這象徵著貴族的沒落與中產階級的興起，也是英國階級政治的一大轉變。新的勞動階級從此可以買到便宜的食物。

羅德斯的難題

然而，國家對工人階級的關心並不是完全來自同情或利他主義。英國的礦業鉅子羅德斯（Cecil John Rhodes）曾總結了那個時代的見解（那時穀物法已經廢除幾十年了）。當羅德斯在一八九五年提出他對食物的看法，有許多政商人士十分贊同：

昨天我到倫敦東區參加一個失業者的會議。我聽著他們的陳述，他們只是想要「麵包」而已！在回家的路上，我反覆回想剛才的景象，更深深體會到帝國主義的重要性……大英帝國的問題，正如我一直強調的，就是麵包與奶油的問題。如果你想要避免國內發生動亂，你就

要變成帝國主義者。

不管是舊或新的權貴，都對日漸龐大的工人階級感到害怕，每天都在擔心他們會鬧出什麼事來。為了消除權貴心中的恐懼，企業人士與政府官員著手進行一項計畫，跟羅德斯的想法十分接近。它的基本概念直到今日還存在，因此值得讓我們好好檢視一番。羅德斯的想法可以理解如下：

1. 窮人有很多，而且仍不斷增加。
2. 沒有足夠的食物可以餵飽所有的窮人。
3. 如果沒有足夠的食物，人民就會挨餓。
4. 如果人民挨餓，就可能發生暴動。
5. 其他國家有足夠的食物可以餵飽人民。

因此，只要從其他國家運來食物，把食物提供給人民，就能夠阻止人民暴動或內戰。

在這個看法中，前兩項是世界上首位職業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提出的。馬爾薩斯最著名的理論就是，以幾何級數增加的人口在經過一段長時間之後，將超越以算數級數增加的糧食生產量，結果導致饑荒與人口爆炸。不過，他提出的這兩項說法對饑荒成因的分析都不正確，也誤導了後人（我將在第六章討論），現今仍有不少人口與飢餓的相關研究抱持同樣的看法。從優生學家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到李京海對人口的憂慮，還有每一個曾經使用

「配額女王」這個字眼的人，只要人們對人口過剩與糧食不足仍然感到恐懼，馬爾薩斯的理論就會不斷被提起。

羅德斯以馬爾薩斯理論為底，加上他自己對階級制度的觀察，提出第二層級的預測。他認為窮人不應該等著人口爆炸、挨餓而死，而是應該團結起來，跟著有錢人的腳步。照此邏輯，窮人是被簡化為三個基本器官：咕嚕咕嚕叫的胃、握緊的拳頭以及永遠無法滿足的生殖器。我們不需要去探究為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多窮人，也不必知道為什麼他們的生育率會這麼高。羅德斯這種跟食物有關的帝國主義是一種歸謬法，他認為防止飢餓不是基於飢餓本身，而是因為飢餓會導致政治不穩定。

對十九世紀末葉的新興中產階級來說，羅德斯的第一項看法聽起來頗有道理，因為窮人確實很多。工業革命（大約是一七八〇年代到一八四〇年代）改變了整個英國。從十八世紀末直到十九世紀，新的勞動階級總是在新興都市的惡劣工作環境下過著貧困的生活。「stim」（貧民窟）這個名詞就是那時產生的，它描述了一種新的城市樣貌。文豪狄更斯便很清楚那時倫敦勞動階級的悲苦生活，他的小說有很詳細的描寫。狄更斯十二歲被送到工廠當童工，負責幫鞋油罐子貼上標籤，每天都要工作十個小時。年輕的狄更斯得靠工資來付房租，因為他父親負債而入獄。雖然一直到狄更斯死後，他根據自身貧困生活所寫成的小說才受到矚目，但是他的文學作品仍然完整揭露出他在工業革命時期親身經歷的各種腐敗、恐懼以及窮人被污名化的

社會現況。在小說《孤雛淚》中，主角奧立佛住在簡陋的房子裡，「粗劣的三餐撐過辛勞的一天，每個禮拜吃兩顆洋蔥，星期天可以享受半個麵包捲」。雖然這種情節可能有些誇大，但它確實表達出勞動階級飲食的貧乏。從工業革命開始一直到十九世紀中期，勞動階級的工資實際上增加不到百分之十五。勞工的飲食反映出這種真實的情況：以麵包為主食，配上馬鈴薯。不過狄更斯生活還算好的；工業革命對女性的剝削比男性更大。如果我們看一下英國文獻有關罪犯流放船上婦女身高與識字率的記載，很多痛苦的現象都會呈現出來。在工業革命的過程中，

一八〇〇到一八一五年間，英國農村出生的婦女的平均身高降低超過零點七五英寸，都市出生的婦女平均身高則是下降零點五英寸。英國婦女的文盲比例也提高。在一七九五年出生的女性罪犯，只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識字，但是出生於一八二〇年的女性罪犯，則有超過百分之二十的文盲比例。

然而，新的勞動階級並沒有消極地向命運屈服。在這一方面，羅德斯的觀察就是正確的。畢竟，十九世紀前半葉正是工業革命的高峰，此後一直延續到世紀末。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勞工運動興起。《共產黨宣言》首次發表於一八四八年，在這一年，歐洲各地紛紛傳出改

革之聲，從法國到奧匈帝國，一直延燒到今日所稱的義大利與德國。在英國，憲章改革派要求全體人民都要有投票權。歐陸的改革運動開始不到幾個星期，甚至就出現公社，例如一八七一年初成立的巴黎公社。對狄更斯時代的英國中產階級，尤其是那些特別容易被政客煽動而恐慌的人來說，顯然社會是動盪不安的，到處都有工作和生活在骯髒、黑暗、擁擠城市角落裡的男男女女在暴動。

歐洲的勞工並不是唯一武裝起來的人。正如歐洲與美國的窮苦勞工紛紛反抗貧窮，那些為白人勞工階級提供便宜食物的奴隸也在奮起反抗。奴隸都感受到了改革熱潮，尤以海地的奴隸抗爭最為激烈。由於受到美國獨立革命的影響，以及幾世紀以來被歐洲強國侵占，海地的奴隸在盧維圖爾（Toussaint L'Ouverture）的領導下奪回了國家的掌控權。他們趕走了法國人、英國人、西班牙人和法國人，努力地走向光榮但短暫的獨立之路；但得到的卻是極為殘酷的回報。經過一七九一至一八〇四年的革命運動之後，海地在隨後兩百多年逐步淪為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而這是美國、法國與德國蓄意作為的結果。如果我們不了解歐美各國的精英份子為何會害怕海地革命的傳染性，就很難理解他們為什麼要以殘酷的手段對付海地。

想平息歐洲勞工的不平情緒，就要削弱他們不滿的藉口。這包括固守不成文的社會契約，也就是將飢餓與剝削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內，保證有便宜且充足的食物。而便宜的食物必須依靠奴隸與低工資的農工。根據戴維斯（Mike Davis）的估計，為了餵飽歐洲與北美的人

民，有上千萬的勞工犧牲死亡，而世界食物體系的發展過程，塑造了二十世紀南方國家的特徵：貧困。這就是為什麼新國際食品體系的建造者會如此害怕奴隸的叛亂。在他們心中：沒有奴隸，就沒有糖，也就沒有足夠的食物來穩定勞工階級。而奴隸誤解了美國獨立與法國革命的涵義；美國獨立與法國革命主要是中產階級起來反抗貴族，但奴隸卻以為自己也能同樣爭取生活品質、追求自由與幸福。獨立或革命的口號並不是給奴隸聽的，因為他們太窮、太黑，而且歐洲太需要他們來生產食物。奴隸生產的便宜的糖，原本就是歐洲各國用來安撫勞工的工具。當歐洲強國把大批奴隸帶到加勒比海時，他們就已經沒有權利揭竿起義，也沒有權利效法歐洲的革命。

食物冷戰

羅德斯這種對於在日益國際化的世界經濟中失去地位的恐懼與憂國意識，仍然是下一個糧食體系的特徵。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取代了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強權。美國藉著強大的政治、經濟與農業勢力，建立新的食物體系。但是，精英階級對勞工運動的恐懼顯示出新的食物分配系統跟舊的其實沒什麼不同。

對於冷戰初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參與國的政府而言，羅德斯的擔憂是一語中的。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數百萬名有紀律、有組織並經過武器訓練的士兵被解散回家。共產黨在各國成了有實力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在歐洲，美國也是。但這時候發生了兩個糧食危機，分別是一九四三年的墨西哥危機及一九四六年的歐洲危機，使得歐美的國會議員一心只想解決糧食問題。關鍵在於，這兩次糧食危機完全出乎美國的意料。在二次大戰後期，美國與加拿大仍然有足夠的糧食可以提供給人民，平均每人每天能吃到三千大卡的食物。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二次大戰開始後首次出現於倫敦商店外的排隊場景，只不過是顯示了戰後英國政府官僚的無能。英國人再次為了買食物而排隊，雖然很不方便，但對於每天能攝取的熱量影響不大：大約二千九百大卡。但是，歐陸各國的情況就糟多了，他們的人民平均每天只能吃到二千大卡的食物。

歐洲糧食危機再現以及冷戰的熾熱氣氛，讓食物再度變成階級政治的武器，而且這不是最後一次。然而，這次的糧食爭奪戰有新的面貌，其規模比以前更為全球化。美國杜魯門總統在一九九九年的就職演說中宣布：

我們必須進行大膽的新計畫，以我們先進的科學與發達的產業來改善未開發地區並促進其發展。世界上有半數以上的人都活在窮困的邊緣。他們沒有足夠的食物，他們受疾病的摧殘，他們的經濟原始落後。他們的貧困對他們自己以及大部分富足地區來說都是一種障礙與威

脅。這將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人類有了知識與技術來減輕這些人民的苦難。

一般認為，這段演說詞就是定義了今日所謂的「發展」的開創性文獻。但少為人知的是，這個「發展」過程並不單純。在這段就職演說中，杜魯門先是描述了共產主義的罪惡，接著闡述了以下的理念，最後才在演說中的第四點提到「發展」：

我們必須執行計畫，去破除世界貿易的藩籬並擴大貿易量。經濟復甦與和平都必須仰賴擴大的世界貿易……我們將鞏固那些愛好自由的國家，協助他們抵抗任何侵略行為。我希望儘快將有關北大西洋安全計畫的協議送到參議院。此外，我們將提供軍事建議與設備給願意與我們合作維持和平與安全的自由國家。

換句話說，「發展」是國際貿易、軍事力量與重分配計畫等政策的一部分。至於重分配的是什麼？原來是糧食。為了因應戰後的糧食短缺，二次大戰後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開始提供充足的糧食給飢餓與開始不耐的歐洲人民。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當歐洲農民生產的糧食已經可以滿足歐陸市場、甚至還有剩餘，他們就希望美國能停止援助。畢竟對歐洲農民來說，便宜的美國農產品是他們銷售自己農產品的一大阻礙。於是從一九五四年七月開始，

美國的糧食援助計畫有了新的目標，那裡的農民沒有能力對抗美國。這個新目標就是南方國家。

在一連串國際與國內隱憂的影響下，美國決定把自己生產的糧食運送到發展中國家。美國農民與農村工作者希望能得到聯邦政府的照顧，也沒有政治人士會願意停止從戰時為了提供軍糧而開始的農業補助。但同時期由於歐洲市場萎縮，使美國面臨了國內糧食生產過剩的問題。就在這一年，美國國內的反共熱潮剛過，莫洛（Edward R. Murrow）公開播出了他的《麥卡錫報告》。而南方國家似乎正朝著共產主義邁進。美國的精英對中國充滿了恐懼與不解（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今日）。對美國的政治人士來說，這一切都可以用冷戰的思維來解釋，就像五十年前羅德斯的看法一樣。只要提供便宜的糧食，人民就不會因飢餓而引發問題，相反的，他們會更感激、甚至更依賴你。這個思考邏輯讓美國政府找到了突破困境的辦法：將生產過剩的美國糧食送給飢餓的人。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美國總統艾森豪簽署了一項公共法案「一九五四年農業貿易發展與援助法」，這就是著名的「四八〇號法案」（PL-480）。雖然名稱看來是發揚國際同胞愛，但它其實是美國政府一項狡詐且有力的外交政策。任何正與勞工組織對抗的親美政府，更確切地說，只要是任何看似有理的反左派政府，都可以獲得美國的策略性糧食援助。於是那些緊鄰著共產社會的國家都被美國視為頭號拉攏對象。

於是，糧食援助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心，此後到一九五六年之前，經濟援助計畫中有一半以上是以糧食為主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〇年間，美國提供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小麥出口量。全球的小麥價格被美國的糧食援助行動刻意壓低，此舉對種小麥的農民造成極大的傷害，但是那些受美國援助的南方國家卻因此上鉤。一九六八年，南方國家對美國的糧食依賴達到了顛峰，美國有百分之七十九的出口糧食都是送到「第三世界」。曾經在尼克森與福特政府當過美國農業部長的布茨（Earl Butts）就十分贊同這項做法，他說：「飢餓的人只會聽令於手中有麵包的人。食物是一種工具，它是美國用來談判的武器之一。」但是這種手段注定不會長久，就像毒販與吸毒者的關係不會永遠持續一樣。

在糧食援助之後

雖然沒有留下墓碑，但戰後的糧食秩序確實在一九七三年瓦解。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國際經濟中最重要的液體——石油——的產銷發生危機。從一九七三年十月到一九七四年，石油價格上漲了四倍之多，嚴重影響到全球經濟。購買與運送糧食到南方國家的成本都大大提高了，使得糧食援助系統不再是個好方案，更要緊的是，那些獲得援助的國家似乎不太感激。許多南方國家受夠了美國與蘇聯的不斷威脅利誘，向聯合國反映催促，聯合國終於在

一九七四年五月提出了「新國際經濟秩序」。南方國家的這項主張其實跟自己的需求沒有太大關係，而是在彰顯其領導者想脫離恩主國控制、自己作主的決心。

這一次的石油危機也迫使冷戰時期的經濟與政治思維重新調整。當駕駛人都在加油站大排長龍等加油時，美國政府知道當務之急就是要保障國內的石油供應不虞匱乏。這時候，剛好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之一需要進口小麥，而且願意用石油來交換。這個國家就是蘇聯。儘管美國跟蘇聯是死對頭，但在當前的嚴峻狀態下，美國也只好勉強把小麥賣給共產黨。美國把糧食賣給蘇聯，是不是那些原本受美國糧食援助的南方國家會大受影響呢？並不是，因為其他北方國家，尤其是歐洲各國，都趁此大好機會把自己生產過剩的糧食賣給南方國家。

在此同時，為了解決羅德斯的難題，各項科技正在發展之中。例如能提高產量的綠色革命技術，可以讓國內自行生產足夠的糧食，不必仰賴國外。這項技術讓原本從國外進口糧食的南方國家轉為農業技術上的依賴，也就是說，他們進口肥料等必需品來提高國內的糧食產量。對許多國家來說（尤其是印度），自己有能力生產當然是一種擺脫乞食地位的進步，但綠色革命的成本其實很高（正如本書第六章將描述的）。綠色革命技術也不是唯一被用來安撫民眾的工具。舉例來說，印度的甘地王朝就曾經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的「非常時期」強迫人民節育，以減少人口的做法來解決飢餓問題，而不是想辦法餵飽他們。羅德斯的擔憂確實一直存在著。

不論是富裕或貧窮的國家，都把糧食援助當成一種政治上的談判手段。儘管這種以增加糧食供給來控制外國經濟的時代結束於一九七〇年代，但已有其他更微妙的手段正在逐步形成。食物經濟的新型態政治操控不再被美國的過剩糧食所決定，而是取決於南方國家的債務上。以下就是原因所在。

當美國正到處找石油的時候，許多南方國家也為同樣的問題在頭痛。他們需要借錢來買石油。於是，那些靠著石油出口賺了大把鈔票的國家便很高興地把錢借給南方國家。這就是「石油美元」時代的開始。資金太多，利率史無前例的低，石油出口國投資成立的銀行將錢借給任何想借的人。這種建築在危險基礎上的金融體系，只要情況出現一點點變化，就會整個垮掉。一九七〇年代晚期，這個變化終於來臨了：因為利率升高，全球經濟衰退，此時已經債台高築的拉丁美洲、非洲國家都走上破產的道路，最後連亞洲也無法倖免。

突然間，國際資金大舉凍結，債務國被迫立刻還錢，但是由於國際經濟衰退，這些債務國都不知道要如何賺錢來還債。不得已，債務國只好借更多的錢來償還利息，希望等待經濟好轉。但由於正值不景氣，通貨膨脹相當嚴重（所以利率大幅提高），錢就更難借到。在借款來源減少的情況下，有一群新的參與者出現了，掌握南方國家的命運，那就是國際金融機構。這群組織的資金來源是納稅人，它們有很多型態，例如國家出口信貸機構、貸款保證組織、國家發展機構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界銀行。世界銀行是由許多富裕國家聯

合贊助的，直到今日，當債務國要還錢給國際金融機構時，第一個要償還的對象通常是世界銀行。世界銀行原本是一個冷戰時期的重建組織，現在它對南方國家的任務範圍不僅擴大許多，權力也變得更強大。一九六八到八一年，世界銀行是由麥納瑪拉（Robert S. McNamara）掌舵，他是美國參與越戰的主要決策者之一。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末，由於世界銀行的資金來源是政府，因此它成為少數有財力又有意願讓南方國家延長還款期限的組織。

世界銀行願意借錢給南方國家，不過有幾個條件。它把這些條件都寫入「結構調整計畫」（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之中。如果第三世界的國家想借錢來償還他們在一九七〇年代的貸款，就必須接受結構調整計畫的「條件」。世銀的理由是，一九七〇年代的金融危機乃起因於「不健全的基礎」，特別是寅吃卯糧的政府預算、過高的匯率、太龐大的政府機構以及對資本進出國內外的操控。這些貸款條件包括一套徹底的經濟改革計畫：債務國政府不得讓財務出現赤字，而是必須收支平衡。債務國貨幣的匯率要能自由浮動；實際上，這做法會讓債務國的貨幣貶值，於是其他國家能用便宜的價格來購買他們的產品，而外國的產品在這些國家就會變得比較貴。債務國的貿易還必須自由化，關稅必須逐漸降低。債務國對國內農民的支援政策，例如「營銷委員會」這一類為農民提供保證市場與最低收購價格的機構，都要取消。而且通常這些國家必須調高利率，以控制國內的通貨膨脹。

若在不同的情況下，這些策略或許非常有益。但是，它們跟以往北方國家在發展時期所

採用的策略有很大的不同。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等工業國家的致富之路跟他們要求南方國家的根本完全相反。當歐洲、北美與日本在十九世紀工業化（印度與中國則是在二十世紀工業化），他們的政府都在工業發展上做了大筆投資，以高關稅來保護本國工業，同時發行公債並擴大公共部門。對南方國家來說，接受世銀貸款條件的唯一好處是讓還款期限延長個幾年，但政府就等於把大部分的經濟與社會支出的主權拱手讓人。於是，南方國家的發展決策將不再掌握於自己政府，而是在債權人手上。

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糧食再度登上了國際政治舞台。債務國仍然必須償還債務，而且要以美元支付，所以他們積極地尋找賺美元的方法。有些國家是說服觀光客使用美元付款。不過，最直接的方法是生產貨物並銷售給擁有美元的國家。譬如運用農業資源，出口農產品來賺錢。透過這些機制，擁有適當氣候與土壤的南方國家生產出口糧食到北方比起種給自己吃更能獲利。而北方國家則以更新、更便宜的「自發性」市場秩序成功取代了舊式的殖民控制手段。隨著匯率自由浮動與貿易壁壘降低，北方國家彷彿是在寬大地接受來自南方國家的廉價食物——北方國家每吃一口食物，就是在幫助南方國家還債。

不到十年的時間，食物體系已然重建。雖然糧食援助仍在進行，但是南方國家的經濟與食物體系如今並非被糧食所控制，而是受到債務陷阱的威脅。在這新的體制下，羅德斯的難題再度解決了，反映出當時人們對食物問題的擔憂。勞工組織在一九八〇年代接連被打擊，世界各地的工會勢力紛紛瓦解，工人暴動的威脅暫時不存在了。新的食物秩序為全世界維持了便宜的食物供給，但也讓美國政府與私人部門逐漸成為農業技術與國際貿易上的重要角色。而設計這個新農業秩序的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機構，那就是「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

二次大戰之後，世界各國為了促進貿易發展，商議了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這項關貿協定或多或少地幫助了各會員國之間達成互惠的關稅減讓。在一九七〇年代，由於當時全球景氣衰退，世界各國都想要提高關稅，以保護本國的產業免於遭受不景氣的影響。如此一來，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便開始崩解。幾經周旋之後，美國政府說服關貿總協定的各個會員國再次回到談判桌上。這一系列的談判首先在烏拉圭的埃斯特角城（Punta Del Este）展開，這場被世人稱為烏拉圭會談的談判一共僵持了八年之久。一九九五年十二月，WTO正式成立。除了延續關貿總協定的主要協議之外，WTO也把範圍擴大到各項專業領域，包括智慧財產權、服務、紡織、農業等，另外，最重要的是，WTO還有解決貿易糾紛的機制，在美國的眼中，這項機制正是關貿總協定所缺少的關鍵項目。

農業方面的協議是WTO新增加的重要項目，在談判過程中也引發了最多的爭議。由於

歐盟與美國自二次大戰以來就積極培育本國農業（但是其中最大的得利者不是窮苦的農民，而是大型農企業），因此他們都不願意降低農產品的關稅。歐盟與美國這麼做是為了維持他們的戰略性存糧，同時迫使南方國家交出農產品供應權。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貿易談判過程幾近破裂，此時美國與歐盟提出一個世界各國能接受的協議。經過無數次談判以及複雜的統計計算，歐盟與美國終於達成「布萊爾舍協議」（Blair House Agreement）；根據此項協議，歐盟與美國仍然可以繼續補助本國農民，但是南方國家的農民就無法享受到相同的權利。在美國與歐盟，政府與大型的私人企業通力合作，共同發展本國農業。而在其他國家中，這些跨國企業也同樣不會受到其他政府的干預。

這就是新的全球食物秩序之架構。在農業方面，後一九七〇年代的世界版圖已經重組。從此，美國不再以糧食援助的方式來表示慷慨，而是發展出更精巧的新貿易協定，一方面繼續培育本國農業，另一方面則以債權人之姿來控制其他國家。在這個「後石油危機」的世界發展局勢中，我們可以看到幾個新的國際金融機構，例如世界銀行以及後來的WTO。WTO主席魯傑羅（Renato Ruggiero）就把WTO的角色做了恰當的描述，他在一九九六年說道：「我們不再制訂各別國家之間的經濟互動原則。我們制訂的是單一全球經濟的共同法則。」然而，這個新全球經濟發展法則的目的並不是想要全面改善窮人的生活品質。相反的，這個新法則乃是人類長久以來藉著供應便宜食物以防止暴動的最新方法。降低南方國家的貿易藩籬，並不是為

了幫助窮人遠離貧困，也不是為了發展農業，而是為了避免國家破產的一項緊急措施。這種國際糧食策略非但沒有為窮人帶來更多的選擇與機會，而且還透過干預、資助，甚至是暴力的手段來控制他們。有很多人認為這些食物系統的相關政策隱藏了許多自由與安全方面的疑慮。如果這些政策剝奪了小農民的自由與安全（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所看到的），我們不禁要問，在這樣的世界裡，到底是誰獲得了更多的安全和自由？這些問題也是下一章所要討論的。

1 譯注：quota queen，美國右翼人士曾經使用這個詞彙將對手抹黑成支持配額制的種族歧視份子。

5 消費者是我們的敵人—— 食品業之基本介紹

競爭者是我們的朋友，消費者是我們的敵人……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是在自由市場上販售的，一樣都沒有！唯一會出現自由市場的地方，就是在政客的演講之中。只有中西部的人才會理解，這實在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安德亞斯 (Dwayne Andreas) 。

一九九五年ADM (公司口號：世界的超市) 董事長的訪談內容

永遠的香蕉共和國：聯合果品公司

貿易協定就跟糧食援助一樣，都是為了讓各個國家可以共同致力世界的自由開放。然而，對窮苦的農民來說，貿易協定卻帶來巨大的災難。自殺、貧困與流離失所已經充斥在許多熬不過全球市場衝擊的鄉村地區。如果貿易協定與自由化沒有為他們帶來自由開放，那麼真正的受益者到底是誰？答案就跟以下的這個組織有關。這個組織偶爾會浮上檯面，不過目前為止它都安靜躲在幕後。在探討與全球食物系統有關的問題時，我們無法不注意這個已經掌控了食物系統長達數個世紀的組織，它可以在彈指之間就將食物供給鏈打斷。

今天，跨國農業企業一共控制了百分之四十的世界食物交易，有二十家公司壟斷了咖啡的買賣，有六家公司操控了百分之七十的小麥交易，而百分之九十八的包裝茶葉則完全由一家公司包辦。每家公司的操縱手法略有不同。舉例來說，有些跨國農業公司和農民打交道時會提供諮詢與信用貸款，並且在農民的農地有法拍之虞時提供製作農業合約。而這樣的結果就是，農民會完全喪失主導權。當跨國農業公司將農民打點好之後，農民所生產的食物就會被裝箱運送到國內各處以及國際市場。跨國農業公司會利用組織內部交易來降低課稅的負擔。此外，他們還善於訴諸國家利益來要求政府給予補助。同時，他們也會利用一面倒的科學研究成果來為他們「崇高」的行動背書，並以「因應市場競爭」來合理化他們的干預行為。只要哪裡

有可能出現利潤，這些跨國農業公司就一定會聞風而至。

譬如現代食物體系的第一批商品：香蕉。香蕉的生物構造是它能成為國際食品的重要原因。香蕉被紮實的香蕉皮所包覆，因此在長距離運送之後仍然具有完好的賣相。成立於一八九九年的聯合果品公司曾經是全球最大的香蕉商。在顛峰時期，這家公司不但掌控了香蕉產業，更操縱中美洲島嶼國家的貨運、郵件與金錢流動。聯合果品公司謹慎捍衛著它的權利，當時也很少有人能與之抗衡。若當地民選政府試圖限制它的權力，或者人民聯合起來想抵抗剝削時，聯合果品公司就會進行反擊。

聯合果品公司最惡名昭彰的行為就是它利用跟杜魯門與艾森豪政府的關係——特別是透過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他的律師事務所是該公司的法律顧問——指稱瓜地馬拉民選總統阿本茲（Jacobo Arbenz Guzmán）是共產主義支持者。為什麼它要這樣做呢？因為阿本茲打算以聯合果品公司所申報的地價來購買該公司的閒置農地，並將這些農地分配給沒有土地佃農。但這些極低的地價其實是聯合果品公司為了報稅而刻意降低的。結果，美國中央情報局於一九五四年受美國總統指示，策畫了一個名為「成功」（PSUCCESS）的行動，造成瓜地馬拉的內部衝突，共奪走了二十萬人的生命，歷時超過四十年。瓜地馬拉的大片土地仍然掌握在聯合果品公司的手裡。所以該行動才叫做「成功」。

附帶一提的是，此行動有一個後續任務，就是搜尋過去各個檔案，以找到能證明阿本茲

是共產黨傀儡的證據。這項任務被命名為「歷史」(PHISTORY)。但美國中情局翻遍了多達十五萬頁的文件，還是找不到任何證據。這場行動並沒有因此結束，它造成的傷害持續了四十多年，直到一九九六年瓜地馬拉的血腥內戰才看似和平落幕。類似的行為不斷出現在聯合果品公司身上，這也是它為什麼會贏得「章魚」這個綽號的原因。

在美國，很少有人知道聯合果品公司與政府串謀剝削中美洲的窮人。這是一段刻意抹滅的歷史。在那一段時間裡，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的許多國家都因為出口香蕉而聲名大噪，然而，世人充其量只知道香蕉出口貿易企業所設下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卻很少能看到背後的強取豪奪的歷史事件。大家不明白這些國家其實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反而為他們冠上了「香蕉共和國」的稱號。這名稱不但無法彰顯這些國家窮困的原因，更讓他們名聲掃地。簡單地說，這就是一個「指責受害者」的典型例子。

今日，聯合果品公司已經改叫一個看起來溫暖、模糊的名稱：奇基塔公司 (Chiquita Brands)。這家公司透過許多公關活動，打著「公平交易」的旗幟，努力想贏得一點消費者的青睞。不過，這不表示它值得受到我們尊重。它最近才因為資助哥倫比亞的右翼民兵而被罰款二千五百萬美元。總結說來，聯合果品公司的各種行徑與遭遇是今日許多農企業的一個縮影。它代表著一種殖民主義，它控制著生產、分配、行銷與資金管道，它操弄著國家利益、同時強化了第三世界的種族分離。首先，就讓我們來談談權力的結合吧！

各種不同的聯合方式

把你的蛋全部放在一個籃子裡，然後一直看著這個籃子，不要分散你的資源。只有集中才能為人生贏得最多的成就。

——安德魯·卡內基 (Andrew Carnegie)

今日，想要獲得財富只有靠一個方法：合併。說得更明確一點，就是市場力量的集中。綜觀整個食物體系，集中市場力量已經蔚為一股風潮。正如聯合果品公司提醒我們的，市場力量早就不是什麼新聞了。一個世紀以前，只有卡吉爾、大陸 (Continental)、邦吉 (Bunge)、路易達孚 (Louis Dreyfus) 這四家公司在經營全球穀物貿易。而從現在的市場集中型態與廣度來看，食物體系沒有一個角落不被大型的農企業占滿。美國密蘇里大學的研究人員曾經追蹤食品市場中的許多項目來觀察市場合併的速度。他們先計算出任何一項農產品或農業服務在美國的市場規模，再統計有多少比例是掌握在前四大企業手中。這就是所謂的「前四大廠商之市場占有率」或「前四大集中率」(CR4)。美國市場的這種集中趨勢將告訴我們有關食物的過去與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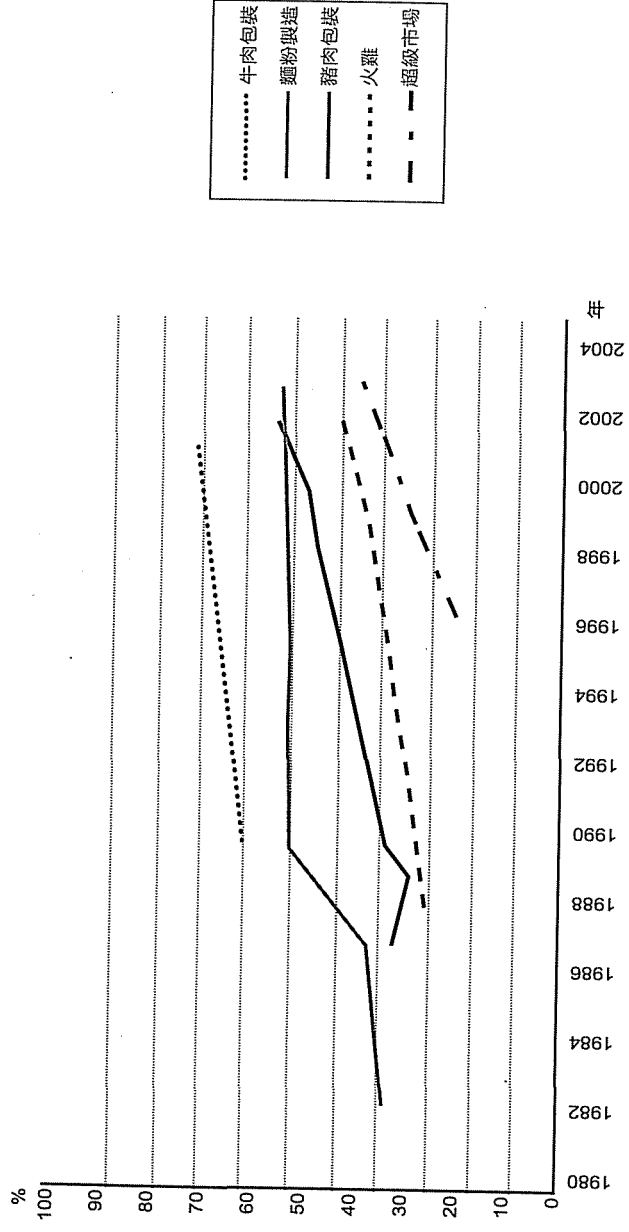


圖5.1 美國食物體系中，各食品領域的前四大廠商的集中趨勢

(資料來源：Hendrickson et al. 2001)

這一長串數字顯示出食品體系存在一個主要的矛盾。一般而言，競爭應該會為市場帶來更高的效率與更低的價格，但是食品製造與銷售的過程卻導致市場競爭減少，並為大型企業帶來更多的權力。於是，消費者成了受害者：根據最近一項研究，市場集中化已經造成美國三十三類食物中有二十四類價格高漲。此外，農民也深受其害。一九九九年，農業經濟學家泰勒（C. Robert Taylor）向參議院農業委員會證實：「從一九八四年以來，一籃子食品的實質價格已經上漲了百分之二點八，但是食物的農耕價值反而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點七。」

我們或許還寄望於某些國家所設立的「競爭」或「反壟斷」委員會，相信他們能阻止寡

圖5.1顯示出在少數幾個企業掌控下的市場集中程度，以及他們掌握的各個食品領域（從家禽養殖業一直到零售業）之集中化增長情況。企業合併情況橫跨了整個食物體系。前十大食品業者控制了世界一半以上的種子供應量。在總價值大約二百億美元的動物用藥市場中，前十大業者掌握了百分之五十五。十大農藥業者所掌控的農藥市場約占三百億美元市價總值的百分之八十四；分析家指出，根據合併的趨勢，到了二〇一五年，整個農藥市場將被三家最大的企業壟斷。在一兆二千五百億美元的包裝食品市場中，前十大食品與飲料加工業者就包辦了百分之二十四。在集中情況最嚴重的零售業中，前十家業者掌握了三兆五千億美元市場的百分之二十四。對那些希望從酒精尋求慰藉的人來說，他們喝掉的啤酒有百分之四十一是來自五家歐美大公司。

占市場的形成。然而這些希望卻所託非人。當業者想要合併時，他們會拿著各種理由來說服這些委員。其中，最基本的論點就是達爾文主義：市場的機制就是適者生存，政府最好不要干預；如果一家企業注冊成為市場競爭下的犧牲者，政府就不該出手挽救。合併的行為被「效率」的名義正當化，規模經濟被認為是企業合併的「綜效」。當企業要說服政府當局同意合併行為，便會宣稱兩家企業的合併「綜效」能讓消費者獲得更好的利益。有時候，企業會透過「旋轉門」的方式來酬庸負責協調的政府官員，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官員在任內有好的表現，企業就會以高薪聘請他們擔任一些掛名的職務。當然，這種做法的最終受益者仍然是股東。

最近在種子產業中的一樁企業合併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化學大廠孟山都（Monsanto）併購蔬菜種子公司聖尼斯（Seminis）。孟山都公司說：「技術能力是互補的，現在，孟山都的研究範圍變得更廣了。」言下之意，就是孟山都與聖尼斯的專業知識相互結合之後，就能進行更多的研究與發展，而消費者將是最大的受惠者。但是，這兩家企業的合併對於有經驗的投資人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正如美國農業部的經濟研究單位所說，種子產業的集中以及種子研究的私有化只會減少企業在研發方面的投資，而不會產生更多的研發成果。孟山都公司真正的想法應該是，由於蔬菜種子是一種具有「高價值、高成長潛力的農產領域」，因此，兩家市場龍頭的合併將讓孟山都一舉超越它的對手杜邦公司（DuPont）。

或許，我們本來就不應該寄望這種合併綜效會幫助大眾獲得最大的利益。企業本來做生意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利，而不是為了遠大的社會目標。雖然他們有時候會提到「遠大的社會利益」，但這只是在投資人面前做的一個小動作而已。公關部門發布的消息向來都是為了討好投資人罷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例子。最近世界上最大的食品集團高特利（Altria）完成了一個綜效案例。我還在寫這本書時，高特利集團（前身為菲利普莫瑞斯集團〔Philip Morris〕）正打算放手讓它旗下的卡夫食品（Kraft Foods）獨立經營。在卡夫食品獨立之後，高特利集團仍會持有南非米勒釀酒公司（SABMiller，是米勒啤酒與南非啤酒合併之後的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並可同時繼續經營它的核心企業，也就是菸草。菸草與食品加工看起來好像不太可能搭在一起。菸草傳統市場曾經一度面臨衰退，同時，各菸草公司又必須支付大筆的法律賠償金額，為了因應這樣的困境，菲利普莫瑞斯集團買下通用食品，打算把原本的菸草專營轉型為多角化經營，並且期待這些新的事業能成為菸草之外的不同收入來源。沒想到，這筆買賣竟然成了菸草產業的金雞母。當菲利普莫瑞斯集團在一九九二年買下卡夫食品之後，它便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性產品公司，換言之，這家高寶路香菸的製造商不只是買下人們吃的食物而已；透過卡夫食品的物流網絡，菲利普莫瑞斯集團買下的除了食物之外，還有讓人們吃下這些食物的方法。

乍看之下，菸草公司把經營觸角延伸到食品產業似乎有些奇怪。但是這其實早有先例。一八八七年，伊斯多爾（Isidore Gluckstein）和蒙塔克·格拉斯坦（Montague Gluckstein）兩兄弟就已經帶著家族經營的專門削價競爭的菸草公司進入外燴業務。他們的外燴事業做得有聲有色，到了一八九四年，他們買下一個小工廠並且在這裡大量生產食物，同一年之中，他們在倫敦的皮卡迪利廣場開了旗下第一家零售商店約瑟夫里昂茶館（J. Lyons and Co.）。茶館是倫敦的一大特色，因此該公司所開的茶館也成為它在整個英國的食品生產、加工與銷售網絡之主要支柱。在這樣的情況下，該公司的食品相關業務可說是蒸蒸日上。正如該公司的傳記作者所說，它成長為世界上第一個食品帝國。它的產業規模相當龐大，在尼亞薩蘭，也就是現在的馬拉威，擁有大片的茶園，而且從茶樹種植一直到最後產品銷售的每個環節都由該公司掌控。當茶館的熱潮漸漸退去之後，里昂公司在一九五三年成立溫比（Wimpy）速食連鎖店（透過里昂公司的經營據點，這家店也成為印度的第一家速食連鎖店），正式將速食文化帶進英國民眾的生活。要管理這麼龐大的公司必須投入大量的資源，在技術上也必須隨時創新，因此里昂公司孕育出世界上第一部商用電腦「里昂電子辦公室第一代」，簡稱里昂一號，並以這部電腦來控管所有的業務。此外，里昂公司也聘請了許多食品科學家，包括當時剛從牛津大學化學系畢業的柴契爾夫人。現在，雀巢公司擁有里昂公司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則是聯合里昂集團（Allied Lyons）所有，聯合里昂集團的其他成員還包括唐恩甜甜圈（Dunkin' Donuts）。這樣的結

局看起來或許不太光彩，但至少它還是將生意繼續維持了下去。

就像以前的里昂公司一樣，現在的高特利集團也是一個商業巨擘。二〇〇五年，高特利集團在食品方面的淨收入超過三百億美元，旗下的產品包括奧利奧餅乾、星巴克咖啡、瑞士三角巧克力、奧斯卡梅爾肉品（Oscar Meyer meat food）以及菲利普莫瑞斯的萬寶路香菸。高特利與里昂這兩家公司在市場上的地位，不但讓他們擁有動機與手段去成為遵守市場規則的玩家，更讓他們得以積極地改變與創造這些規則。

身為食品市場的主要玩家，高特利集團也跟華盛頓特區的政治圈有所接觸。舉例來說，它是美國貿易代表處農業技術顧問委員會的一員。然而，要在華盛頓特區的政治圈裡打滾，代價可不便宜。在一九九八到二〇〇四年之間，高特利集團在華盛頓特區總共花了一億一百二十二萬美元的疏通費，付錢給五十多個人，並且接觸了二十幾個聯邦政府部門，從美國農業部到鐵路局退休委員會，讓這些人贊同高特利集團的觀點，從而制訂出對它有利的法規與政策。

這就是併購所帶來的力量，它強大到足以改變遊戲的規則。在WTO中，這種改變市場的過程可能更為明顯。（有鑑於WTO那些不透明的處理程序，用「明顯」這個詞來形容或許不太恰當！）各國政府的談判授權並不是在日內瓦的WTO總部之內完成的，而是出現在華盛頓、倫敦、北京的旅館會議室裡，那些被選為會議代表的官員在這裡所享用的點心與娛樂，都

是甜食與香菸廠商所提供的。

市場中處處可見政治回報

在商業界，高特利集團並不是唯一花錢買通政府的公司。整個食品體系，從種子產業到小包裝食品業，每個業者無不想盡辦法拉攏、遊說、威脅、利誘，只為了得到政治人士的利益回饋。在食品體系的合併風潮下，這種政治上的利益回報開始對市場結構產生了影響。如表5.1所示，如果我們看看美國政治體系所接受的捐款總額（這是有申報記錄的部分，其他檯面下的捐款還不算在內），可以發現食品體系中許多產業的前四大廠商所捐贈的政治獻金幾乎占了捐款總額的一半以上。換句話說，每個業者都想藉由政治捐獻來獲得一些好處。這種情況早就見怪不怪了。而

且，有時候不同領域的食品業者所要求的政治回報還會互相衝突。結果是根據不同的原因而定。當然，捐款金額的多寡是一項因素，但也要看當時政壇的主流風氣為何，還有廠商是否有其他外來的助力、遊說手段是否高明，而政治人物偶爾也會參考一下大眾的意見。舉例來說，在一九九三年，美國與加拿大政府都宣布國民在日常飲食中應該減少動物脂肪的攝取。這項建議雖然早在十多年前就有營養專家提出，但是美加兩國政府正式採用建議的背後意義不是科學的勝利，而是蔬菜油產業戰勝了肉品與乳品業。因此，政治捐獻或許應該說是一種現狀，而不是一面反映現狀的鏡子。我們不僅可以從政治捐獻當中看出目前誰占上風，同時也能看出哪些人正努力爭取下一次的勝利。

在食品體系這種藉由政治力量來影響市場的情況中，合法與非法行為的界線變得很模糊。有時候，法律與現實之間的鴻溝變得如此巨大，有些廠商不免失足墮入。當業者在法庭上成了被告，可不像在文具店偷鉛筆的那種小案件一樣容易解決。在過去幾件相當大的訴訟案件中，食品業者都被判敗訴，其中包括：伊士曼化學公司（Eastman Chemical Company）、赫希斯特公司（Hoechst AG）、日合成化學（Nippon Gohsei）與大賽璐公司（Daicel）串謀哄抬山梨酸（sorbic acid，通常以E200-203表示）價格的案件；巴斯夫化工（BASF AG）、赫夫門羅氏藥廠（F. Hoffmann-La Roche Ltd.）共謀哄抬維他命A、B2、B5、C、E與胡蘿蔔素（Beta Carotene，早餐穀片的常見添加物）價格；最著名的案件是阿契爾·丹尼爾·斯米德蘭公司（ADM）拉

表5.1 食品體系中各產業給美國政府的遊說費用
（資料來源：廉政中心，2006）

產業別	1998到2004年捐款記錄總額（美金）	最大捐款者	最高單筆捐款占產業總捐款的百分比（%）	前四大公司捐款占產業總捐款的百分比（%）
農業服務與產品	104,137,056	美國農業社團聯合會、各州成員與相關企業	37	75
啤酒、葡萄酒與其他酒類產業	74,629,931	烈酒協會	24	58
其他農企業	14,047,965	卡吉爾公司	38	89
食品與飲料產業	62,359,787	馬爾斯公司（Mars Inc.）	15	48
食品加工與銷售	67,920,672	美國食品加工產業協會	16	44
零售	73,803,244	全美便利商店協會	15	40

抬離氨酸 (Lysine) 與檸檬酸 (Citric Acid) 價格的行為，在市值六千萬美元的市場上將這些化學產品的市價提高了百分之七十。

在詳細討論 A D M 公司的案件之前，我們要注意一個重點，那就是法律並不是專門用在解決某些「利益人士」與企業的衝突事件。司法對大家是一視同仁的，她不僅很樂意在「利益人士」與企業的小小衝突中做出評判，對於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鬥爭，她也同樣樂於提供解決之道。舉例來說，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這兩家苦苦纏鬥多年的飲料業巨擘就曾經聯手共同以法律來對抗食品業的其他巨人。儘管這兩家公司之間存在著很多歧見，但是當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在高果糖玉米糖漿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的使用上出現問題時，他們還是聯合起來捍衛這項基本原料。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兩家公司同一陣線對抗玉米糖漿生產業者，控告後者串謀抬高原料價格。百事可樂與可口可樂宣稱 A D M、卡吉爾與史得利 (Staley) 的聯合抬抬價格行為，讓他們的製造成本增加了十六億美元。卡吉爾公司最後以二千四百萬美元的代價與這兩個飲料巨人和解。對卡吉爾來說，這個結果還不錯。因為如果這三家公司被判有罪，法官可依法判決他們付出十六億美元的三倍，也就是將近五十億美元的賠償金額。為了避免付出高額的賠償，A D M 公司最後以四億美金和解。由於 A D M 公司常常碰到類似的事情，因此他們在處理官司方面可說是駕輕就熟了。一九九〇年代中期，A D M 公司被指控進行蔬菜副產品離氨酸的聯合抬價格行為。為此，美國聯邦調查局對 A D M 展開大規模的搜查行動，後來該

公司的前任副總裁向聯邦調查局密告，最後 A D M 被處以一億美元的罰款。兩位串通定價的高階經理被處以三年的有期徒刑。而那位協助聯邦調查局進行三年調查的副總裁惠特克 (Mark Whitacre)，被判了九年的刑期。

此外，在食品體系中，同一個產業之內必然會有幾家不同的公司在彼此競爭，但是這些公司還是可以合法地與上下游廠商合作。舉例來說，卡吉爾與孟山都將彼此的產品製程與物流程序結合在一起，將兩家公司的產品 (農藥與種子) 運送給客戶。諾華製藥 (Novartis) 與 A D M 公司也有類似的合作。康艾格 (ConAgra)，這家北美最大的穀物研磨業者之一，也跟它的上下游廠商共同合作，合作對象包括種子業者到食品製造業。透過這樣的經濟合作，食品體系的競爭情況愈演愈烈。但是，如果沒有政治力的穿針引線，企業之間也不可能這麼順利地結合。雖然大部分的食品體系都掌握在私人企業手裡，但社會大眾與政府才是允許與塑造市場的人。我們可能忘了其中的關係，但農企業並沒有忘記。而且沒有企業比 A D M 更清楚這一點。

安德亞斯與國家利益的操弄

但是，如果我把每顆七分錢買來的蛋，以四點二五分錢的價格賣回給馬爾它的人民，這

樣每賣一顆蛋，我至少可獲得三點二五分錢的利潤。我當然沒賺到這些錢。那個聯合組織把錢賺走了，而且每個人都分到一些好處²。

——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中，明德賓德中尉的話

當一國對他國懷著熱烈的喜愛時，各種弊端就會產生。由於對所喜愛的國家抱持同情，自己便會幻想出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共同利益；同時，由於將他國的仇恨也灌注給自己，結果當他國與別國發生爭端或戰事時，自己也會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無端介入。此外，所喜愛的國家也會獲得一般國家不會得到的特權；於是，這個做出讓步的國家便會蒙受雙重損害，一是損失本身應當保有的利益，一是激起沒有獲得這些利益之國家的嫉妒、厭惡和報復心理。這一切將會給那些有野心的、貪腐的或受蒙蔽的公民提供了方便；儘管他們投靠了自己所喜愛的國家，但這些弊病將使他們在背叛或犧牲自己國家的利益時不會遭人憎恨，有時甚至還受到歡迎，同時，那些因為野心、腐化或狂熱而屈服的愚蠢之人也將會被粉飾成具有正直的責任感、順乎民意或是熱心公益而值得讚揚的人。

——喬治·華盛頓一七九六年《告別演講》

ADM公司提供了一個血淋淋的教訓，讓我們看到食品產業花了大筆政治獻金之後的下場。ADM當時的最高掌舵者是安德亞斯，他在一九七一到九七年之間擔任執行長。安德亞斯出生於一次大戰末期，年輕時在一家食品加工廠上班，學到了許多食品產業的知識。這家食品加工廠後來在二次大戰時被卡吉爾公司買下。短短七年之內，安德亞斯就從基層員工迅速竄升到副總裁的職位，並且做到他離開這家公司。一九六五年時，安德亞斯和他的弟弟獲邀進入ADM工作，來挽救這家當時瀕臨破產的公司。那時安德亞斯已經在政治圈擁有相當強大的人脈，他捐贈了大筆的政治獻金給有望當選美國總統的民主黨候選人漢弗萊（Hubert Humphrey）以及共和黨的候選人尼克森（事實上，當安德亞斯開了一張支票給水門大廈的一名潛入者時，他就成了套殺尼克森政治生涯的第一根繩索）。

農企業捐錢給政治人物，有時候收買的是政治人物的心。ADM董事、一九八五年擔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史特勞斯（Robert Strauss）就公開承認：「安德亞斯擁有我，但我指的是好的那一面。」

對安德亞斯來說，政治捐獻就像以前人民繳錢給教會一樣，他坦承：「我覺得政治就像教會。」這比喻能幫助我們思考。如果在教會中，那個仁慈、沉默的最終權威是全能的上帝，那麼政治圈裡的最終權威是誰？它必須是不為自己辯駁的，而是教出一批信徒替它說話並奉行旨意，最重要的是，它必須贏得所有人的忠誠，必須讓所有政治成員都絕對相信，沒有一絲懷疑或批評。我們稱它為「國家利益」。國家利益沒有任何不證自明的形式或主旨，但是

它有自己的高階神職人員與神喻。對這些人來說，任何想要得到救贖的人只要一點點捐獻就能得到神的赦免。就像中世紀教會所發的贖罪券一樣，國家利益也是偏好有錢人，而不是窮人。

安德亞斯撒下的大筆鈔票便讓美國的國會議員甘心奉上大量的國家利益。雖然他有時候會因為做得太過分而招致小小的懲罰（ADM公司承認在一九七六年的「糧食換和平計畫」中與蘇聯進行穀物交易時有犯罪行為），雖然安德亞斯的強大影響力還是無法讓他的兒子免受牢獄之災（他兒子因離氨酸的操縱定價醜聞而入獄），但是在冷戰的高峰時期，他仍然把國家利益帶到了一個十分崇高的地位。

我們可以玉米為例。就像第三章描述的，墨西哥的貿易替代現象並沒有結束於墨西哥，同樣的，玉米的故事還有許多後續文章。雖然美國成功打開了海外市場之門，但美國國內仍有許多玉米等著出售。政府花了大筆的公共經費來發展玉米的其他用途或是把玉米運送到其他國家。一開始的時候，美國把生產過剩的玉米當作對付共產國家的策略之一。自從一九四〇年代末期以來，糧食援助就成為冷戰時期的一種防禦策略，也就是以食物來安撫眾多飢餓且可能暴動的南方國家的工人。美國以糧食援助之名，把大批的食物運送到世界各地。在一九六〇與六一年，美國每十噸玉米中就有一噸是用於糧食援助，而小麥、麵粉、黃豆油與奶粉則是每四噸就有一噸被送到其他國家。然而，即使美國大方地到處贈送食物，還是無法完全消耗堆積如

山的過剩糧食，必須想出其他的用途來解決這個問題。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困境終於有了突破，而且將改變數百萬人的生命，那就是：高果糖玉米糖漿。美國花了大筆經費來研究如何將玉米轉換成地球上最普遍的甜蜜汁液。玉米先經過濕式碾磨過程，乾燥之後分類，浸泡到亞硫酸之中；玉米種子裡的胚芽被去除，然後是洗淨、過濾、脫水，接著加入稀釋過的鹽酸加熱，這樣就可製成玉米糖漿。這時候，這個混合物只要經過淨化與後續處理，它的甜度就能達到糖的四分之三。如果要把甜度再提高，就要讓果糖跟酵素起反應，藉此增加果糖量，接著經過蒸餾與濃縮之後，甜度就會大大提高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再稀釋之後，就能製造出符合產業標準的百分之五十五果糖含量的玉米糖漿。

如圖5.2所示，高果糖玉米糖漿的市場需求量非常大。但它大受歡迎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甜度，而是因為兩項獨特的經濟特性。第一，高果糖玉米糖漿並不是真正的糖，而是用來取代糖的東西，但由於糖在美國的售價頗高，因此便宜的高果糖玉米糖漿就變得很有吸引力。在二〇〇五年，美國平均糖批發價格是每磅二十九美分左右，世界平均糖批發價格則是每磅十三美分。美國以限制糖的進口數量來保護國內的製糖產業，市場無法從國外獲得大量便宜的糖，因此糖價一直居高不下。然而，從中獲取最多利益的不是窮苦的農民，而是位在食品體系中間的食品加工業者。這是預料中的結果，也是ADM公司處心積慮收買來的好處。何以見得？因為這些製糖公司是美國國家利益的一部分。

益。

然而，安德亞斯對國家利益所做的最大變革不是在高果糖玉米糖漿方面，而是他與蘇聯之間的交易。一九七四年，戰後的糧食體制剛剛解除，安德亞斯就忙著效法明德賓德中尉的國

年，美國人每年平均消耗掉六十四磅（乾重量）的高果糖玉米糖漿。這一切全來自國家利

高果糖玉米糖漿如今是無處不在。一九六九年，你還沒辦法買到它，而到了一九九九

格出售，他們可以輕鬆地把產品價格壓低，對國內的精製糖市場造成致命的一擊。」

「ADM公司能夠以每磅九到十二美分的成本來生產玉米糖漿，再以每磅十八到十九美分的價格出售，他們可以輕鬆地把產品價格壓低，對國內的精製糖市場造成致命的一擊。」

利樂（Tate & Lyle）的子公司史得利。正如[巴納斯（John Barnes）在《新共和》雜誌中寫道：

大約有百分之十是用來製造高果糖玉米糖漿，而控制市場的不外乎ADM、卡吉爾以及泰特

既便宜又容易取得。想當然爾，這其中的重要參與者就是ADM公司。美國的玉米總產量中

對穀物貿易商來說，這樣的論點還有著更深層的意含，也就是說，這個攸關國家利益的

米農並且使用他們種出來的玉米將會帶來國家利益。

一九六九年，高果糖玉米糖漿誕生，它的第二個經濟特性就是：玉米的價格很低。以前

美國政府會採用進口限額制度來維護國家的利益，但是這一次美國卻改用複雜的獎勵制度來鼓

勵農民，讓美國玉米的價格能在國際市場上更有競爭力。其中的正當性何在？因為持續支持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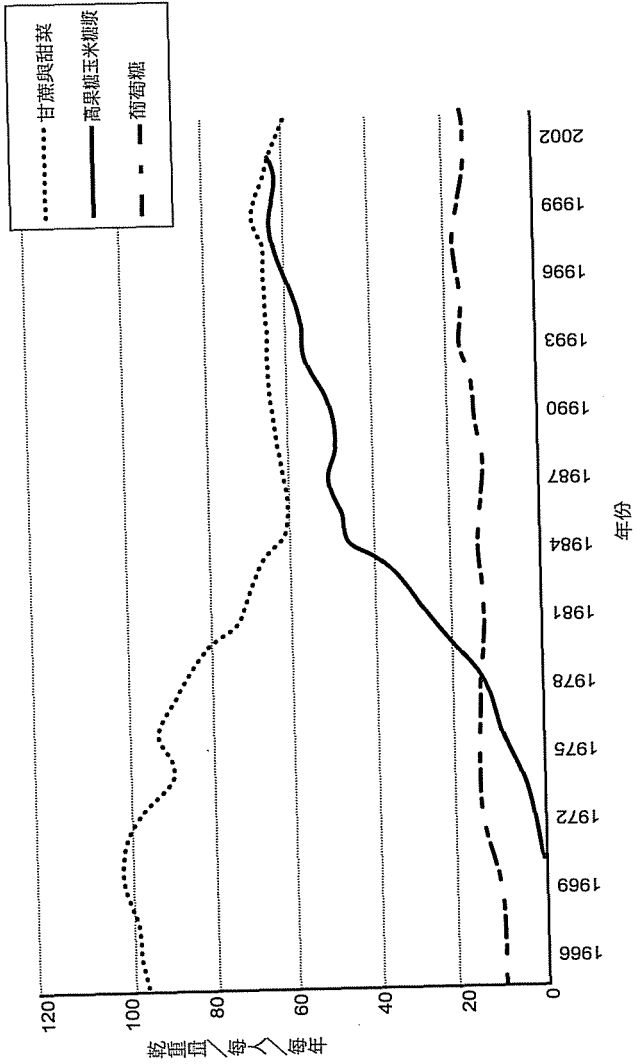


圖 5.2：美國每人每年消耗的甜味劑之乾重量磅數
(資料來源：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局)

際貿易手段：「要知道，一九七三年時，我們（美國）讓蘇聯賒帳購買了價值七億五千萬美元的穀物，後來蘇聯連本帶利將錢還給我們。所以這對美蘇雙方來說都有好處。」一九八〇年代，安德亞斯對蘇聯打的主意終於萌芽了。一九八四年，安德亞斯成為美蘇貿易與經濟會議的主席，在擔任主席的十年間，他不斷地為美蘇貿易進行辯護，當然，國家利益再度成為他最好的藉口。在蘇聯擊落韓國航空公司客機事件的一個月之後，安德亞斯在莫斯科主持美國農企業展覽會。他如此反駁大家對它的批評：「如果……俄國人想要買玉米、黃豆與小麥，我們要把這筆生意全都推給德國嗎？或是我們也想要分一杯羹？他們跟西歐做了四百四十億美元的生意，卻只跟我們買了二十億美元的東西。」

安德亞斯始終信奉著國家利益，但他絕對不是唯一的一個。歷史上有很多人把農業的豐收與國家富足連結在一起。畢竟，如果不把國家社會主義者所說的「血與土」詮釋成在祖國的土地上開創出民族的花朵，我們難道還有其他更好的詮釋方法嗎？在爭取「國家利益」的訴求上，鄉村地區扮演了一個相當特別的角色。當城市熱切地為國家開拓出一條未來之路，鄉村地區彷彿只是田園景致的沉靜守護者，只是昔日風光明媚、如今卻靜謐的古蹟公園。當然，事實會告訴我們一切。

農村地區曾經是一些最重要的技術、經濟與社會變革的發源地，而且這樣的改變仍然持續發生。然而，農村地區的歷史卻遭到改寫，換言之，即使發生了這些變革，它們也不會受到農村的重視。舉例來說，一九三〇年代是瓜地馬拉被迫發生劇烈現代化轉變的時期，但「香蕉共和國」這個名詞開始流行的時間也正是這個時候。直至今日，這種重寫歷史的現象仍然在不斷上演。的確，照理來說，它確實會發生。其原因就在於，如果說「注定要邁向進步與啟蒙」是國家的特色之一，那麼每個世代都應該要回顧並重新詮釋國家的歷史，唯有如此，國家當下的處境才不會陷入矛盾。在這樣的思維之下，我們或許希望歷史能被改寫，好讓當今的企業與國家利益可以不衝突，而且最好是從來不曾有過衝突。在下一章，我們將可以從美國小布希總統於二〇〇六年訪問印度的過程中看到這種重寫歷史的現象。

1 譯注：形容其凶殘霸道的行為。

2 譯注：在小說中，蛋的真正購入成本其實是每顆一分錢，因此當他以一顆蛋四點二五分錢的價格賣到馬爾它，能賺到三點二五分錢的利潤。

3 編按：小說《第22條軍規》中頗具生意頭腦的伙食軍官。

6 | 化學的生活比較好？

那個人說：「你來啦！」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把看起來很奇怪的小豆子，繼續說道：「來！這就是神奇的豆子！」他說：「看你這麼聰明，我不介意跟你做個交易，你可以用牛跟我換這些豆子。」

「好啊！」傑克說：「你不喜歡這些豆子嗎？」

「哈！你不知道這些豆子是什麼！」那個人說：「如果你在前一天晚上種下豆子，隔天早上，它就會一直長到天上去。」

——《傑克與魔豆》

在不久的將來，「固氮作用」將會是我們面對的一個問題。除非我們正視它，否則偉大的高加索民族將不再居於領先地位，那些不以麵包為主食的民族將會擠壓我們的生存空間。

——威廉·克魯克斯 (William Crookes)，一八九八年

本章將討論食品體系的核心問題：飢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二十年間，美國生產過剩的糧食直接解決了飢餓的問題。當這樣的體系開始衰退時，新的體系已準備取而代之；這個新體系打破了貿易與糧食援助之間的關聯，私人企業躍升為主要角色，最重要的是，農業研究的突破使得南方種植的小麥、玉米與稻米等主食類穀物的產量大幅增加。這項研究以混種的方式培育出生產力比傳統種子高的新品種。但是，這些新品種的生長條件十分嚴苛，灌溉、施肥、用農藥防止蟲害等等，都要靠化石燃料才能滿足。除此之外，必須犧牲本地的生物多樣性，這樣新品種才能長得好。這個農業經營上的大轉變就是所謂的「綠色革命」。在某些地區，藉由綠色革命的科技，人民的飢餓情況沒有繼續惡化。但是綠色革命帶來的社會與生態成本也很高。最近，像印度這些地區，飢餓的夢魘又回來了。於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第一次綠色革命中扮演關鍵角色的企業提出了「新綠色革命」的口號，開始鼓吹一種以基因改造技術來提高產量的第二代穀物。

知識與創新

二〇〇五年，印度總理辛格 (Manmohan Singh) 拜訪美國，他從歷史的角度表達出他對未來的看法：「我們感謝美國創造出綠色革命。現在，在美國的協助之下，我們可以預見第二次綠色革命的到來。」後來，布希總統在二〇〇六年拜訪印度時，也做出了相同的回應：

美國與印度……在農業上合作無間。美國與印度在一九六〇年代攜手合作，幫助印度滿足她的糧食需求，當美國科學家博洛格 (Norman Borlaug) 等人首創新的農業技術時，他們就把這些新技術分享給印度的農民。感謝你們的辛勞，由於你們的努力，在過去半個世紀，糧食產量幾乎提高了三倍。為了增進農業方面的進步，辛格總理和我現在宣布新的農業知識創新計畫。我們將投入一億美元的資金，鼓勵美印兩國的科學家能互相交流並共同研究，以改善農業技術。在美印兩國的合作之下，我們將發展出更好的穀物生長技術，並且讓這些穀物在市場上流通，邁向第二次綠色革命。(鼓掌)……為了增進美印兩國科學家的關係，我們將注資三千萬美金，成立一個新的科學與技術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將為生物科技這一類有發展潛力的領域提供共同研究的經費。(鼓掌)……偉大的印度詩人泰戈爾曾經寫道：「世界上只有一個歷史，那就是人類的歷史。」美國與印度將抱持著同樣的信念攜手向前。人類的歷史只有一個，它將帶領我們走向自由。

印政背景

我們可以從這段話中發現一個對綠色革命的錯誤印象，而它背後的原因值得我們探討。印度的農業發展軌跡的確和美國的政策息息相關，但其真正的歷史背景卻和印度總理的記憶有很大的差距，其中的種種限制與不自由的程度更是遠超過布希總統願意承認的範圍。

在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美國急切地希望印度不要走向共產。當時的印度非常需要食物援助，於是印度的領袖們開始計畫對農業生產模式進行徹底的變革，他們所想到的方式就是：改革資本主義的核心體制——私有財產制度。印度總理尼赫魯(Nehru)認為，既然中國可以藉由革命後的土地改革來提升農產量，或許印度的地主與農民之間也可以透過「合作式」的土地管理制度來增加食物產量。但是對印度的地主與國會代表來說，這樣的提議完全沒有吸引力。這種土地所有權的改變將會讓政府(儘管它代表著大多數的人民)與地主、貴族之間形成對立。雖然這項提議不受歡迎，但印度的土地制度終究還是需要改革。鄉村地區的貧困人民正因為傳統的土地制度而過著痛苦的生活，從國外進口的便宜小麥也直接衝擊到印度農民的生計。窮困的印度農民無法跟那些有美國政府支持的大型農場競爭(尤其是當時印度的國家利益著重在都市的產業與科技發展上，因此國內的資金幾乎都從鄉村轉移到都市)。他們正確地解讀這些市場現狀，都不願提高產量，導致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到中期印度的小麥產量沒有太大的變化。而外國的糧食援助更讓印度國內的糧食產量愈來愈少。在這種情況下，糧食不足的問題開始浮現；農民不願提高產量，印度就對糧食援助的依賴日漸加深，在一九六〇年代，印度的

糧食進口數量每年都增加百分之十。

等到糧食援助在一九七〇年代結束時，印度積欠美國的債務已占其貨幣供給量的三分之一以上。這樣的債權關係轉移並舒緩了美國政府對於國家安全的焦慮，同時也讓美國的農企業有機會將觸角深入這個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國家。那時世界各國都籠罩在共產主義的威脅之下，各國政府無不擔心人民在看到懸殊的貧富差距後會群起反抗、爭取自己的權益。這種擔憂表現為對於國家「安全」的憂慮。舉例來說，美國總統詹森於一九六五年一月的國會演說中就提到：「我不認為我們富足的島嶼能安然處於絕望與不安的汪洋之中，當受壓迫的人民可能成為破壞現代的力量時，我們絕對無法泰然處之。」

一九六四年五月，印度總理尼赫魯因心臟病而辭世，夏斯特理(Lal Bahadur Shastri)繼任為新的總理，此時的印度正在飢餓的邊緣。在一九六四至六五年間，印度國內因糧食不足而發生多次暴動。但是在美國媒體眼中，印度人民的抗議並不是起因於對糧食援助的日漸依賴，而是正如《時代》雜誌在一九六四年所報導的，這是印度「頑固地拒絕改變」之象徵。然而，這樣的行為不只是頑固而已，它更有引爆危險局勢的潛力。在美國，不論是輿論界或詹森政府，都認為飢餓的人民就等於政治動盪與共產主義的散播。一九六一到六九年間，在甘迺迪政府與詹森政府擔任美國農業部長的傅黎曼(Orville Freeman)就曾經在某一次記者會上表示：「絕望將導致戰爭，當貧富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人民就愈有可能群起反抗……接著引發暴

動、推翻政府，最後造成國際侵略行為。」當印度總理夏斯特理公開反對美國在越南的轟炸行為時，詹森政府卻認為這是印度政府頑固且傾向共產主義的徵兆。於是，詹森想要給印度一點教訓，讓印度遠離親共思想。一九六五年七月，他故意拖延美國四八〇號法案對印度的糧食契約的更新，並且把原訂以年為基礎的糧食援助計畫改成以月為基礎。這種故意延後糧食援助的做法，等於是拿了一把刀架在印度政府的脖子上。

但是除了刀子之外，美國政府也同時拋出一個誘因。只要夏斯特理不繼續進行前總理尼赫魯的土地重分配制，並且對美國的亞洲政策表現得更順從，美國政府就會幫助印度脫離困境。也就是說，只要印度乖一點，美國不僅會重新恢復長期的糧食援助，也會提供新的農業技術。美國有許多基金會都在研發新的農業技術，主要的研發單位便是福特基金會與洛克斐勒基金會，他們在提高墨西哥的農業產量上曾經多有貢獻。一九六五年，《紐約時報》為這個引誘措施做了一個總結：

刺激發展中國家，將她們帶往正確的方向……例如，我們就告訴印度，美國國際開發總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每年提供給印度的經濟發展經費與「糧食換和平計畫」所允諾的糧食援助，都跟她每年用來進口肥料或者建立肥料工廠的經費有關。

「綠色革命」正是符合這些限制的解決方案，它提供種子、肥料與制度，既能讓窮人獲得糧食，也可以讓富人保有他們原有的土地。一九六六年，蒙代爾（Walter Mondale）評論說：「透過這個新的『糧食換和平』概念，我們可以掌握那些接受援助的國家。一旦他們稍有反抗，這些援助就會連夜腰斬。」

由於傅黎曼在背後推動美國肥料產業的利益，以及美國以糧食援助計畫當作控制的手段，再加上印度國會對社會改革的阻撓，綠色革命就這樣在印度展開。從這些情況看來，印度總理辛格並沒有說錯，「我們感謝美國創造出綠色革命」這句話的確其來有自。但如果說綠色革命是印度政府自願接受的，那就有些站不住腳了；至於「綠色革命是印度人民自願接受的」這種話，那就更不用提了。恰恰相反，印度有許多農民發起抗爭運動，反對政府在美國的擺布下進行農業改革。綠色革命只是被政府視為在正確時機出現的正確方法。增加糧食產量的做法成功遏止了人民對重新分配的渴望。技術解決方案消弭了政治上的問題。這就是布希總統所謂的「自由的歷史」。

我們無法簡單地評論綠色革命的功過。對印度北部那些受惠於綠色革命技術以及接受灌溉與其他適當協助的農民來說，二十多年來，他們的農作產量提高了五倍之多。這個成果似乎變成散播這些技術的最佳證明。毫無疑問，綠色革命技術提高了農作物產量，即使公開反對者都不得不感激它帶來的貢獻。帕柏亞（Jagdish Pabra）是旁遮普南方的一個農民，他曾經到世界

各地做抗議綠色革命的活動。帕柏亞回想起那一刻聽見綠色革命口號響遍田野的神奇景象：

我們聽到旁遮普大學傳來的廣播。有人把收音機開得很大聲，因此整個村子裡的人都聽得到，就連在遠處農田裡工作的人也聽到了。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太相信，但是當時的廣播真的可以在安靜的田野中傳得很遠。我們聽著廣播。我們可以聽到旁遮普農業大學傳來的話，它告訴我們新的種子、肥料與機械設備。聽到這些消息之後，人民漸漸去嘗試。以前農業大學的人常常會到村子裡面來提供肥料給我們。他們會跟農民一起，找一塊農地施肥、耕種。當時有許多農民反對，但是這些人後來都被說服了。現在我回想才發現，他們其實也帶來了許多毒害環境的物質。但是總結說來，他們的確增加了收益，也提高了產量。

雖然產量提高了，但帕柏亞還是告誡農民要反對這項技術，因為正如他所說的：「這些神奇種子的代價太高了。」這些種子的奇妙之處是，它們只要在適當的條件下就能出現盛大的豐收。只要提供正確的生長環境，幾乎一定能獲得豐收。問題是，它的生長條件很難達成。這些種子需要灌溉，因此農民無不爭相開發水源，結果造成某些地區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超過一英尺。灌溉也讓土壤中的鹽分沉積過多，導致後來有許多農地無法耕種。綠色革命的單一栽培方法也使得生態體系遭到破壞。原有的植物種類是經過幾千年不斷演化，才形成最適合旁遮普

環境的物種，不能提供人們小麥所缺乏的營養，也保護了各種非綠色革命的原生穀物。

再者，^③只有那些有辦法取得資金的農民才負擔得起昂貴的肥料成本。其他無法獲得資金或技術來購買灌溉設施與肥料的農民，都被遺棄在綠色革命的道路兩旁：印度旁遮普的小農地數量減少了四分之一。（這個情況再度證明綠色革命無法真的為農民帶來好處，它只是為都市裡的消費者提供更便宜的農作物罷了。）今日，根據印度政府的資料顯示，旁遮普的農民每年平均負債額為四萬盧比（約九百美元），遠高於國民平均負債額的一萬三千盧比（約三百美元）。由於耕種成本提高，所以農民拖欠還款的風險也比以前高出許多。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在二十年間，就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農民因為要貸款與不斷增加耕種成本以維持產量而陷於貧困。

還有一個重點是，印度在綠色革命中投入的龐大經費，^{限制}大部分集中於最豐饒的地方，也就是旁遮普。旁遮普的穀物產量從一九六五至六六年產季的三百萬公噸提升到一九九一至二〇〇〇年產季的二千五百萬公噸。藉由綠色革命的技術，這個有二千四百萬人、大約只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二的省分所生產的糧食數量就占了印度總糧食產量的百分之十二以上。而大多數的印度農民都被政府的綠色革命政策所遺忘，因為他們沒有大片耕地，居住的省分比較貧瘠。全印度四分之三的農民耕種著三分之一的農地，這些人是印度食物體系的支柱，卻不受政府重視。

於是人們氣吃
氣吃成浪費

這樣看來，我們也只能說，綠色革命是聊勝於無。但如果想要深入了解綠色革命，最好的方法不是跟以前的情況做比較，也不是看它缺少了什麼，而是應該將它與其他可能發生的情況做比較，也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機會成本」。換句話說，就是設想看看如果沒有發生綠色革命，那麼其他可能發生的最好結果會是什麼。若要做這項比較，最佳的研究案例或許是印度的喀拉拉省。相較於旁遮普實施農業技術改良，喀拉拉則是從政策面進行改革，整個改革行動始於一九五七年的「土地改革條例與教育法案」。從這項法案的名稱我們可以知道，土地改革跟社會問題有很密切的關係。當時的土地重新分配是屬於一整套公共政策，其他的相關政策還包括了民眾的糧食配給方案、就業保證、教育以及健保體系等等，這些政策都是在省級的共產政府底下推行。這項改革方案十分成功，雖然喀拉拉三千萬人口的貧困程度比其他地區的人還要高，但現在它不僅是全印度識字率最高的省分，民眾健康狀態與社會發展情況也是全國最佳。當然，喀拉拉不是完美的地區，它有左派與右派的衝突，也有企業家與漁民之間的衝突。不過，省政府沒有錯失這些衝突所帶來的機會，一九九六年共產黨在喀拉拉地方選舉獲勝，隨即推動「人民分權計畫運動」(People's Campaign for Decentralized Planning)，該省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預算分散至各地方委員會手中，共有二百五十萬人直接受益。喀拉拉省透過重新分配制度，推行更廣泛的政治方案，儘管該省人民比較貧窮，但是他們的識字率和平均壽命卻比美國某些地區還要高。喀拉拉的成功不是來自個人的微小的奮鬥過程，也不是將農民塑造

成市場上孤軍奮戰的企業家，而是藉由社會改革政策來對社會問題進行全面且集體的改變。

喀拉拉方案的影響力似乎比綠色革命還要持久。在綠色革命二十年之後，當喀拉拉省的人民健康與幸福指數仍維持在高標時，印度其他地區卻再度陷入惡夢之中。整個一九九〇年代，印度各地營養不良的情況日益增加，窮人平均攝取的熱量值也呈現下降的趨勢。今日印度共有二億三千三百萬的人口面臨營養不良的問題，他們無法攝取足夠的熱量，也缺乏微量營養素。在三歲以下的幼童當中，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營養不良（相較之下，中國只有百分之八的三歲以下幼童是營養不良）。由於很多農耕用地都轉種出口作物，因此有些主要糧食的產量呈現下降。如表6.1所示，現在印度每人能獲得的糧食數量，是自一九三〇年代英國殖民時期的經濟衰退以來，前所未見的低點。

為什麼會下降？簡單地看，每個人周遭的糧食確實比以前少。但奇怪的是，每人糧食取得數量的下降幅度卻遠大於

表6.1 印度各時期之糧食產量與取得量
(資料來源：Patnaik 2001, 2004)

時期	每人總糧食產量 (公斤/年)	平均人口(百萬)	每人總糧食取得量 (公斤/年)
1921~1926	186.5	239.18	185.6
1927~1932	171.1	253.26	174.5
1933~1938	154.2	270.98	159.3
1989-90~1991-92	175.6	850.70	173.5
1992-3~1994-5	177.3	901.02	170.1
1995-6~1997-8	171.5	953.07	169.3
1998-9~2000-1	171.9	1,008.14	159.9

每人糧食產量的下降程度。這謎團若要解開，就要看看同樣發生於一九九〇年代的事：印度政府廢除了國家糧食的生命線「公眾配給系統」(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印度公眾配給系統就像北方國家對食物體系的干預，一開始並不是以鄉村窮人為主，而是要為都市地區提供便宜的食物。一九四二年，此系統只在七個城市施行，但由於一九四三年發生孟加拉大饑荒，因此到了一九四六年，全印度共有七百一十個城鎮實施這個系統。在整個一九五〇年代，印度政府以此分配網絡不定期實施都市糧食定量配給。一九六〇年代，政府重新調整系統，並利用它來分配美國所提供的糧食。雖然公眾配給系統的制度不是很公平，但是在高峰時期，它透過四萬家平價商店所組成的網絡，把一千八百八十萬公噸的穀物分配給八千萬以上的人口。甚至在一九八七年的旱災期間（印度在二十世紀遭遇的最惡劣情況之一），政府靠著公眾糧食的儲存與重新分配措施有效控制了饑荒的蔓延。

印度最貧困人口的福利衰退時期，正好相當於總理辛格親自擬定的一項改革方案的實施期間，那方案是他在一九九一年擔任財務部長時草擬並送交國會通過的。在他的新政策中，他以「公眾配給系統」效率不彰為由，逐步廢除了這個體制。一九九二年，「改造後的公眾配給系統」(Revamped 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 開始實施，一九九七年，又實施「指定公眾配給系統」(Targeted 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而印度政府分配的糧食數量從一九九七年的一千七百二十萬公噸下降到二〇〇一年的一千三百二十萬公噸。如果不考慮別的因素，我們或

許會認為印度政府分配的糧食數量減少跟人民飢餓程度的增加沒有什麼關聯。印度政府在鄉村發展上的支出也在減少，從一九八〇年代晚期占國內生產毛額百分之十四，一直下降到二〇〇〇年不及百分之六。

這些數據的確讓我們對印度鄉村的貧窮情況感到震驚。我們曾經相信一個有效率的市場與新的技術將解決鄉村與都市貧窮人口的飢餓狀況。然而⁹⁴³如果繼續抱持這種想法，那就表示我們忽略了經濟史上最悲慘的教訓之一。一九四三年的孟加拉大饑荒造成超過三百萬人死亡，隨後公眾配給系統便擴大實施範圍。矛盾的是，人民死於飢餓時，孟加拉其實有足夠的糧食可以提供。經濟學家沈恩 (Amartya Sen) 研究發現，現代的饑荒其實不是因為缺乏糧食，而是因為人們買不起食物。沈恩觀察到，孟加拉在一九四三年的饑荒中其實不缺食物，反而是很豐富。饑荒之所以產生都是因為人們深諳「物以稀為貴」的道理，所以大量屯積糧食。而死於街頭的人則是因為付不出錢來購買食物。這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因為它打破了「市場上買得到食物」與「窮人吃得到東西」之間的連結。雖然市場上有豐富的糧食，但這不表示窮人一定可以吃飽。事實上，如果窮人只能從市場上取得食物（就像英國人統治孟加拉時的想法一樣），那麼當食物顯然不足時，我們幾乎可以確定這個有如沙漏一般的食物體系所傳遞的不會是糧食，而是飢餓。那些掌控糧食分配的人只有在價格夠高時才會把食物送到市場上。所以，戰勝飢餓的唯一辦法就是保障窮人的權益，讓他們能夠擺脫商人的詭計，突破這個沙漏一

般的食物體系。沈恩認為，唯有透過有效率的民主才可能達到這個目標。

然而，總理辛格卻沒有體會出這個道理，他寧願將注意力轉到日益增加的營養不良問題上。他的解決方案不是效法喀拉拉，也不是增加鄉村地區的發展經費，而是提出一項短期的紓困方案。不過正如印度記者與評論家夏爾曼（Devinder Sharma）所說，這項方案給銀行的好處多過農民。此外，辛格的長期策略就是進行第二次綠色革命。但正如第一次綠色革命一樣，這種藉由技術來增加食物的方法只能暫時舒緩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卻同時排擠掉許多可行的糧食策略。然而從目前的局勢來看，那些完全被排除在外的策略只能期待歷史能夠重寫了。

當美國總統大談黑格爾哲學並說「只有一個歷史，那就是自由的歷史」，我們應該對此感到憂心。畢竟，這樣的說法掩蓋了第一次綠色革命背後的政治權力更迭，更扼殺了許多不論在當時或今日都可被採用的其他選擇方案。不過，印度人民或許比較願意接受第二次綠色革命，因為現今的美印關係比過去友好許多。尼赫魯在擔任總理期間曾參與「不結盟運動」，試圖避免捲入冷戰的兩大陣營，開創出第三條道路。但隨著冷戰結束，這項行動跟著式微了。再者，美國藉著糧食援助來控制印度的日子也遠去了。一九七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森曾將印度總理甘地夫人稱為「老巫婆」。他還說，印度人通常都「很狡猾、靠不住……巴基斯坦人比較直率，但有時候實在笨得可以……相形之下，印度人就顯得很不坦率」。就連國務卿季辛吉也附和：「印度人根本就是一群討厭鬼。」但如今，印度政府購買的美國波音飛機數量已經超越

糧食戰爭

了它購買的蘇俄米格戰機。跟墨西哥一樣，印度和美國的精英對於國家管理與維持經濟秩序有同樣一套想法。這種利益上的結合讓印度敞開經濟大門，歡歡喜喜地迎接第二次綠色革命的到來。這一次，來的不再是肥料與改良過的種子，而是生物科技。

專利之戰

在人類歷史上與各種童話故事中，充滿了許多如何從土地收穫更多的想法。「傑克與魔豆」故事的文字版本最早出現於十八世紀，不過故事本身可追溯至更久以前。自人類懂得耕作以來，農人成功收割的景象就不斷呈現在這些豐富的幻想故事中。農人（尤其是女性農作者）是最早的自然科學家，他們維護了生物的多樣性；做實驗、保存種子，並且交換試驗、培育出新的品種，目的是為了在土地上種出更多植物並讓植物能夠抵禦病蟲害，讓農作物更容易採收，生產出更多可供食用、燃燒、紡織與建築的材料。一直到二十世紀後期，上述這些景象幾乎在世界各地不斷被實現著，而且沒有任何人擁有培育農作物的知識專利。然而，WTO的主要宗旨就在於確保「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這些知識產權讓個人或組織能夠保有他們自己的獨特想法，不論這些想法是軟體、音樂、商標、專利、製造程序或娛樂表演，而其他人如果果要使用這些想法就必須付費。

在印度，對農業知識產權的共同需求已經造成了兩方的對立：一方是印度最貧窮的農業，另一方是最富有的資訊科技業。印福斯科技 (Infosys) 是第一家在美國那斯達克上市的印度公司，旗下的一間子公司專門處理「企業流程委外」的工作。印福斯的執行長阿克夏亞·巴爾加瓦 (Akshaya Bhargava) 對知識有著極大的熱誠，他曾這麼說：「未來就在於那些知識密集的生產業程序之中。」在人才眾多的印度資訊科技產業中，很少有人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也因此，他們對未來的知識需求都有樂觀的預期，並且認為他們可以針對這些生產業程序及其背後的知識加以收費。為了確保未來持續從中獲利，他們希望高科技知識能夠受到法律的保護。不過，就像WTO中有一套用來保護電腦軟體智慧財產權的遊戲規則一樣，這套規則同樣也適用於農業知識。也就是說，幾乎所有的農業知識都有機會被申請為智慧財產權。以下就舉出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美國的農業化學公司格雷斯 (W. R. Grace) 與農業部經歷了一場農業智慧財產權爭奪戰。一九九〇年，這兩個民間與政府的合作夥伴試圖針對印度棟樹申請專利，因為他們發現印度棟樹可以提煉出有效的殺蟲劑。不過他們面臨的問題就是，印度人早在好幾個世紀以前就知道這件事了。這知識在印度農業社會中至少流傳了兩千年以上，有一位印度國會議員便譏笑說：「針對印度棟樹申請專利就如同針對牛糞申請專利。」然而，這項申請專利的訴求總共歷經了十五年才遭到否決。儘管最後並沒有申請成功，國內外的許多公司卻已經開始利用WTO所提供的智慧財產權保護規定來進行所謂的「生物剽竊」(biopiracy)。

「印美知識倡議」(Indo-American Knowledge Initiative)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在這計畫正式發表幾個月之後，人們對它的任何細節仍然一無所知。相關人士皆以國家利益為理由，拒絕透露任何資訊。雖然我們不知道它到底在做些什麼，但大概能看出它的目標為何。美國農業部的生物科技資深顧問史波奈克女士 (Madelyn E. Spinak) 就明白地表示：「美國的目標在於確保印度的生物科技市場維持開放。」印度的遺傳學家沙哈依 (Suman Sahai) 說道：「不久以前，像孟山都這種民營公司還只是單純的企業體。但現在他們只要向印度農業研究委員會的總監提出要求，就能從兩百種以上的研究成果中取得我們龐大的基因財產。而且民營公司可以申請基因方面的專利，再以高價賣出。」對於那些在「知識倡議」背後虎視眈眈的企業來說，基因資料的取得將是未來的勝利之鑰。能夠取用印度的生物多樣性資訊，尤其是它的基因藍圖，就等於發現了一個深不可測的知識寶藏，而這寶藏正等待企業去挖掘、分析、占為己有並且轉售。正如一位印度官員所說的：「這個倡議行動將讓印度政府付出超過兩億美元，但是美國卻不必付半毛錢。」就這樣，那些深切需要美國賦予智慧財產權的印度資訊科技產業與研究人員（大部分是利用電腦工作的男性）成功地將印度的農業知識（主要是由幾個世紀以來的女性辛苦耕耘出來的）賣了出去。

隱身在「知識倡議」背後的企業以及那些研發基因改造種子的公司，都跟第一次綠色革命有著直接的關聯。他們都是化學公司。他們研發新種子的目的不是為了改善鄉村窮人的生

活，而是為了擴展他們的農藥產品線。正因如此，那些製造農藥的公司現在都是種子企業的大股東。

今日，印度有一種主要農作物是蘇力菌抗蟲棉花 (Bt Cotton)，這種棉花被植入一種由土壤細菌 (蘇力菌) 所產生的抗蟲成分。在植物體內注入殺蟲劑，是種子產業所研發的技術之一。孟山都公司研發的另一批重要的基因改造作物就是名為「抗農達」(RoundUp-ready) 的耐除草劑基因改造作物。他們不是為了增加農作物的風味、營養成分，或是為了讓植物長得更高或更耐乾旱才進行改造，而是為了讓這些農作物能承受孟山都的「農達」全面性除草劑。最初的想法是要讓農民不必為了田裡的雜草而煩心，只要在田裡噴上這種除草劑，就可以輕鬆除掉雜草，不用擔心農作物會受到影響。這就像把軍事上「射擊後不理」的方式套用在農業上。當然，看到他們把一些農藥取名為標槍 (Javelin)、妙極 (Bravo)、艦長 (Captain)、彈藥 (Ammo) 和戰士 (Warrior) 之後，我們可以知道這些企業早就把除蟲的工作視為一種戰爭。現在，農藥也跟軍事武器一樣，只需要簡單地「瞄準、射擊」就可以除掉敵人。

當農民購買這些種子時 (它們的價格遠比傳統種子還要昂貴)，還會拿到一張寫得密密麻麻的法律契約。契約是用農民慣用的語言寫成的，但是內容卻複雜到讓人看不懂。這就是那些企業用來賺錢的手段。就像我們買電腦軟體時碰上的情況一樣，一張小小的光碟片裡隱藏著要價高昂的內容。一張空白光碟的成本不過幾毛錢，我們之所以願意付出高價，都是為了獲得

光碟裡面的知識。

跟軟體產業一樣，農藥產業也花了很多心力防止它的財產被剽竊。正如軟體有「防止拷貝複製」的設計，農藥產業也研發出「終結者技術」；這是一種基因改造技術，經過改造之後的種子所長出的後代種子將無法發育。就像軟體產業一樣，農藥產業也早就準備好要對付那些不遵守合約的人。微軟公司發展出反盜版工具，一旦發現作業系統遭到複製，它就會立刻回報給微軟總部。農藥業者也一樣，只是他們在研發的時候就已經加入了防止複製的方法，比微軟的做法更有前瞻性。一個知情人士告訴我，孟山都公司在研發會議中討論要在植物體內加入一種特徵，讓它的葉子能夠以特殊的方式反射光線，只要透過低軌道的人造衛星，就能看到這些光線。這種特性對農民毫無幫助。它只是單純地讓農藥公司能夠輕鬆地從空中觀測他們自己的財產權，並且找出沒有付錢的農民。

不過，這種軟體公司的反盜版比喻終究還是不夠貼切。農藥跟軟體不同之處在於，軟體可說是企業自己「無中生有」，但種子裡面的基因資訊並不是農藥公司創造出來的，這些基因是幾千年來人們不斷使用的成果。企業只不過在裡面增加了一些小小的價值，但這就足以讓他們把整顆種子申請為自己的專利。

毫無疑問的，最直接受惠於印度第二次綠色革命的就是農藥公司，正如他們從第一次綠色革命獲得許多好處一樣。他們早已布下了許多策略，以確保他們能夠從中獲利，同時以這張

歷史的新頁來衡量他們在「對抗飢餓之戰爭」中所獲得的勝利，並且把他們的暴力壟斷行為加以正當化。現在，他們只想得到大眾的支持。由於農藥公司毫不關心世界各地的窮困人民，再加上他們以備受爭議的科學技術培育農作物，以及不擇手段開拓市場的態度，因此這一路走來，他們飽受各種社會運動與公民社會組織的攻擊。相較之下，第一次綠色革命是在政府的主導之下幫助私人企業獲利，但是第二次綠色革命可說是由私人企業所帶動，政府只是從旁協助。在食物體系中，這場掌控權的顛覆代表著私人企業對大眾負有更多的責任。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會如此積極地推廣產品的原因。

企業回應窮人的需要

農藥公司為了回應諸多的批評，並且為了贏得大眾的認同，他們採用了三頭並進的策略。第一，研發看似能夠改善窮人生活的農作物。第二，增加科學研究，並藉由科學數據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第三，這些企業試圖運用與塑造「文化戰爭」來替自己的行為正當化。我們應該逐一檢視這些作為，因為它們不但指出了一些更廣泛、更令人憂心的社會趨勢，同時也凸顯了它們和其他「無須採用農藥就可改善糧食問題的手法」之間的強烈對比。

讓我們先來看看，為什麼農藥公司要研發能夠幫助窮人的農作物。如果企業的獲利跟窮人的需求一點關係也沒有，為什麼企業學家會主張「金字塔的底部蘊藏有很多財富」呢？這些看法並沒有前後矛盾。不難想像，企業確實可以投入大筆資金為窮人提供商品與服務，並且十分重視這個市場，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真的關心窮人的需求。在世界的食物體系中，有一大堆公司都把自己包裝成關心窮人的模樣。其中，最有可能幫助窮人的「看板」農作物，就是「黃金米」(Golden Rice)。

在世界各地，每年大約有二十五萬到五十萬名兒童因缺乏維他命A而失明，如果他們的營養沒有改善，其中將有半數的失明兒童會在十二個月之內死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科學家把維他命A加入稻米之中，「黃金米」因此誕生。「黃金米」之所以呈現金色，是因為它所含的維他命A是來自貝塔胡蘿蔔素，這也是胡蘿蔔呈現橙紅色的原因。「黃金米」的市場主要鎖定為亞洲，因為亞洲人每日的熱量來源大部分都是從米食而來，此外，亞洲人口缺乏維他命A的比例也比其他地方高。遺憾的是，在亞洲，如果米不是白色的，就會被認為是次級品。因此，若想要讓人們願意吃這種有顏色的米，就必須有配套的教育措施，帶領人們慢慢改變長久以來的習慣。但是，兒童必須吃下大量的「黃金米」才能達到效果。根據生物科技產業的估計，每個兒童每天必須吃兩碗「黃金米」才能獲得足夠的維他命A，然而根據獨立評估的結果，每個兒童每天要吃下將近五十碗的「黃金米」才能達到營養標準。正如《時代》雜誌在二〇〇〇年報導的，這是「拯救一百萬個小孩」的任務，但是它要拯救的對象大部分都住在糧

食過剩的國家。相較於那些深奧難解且不斷發生的政治與分配問題，「黃金米」這個新科技既有著神聖的包裝，又不必花費太多功夫，因此對那些急功近利的政治人物來說，這正是一個可以滿足他們的解決方式。然而，人們並不需要這麼多的維他命A。事實上，人們每天只要吃半根胡蘿蔔，就能攝取到足夠的維他命A。很多南方國家的兒童之所以會過著貧窮的生活甚至因此死亡，不是因為那裡沒有足夠的糧食，也不是因為他們的國家沒有這種含貝塔胡蘿蔔素的米。他們會營養不良乃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唯一買得起的食物就只有米。

像「黃金米」這一類的基因改造作物，其最大的優點在於它們能補充人們所缺乏的營養素。但是，人們無法獲得均衡飲食的主要原因在於貧窮，而不是因為農作物裡面缺乏必需的營養成分。當然，想藉由一個農作物來解決收入與食物分配不均的問題，確實太荒謬可笑。但是，既然貧窮才是人們缺乏維他命A的根本原因，那麼「黃金米」不只是毫無用處的宣傳花招，它們還帶來了其他的壞處。事實證明，「黃金米」的出現，讓人們不再積極地探討如何解決社會貧困的根本問題。這也是為什麼農藥公司要努力宣揚他們的農作物將幫助農民擺脫貧困的第二個理由。但是，即便是這樣的宣稱都令人存疑。

中國從一九九七年起開始引進蘇力菌抗蟲農作物，農民們發現，他們種植這種基因改造作物之後，農藥方面的支出就減少許多，因為這種抗蟲農作物自己能夠抵擋蟲害。但是到了二〇〇四年，農民們發現他們的農藥用量比以前多了三倍，幾乎跟種植傳統種子時一樣；這是因

為原本的害蟲數量減少，讓第二種害蟲找到了生存的空間，而且新的害蟲不會受到蘇力菌的影響。二〇〇五年時，印度的安得拉邦（人口為七千五百萬人）禁止農民種植孟山都公司的基因改造棉花，理由是這種棉花的優點已經不復存在。跟非基因改造的農作物比起來，這種棉花不但產量較低，而且容易感染病菌蟲害。這個實驗讓人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在安得拉與維達巴（Vidharba）地區發生的農民自殺事件中，有百分之九十都跟種植這種基因改造棉花有關。

「新綠色革命」已經引起了反彈。孟山都公司向一位住在印度哈里亞納邦的農民辛格（Parmjit Singh）租了一塊土地，告訴他要在这塊土地上試種傳統的農作物。當辛格發現該公司種的是基因改造作物，他的反應是：「這對農業、環境以及人類的生命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我很高興能看到它被燒掉。」正如一位時事評論家說的，愈來愈多農民反對基因改造作物。透過國際農民組織巴提亞科依桑聯盟（Via-Campesina-affiliated Bharitya Khasan Union）發起的農民運動，有愈來愈多人認為基因改造作物會造成反效果。但由於農民都不願種植基因改造作物，因此企業界無不進行更大的行銷活動來說服農民。在印度一本農業月刊上就曾出現過一則全版廣告：「種植蘇力菌抗蟲棉花的農民真實故事」，廣告中有一張照片，有個農民站在一部牽引機的前面，文章告訴讀者，這個農民種植了基因改造作物之後賺了大錢，所以他才買得起這些昂貴的設備。事實上，這名農夫是跟銀行貸款才買了牽引機，他之所以會站在牽引機的前面拍照，是因為有人告訴他，只要他照著做，他就有機會贏得一趟免費的孟買之旅。

企業說服農民，卻不償消費者（不負責任且沒賺）

我們面對的問題，遠比這位農民能不能贏得旅行還要來得嚴重許多。確切地說，這些問題跟技術本身沒有什麼關係。有關基因改造方面的農業科學其實是有其貢獻的（稍後我們將會討論到）。真正的問題在於權力與控制。當孟山都公司的行銷部門為它的基因改造棉花創造出一股風潮時，農民不但因此「失去技能」，而且根據一位長期研究農藥公司行銷手法的資深人類學者表示，這些企業的做法將會造成整個農業體系的崩解。

企業界宣稱基因改造作物將會帶領農民走出貧困，但這樣的宣言卻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因為這些農作物是專門設計給人們食用的，如果消費者還沒有準備好要吃它，農民也就賺不到錢，更不可能擺脫貧窮。消費者聯盟擔心的事情有很多。首先，他們十分擔心這些農作物的安全性。這確實很值得注意。有時候，研究根本就沒有完成。在二〇〇五年，孟山都公司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罰了一百五十萬美金的罰款；因為在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二年之間，孟山都公司以七十萬美金賄賂政府官員，企圖取消一項管理條例，這個條例將審議它在印尼生產的基因改造棉花。當年基因改造作物之所以能在美國上市，就是透過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美國前副總統奎爾（Dan Quayle，他曾經誤以為馬鈴薯的英文是potatoe）所提出的行政程序簡化法案。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那時表示，他們相信業者已經做了各種必要的檢測，讓基因改造作物能夠符合目前的安全規定，因此准許基因改造作物在美國上市。也就是說，政府完全沒有對這些產品做任何檢測。因為，有關農作物安全性檢測與評估的部分，正好是被奎爾「簡化」掉的程序。

在英國，由於激進人士的強烈反彈，以及當時狂牛症所引起的食物恐慌，因此英國政府不像美國政府那樣大賜恩惠給農業業者。英國擁有世界首創的「田野試驗評估計畫」（Farm Scale Evaluation field trials），在輿論的壓力之下，英國政府被民眾要求檢視這些試驗評估的結果。這些試驗在檢測基因改造作物時，會測試業者自認為最強的領域，也就是他們宣稱「基因改造作物對環境影響比較好」的這個部分。最近，最後的四個檢驗項目都已經完成。在基改玉米的部分，其中只有一個項目顯示基因改造玉米對野生生物有益處。但是，這是把基因改造玉米拿來與噴灑過「草脫淨」（Atrazine）的傳統玉米做比較所得到的結論；事實上，這種除草劑因為毒性太強，很快就被禁用了。真正重要的研究，像是基改農作物與有機農作物的比較，到現在都還沒有完成，至於基改農作物與農業生態耕作之間的比較就更不用說了。然而，英國人很幸運。在美國，消費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吃進去的是基因改造作物。有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美國消費者要求業者把基因改造食品標示在產品標籤上，但是業者卻想盡辦法不讓它發生。

另一方面，消費者團體也擔心農業社群是否能從基因改造作物中獲得好處。同樣的，這些農業社群也明確表達出他們的不滿。舉例來說，一九九八年，印度卡納塔克邦農民協會就宣布：「親愛的朋友們，自本週六起，孟山都公司在卡納塔克邦進行的田野試驗將全面廢止。」這場行動組織了許多農民，不僅種植基改作物的農田被他們燒成灰燼，就連孟山都公司

在班加羅爾的辦公室也遭到攻擊，裡面的檔案文件都被撕毀。從巴西到英國，種植基因改造作物的農田都被焚毀。業者常常把反抗他們的人形容為頑固守舊的「盧德份子」，說他們是一群反對進步的暴民。如果想要進一步理解業者們所採取的手段與策略，我們可以觀察其他人對基改業者的挑戰與質疑，我們會發現到，當基改業者面臨質疑或反對時，他們就會想盡辦法扭轉局勢，包括政府部門對農業生物科技的資助、學術單位對基改作物的相關研究等等，皆可看到私人企業利益介入的痕跡。

我要感謝學術界

是什麼讓所有的教義變得如此清楚明白？

大約每年二百英鎊。

那些以前就被證實為真的教義，

要再度證明它是假的？再加二百英鎊。

是什麼打破了所有的誓言？

是一個神聖的責任嗎？是食物與衣服。

——巴特勒（Samuel Butler），《休迪布拉斯》（Hudibras）

為了讓自己的行為變得正當，基改作物產業使出的第二種手段就是掌握知識。當廣告公司把農業產業包裝成一個良好的形象之後，能夠避免這種良好形象被玷污的更有效辦法就是直接攻向最有可能檢視這種新科技的地方，也就是學術界。對於那些不認同食物體系發展方向的人來說（尤其是科學社群），學術界的研究自由已經蕩然無存。對此，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土壤科學教授恰帕拉（Ignacio Chapela）應該最能體會。他和一位柏克萊的研究生奎斯特（David Quist）在二〇〇一年於《自然》（Nature）期刊中發表了一篇論文，文中描述他們在墨西哥瓦哈卡（Oaxaca）的玉米中發現了改造基因（墨西哥在一九九八年就禁止種植基因改造玉米），後來，《自然》期刊做了一件在其一百三十三年發行歷史中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事情。它撤回了這篇論文，理由是該篇文章沒有確實的來源依據。這個動作相當不尋常。一般說來，一篇科學論文在發表之前必須先通過其他科學家的審核，成功發表之後，科學社群可以把該篇論文繼續發揚光大，或是嚴厲地批評它。這就是大家所公認的科學研究方法。奎斯特與恰帕拉的論文通過了《自然》期刊的嚴格審核過程並公開發表。論文刊登之後，期刊的編輯接獲了許多回應，接著，該期刊便委任學者進行三項獨立的審核；經過重新審核之後，《自然》期刊決定撤消該篇論文。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的「新聞之夜」節目公開了這三項審核的內容。儘管所有的審核意見都對該篇論文提出批評，但是其中只有一篇報告沒有在墨西哥玉米中發現改

造基因。結果這篇論文還是遭到撤消。《自然》期刊表示：「現有證據不足以證實該論文的結論。」

然而，恰帕拉的惡夢並沒有就此結束。就在他發表論文之後不久，網路上有兩個名為「史麥塔那」(Andura Smetacek)與「莫菲」(Mary Murphy)的人對他進行嚴重的人身攻擊。這兩個人聲稱恰帕拉的論文沒有經過其他科學家的檢視(它確實有經過檢視)，並指稱恰帕拉其實是一個激進份子而不是一位科學家(這兩種身分其實是可以並存的，就像愛因斯坦一樣)。後來，有人尋線追查這兩個人所發出的電子郵件，發現信件是從孟山都公司與其電子媒體公關公司拜伍德(Biwood，隸屬於拜威集團(Bivings Group))的伺服器所發出的。這兩個人的抹黑行為讓其他贊成生物科技的研究人員群起附和，網路上頓時出現了各種對恰帕拉不利的傳言。他們要求恰帕拉應該立刻辭職。

當時，恰帕拉正準備要從助理教授升任為副教授，這在北美學術界可說是一件相當重要的大事；在評等的過程中，大專院校可根據學者的學術貢獻、教學品質與為人表現來決定他們是否能取得終身職。根據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史瑞特(George A. Strait Jr.)表示，如果考量到教授與大學的名聲，毫無疑問的，柏克萊的終身職審議過程是「全國競爭最激烈、最公平也最嚴格……沒有任何人、任何單位或是任何團體能夠影響這個過程」。

在恰帕拉所任職的系所中，大家一致推薦恰帕拉應獲得教授終身職。為此，校方組成了一個審議委員會來審核他的資格，審議的結果，委員會成員一致通過恰帕拉的終身職位。然而，學術委員會卻要求審議委員會再次檢核恰帕拉的資格，審議委員會的主席不願受此壓力，他在沒有告知其他成員的情況下就自行辭職了；後來，學術委員會便建議校長否決這項終身職的決議，恰帕拉也因此失去了他的教授終身職位。後來經過一連串的法律行動，直到新的校長上任之後，恰帕拉才終於取得他的同仁一致認同的終身職位。甚至到了現在，身為副教授的恰帕拉並沒有因此獲得比較高的薪水，他領的錢仍然跟之前的助理教授薪水一樣。

在這兩個事件中，不管是終身職的否決或是論文的撤消，我們都可以看到正當的程序遭到了脅迫與事件背後隱藏的陰謀，更發現一個看似公平的組織如何為了清除異己而做出反常的舉動。這些行為的背後一定有某種理由，以下就是一個例子。

恰帕拉說道：「我應該被踢出學校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我妨礙學校從諾華公司獲得一筆五千萬美元的捐款。」恰帕拉以前任職於山德士(Sandoz)，後來山德士與汽巴嘉基(Ciba-Geigy)合併為諾華公司。諾華是一家擁有九萬名員工的「生命科學」企業，它在二〇〇五年的營業額為三百二十億美元。諾華公司原本要捐款給柏克萊的植物與微生物學系，但是在恰帕拉事件發生後，它把捐款減為兩千五百萬美金。諾華公司所要求的交換條件，就是當柏克萊的學者要發表研究論文時，諾華公司有權率先閱讀，此外，在五名學者所組成的研究委員會中，諾華公司的人必須占有兩個席位；還有，諾華公司可以爭取系所中三分之一的研究成果

的專利（無論其研究經費是來自諾華公司或是來自政府）。由於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補助愈來愈少，因此這對一所經費短缺的大學來說不啻為一項不錯的交易。只要放棄一些學術自由，就可獲得二千五百萬美金。

由於大專院校所提供的資源是其他機構所無法提供的，因此恰帕拉事件引起了兩個很令人擔憂的問題。第一就是所謂的示範效應。諾華公司所得到的回報，其價值遠比它付出的金額還要高。這個影響不是來自於生技公司對系所直接金援，而是由於各個系所之間為了獲得經費而產生的互相競爭。恰帕拉再度表示：

或許你不是直接從公司拿到一筆錢。但是你「希望」你能拿到錢。如果你能想到一些企業願意資助的研究，為了拿到經費，你就會去做。即使最後他們沒有出錢，他們也不會有任何壞處。因為他們已經得到一大堆對他們有利的研究案。只要掛上一根小小的胡蘿蔔，就有一大堆人上鉤。想想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社區大學，那些人每天都為了經費在傷腦筋。為了生存，他們願意投入大筆預算，他們甚至會去借錢，用這些錢來投資自己，讓自己能獲得企業的青睞。

為了獲得諾華公司的贊助，每個人的研究案都會努力討好他們。大專院校也會盡量輔助

那些可能獲得企業贊助的研究案。恰帕拉繼續說道：

我記得我曾經在一次口試中擔任外部主考官。當時，參加口試的那位女士正解釋著她的研究結果，她說她的研究結果具有商業價值。那時候，她在座的系上同事們聽了她的發表之後，就說：「你不應該把這個結果放在你的論文當中，那是你為諾華公司所做的研究。」所以在論文中寫上一堆沒有商品價值的資料，接著諾華公司就會從中選出對他們有利的東西，最棒的是，他們完全不必花一毛錢。

聽到大專院校提供的第二項資源，或許會令人感到很意外，那就是責任保障。在約定成俗的情況下，大部分國家的大學都可以不像其他社會機構那樣受到某些法律的約束。舉例來說，他們不太需要接受民意代表的質詢，理由是學術自由不能因為政府單位的需求而受到局限。恰帕拉說：「但是現在，學術自由的意義變成『我們應該自由地決定要把自己賣給任何人』，而且沒有人能夠說：『你怎麼可以任意使用我們的公共資源呢？你能享有研究自由，是因為大眾希望你能基於公共利益，為大家營造出一個更好的社會。』最終的結果就是，大專院校擁有一個保護膜，它讓學術界的每個人都能夠免除法律的約束。」

甚至連立法單位也發現很難解除這一層變質的保護膜。二〇〇〇年五月，加州議會在沙

加緬度舉行了一連串的聽證會。在這些聽證會上，我們可以看到加州大學這樣一個公共機構努力地掩飾它與生技公司的交易內幕。擔任財政委員會主席的皮斯（Peace）參議員曾經被引述道：「你們創造了一個付款與轉帳的系統，但這個系統基本上是無法審查的。」為了釐清大學與私人企業的確切協議內容，大家進行了一連串交叉詢問，但這一切卻仍然毫無結論且令人沮喪，加州參議員海登（Tom Hayden）最後說道：「不要認為今天的會議能夠改變任何事情。今天，我們所做的只是讓後世知道，至少我們曾經試著要做些什麼。」

恰帕拉口中的「促進」工作，其實就是一種為了推動某一個特定對象所做的跨領域研究，而這裡的特定對象，指的就是食物體系中的生技公司。這種「促進」工作的各種相關成本有著極大的差異。原本用來做預防性科學研究的資金都被拿來用在巴結特定產業的科學研究上了。「現在人們常常問：『我要如何把這個變成那個？』『我要如何把花變成紅色的？』而不是『如果我真的這樣做，會發生什麼事呢？』」現在的研究人員往往是根據商業利益來提出問題，而鮮少考慮到飢民的需求。因此，我們聽到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把維他命A加到稻米之中？」或是「我們要怎樣才能降低窮人的生育率？」而不是「為什麼窮人仍然處於飢餓的情況？」除此之外，還有一大堆問題是人們連想都沒想過。但只要人們願意，這些問題都有辦法可以解決。在恰帕拉進行的有關玉米受基因污染的研究中，從與墨西哥研究人員的合作開始算起，最初只花了二千美元，最後所有的花費也不到一萬美金。反觀諾華公司捐給大學的金額卻

高達二千五百萬美元。恰帕拉說道：「這就是兩種研究比例懸殊的明顯例子。」

恰帕拉並不是唯一被生技產業的公關公司嚴厲批評的人，海斯（Tyronne Hayes）與普斯泰（Arpad Pusztai）也遭遇同樣的打壓。令人悲哀的是，很快地，學術界就不必再面臨棘手的審查制度。今日，成功的研究生都是在這種複雜的環境下薰習成長的。只要他們願意繼續留在與企業掛鉤的學術界，他們的「成就」將指日可待。這就表示，恰帕拉、普斯泰以及海斯等這一類學者將不復見；如此一來，很快地，有關學術自由的問題將不再是問題，因為那些「每天在為巴結產業公司而進行研究的人將會忘了如何進行真正的研究。」

為了非洲！

為了那片面臨飢餓威脅的大陸，我懇求歐洲政府停止他們對生物科技的反對。我們應該鼓勵人們發展安全、有效的生物科技，以求在對抗全球糧荒的戰爭中贏得勝利。

——美國總統小布希

看到人們死去，我們會有多心痛。

看到人們活著，我們會有多安心。

——塞納斯 (P. Sainath)

在一九九七年的廣告文宣中，孟山都公司試圖以「開始收割吧！」這句口號來扭轉人們的看法。當歐洲一些社會運動人士在反抗孟山都時，他們成功地把農業生物科技描述為「基因改造食品」，為此，生技產業採取了不同的因應策略。他們把種族議題拉上火線。這也是企業為了把基因改造作物加以正當化所使用的第三種手段。在這些手段中，企業表達出南方人民的請求，說他們想要基因改造作物，但由於歐美的白人中產階級環保人士在消費者之間散布不實的消息，因此南方人民的心願沒辦法完成。事實上，在南方也有許多反對基因改造作物的組織。然而，企業的這種說法的確吸引了人民的注意力。這並不是第一個為了說服南方農民而故意捏造出來的爭議，它的真正目的其實是為了打動北方的人民。因為在北方，尤其是歐洲的消費者對基因改造作物的反抗最為激烈。

種族平等會議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這個曾經盛極一時並且與金恩博士共同奮鬥的組織，在一九八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卻因為跟美國國稅局發生糾紛以及與金恩博士的原始理念漸行漸遠而逐漸沒落，但是在二〇〇三年時，它以強大的聲勢再度站上種族爭議的舞台。它的創辦人羅伊·英尼斯 (Roy Innis) 跟他的兒子尼格爾 (Niger Innis，共和黨顧問，同時也是 M S N B C 的新聞評論員) 開始發起支持生物科技的行動。在一部名為「來自非洲的聲音」之影片中，英尼斯喚起人們對馬爾薩斯的記憶，他說道：

我擔心非洲將無法餵飽迅速成長的人口。在非洲，還有一半以上的國家必須靠糧食援助才能勉強生存。非洲需要農業改革。為了證實我的擔憂，我親自前往非洲。在那裡，我看到了……生物科技的潛力。

英尼斯的說法很奇怪，首先，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之後。「非洲人口成長快速」的情況早已不再出現。第二，從一九七〇年代以來，非洲人民的糧食總消耗量似乎有逐漸增加的趨勢（雖然增加幅度很小）。英尼斯似乎把非洲需要糧食援助的原因直接歸咎於糧食產量的不足。為了證實非洲的糧食產量真的不足以餵飽她的人民，英尼斯與他的贊助者帶著疑問前往了非洲。正如表 6.2 所示，在非洲，近來的饑荒、大規模的飢餓情況以及飢餓所導致的死亡人口都不是糧食缺乏所造成的。真正的原因其實很複雜。飢餓是眾多因素所導致的結果，有些是時候因素，有些則是人為因素，其中包括武裝衝突、資源的缺乏、暴力開採鑽石、從冷戰中復甦、以及現有社會機制的崩解（現有機制被稱作「道德經濟」，這是當時為了減緩糧食危機所創造的）。當英尼斯來到非洲，我們有聽到他提出武力的控制、資源的重新分配或是政治改革等辦法嗎？沒有。

表6.2 非洲二十世紀饑荒的死亡人數

(資料來源: Devereux 2000)

年度	地點 (集中地)	至少死亡人數	原因
1903-6	奈及利亞 (豪薩爾)	5,000	乾旱
1906-7	坦尚尼亞 (南部)	37,500	衝突
1913-14	西非 (薩赫爾)	125,000	乾旱
1917-19	坦尚尼亞 (中部)	30,000	衝突與乾旱
1943-4	盧安達	300,000	衝突與乾旱
1957-8	衣索比亞 (提格雷)	100,000-397,000	乾旱/蝗災
1966	衣索比亞 (沃羅)	45,000-60,000	乾旱
1968-70	奈及利亞 (比夫拉)	1,000,000	衝突
1969-74	西非 (薩赫爾)	101,000	乾旱
1972-3	衣索比亞 (沃羅與提格雷)	200,000-500,000	乾旱
1974-5	索馬利亞	20,000	乾旱與政府政策
1980-1	烏干達 (卡拉莫賈)	30,000	衝突與乾旱
1982-5	莫三比克	100,000	衝突與乾旱
1983-5	衣索比亞	590,000-1,000,000	衝突與乾旱
1984-5	蘇丹 (達佛、科爾多凡)	250,000	乾旱
1988	蘇丹 (南部)	250,000	衝突
1991-3	索馬利亞	300,000-500,000	衝突與乾旱
1998	蘇丹 (加扎勒河區)	70,000	衝突與乾旱

在全球放送，但是卻沒有人報導這樣的人間地獄其實是長時間的天候與人為因素所造成的。二〇〇二年非洲南部的人民之所以會餓到不成人形，其實是因為他們已經挨餓了十年以上。根據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的報告，一九九一年，辛巴威的六個月到五十九個月大的兒童長期營養不良 (發育遲緩) 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十九，不久之後又增加到 (並維持在) 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在此同時，辛巴威兒童嚴重營養不良 (消瘦) 的比例維持在百分之四點四左右。自一九九〇年以來，馬拉威兒童長期營養不良的比例始終維持在百分之四十九。在這段期間，馬拉威兒童嚴重營養不良的比例略為上升一個百分點，來到百分之六左右。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估計，二〇〇〇年時，發生饑荒的地區大約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民處於營養不良，莫三比克則有百分之五十四的人口都處於營養不良。其中，婦女、老人與小孩更是長期處於飢餓狀態。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報告，在二〇〇〇年時，該地區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五歲以下兒童體重過輕。雖然賴索托的食物市場並沒有發生糧食短缺的情形，但是其國內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有一半的人被歸類為赤貧。賴索托所購入的穀類食物占了窮人年度糧食需求的四分之三，但是全國一共有百分之七十被歸類為「非常貧窮」的家庭根本吃不到穀物。同樣的，這些人之所以會餓肚子，完全是因為他們窮到買不起食物。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馬拉威，二〇〇一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告訴馬拉威政

正如一九四三年發生的孟加拉饑荒一樣，許多接受糧食援助的國家其實都有充足的食物可以提供給人民，但是因為不當的食物分配措施，才讓人民陷於飢餓的情況。英尼斯或孟山都公司有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嗎？沒有。因為這跟他們賣的東西無關。

然而，這就是隱藏在非洲大陸大批飢民背後的深刻問題。當北方國家的電視上出現一大堆蒼蠅在非洲飢民臉上飛來飛去的景象時，大家才終於覺得非洲各國進入了緊急狀態。舉例來說，在二〇〇二年，非洲南部發生了連續兩年的農作物欠收，而此時官方才終於承認這樣的情形超過了「饑荒」門檻。儘管非洲的悲劇畫面不斷

府要把戰略存糧從十六萬五千公噸減少至三萬到六萬公噸之間。IMF是根據成本計算做出這樣的決定，但是這樣的決定其實是一個錯誤，因為他們誤以為來年的農作物收穫量將會增加。一年之後，當馬拉威的人民已經開始因飢餓而死亡，但是IMF卻以馬拉威政府沒有盡力解決饑荒而拒絕撥發四千七百萬美金的貸款。馬拉威政府指控IMF才是造成這次饑荒的禍首，聽到這樣的指控，IMF反而說馬拉威政府腐敗，卻不願承認或許真的是因為自己太過遲鈍才引發這次的饑荒。IMF總裁克勒（Horst Koehler）在一場英國國會的聽證會上表示：

在過去，當我們（IMF）主張進行結構性的改變時，我們沒有特別注意貧窮與社會安全網的問題。但是，結構的改變總是伴隨著混亂。如果想要幫助發展中國家達到經濟成長的目標，我們就必須接受事物永遠不斷在變動的事實……發展中國家應該自己生產糧食，而我們應該幫助他們提升糧食生產能力。

在此同時，有好幾千人處於飢餓的情況，但是穀物卻被投機的商人屯積起來、想趁著饑荒哄抬糧價，簡單地說，這種行為正是商人在高需求、低供給的自由市場所做的事。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非洲走到這種地步呢？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非洲各國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為了非洲的繁榮，大家應該致力於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拉哥斯行

動計畫」（Lagos Plan of Action）中，非洲幾個主要國家呼籲非洲各國要跟變幻無常的世界市場區分開來、獨立發展自己的經濟，推行進口替代方案、維持糧食主權與強調非洲大陸內部的貿易，最重要的是要降低外債，不要讓非洲的價值外流。但是世界銀行卻不同意，它依然堅持一九八一年《伯格報告》（Berg Report）的主張：這份報告認為，國家若干涉市場的正常運作，將會導致低度的經濟成長。大部分的非洲政府都負債累累，他們的未來更是受到了貸款的牽制，而他們的債權人正是世界銀行，因此，他們只好遵照世界銀行的計畫行事。

最近在南部非洲所發生的糧食危機，就是這一類政策所導致的結果，但是，這次的危機卻為農業產業提供了一個機會。之前，我們已經看到一些非裔美國人例如英尼斯父子等人積極在非洲推廣基因改造作物。但是除了上述的手段之外，農業產業還有其他的辦法。二〇〇〇年，南部非洲天主教的主教團曾經要求非洲各國不要使用基因改造作物，因此最後只有南非政府接受基因改造作物，其他國家都拒絕了。近來的糧食危機正好成為推廣基因改造作物的契機，而且，這一次教會再度成為主要的領航者。在二〇〇二年的九月底，美國國務卿鮑爾（Colin Powell）請求羅馬教廷的外交部長陶然總主教（Archbishop Jean-Louis Tauran）說服辛巴威政府接受美國提供的基因作物糧食援助。美國國際開發署的一位官員曾在類似的情況下表明：「乞丐沒有選擇的權利。」儘管美國媒體大力鼓吹，但是辛巴威還是拒絕了這項援助，理由是他們缺乏獨立的科學監督能力，同時他們也擔心自己的農作物會受到基因的污染。相反的，辛巴威政

府積極開發其他的食物來源，終於在沒有美國基改作物的糧食援助下成功度過了這次的糧食危機。

相形之下，種族平等會議卻因為這些錯綜複雜的因素而再次受阻。談到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不斷進行反對農業生物科技的活動，英尼斯表示：「現在該是讓這些狂熱份子為他們所造成的痛苦與死亡負起責任的時候了……因為他們只顧著推行自己的理念，卻讓第三世界永遠陷入貧窮、疾病與死亡的泥沼。目前看來，他們的策略確實相當成功。」當WTO在墨西哥（這裡也是李京海自殺的地點）舉辦部長級會議的同時，英尼斯把「綠色力量——黑死病」的獎項頒給包括「綠色和平」在內的一些環保組織，並且極盡諷刺地解釋為什麼他們能獲得這個獎項：

「因為他們花費百萬美金推行反能源、反農業、反生物科技、反貿易以及反經濟發展等能夠改善或拯救數百萬條人命的活動。」現場有一群人穿著黑衣、拿著鐮刀扮演死神在一旁觀看，接著，就像頒發奧斯卡獎一樣，英尼斯把第一個獎項頒給他同事所扮演的「綠色和平」組織。她興高采烈地說：「我要感謝蚊子把瘧疾帶到低開發國家，但是最重要的，我要感謝數百萬名死去的兒童，因為他們，我才能得到這個獎。」

同樣的，這些誇張的表現手法不是針對非洲，而是以歐洲與北美洲為目標。由於這些環保組織成功地在非洲、歐洲與北美洲引發人們對基改作物的憂慮，並且說服大多數的消費者對農業公司抱持懷疑，因此農業公司就利用種族平等會議來對抗他們、把他們加以污名化。這個手段利用了北方國家對種族政策的焦慮，並找來了非裔美國人或是非洲人來代表非洲人民的心聲，同時把所有反抗行為套上種族歧視的罪名。但非洲的真正情況又是如何呢？在英尼斯的影片中，他說道：「在南非，基因改造作物已經開始成長、茁壯。這就是非洲的心聲。」然而，在非洲的田野之間，其實完全沒有出現英尼斯的幻想景象。在夸祖魯納塔爾（KwaZulu-Natal）北部，只有幾千個南非農民在種植孟山都的基因改造棉花。它的發展情況完全不像英尼斯、孟山都或南非政府所想的那樣。

虛構的馬卡哈席尼

南非夸祖魯納塔爾省北部的馬卡哈席尼平原上，坐落著孟山都公司的農作物生產中心。在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二日美國眾議院科學小組委員會的研究報告上，孟山都公司的產品與技術合作副總裁霍爾許（Robert Horsch）提出了下列證據：

布特萊齊 (T. J. Buthelezi) 是首先在南非種植生物科技棉花的其中一位農民，他說生物科技棉花為他帶來更高的收益，讓他可以購買更多土地與更好的設備。最近，布特萊齊還告訴我：「這是我第一次賺到錢。我終於可以付貸款了。」由於我們成功地引進了生物科技棉花，非洲終於能明顯感受到生物科技的力量與實用。

為什麼霍爾許要特別在國會的簡報上提到這一塊小小的土地以及這幾個農民呢？回想一下，這些企業不是一直積極地想要讓北方國家的民眾接受基因改造作物嗎？了解這一點之後，我們就不難看穿他們的手段了。基因改造作物的改革理念就在於「把傳統種子變成全能種子」，不必太費力，就可以輕鬆讓它成長。孟山都公司把基因改造種子銷售到全球各地，賣給大規模的農家。但是如果國家拒絕進口，他們就沒辦法把它賣出去。因此孟山都就利用北方國家對非洲的刻板印象，讓北方民眾認為，如果連非洲的農民都可以種出豐收的基因改造作物，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而且，如果非洲的農民都想要種植基因改造作物，歐洲人憑什麼阻止他們？畢竟，沒有人想要被冠上種族主義的罪名。基於這些原因，馬卡哈席尼可說是上天所賜最好的公關宣傳工具。

儘管有些農民有水源可以灌溉，但是馬卡哈席尼平原區的大部分農民仍然只能用旱地耕種法。除此之外，這裡的農民大多僅擁有一小塊的土地，只有少數幾個擁有十公頃以上的面積，這種情況也同樣利於推廣基因改造作物。由於這些農民並不富裕，因此對他們來說，只要能帶來更好的生活，任何新發明他們都願意接受。基因改造棉花自一九九八到九九年的生長期開始推廣以來，只花了四年的時間，當地幾乎所有農民都開始種植。由此看來，南非的情況就真的跟霍爾許說的一樣。農民似乎是自己選擇了種植基因改造棉花。乍看之下，市場好像已經做了決定，環保主義者似乎都錯了。

事實上，這個市場遭到了些微的扭曲。在二〇〇一到二〇〇二年間，提供基因改造作物的業者也提供貸款給任何保證會購買基因改造棉花種子的人。消息一傳出，就有一大堆的人擠在公司的門口，每個人都信誓旦旦地說自己是種植棉花的農夫，問公司是否能借錢給他。我們可以想像，當借來的貸款被拿去還清現有的債務之後，這些「種植棉花的農夫」也會跟著消失無蹤，後來真正的棉花種植數量便會比貸款所顯示的數量要小得多；畢竟，我們在面臨相同處境時一定也會這麼做。

原本負責發放企業貸款的是當地的棉花工廠，後來，這項業務改由更精明的馬卡哈席尼棉花公司 (Makhahini Cotton Company) 負責。為了嚴格禁止窮人白借錢，馬卡哈席尼棉花公司便建立了一個新的系統。在新的貸款制度下，棉花公司不是對所有貸款人都來者不拒，他們知道自己的目的不是借錢給別人，而是要推廣基因改造棉花，因此他們只把錢借給真正的農民。棉花公司的做法是給農民們一些布袋，要農民把棉花裝在布袋中，接著免費幫農民把棉花運送到市

南台平設
大規模種植、居住權受威脅

場上販售，並且保證一定可以賣出去。當農民進行這項交易時，棉花公司要求他們提出購買基改棉花種子的證據，證明這些棉花確實是他們種出來的基改棉花。棉花公司想要看到的證據，就是孟山都公司核發的基改種子許可證。

當然，棉花公司的最終目的就是提供農民下列的選擇：只能選用基因改造種子，否則就完全不種棉花。由於當地沒有其他的農作物可以賣錢，因此農民們當然就會選擇基因改造棉花。

這樣看來，如果你想要在旱地上種植棉花，基因改造棉花或許是你最好的選擇。但是，目前還不能做出這樣的結論，因為基因改造棉花的產量一開始雖然有提高，但後來似乎又漸漸減少，而且，農民選種基改棉花的原因也不完全是因為它的成效。種植基改作物的農民之所以會減少農藥支出，一部分是因為基改種子比傳統種子貴得多，一部分是因為農民買了昂貴的基改種子之後，通常都不會照著孟山都公司的指示來種植，而是根本不噴農藥。從世界其他地方過去的棉花種植記錄來看，跟傳統棉花比起來，基改棉花似乎不太可能為小規模的農家帶來更豐富的收益。但是，這一切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更大的黑手。農民要不要種植基改棉花，其實由不得他們自由決定。在這個基改棉花的舞台上，所有的情節都操縱在一個最有力量的主角手上。在馬卡哈席尼平原上，這個強而有力的主角就是馬卡哈席尼棉花公司。

對軋棉公司來說，規模經濟相當重要。工廠收到越多棉花，他們從每單位棉花獲得的利潤就越高。在馬卡哈席尼，一台軋棉機，即使是從美國進口的二十世紀中期的型號，也是一個相當昂貴的設備。只要看到軋棉機，你就知道為什麼它會這麼貴。軋棉機是由許多滾筒狀、鋸齒狀的零件以及烘乾機所組成的，一台軋棉機幾乎有幾棟房子那麼大。軋棉機主要是用來摘取田裡的棉花子，去除裡面的雜質，把棉花子清理乾淨之後，再把其中的棉纖維抽出來。軋棉機能創造多少經濟效益，端看工廠有多少棉花能讓軋棉機保持運轉。在馬卡哈席尼，始終沒有足夠的棉花可讓軋棉機一直保持運作。為了收取更多的棉花，棉花公司拋出許多誘因來吸引農民。農民可以選擇跟棉花公司簽訂製作合約，也可以選擇拿取一筆生產權轉渡金並讓棉花公司全面接收棉花生產業務。在一連串的事件發生之後（包括軋棉廠的地點、前任公司的財務困境以及農民的認證機制），馬卡哈席尼的新種子實驗讓有些農民甚至不必親自種棉花也有錢可以賺。

除此之外，軋棉機對棉花的強大需求也帶來更深遠的影響：棉花公司需要大片土地來種植棉花。為了達到大規模種植的效益，所有棉花田都必須連接在一起。面積太小而且沒有鄰接在一起的農地並不適合產業用的耕種機械設備，也就是說，土地的長度至少要有數個足球場那麼長。馬卡哈席尼棉花公司接觸了當地的幾個大地主，要求他們把土地賣給公司。地主們在沒有爭求當地居民的同意下，就把土地賣給棉花公司。但是，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搬走。

某位太太驚恐地說道：「如果他們知道我跟你說話，他們一定會殺了我。」「請你也去

問問這裡的每個婦人，不然他們一定會知道是我說的。」當我們的研究小組試著問當地居民有關棉花的情況時，我們所得到的回答就像這樣。這位太太不願意搬家。她是被趕走的。當然，在執法人員強制驅離住戶時，當地的棉花公司並沒有在場。表面上看來，這位太太會如此害怕，跟棉花公司一點關係也沒有。她是受到簽訂發展合約的當地權貴逼迫而離開家園的。這位太太被趕走。棉花公司拿到了土地，並且在土地上種下棉花。然而，問題還一樣存在。

種子的生長情況並不好。缺乏灌溉系統，再加上當時的雨量又比往年多，要在那裡種植棉花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布特萊齊這位農民在三年前曾經被孟山都副總裁在國會上大力讚揚，但是到了二〇〇五年他卻說了這些話：「我的頭快要爆炸了，我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這一季，我沒有種下任何種子。我已經花了六千南非幣（大約美金八百二十元）來犁田，現在我負債累累。」

布特萊齊是孟山都公司用來向世界宣揚非洲農民因基因改造技術而獲利的面孔之一。但是他現在卻陷入了困境。他還有二十七個小孩要養。儘管布特萊齊是北祖魯地區馬卡哈席尼平原的大地主之一，擁有超過三十公頃的土地，但是他們全家仍然只能擠在一個小小的、沒有電的房子裡。儘管跟他的佃農比起來，布特萊齊的生活已經過得比較好，但是他仍然很窮。我不是要指責他成為孟山都的非洲代言人。當天候狀況不如人意時，他也跟其他住在馬卡哈席尼的人一樣受苦，雖然他受的苦或許比較少一點。

我們應該仔細看一看孟山都如何利用布特萊齊這類農民。非洲一直是特別投入基因改造作物的地區。大多數人一想到非洲，總會以種族歧視的態度來看待這一塊充滿著持續饑荒、殘忍暴力及惡劣先天條件的土地，因此，雖然孟山都從來不願意正面承認，但當它選擇非洲成為生技發展之地時，說這些先入為主的想法沒有影響它的決策，是無法讓人信服的。

如果真的去認真思考是否要接受生物科技，那麼非洲眾多的窮苦農民又會如何抉擇呢？當我們的研究小組訪談了多位馬卡哈席尼的民眾之後，我們清楚地發現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他們可以種植其他農作物，沒有任何人會選擇種植棉花。這個問題就連馬卡哈席尼棉花公司自己也無能為力，因為它也受制於其他更強大的權力。對此，南非棉花產業聯盟（CottonSA）的一位高級職員做出一個結論：「的確，對逐漸沒落的棉花產業來說，蘇力菌抗蟲棉花是一項新的科技。因為它的誕生，南非的棉花產業才能繼續勉強存活。」問題是，棉花無法成為南非的經濟作物。南非幣屬於強勢貨幣，因此世界其他地方所生產的棉花都比南非的棉花還要便宜。南非的棉花產業已經是風中殘燭，想要振興棉花產業，光靠神奇的種子是不夠的。唯有政府與人民共同努力，才能解決農村社群的結構問題。然而，基因改造作物的發明卻拖延了農村問題的改革，它讓人們暫時不去思考其他更周全的解決方案。

馬卡哈席尼的農民渴望能種植其他的作物，不論是甘蔗（具有本地市場）或是其他更有價值的食物。但是，那裡沒有糧食的市場。南非的思巴爾超市（Spar）不在本地購買糧食，

而是從幾百公里以外的地方運來各種食品。因此，馬卡哈席尼的農民可以選擇的農作物並不多。他們只能種植那些可以讓食物體系掌控者賺錢的農作物。

然而，種族平等會議似乎不願意去了解這些真相。當然，在國際舞台上，種族平等會議並不是一個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們忽視的問題、他們代表的利益、他們宣揚的解決方案以及他們的策略，再再顯露出隱藏在食物體系中的那股強大力量。

以生活化學取代化學生活

心得

事實上，我們可以找到不同的解決方案，而且這些方法或許更能解決人們的問題，然而，對基改產業來說，這些方法無法帶來豐厚的利潤，也因此這些解決方案很少被它們提起。最近，比爾·蓋茲和他太太共同成立的蓋茲基金會就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們捐了一億美金來資助一項名為「非洲新綠色革命」的計畫。他們甚至聘請了孟山都的副總裁霍爾許（就是前不久在國會上大力支持南非農民布特萊齊、後來又把他甩掉的人）。對農業產業來說，其實還有其他的做法。非洲的國際農民組織就為那些沒有土地的農民和鄉村地區的窮人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決方案。此外，在距離美國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一個結合高科技並且考量到環境與社會因素的農業系統正蓄勢待發。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在一九八八年時大量使用化學藥劑、並

且以高度機械化方式來耕種的國家吧！

這個國家就是古巴。以前，它的經濟發展主要是依賴與蘇聯之間的貿易，其國內有將近百分之九十的商品都銷往華沙公約組織國家。古巴用它的蔗糖換來遠低於市價的石油。蘇聯所提供的石油補助，讓古巴的經濟得以成長。然而，這也讓古巴的經濟體系變得十分脆弱。當蘇聯解體時，古巴仰賴共產世界進口的每樣商品幾乎都全面漲價。的確，在美國的禁運措施之下，古巴的商品價格比鄰近的加勒比海國家還要高。所有在兩百英里內就能買到的商品都只能遠從半個地球以外的地區運送過來。因此，當蘇聯解體時，古巴的經濟也隨之崩潰。當古巴努力地想要恢復經濟時，其國內發生了嚴重的饑荒。一九八〇年代，古巴境內到處都可看到牽引機，其數量多到連港口碼頭都還有一大堆牽引機無人領取；但是到了一九九〇年代，由於沒有石油，所以牽引機都被棄置在農田裡等著生鏽。在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四年之間，古巴人的平均體重下降了四十磅。這個「特別時期」（嚴格說來，應該是艱苦的轉型階段）也造成了許多不滿、飢餓與黑色喜劇。

古巴政府發現它的產業型農業模式已經無法持續下去。在一九九四年，眼看著饑荒的範圍漸漸擴大，在國家利益的考量下，古巴政府宣布進行全面的農業改革。以往，由國家擁有並經營的土地高達國土面積的百分之七十九。進行改革之後，政府把土地經營權分散給一些私人機構。直到今日，古巴已經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農地可以讓私人經營，但是百分之七十九的國土

所有權仍然為政府所有。人民可以把土地的經營與使用權移交給他們的下一代，但是不能把這項權利賣給其他人；如果下一代沒有繼承，就只能把經營權還給政府。政府仍然是商品分配的主要負責人，以確保所有人民都能取得食物，並保障市場與價格的公平性。除此之外，古巴政府也十分支持都市裡的糧食莊園，這些莊園起源於哈瓦那的一項行動，目的是為了滿足首都的需求並減少食物的運送距離。

在古巴，農業生技及其相關的人民教育都還有發展的空間。儘管古巴只占了拉丁美洲人口的百分之二，但是他們的科學家比例卻占了全拉丁美洲科學家的百分之十一。在古巴，抗拒進步的盧德主義並不存在，大家都積極地發展科學與技術。但是，科學家在古巴糧食生產上所扮演的角色，是由政府所引導，而不是私人企業塑造出來的。古巴政府嚴格禁止發展基因工程，只有在科學家能證明該項技術是安全的、而且沒有其他方法能達到同樣效果之情況下，才能獲得政府的許可。這些條件迫使古巴科學家不得不去研究他國的科學家不必留意的各種糧食問題與需求。於是，古巴的生物科技就此誕生。蘇力菌，這個孟山都公司用來培育蘇力菌抗蟲棉花的主要成分，在古巴科學家把它跟其他生物控制成分結合之後，搖身一變成爲古巴政府生產與分配的產品。古巴的蘇力菌作物與孟山都的抗蟲棉花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把殺蟲劑直接植到種子當中（在孟山都的做法中，種子裡面所含的殺蟲劑量只能殺掉少數的昆蟲，但是其他昆蟲將會對此發展出免疫能力）；在古巴的模式中，只有在必要的情況下，蘇力菌才會變成具

有選擇性且高劑量的殺蟲劑。因此，古巴農民不能把化學藥劑當成必需品，而是要把它當做最後的手段。

古巴的農藥產量不僅受到中央政府的嚴格限制，而且只有幾家專業實驗室才能生產農藥，這些實驗室也都是政府在全國各地設立的，除此之外，所有產品都必須經過科學家的實際田野測試才能產。農業能源的限制也讓古巴的農民以及科學家懂得重視複雜的生態系統。問題是，產業型農業模式在處理蟲害時，幾乎都採取「摧毀一切」的原則。農藥殺死的不只是會吃掉植物的害蟲，它也會殺死其他能夠吃掉害蟲的昆蟲。使用農藥就像使用踏步機一樣，一旦你踏上去之後就很難停下來，因為每次只要有新的害蟲入侵，你就只能繼續噴灑農藥。然而，古巴有一位土壤科學家發現了一個新的辦法：「想要控制昆蟲，你必須先放棄控制牠們。」換句話說，我們要先了解昆蟲，並且學習與牠們和平共處，將牠們的負面影響減到最低。根據這個觀念，古巴已經發展出一個精密的害蟲管理系統，包括蘇力菌抗蟲劑的培養到實施間作農業，舉例來說，把玉米和甘薯種在一起，其中一種植物的害蟲就會被另一種植物的害蟲驅離。

儘管古巴積極發展農業生態，但她仍然不是生態的天堂。古巴的稻米生產大部分還是採用密集的農耕方式。自蘇聯解體以來，古巴的牛肉與牛奶產量仍然無法滿足國內的需求。此外，生產牛肉與牛奶的能源密集型畜牧業也對農業環境造成很大的負擔，因為動物會製造很多

排洩物，同時也消耗掉大量的糧食。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古巴政府決定選擇最適合國家並且最能滿足人民需求的產業。這個決定似乎有了成效，至少在教育與健康的指標上，古巴都迎頭趕上甚至超越許多比她更富裕的國家。

分別以古巴與美國的模式來探討「國家利益」，可以讓我們對其中的意義有不同的感受。在美國的模式下，無論我們生活在哪裡，食物體系中的決策都在政府與私營領域企業的操作下一再被推翻。然而，這並不表示在資本主義之下不會有所謂的核心計畫，相反的，是有太多的核心計畫。在錯誤的「農業條款」領導之下，美國州政府的資金流向說明了一切。在專為「核心」農民設計的法律之下，資金被重新分配，而且大部分都流到有錢人的手裡。正如安德亞斯所說，私營領域不僅深諳箇中道理，也獲取了龐大的利益。因此，在這種強權體系中，跟國家利益有關的決策不是被隱匿在政治分贓的手段下，就是在身著白袍之科學家的背書下被偽裝成科學事實來蒙混過關。相形之下，古巴的模式或許誠實多了，因為他們把國家利益深入地保存在部分的共有制度之中，而且它的結構完全是由政府塑造，而不是由企業來決定。在古巴，科學家的角色比較像是公共的開發者，而不是私有的知識。這些知識已經超越了古巴的邊界，往世界各地流散。古巴在發展替代農業方面的專業知識已經被拉丁美洲與非洲的許多國家採用，甚至連位於亞洲的寮國也跟進。

政府絕對不是傳達這些觀念的唯一途徑。在印度，永續農業發展中心（the Center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秉持著「沒有農藥，沒有害蟲」的理念，跟農民一起合作，發展能建立並維持生計的替代方案。日本的福岡正信¹把有機農業與科技農業的理念有系統地傳達到世界各個角落。在拉丁美洲，一個名為「農民對農民」（Campesino a Campesino）的互助運動或許讓我們看到最深刻的分散式學習與分享範例；在這個運動中，農民們跨越國界、走遍世界各個鄉鎮，跟各地的農民分享他們的理念、種子、文化與歷史，建立起屬於他們自己的無國界網絡。「食物優先學會」（Food First）的執行董事，同時也是長期推行「農民對農民」運動的學者吉孟涅茲（Eric Holt-Gimenez）解釋農民自己如何看待這項運動：「他們說這是用雙腳『走出』革新與團結，同時一手生產食物、一手保護環境。它讓我們在生氣盎然的農民文化基礎上，『看到』一個永續的農村未來。」的確，當古巴發展出農業生態模式之後，這種農耕方式不是透過政府來傳播，而是藉著「農民對農民」運動來交換、分享。「農民對農民」運動拒絕把知識、土地、空間、記憶與專業知識私有化，它把源源不絕的可能性以及替代農業系統的實際經驗帶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它的做法正好跟「印美知識倡議行動」完全相反。在這個運動中，專家把智慧傳遞出去，同儕間也互相分享知識；它讓土地去適應農作物，讓農業去順應土地；它讓人民不再只是被動地承受，而是讓人民以自己的知識來主導發展。

此刻，不論是政府或非政府主導的產業型農業替代方案都不是主流。但是它們永遠都屬於農業版圖的一部分，而且，在產業型農業當道的日子中，它們仍然順利存活了下來。它們

為更好的農業體系提供了希望與種子。當然，在部分拉丁美洲地區成功的，不一定適用於其他地方。體系，就像種子一樣，有其成功的條件；如果未來的農業體系對它們所採用的生物、地理、歷史與民主制度不夠敏銳，必然會招致失敗。然而，我們迫切地需要這些新的體系。為什麼呢？只要看看那個曾經掉入農企業誘惑的陷阱，卻又能夠提出希望與願景來努力對抗它的國家，就可以了解箇中緣由。這個國家就是巴西。

1 譯注：Masanobu Fukuoka (1913-2008)，為日本當代著名的哲學家與農學家，在其《自然農法》和《一根稻草的革命》等著作中指出現代科學農法的缺陷與弊端，並提出「自然農法」的構想。

7 神奇的黃豆

我這裡有一種神奇的超級維他命巧克力，我們只需要給他三份就行了。這種超級維他命巧克力含有維他命A、維他命B、維他命C、維他命D、維他命E、維他命F、維他命G、維他命I、維他命J、維他命K、維他命L、維他命M、維他命N、維他命O、維他命P、維他命Q、維他命R、維他命T、維他命U、維他命V、維他命W、維他命X、以及維他命Y，維他命不信由你，它甚至含有維他命Z。它獨缺兩種維他命，一種是維他命S，因為維他命S會讓人生病，另外一種是維他命H，因為維他命H會讓你的頭上長出跟牛一樣的角。總而言之，這種超級維他命巧克力真的含有少量卻珍貴神奇的多種維他命。

——羅爾德·達爾，《巧克力冒險工廠》

神祕成分

糖果產業中並不是只有巧克力噴泉和巫帕倫伯司¹。你只要看一下先前之過的巧克力棒包裝紙就可以發先一些端倪了。在可可粉的底下還潛藏了許多化學成分與試劑，這些添加物足以讓那些最詭詐的糖果公司老闆們都感到羞愧。這些添加物並不是為了讓巧克力棒更好吃，而是為了方便製造、囤積、運送與保存。舉例來說，有些添加物可以提高巧克力的融點（不過還是效果很有限），有些添加物可以讓人工加入的各種口味混合得更均勻，有些添加物可以幫助防腐達好幾個月，有些添加物則可以隔絕水分、以免讓巧克力棒中的各種成分在還沒有食用前就先融化而混在一起。

在眾多的添加物之中，或許有一種曾經引起過你的注意：卵磷脂（Lecithin）。卵磷脂可以當作一種食物黏合劑，它能夠幫助脂肪與水的混合。換言之，卵磷脂可以讓牛奶巧克力變得非常乳白濃稠。然而，加入這項添加劑的主要目的完全是為了製造上的考量。把卵磷脂加入巧克力漿後，大量生產巧克力的艱苦過程將可以變得容易一些，因為卵磷脂可以讓巧克力漿中好不容易混和好的脂肪與水不再分離。在巧克力的製造過程中添加卵磷脂是從一九二九年開始的，最近有些精品巧克力公司已經認為這是不必要的程序而停止使用卵磷脂。不過，對買不起

精品巧克力的人來說，目前只能無奈地接受它。

早期的卵磷脂是從蛋白中提取出來的，不過自一九二〇年代起，就逐漸改從另一種食物提取：黃豆。事實上，黃豆並不僅是巧克力中才有的神祕成分；超市架上大約有四分之三的商品，以及幾乎所有的速食產品，都含有這項成分。黃豆同時也是一種重要的動物飼料，它可以提供許多蛋白質。它還是植物油與人造奶油的主要成分，也因此，大部分的食品加工過程都會用到。如果你想要過上一天不吃黃豆的日子，那還真得費上一番工夫才有可能。然而，幾乎沒有例外，很少有產品會特別標榜其含有黃豆這項成分。黃豆之所以能在食品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並不是因為它的口感或味道不錯，而是因為它為所有的人提供了方便，但是不包括消費者在內。樂觀一點來看，這只不過表示我們喪失對某種食品的自由食用選擇權，但事實上，這一切的背後還隱藏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包括了環境破壞、謀殺與奴役。在現代食物體系的發展過程中，在單一經營以及商業大量生產制度的形塑之下，地球上某種美好的植物變成了某些人行使殘酷暴行的手段，而對那些食用它的人來說，這一切乃是不解的祕密。

這一切到底是如何發生呢？就讓我們先來談談黃豆吧！歐洲人會把黃豆稱為「Soya」，源自於日本的「Shoyu」（醬油），也就是黃豆發酵之後做成的一種鹹味醬汁。換句話說，歐洲人是以黃豆的加工產品來命名這種豆子。當歐洲人第一次吃到這種豆子，他們根本無法想像它跟許多不同的食品有關，例如豆腐、醬油、味噌等等。當然，在歐洲人還不知道黃豆這種植

物時，它早就是別的地方的農作物了。早在西元三千年以前，就已經有人開始種植黃豆；儘管我們沒有證據證明黃豆有五千年的種植歷史，但可以確定的是，黃豆成為農作物的時間至少有三千年以上。然而，直到一七二二年，德國一位醫生、學者兼植物學家肯培爾（Engelbert Kaempfer）發表了他的《異國奇觀》（*Amoenitatum exoticarum politico-physico-medicarum*）一書之後，歐洲才將黃豆如何製成豆腐與味噌的方法記載下來。直至今日，黃豆仍為西方世界帶來許多異國風味，不論是物質或醫學上。而其中最特異其趣、最與其源起初衷相差十萬八千里的，就是它所滿足的政治目的。

黃豆本身看起來很不起眼。它的豆莢裡面並不是像豆腐一樣的泥狀果肉。它就跟一般豆類一樣，矮小的莖幹上長著一條條豆莢，豆莢裡面包了幾顆豆子。雖然它的外表不起眼，但它可是一種相當神奇的植物。瑞典自然學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將它命名為「*Glycine max*」，「*Glycine*」是指它的「甜」，而「*max*」則是指黃豆的根上有根瘤菌，這些根瘤菌能夠把空氣中的氮轉化為增加土壤沃度的化合物。黃豆的生命力非常強悍，即使葉子掉了一大半，還是能長出許多果實。但是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黃豆含有豐富的蛋白質，而且它不只含有蛋白質，還包含了各種氨基酸；在植物當中，黃豆的營養成分跟動物所能提供的養分最接近。黃豆能為人體帶來許多好處，它不僅能降低心臟病的發生率，同時也能減少呼吸系統的問題。美國心臟協會建議人們每天要攝取三十五到五十公克的黃豆蛋白。黃豆可說是一種功能保健食

品，但是它必須經過加工，才能發揮保健的功能。人們生食黃豆時，其中所含的蛋白質大部分都無法被人體消化吸收。如果食用未經處理的黃豆，它只會很快地通過人體，卻不會為我們帶來什麼好處，頂多只會引起胃腸脹氣罷了。

雖然人類的消化系統無法消化未經處理的黃豆，但是動物卻能在生食黃豆的情況下充分吸收其中的營養素。正因如此，在黃豆尚未被大量製成人類的食品之前，它主要是給動物吃的，全世界有百分之八十的黃豆都銷往家畜養殖業。然而，就連動物也不是吃生的黃豆，牠們吃的是黃豆做成的飼料。的確，只有百分之十左右的黃豆不會被拿來加工，而是再度做為種子或是生豆，其餘的黃豆大部分都會被磨碎，但是黃豆的加工過程其實並不是從「磨碎」開始，而是先經過擠壓。黃豆加工產業可說是龐大、到處擴展而且擁有強大力量的農業引擎。當工廠買進黃豆之後，他們就把黃豆儲存在具有溫度控制的穀倉中。在黃昏時分，一座高達四層樓、裝滿五萬五千公噸穀物的穀倉看起來是很嚇人的。不只如此，當穀倉中無法計數的黃豆慢慢地滾滾下來時，它不斷發出的沙沙聲更像是一種不祥的徵兆，就像有一千隻響尾蛇在襪子裡一樣。當這一大堆小小黃黃酸酸的乾燥豆子整個滾滾下來時，可是會壓死人的。在黃豆加工廠中，你要小心不要踏進一池池裝滿豆泥的水坑，如果你的衣服上不小心沾到一點豆泥，那味道永遠都洗不掉。在穀倉與加工設備之間，有幾條長達一英里的輸送帶，在這些輸送帶上，黃豆會先經過乾燥，接著研磨成小薄片，然後再度乾燥；接著，這些經過乾燥的片狀物會被噴灑上

一種名為己烷的溶劑，這種溶劑能把黃豆中的油份去除；然後再經過精煉與漂白，把黃豆裡面有毒物質與酸味去掉，便能加工成離氨酸、卵磷脂、黃豆食用油以及用豆渣做成的豆粉等等產品。當黃豆被磨碎之後，它就會產生兩種非常不一樣的產品，其中有五分之四是豆粉，剩下的五分之一則是油。豆粉大部分都用來製造富含蛋白質的動物飼料，而黃豆油則是全世界最廣為使用的蔬菜油，黃豆油占了全球蔬菜油市場的四分之一以上，也占了美國生產與消耗之油類與脂肪產品的百分之七十。

美國的煉油事業

我們要記住，當全世界都陷入戰亂時，並不是每個經濟體都會發生衰退；仔細回想一下，你就會發現近代有許多明顯的例子可以佐證。只要有好的管道、對的產品，再加上正確的時機，戰爭也能為人們帶來很多好處。黃豆就是一種在戰火中誕生的明星商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前，美國大多從歐洲進口蔬菜油，但是當戰爭爆發之後，這條傳統蔬菜油的補給線被迫中斷。美國為了滿足國內的需求，便從中國東北九省引進三億三千六百萬磅的低等級黃豆油。然而當戰爭結束之後，歐洲的穀物供給漸漸恢復，美國的農業卻因此面臨生產過剩的問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農民努力地增加產量以滿足國內市場與政府的需要，甚

至借錢來添購各種設備以提高產量，同時也開拓了更多土地加入農業生產的行列。等到歐洲的農產出口業復甦、並且重回市場龍頭寶座之後，美國農民才驚覺他們生產了太多的黃豆。為了安撫人心惶惶的農村地區，並對日漸強大的農企業遊說團示好，一次大戰之後，美國便制訂一連串的關稅壁壘以保護國內的蔬菜油產業，包括一九二二年的《佛德尼—馬坎柏關稅法》(Fordney-McCumber Act)，以及一九三〇年美國大蕭條初期所制訂的《斯穆特—霍雷關稅法》(Smoot-Hawley Act)。

在大蕭條時期以及發生大規模沙塵暴的那幾年，美國政府提供了許多資金來援助國內的農民與食品加工業者。美國農業部農業調整署所推行的土壤保護方案為農民提供了一個種植黃豆的理由。在沙塵暴的侵襲下，北美大平原南部的天空不僅被漫天的風沙所遮蔽，在農民過度墾植之下，以往肥沃的農田只剩下貧瘠、乾燥的表土。面對這種惡劣的環境，農民對任何能夠恢復土壤的方法都急於一試。在這種情形下，黃豆就變成了農民的救星。由於黃豆具有「固氮」的特性，因此它被歸類於能夠改善土壤沃度的作物，美國政府也提供資金來推廣黃豆的種植。除了投入大量資金來改善農村基礎建設之外，美國政府也補助牽引機與農業化學產業，並且成立研究基金，以提高黃豆的產量。在這些措施之下，美國國內種植黃豆的面積與產量都大幅提升。

大企業與黃豆之間也有相當的淵源。在十幾年前，當黃豆開始成為美國食品市場裡的一

員，有幾位企業家便開始在腦中勾勒新的夢想，並試著為這種神奇的「豆子」找出不同以往的用途，其中，最著名的企業家就是福特（Henry Ford）。在一九三五年，福特在他位於密西根州第爾本的汽車工廠內舉辦了一場會談與慶祝晚宴。那場晚宴所提供的菜餚都是以黃豆做成的。在晚宴上，福特穿著一身剪裁講究的西裝，席間，他跟與會的來賓說道：「摸摸這件衣服的材质。」來賓們都照著福特的話，摸了摸他的袖子。衣服的材质柔軟得像羽絨一樣，而且它完全都是用黃豆製成的。等到衣服的價格在宴會上傳開來時，原本讚歎不已的賓客們立刻表現出敬畏的表情。據說為了研發出福特身上的衣服，當時所投入的研究經費高達四萬美金，相當於現在的五十萬美元以上。這個令人咋舌的價格也顯示出福特對黃豆有著極高的興趣。正如福特旗下一位工程師所說：「福特先生希望能將農場與工廠結合在一起，把農場上的產物轉變成福特公司的產品……他之前曾經預言有一天汽車會從農田裡『長出來』」。當他把興趣轉到簡單的黃豆身上時，他發現他的大豐收夢想即將實現。」

然而，福特對黃豆的美麗幻想並沒有完全成真。雖然黃豆確實能夠成為汽車底盤的原料，但是這種底盤必須塗上一層味道刺鼻的有機亮光漆。這種味道會讓坐在車子裡面的人覺得自己像坐在太平間裡面一樣。儘管如此，到了一九三五年時，每一輛福特汽車在製造過程中都跟大量的黃豆有關係。雖然福特的想法看起來很奇怪，但是黃豆卻因此發展出許多新奇用途。現在，到處都可見到黃豆的蹤影，從生質燃料到報紙上的墨水都跟黃豆有關。

但是，當福特正忙著把黃豆變成機器時，其他人卻把機器變成黃豆。舉例來說，一九三四年，ADM公司就從歐洲引進了一些新世代的產業加工技術，他們把黃豆碾碎之後，再用已燒來提煉出黃豆的油脂。到了一九三九年，ADM在美國伊利諾州的迪卡特成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黃豆煉油廠，這裡也成為今日黃豆產業的起源地。

不久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隨著戰爭的爆發，黃豆產業又出現了另一次巨變。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間，由於美國預期黃豆油的出口量將大幅增加，因此黃豆油的產量也達到高峰（如圖7.1所示）。一九四二年時，美國政府將種植黃豆的補助額提高到每蒲式耳一點六美元，這個金額是戰前的兩倍，在這項措施下，黃豆產量也迅速增加。儘管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比起來，二次大戰的政經局勢有著明顯的不同，但二次大戰對農民依然有著重大的影響，特別是在黃豆方面的情况。在一次大戰時，美國農業產量的提升彌補了國內主要作物供應不足的现象。到了二次大戰，美國農業產量的成長不僅讓國內的糧食供應不虞匱乏，也為海外的盟軍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補給。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黃豆產業的危機不是因為歐洲的黃豆將恢復進口到美國，而是歐洲與世界其他國家都不再是美國農產品的市場。促成這個重大改變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了農業技術改良、產業計畫、國際政治、農作物的生物科學，以及美國國內對農民和鄉村窮人的政策等（他們在一次大戰與二次大戰之間那和平的幾年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為了因應當時的局面，美國政府制訂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包括「四八〇號法案」糧食援助計畫，以及跟黃豆有關的國際貿易政策。在一九六〇到六一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召開的「狄倫回合」（Dillon Round）會議中，美國成功地突破了歐洲市場的關稅限制，讓美國的黃豆能夠銷往歐洲。到了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七年舉行的「甘迺迪回合」（Kennedy Round，以美國甘迺迪總統為名）中，美國更加鞏固了免除關稅的提議。最後，與會各國協議歐盟將專門生產穀物，美國則繼續維持它在煉油種子市場的優勢。也因為如此，美國的煉油種子產業完全稱霸全球。一九六〇年代後期，美國的黃豆出口量占全球黃豆出口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黃豆油與豆粉的出口量也高達全球的四分之三。在這些複雜又廢時的貿易談判之下，美國暫時保有了在全球黃豆市場的龍頭地位。然而，這個位置很快就被推翻了。在「甘迺迪回合」之後不久，美國的市場優勢漸漸消失。不到十年的時間，美國就把黃豆加工產業龍頭的位置拱手讓給了地球上最多貧窮人口的國家：巴西。

來學黃豆森巴舞吧！

每個經濟體系背後都隱藏了許多推手，這些男男女女管理、監督並且改變著經濟體系，有時候，他們還需要努力地去做捍衛它。以美國的黃豆產業來說，在發展初期，黃豆產業的幕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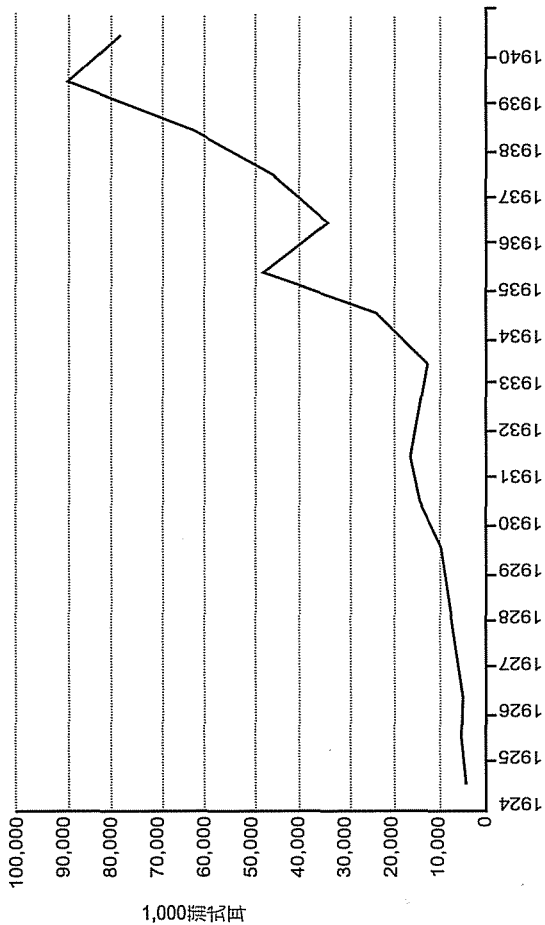


圖 7.1 1924 至 1940 年美國黃豆產量
(資料來源：美國農業部)

推手主要是男性，包括農業科學家、商人、農民、賣油的小販、農業部的官員以及各領域的企業家。然而，這並不表示女性沒有出什麼力。事實上，早在一個世紀以前，就有很多女性為黃豆產業貢獻她們的心力，其中一位重要女性就是懷愛倫（Ellen G. White）。懷愛倫出生於一八二七年，她在一八四〇年成為一位米勒派教徒（Millerite），當時這個教派的人相信世界末日將於一八四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來臨。然而，世界末日並沒有降臨，該教派也因此崩解；自此，懷愛倫開始有了她自己的宗教見解。她和她的丈夫於一八六三年成立基督復臨安息日教會。從她的奇想中（包括高壯的木星人所做的英勇事蹟，到一八六〇年代中期一系列「靈魂沉睡說」），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長壽的祕訣，這祕訣就是：不吃肉類或牛奶製品。當時，懷愛倫的身材頗為肥胖，於是她開始遵循自己的看法戒吃肉類，後來她不僅成功減重，更活到了八十七歲的高齡。除了自己努力實踐之外，她也鼓勵教友遵守簡樸的飲食原則。她的教友們也跟著照做。從此，基督復臨安息日教會的信徒們就變成了黃豆的推廣者，他們同時也是美國最早開始吃豆腐的白種人。的確，黃豆的背後有著長遠的宗教歷史，它也總是被人們當做肉類的最佳替代品。西元一世紀時，茹素的佛教僧侶把黃豆帶到韓國；到了六世紀，佛教徒又把黃豆帶進日本。不過，這些宗教推廣黃豆的成效遠不及現代觀念對人們的影響。

跟其他種植黃豆的地方一樣，巴西開始推廣黃豆農業的原因，並不是因為黃豆能讓畜產動物活得比較久一些。畢竟，人們廣為種植黃豆是為了提高動物的生長速度並降低飼養成本，以便早點把牠們賣給屠宰場。巴西黃豆農業背後的這種邪惡涵義，其實源自於十九世紀的一個宗教觀念，直至今日，這個觀念仍在巴西的國旗上留下印記。

巴西的國旗上有一句口號「秩序與進步」，這句口號從一八八九年開始就已經是正式的國家旗幟。這句口號是巴西的建國者所選定的，因為它是十九世紀最成功的信念「實證主義」所用的口號。在「人性」這個偉大信仰的推波助瀾之下，「秩序與進步」這個信念不僅提供了一條通往未來的道路，也是非教派的無神論者與平等主義者為了達成心目中理想秩序所用的心靈工具。實證主義的創始者孔德（Auguste Comte）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混亂時期淬鍊出他的思想。在那段期間，孔德體會到君主政治是不好的，為了法國的未來，最好不要再有國王的存在。然而，未來不是只有共和而已。有一天，如果人們能夠聰明地做出抉擇，所有的教條都將變成利他主義，私人的財產制度將被廢止，每個人都將是平等的。這個觀念是從他的一項跨時代研究中領悟出來的，這項研究橫跨了最古老的部落文化，一直到當代文明的顛峰——十九世紀早期的法國。孔德推斷歐洲社會已經走過了「神學」階段（在神學階段中，人們認為神主導了世界上的一切）來到「哲學階段」，並且正漸漸地邁向最終的「科學」階段。然而，真實的情況並不是如此美好。私人財產讓人類無法發展出和諧的狀態，反而造成了邪惡的個人主義、貪婪與貧窮。孔德認為，革命或是急切廢除私人財產都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真正的方法應該是把管理社會的職責交給那些最明智且先進的人：銀行家。在實證哲學理念的引導

之下，銀行家將能夠把社會塑造成最崇高的型態，也就是一個充滿利他主義、平等與正義的社會。如果想要讓「進步」成為一項不可動搖的真理，那麼我們就必須依賴銀行家來提供不可或缺的秩序。這就是「秩序與進步」。

這不只是一段歷史軼事，它更清楚地描繪出今日產業「發展」的各種秩序。銀行家深深地相信他們的行為可以為每個人帶來長遠的福祉，並且同時冒著巨大的風險來管理短期的私人財產；在這樣的背景下，銀行家與他們的顧問確實為社會提供了秩序。此外，為了清楚理解「發展」這個詞彙，我們也必須釐清它背後所隱藏的目的、以及它公然干涉那些「比較沒有發展」的國家之行徑。了解「發展」的涵義之後，我們將會明白巴西政府如何藉由國家發展計畫來培育她的黃豆產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巴西依循正統的經濟軌道。他們認為，經濟是國家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項因素。實際上，這就是所謂的「進口替代產業化」，也就是發展本國產業以減少對國外進口的需求，並制訂貿易政策，讓本土產業能夠免於國際競爭的壓力。這個策略是世界上所有後殖民國家所採用的辦法，目的是為了快速地建立起跟以往歐洲與北美洲殖民國類似的產業。在這些後殖民國家中，率先實施這項策略的就是巴西。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擔任巴西總統的庫比切克（Juscelino Kubitschek de Oliveira）便強調，國家發展計畫的目的在於擺脫受歐洲人控制的農業經濟，並且超越歐洲與美國，為本國培育出更強大的發展動力。

正如它的涵義一樣，「進口替代產業化」主要是一項由政府與城市裡的金融家所主導的都市策略。在這項策略中，最具象徵性的就是當時巴西合眾國的現代化首府巴西利亞的發展計畫，這座城市只花了四十一個月就從荒涼的巴西利亞高原建造出來。

此外，這座城市也為巴西國旗上的口號塑造出具體的形象，它讓一塊「不毛之地」搖身一變成為有秩序、現代化的國家標誌。但是，巴西的鄉村地區卻呈現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象。在戰爭結束後不久，巴西的鄉村地區幾乎還停留在奴隸制度下那種未開化的狀態，工人們不是措了一身的債務，就只能依附地主為生。對巴西的大型農業經營模式來說，農業生產需要眾多的人力與廣大的土地。直到一九五〇年，巴西的農業經濟體系中仍然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沒有自己的土地。

但是在戰後時期，「進口替代產業」的政策並沒有將整個國家帶到更好的境地。庫比切克只是在實證主義的藍圖上亂畫而已。他對選民承諾「在五年之內完成五十年的發展」。但是，庫比切克沒有提升國民所得、沒有重新分配財富或建設其他永續發展的基礎，反而指示國家銀行印製更多的鈔票，導致巴西的通貨膨脹一發不可收拾。巴西所有選民中，沒有一個人感謝庫比切克造成的超級通膨（評論家稱之為「在五年之內形成五十年的通貨膨脹」）。在下次總統大選中，庫比切克徹底被擊垮，選民全都轉向奎德羅斯（Janio da Silva Quadros），但是在一九六一年時，巴西總統又很快地換成庫比切克的前任副手古拉特（João Goulart）。古拉特是

一位偏左派人士，巴西軍方與權貴卻誤信他的政治主張而協助他登上總統之位。在他當選總統時，他同時也承接了一個搖搖欲墜的經濟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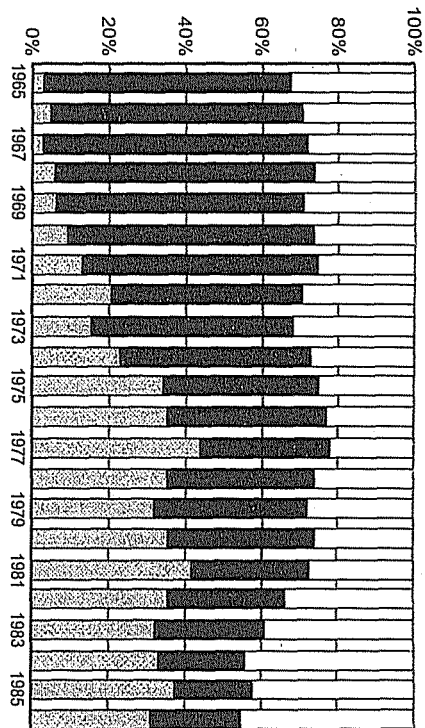
通貨膨脹，再加上食物體系向來只偏好都市而忽略農村地區，這些負面因素終於在一九六二年引爆了糧食動亂。在農村地區，通貨膨脹正無情地傷害著貧苦的窮人。通膨讓土地的租金暴漲，但是工資卻沒有提高。不僅工人遭到剝削，甚至連鄉村那些擁有自己土地的窮苦農民也陷入困境。大型的地產公司趁機搜括了那些無力償還債務的小農民，在大家都面臨破產的背景之下大舉擴張地產面積。因此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那些手中還有零星土地的農民就組織起來，形成工會、農民聯盟與教會。當時鄉村與城市地區也面臨共產主義的威脅，激進的工人與農民曾經發起了一次多達二十萬人參與的大規模罷工。雖然這場怒火並沒有延燒到全國，也沒有讓巴西政府改變農業政策的基本方向，但這場罷工行動已經讓國內的精英份子感到十分憂心。

一九六一年，巴拉納(Paraná)爆發了一場農村暴動，這場暴動主要是反對土地投機買賣以及反對地主把農民趕出家園。然而，古拉特卻把這場暴動視為拉攏民心的最佳機會。他宣布實施《鄉村勞動法案》，為工人爭取更多的工資。但是這項法案只稍微改善了勞工的現況。大部分的農村人民都認為這項法案雖然重要，卻不會產生太大的成效。城市裡的精英份子則把它視為一個不祥的預兆，他們認為未來將會出現更多、更危險的重新分配制度。事實上，這兩種

想法都是對的。但是古拉特這種積極拉攏平民的做法，最後卻讓他的總統之位愈來愈危險；一九六四年，他又宣布要徵收主要交通幹道與聯邦計畫附近的「低利用價值」土地。然而，巴西的精英份子已經準備要反擊了。一九六四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畫下，古拉特政權遭到推翻。在那些反古拉特的精英份子支持下，一個軍事獨裁政府成為巴西的新政權。這個新的軍事政府不僅沒有選民的支持，還承接了古拉特的爛攤子。但是就在這個時機，巴西國內的黃豆產業反而為新政府帶來了一些希望。

直到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巴西的黃豆產業仍然默默無聞，它們生產的黃豆油只提供給國內的食品產業，豆粉飼料主要是用來餵養家禽。儘管巴西在一八二二年就建立了黃豆產業，但到了二次大戰後仍在起步階段。以往，黃豆被視為一種低下的作物。就連烹調用油方面，人們也不屑使用黃豆油，寧可選擇椰子油、豬油，甚至一點點動物油脂都比黃豆油受歡迎。的確，巴西第一個食用黃豆的人也是因為醫生的建議才勉強吃下它，這種情況是可以諒解的，因為當時的加工技術還沒有辦法把黃豆那股令人作嘔的濃厚豆腥味去掉。後來有許多外國企業進入巴西，並把黃豆的商業價值提高，特別是阿根廷的邦吉與伯恩公司(Bunge y Born，也就是今日的農業巨人邦吉公司)，但是黃豆的市場規模仍然只限於小小的國內市場。一般認為，巴西首次的黃豆出口是在一九三八年，當時巴西西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的商人把三千蒲式耳的黃豆運送到德國。在二次大戰爆發之後，巴西的黃豆出口中斷，直到後來同盟國獲得勝

豆粉出口



黃豆油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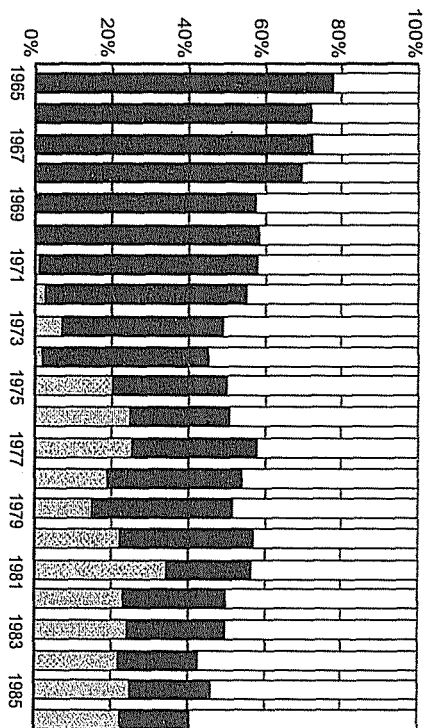


圖7.2 (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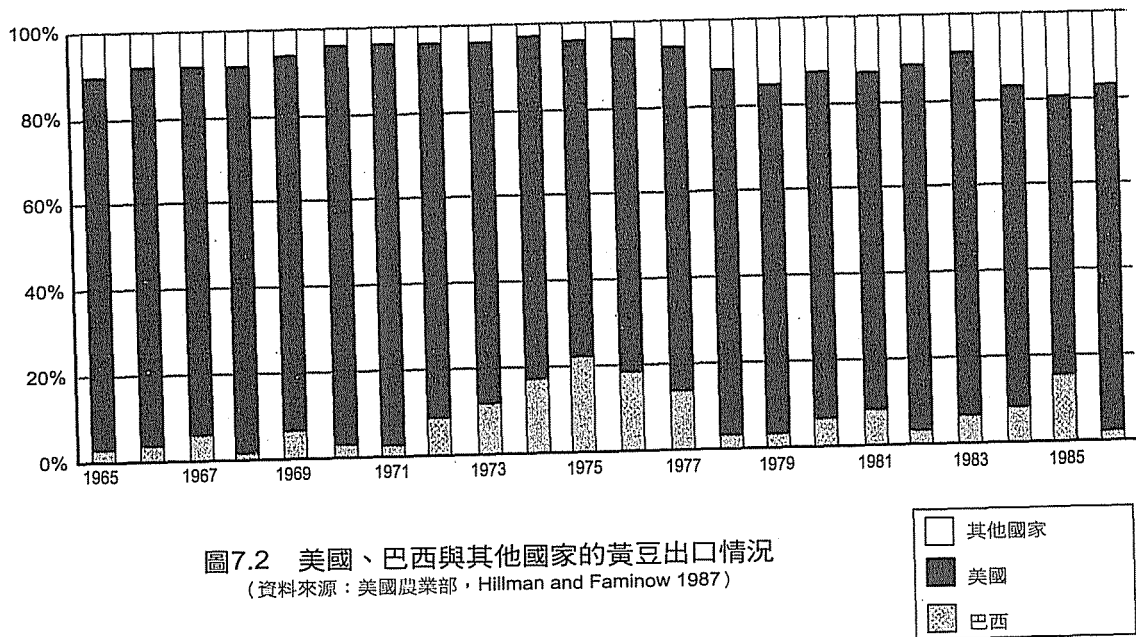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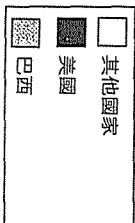


圖7.2 美國、巴西與其他國家的黃豆出口情況
(資料來源：美國農業部，Hillman and Faminow 1987)

利，黃豆出口才又恢復。正如圖 7.2 所示，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巴西的黃豆出口開始蓬勃發展，特別是豆粉與黃豆油方面。它是由天候狀況、市場力量、政治抉擇、共產主義、與魚所共同形成的一場完美風暴下的產物。

完美風暴

從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在美國「四八〇號法案」的糧食援助計畫下，黃豆油成為美國第二大出口糧食，其出口量僅次於小麥。跟食物體系中的其他產品一樣，這種轉變是出現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一九七一年美元貶值，這表示任何一種貨幣都可以買到更多美金。這也意味著在世界市場上，美國的貨物出口將比以前更具有競爭力。在此同時，蘇聯苦於國內赤字不斷攀升，因此決定要提高原油產量。世界各國都是以美金來購買原油，因此為蘇聯創造了貿易順差。一開始，蘇聯用這些錢來購買美國的小麥，後來又從美國進口黃豆。最後，美國國內的黃豆存量竟完全耗盡。

雖然黃豆有許多用途，但是可以取代它的東西也不少。例如說，有好幾種蔬菜油可以取代黃豆油，當黃豆油的價格漲得太高時，人們就可以選擇其他的蔬菜油。另外，豆粉主要是用來製造富含蛋白質的動物飼料，但是對大部分在西歐與日本的家禽養殖業來說，魚粉就是一個

良好的替代品。魚粉的原料主要來自於祕魯海域所捕捉到的鯷魚。但是到了一九七一年，由於市場對便宜魚粉的需求日益增加，使得祕魯海域的魚群遭到濫捕。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氣候狀況讓祕魯的漁業更是雪上加霜。當時祕魯海域受到「聖嬰現象」的嚴重影響，這種現象是因為熱帶太平洋表面出現持續性的溫度變化所造成的。當熱帶太平洋的水溫升高，溫暖、缺乏營養素的熱帶洋流就會取代營養豐富且水溫較低的洪堡洋流。於是，新的洋流帶來較少的養份，同時也表示它會帶來較少的魚群。

聖嬰現象不是只有對祕魯的漁業造成影響而已。太平洋沿海的水溫變化也嚴重影響到非洲中部，因為它改變了全球的天候狀況。尤其是它會帶來普遍的乾旱。在這樣的氣候影響之下，西非的花生產量嚴重下滑。它所帶來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當花生不足時，業者就會以黃豆或魚粉來取代花生作為高蛋白質食物的原料。

這真是一場全面性的災難。漁獲減少，魚粉也跟著銳減。花生欠收，高蛋白原料就不夠充足。高蛋白原料不充足，可以取代黃豆的產品也會減少。替代品減少，黃豆的價格就會升高。再加上前兩年的農作物欠收，糧食存量已經見底。美國擔心他們的黃豆會全部用光，而且找不到其他的替代品，特別是黃豆的價格已經上漲到前所未有的高價。由圖 7.3 中，我們可看到黃豆的價格變化趨勢。

為了因應這些情況，加上美國國內正為了黃豆的安全問題爭吵不休，於是尼克森總統在

少外匯，這對債台高築的巴西來說無疑是一大福音。此外，黃豆也是巴西繼咖啡之後的一大出口項目，在咖啡的出口量日漸減少的時候，黃豆便成為巴西的另一項財源。黃豆產業也能夠為鄉村地區創造許多工作機會，無形之中緩和不少動亂的氣氛。

種植黃豆，藉此恢復土壤的肥沃度，同時還可以增加都市居民的營養。黃豆出口還可以帶來不少外匯，這對於巴西來說無疑是一大福音。此外，黃豆也是巴西繼咖啡之後的一大出口項目，在咖啡的出口量日漸減少的時候，黃豆便成為巴西的另一項財源。黃豆產業也能夠為鄉村地區創造許多工作機會，無形之中緩和不少動亂的氣氛。

一九七三年六月下令禁止美國黃豆與豆粉出口。雖然在幾天之後，這項禁令就被撤消，但是故事並沒有因此結束。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各國（他們才剛剛在長期的貿易談判中同意把黃豆的主要生產權交給美國）與日本都很擔心美國無法提供足夠的蛋白質飼料。人們對市場的期望向來影響市場的存亡。當美國明顯地違背人們的期望時，市場必然會加以報復。全世界都準備好要迎接另一個新的黃豆生產者，而巴西也已經準備好要生產黃豆。

第一個為蓬勃發展的巴西黃豆市場注入資金的外國人是日本人，他們投下鉅資加強黃豆

產業的基礎建設、出口與加工設備。日本企業的介入正好跟巴西政府的國內政策互相呼應，

巴西的黃豆產業也因此打下良好的根基。巴西的軍事政府一直想辦法要壓制住農村地區的異

議。過去以暴力鎮壓農民聯盟的方式雖然稍微地抑制了農民的反抗，但是巴西政府仍然一心想

要找出更有建設性的辦法。在此同時，隨著黃豆產量的提高，各種問題也接踵而至。首先是都

市地區為了填飽眾多產業工人的肚子，對便宜食物的需求也日漸增加。這表示他們不只需要蔬

菜油，還要麵包。一開始，黃豆被當作一種相當有用的作物，因為農民可以在小麥的生產淡季

種植黃豆，藉此恢復土壤的肥沃度，同時還可以增加都市居民的營養。黃豆出口還可以帶來不

少外匯，這對於巴西來說無疑是一大福音。此外，黃豆也是巴西繼咖啡之後的一大出

口項目，在咖啡的出口量日漸減少的時候，黃豆便成為巴西的另一項財源。黃豆產業也能夠為

鄉村地區創造許多工作機會，無形之中緩和不少動亂的氣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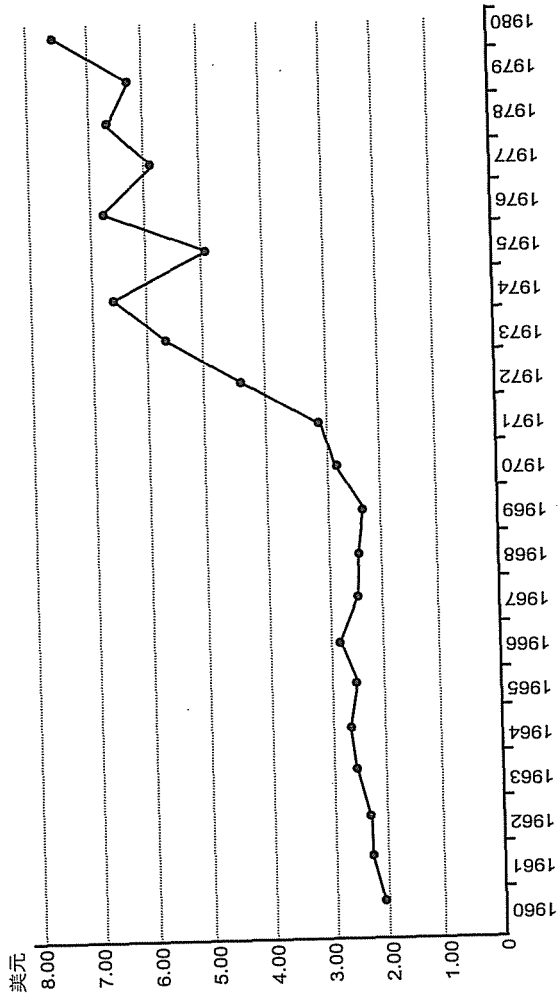


圖 7.3 黃豆的價格
(資料來源：美國農業部1960-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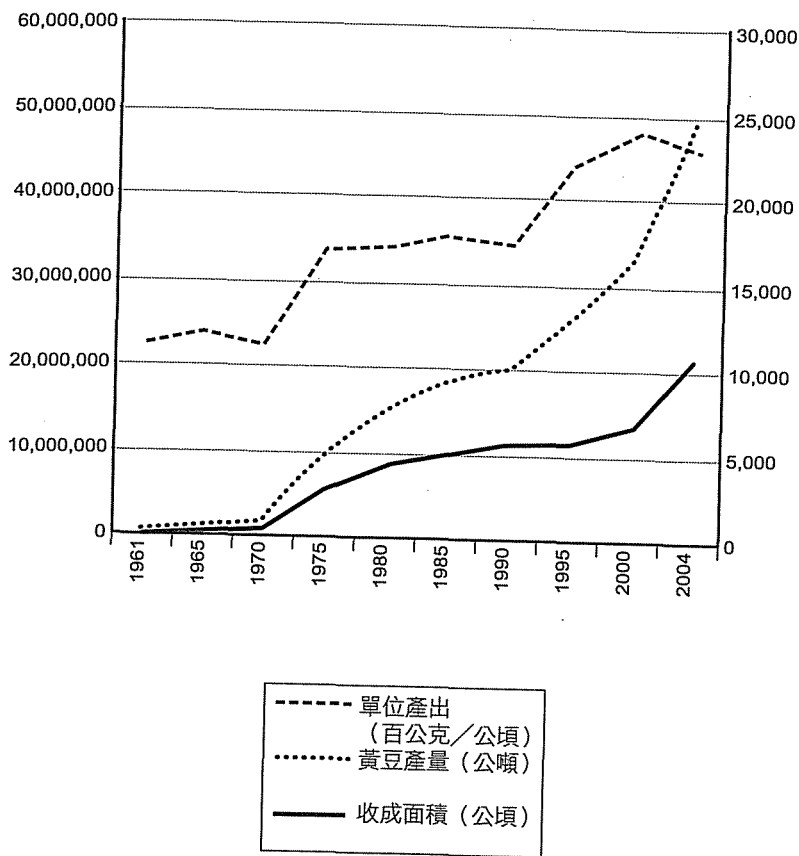


圖7.4 巴西的黃豆產量與收成面積
(資料來源：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除此之外，黃豆產業對巴西的最大影響就是土地的擴張。巴西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國家之一，雖然她的人口總數達到一億七千五百萬人，但由於國土面積廣大，因此人口的密度相當低。巴西所主張的「進步」一向跟領土的擴張有關，他們努力地為「沒有土地的人找到沒有人的土地」。把農業版圖從傳統的南大州穀倉擴大到中部平原，更是巴西國家發展的明確目標。

基於政治、經濟、社會與生物學方面的考量，巴西的軍事獨裁政權與後來的國民政府都支持黃豆產業的發展，他們提供資金來擴大農地、增加生產能力、擴充出口管道並且保障生產者價格。對於想要成立黃豆加工廠的人，巴西政府也提供負利貸款。到了一九七七年，巴西的黃豆加工產業的產能已經超過國內的黃豆供應量，不足的部分便從鄰國進口，甚至是從美國。一九七九年，巴西的黃豆加工品產量已經達到世界的百分之十八，而十五年前只占百分之二。（請見圖7.4）一九七〇年，巴西食品加工業所使用的黃豆還不到一千公噸；到了一九五五年，有將近兩千萬公噸的黃豆被送往加工廠。

從一九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因為美國有幾所大學研究出讓黃豆可以適應新土壤的方法，再加上強大的國際市場需求，因此黃豆的生長範圍逐漸往北方擴張。由於巴西政府之前提供許多貸款給黃豆產業，但是還款情形並不理想，因此一九八八年，政府就取消了對本國產業的補助。但是就在這時候，巴西幣里奧的幣值下跌，讓國外的跨國企業（主要是ADM、卡吉

爾以及邦吉公司) 得以趁機買進大量巴西本國產業之股份。這些跨國企業早就準備好要利用巴西這塊跳板來征服全球的黃豆市場。此時的巴西政府(已經轉而支持國內其他的新興農業)積極地推動農業貿易自由化方案。其中一個重要決策就是在亞松森協定(Treaty of Asunción)決議成立「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這讓巴西與阿根廷、巴拉圭以及烏拉圭達成了部分的貿易協定。在新的WTO中，巴西跟其他幾個農業出口國家結盟，組成所謂的「凱恩斯集團」(Cairns Group)，他們積極地想要打開歐盟和美國的市場，為本國產品創造更多生機。然而重要的是，巴西的自由貿易之所以能夠有所進展，完全是因為他們進行了龐大的公共投資與產業保護(請見圖7.5)。當巴西發生金融危機時，這些公共投資被跨國企業趁機以低價買進，因此，現在巴西的產業發展方向已經操縱在跨國企業的手裡。以至於現在這些公司聲稱他們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

最近，有兩個事件進一步助長了巴西黃豆產業的氣勢。第一個事件就是狂牛症的爆發。狂牛症在英國造成眾多牲口死亡，使得養殖業者不敢再用動物剩下的血和腦做成的飼料，紛紛改用蔬菜所做的飼料。黃豆正好能滿足這個需要。再者，日本企業於一九七〇年代進入巴西，使得後來中國大陸也對巴西的興趣愈來愈濃厚。由於中國的經濟正蓬勃發展，對肉品的需求日益升高，因此當她在尋找其他非美國的黃豆來源時，巴西自然成了最佳的選擇。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大的黃豆進口國，二〇〇三年進口的黃豆總額超過了四十億美金。中國打進巴西市場

的第一個動作不是發展硬體設施，而是進行金融方面的基礎建設。現在，中國已經不必透過全球最主要的交易平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而是直接在巴西購買黃豆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不過，由於巴西政府希望在二十年之後能收回對黃豆產業的投資，因此中國現在也開始對巴西的黃豆出口做出了實質的投資。而在中國率先與巴西合作的過程中，有一個人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出現；事實上，在所有與黃豆相關的新聞中我們都能看到他的名字。

黃豆的代表——布萊若·瑪奇

有一個人比其他人更能代表並影響巴西農企業的未來。這個人就是布萊若·瑪奇(Blaizo Maggi)，巴西人稱他為「黃豆之王」。他是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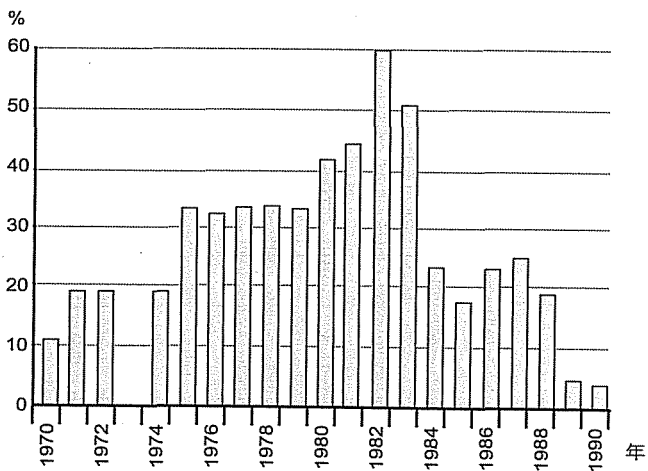


圖7.5 黃豆產業的官方運銷貸款比例
(資料來源：Warnken 1999)

界上規模最大的黃豆種植業者：據估計，他的家族所擁有的土地面積超過了三十五萬英畝，其中有一半用來種植黃豆，而且預計在二〇一〇年，黃豆的種植面積將擴大為目前的三倍。這些土地大部分都在馬托格羅索州 (Mato Grosso State)，該州也成為巴西近年來黃豆生產重心。在一九九五年到二〇〇四年之間，巴西的黃豆產量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七，在這段期間，馬托格羅索州也變成巴西黃豆產量最高的地方。瑪奇擁有許多公司，這些公司涵蓋了各個領域，從黃豆種子的銷售、灌溉、運輸業，一直到建設公司等等。

二〇〇三年，瑪奇成為馬托格羅索州的州長，他會當選不只是因為他對政治有非常大的影響力，更因為他是一個農民。雖然他所擁有的土地比其他農民還要廣大，但是他對農業的熟悉程度讓他得以清楚地表達出農民的需求，並打敗對都市心存偏好的對手。瑪奇是個和藹可親的人，他對巴西黃豆出口產業的倡導更是不遺餘力；他也曾多次對他的競爭對手發動攻勢，這個對手就是美國。瑪奇說道：「我覺得美國人完全是靠著政府來支持黃豆的價格……即使整個市場情況已經變差，他們仍然不斷地生產。產量過多會傷害到價格，但是美國人卻不會因此受害。」他對美國黃豆業者的忠告也十分明確：「停止種植黃豆，轉種其他的農作物，比如說玉米。世界對黃豆的需求就由我們來負責滿足。」

美國有些黃豆生產者就聽了瑪奇的意見，他們到巴西來購買土地並且在這裡進行黃豆的種植試驗。美國業者會這麼做是有道理的。雖然美國的農藥成本比巴西低廉，但是馬托格羅索

州的勞工與土地比美國便宜，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巴西可以生產較多的黃豆。

勞工、土地與資金對農業生產有相當重大的影響。舉例來說，由於巴西的土地價格低廉，因此他們的黃豆種植面積相當廣大。在巴西的熱帶平原上，幾乎有百分之六十的農耕用地都超過一千公頃。這些農地不是憑空出現的，它們通常都是透過開墾森林而來的。

在瑪奇擔任州長的第一年，馬托格羅索州的森林砍伐程度就比以前多了兩倍。對此，他回應道：「對我來說，多砍伐百分之四十的森林根本不算什麼，我對我們的做法一點也不會感到罪惡。我們在講的是一個人跡罕至、比歐洲還要大的荒地，所以根本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表7.1 巴西與美國的黃豆生產成本比較
(資料來源：Baumel et al. 2000)

	每英畝的成本 (美元)		每蒲式耳的成本 (美元)	
	美國愛荷華州	巴西馬托格羅索州	美國愛荷華州	巴西馬托格羅索州
種子	21.00	11.00	0.42	0.20
肥料與石灰	25.00	70.00	0.50	1.27
除草劑與殺蟲劑	30.00	36.00	0.60	0.65
勞力	14.00	5.00	0.28	0.09
機械設備	34.00	29.00	0.68	0.53
其他	15.00	16.00	0.30	0.29
非土地成本之總和	139.00	167.00	2.78	3.03
土地成本	140.00	23.00	2.80	0.42
總成本	279.00	190.00	5.58	3.45
每英畝之產量	50	55		

在我們對瑪奇的砍伐策略感到義憤填膺之前，讓我們先思考一下巴西黃豆產業所提出的三項論點。首先，許多人看到這一段描述時，心裡面都會出現亞馬遜雨林被砍伐之後所殘存的殘破景象。但事實上，馬托格羅索州的大部分土地都不是珍貴的原始雨林，而是林木密度較低且缺乏綠意的一大片平原，名為「塞拉都」（Cerrado）。第二，種植黃豆的農民並不是最早進入塞拉都的人。很久以前，木材業者就已經在這塊處女地留下開採的痕跡，後來，這個地區又變成養殖牛羊的牧場而不是農田。當這塊土地的樹林被木材業者砍伐殆盡、草地也被牲口吃光之後，大多數種植黃豆的農民才進入這片區域。第三，我們應該記住北美洲與歐洲的森林早就被人們砍伐殆盡。如今只剩下幾個小小的國家公園與野生保護區。站在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北方國家實在沒有什麼資格以崇高的道德立場來批評別人。

然而，這三個論點確實引起了反駁。首先，討論有關森林砍伐的問題時，我們不應該認為只有林木受到破壞而已。塞拉都平原或許不像雨林那樣壯觀美麗，也許她看起來只是一片乾燥、沒什麼價值的荒地，但是她保有了重要的生態體系，如今，這塊土地已經轉變為單一種植的黃豆農地。除此之外，她也是世界上面積最廣大的地下水含水層，但今日的黃豆產業卻大量抽取地下水來灌溉，造成地下水資源的枯竭。當然，塞拉都平原的面積還與亞馬遜平原接壤，最近的研究報告也指出，巴西砍伐森林的範圍已經超過了塞拉都平原並且持續往亞馬遜地區前進。

第二，雖然種植黃豆的農民不是直接破壞森林植被的人，但他們也不是被動地接下牧場遺留下來的土地，是他們主動把畜牧業推向新的森林地區。當畜牧業者到達新的地方之後，黃豆農場不只是迅速地跟進，他們同時也帶來運輸系統，讓人們更容易往處女地邁進。此外，愈來愈多的黃豆農民發現，與其等待畜牧業或木材業來開墾土地，自己開墾土地將會帶來更多利益。

最後，儘管以環境政策而言，北方國家的確沒有立場可以批評別人，但是我們並不應該就此而鼓勵砍伐森林，相反的，我們應該要呼籲全世界去共同地改變環境政策，並同時要求北方國家負起森林恢復的重擔。此外，雖然黃豆產業往亞馬遜平原擴張的趨勢看起來似乎是一種國家發展政策，但是很明顯的，巴西的整體國家利益並沒有因為黃豆產業的蓬勃發展而大幅提升。這也是我們要打破黃豆傳奇的重要原因。普遍看來，「秩序與進步」的國家迷思確實有其成效。雖然「巴西已經變成一個農業出口大國」這個口號的確屬實，但是伴隨著這個名聲而來的涵義，也就是「大多數巴西人都因這個全球新興地位而受惠」這句話，則是不正確的。例如馬新納古原住民（Mehinaku）就備受黃豆產業的威脅，他們的發言人指出了黃豆產業只為少數人帶來好處：

州長在我們所住的馬托格羅索州種植黃豆。他想要把我們保護區的一半奪走，只用來種

植黃豆。我現在開始了解白人在想什麼了。我看到的是，我們印第安人尊重白人，但是白人卻不尊重我們。如果你來到我的土地上，你將會看到一整片的森林。它完好無缺。現在，我們必須設置警告標誌來保護森林與河流。人們乘著船順流而下，把垃圾丟到河裡而且把魚抓走。但是我沒有拿走任何屬於白人的東西。印第安保護基金會負責保護我們的土地。很久以前，這片土地是我們的。現在，什麼都完了。所有的樹木都不見了。看不到充滿蜂蜜的蜜蜂巢，也看不到老鷹。沒有猴、也沒有猴子，牠們不是死掉就是消失。現在這裡根本沒有任何動物。普雷圖河 (Peto River) 完全被破壞。河裡的魚不見了，河水也完全被污染。農牧業者破壞了一切，讓這片土地變得光禿醜陋。我們從來不知道會有這麼多經營農牧的人來到我們的土地上。以前，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世界上有牽引機，也不知道有鏈鋸可以砍伐樹木，更不知道什麼是畜牧場。後來我們看到都市裡的人來到我們的土地，他們帶來了疾病，他們污染了河流、消滅了鳥類和動物。五年以前，這裡根本杳無人煙。但是現在，有愈來愈多的人來到這裡。他們開闢了一個又一個的牧場。我們對牛沒有興趣，因為我們不吃牛肉。因此對我們來說，這些牧場根本沒有用處，我們也不需要它們的存在。

這些話可以說是一語中的，不過，這群原住民可不是黃豆產業的唯一受害者。的確，隨著農業的蓬勃發展，不平等的現象也會不斷出現，生活在鄉村地區的有色人種更是一直過著貧

困的日子。那些擁有大片土地的幸運兒，或是那些擁有良好政治關係的人，都可以藉著國家發產獲得不少好處。但是，那些在農田裡辛苦工作的鄉下人卻無法分享繁榮。跟甘蔗產業或是大型畜牧業相比（這兩種都是對環境有害的產業），黃豆產業所雇用的工人並不算多。而且縱使農村人口能夠找到生產黃豆的工作，他們的工資也很低。一九九〇年代，在田裡工作的季節性工人與管理者之間就可出現愈來愈多不平等的現象。

這種不平等現象會與日俱增，一部分是因為在工作機會不多的情況下，農村人口也沒有太多的選擇。但是工資之所以會一直維持在極低的狀態，除了工作機會少之外，也是因為當地長期存在著一個問題，直到最近，這個問題才逐漸受到重視，那就是：奴隸制度。正如圖 7.6 所示，巴西政府每年檢視農場的次數並沒有明顯地增加，但是工人被發現受到奴役的情況卻迅速成長。巴西勞工部部長坎波斯 (Marcelo Campos) 領導了反奴役活動，他表示：「合法的奴隸是主人的財產，正因為他們是資產的一部分，所以必須受到監控。他們有食物可吃、有地方可睡，是因為主人需要確保他們還活得好好的。今日，對地主來說，奴隸已經不重要了。地主只是把奴隸當成暫時利用的工具，就像用完即丟的刮鬍刀一樣。」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的估計，巴西的奴隸勞工大約有兩萬五千人到四萬人左右，雖然有些報告認為奴工人數應該有五萬。實際的奴工人數很難估算，因為負責調查奴隸情況的人員通常都會受到暴力的威脅。舉例來說，在二〇〇四年，三名

來自遠方的看法

在人們的想法中，瑪奇若不是勇氣十足的產業發展新秀，就是像漫畫中的壞人一樣，或者是兩者兼具。對新自由制度主義者來說，瑪奇代表了巴西的未來。對環境保護人士而言，他

勞工部人員和他們的司機在美納斯州（Minas Gerais）進行農業調查時就遭人殺害。農場主人為這件謀殺案被罰了一萬七千美元，而有關他使用奴工的罪名則被判了七十萬美金的罰款。巴西政府曾經提出一項法律，規定如果地主被發現奴役工人，政府就可以沒收他的土地。但是這項法律提案遭到農村地主等相關利益人士的強烈反對。雖然跟甘蔗與生質燃料產業比較起來，黃豆產業使用奴工的情況已經算是輕微，但是這種風氣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包括加快森林砍伐的速度、工資低落，甚至造成政府的腐敗。儘管瑪奇宣稱他的公司「完全守法」，但是國際勞工組織卻發現去年瑪奇從兩個使用奴工的農場買入黃豆。瑪奇聲稱他當時並不知道這兩個農場使用奴工。因為如此，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的發言人（稍後我們將進一步介紹這個組織）便聲明：「我們要讓世人知道，巴西大量出口的黃豆都是由受到脅迫、沒有工資的工人所種植出來的。我希望購買巴西黃豆的國家都知道這個事實。」然而，不但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黃豆產業盛行奴隸制度，大部分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吃的是黃豆產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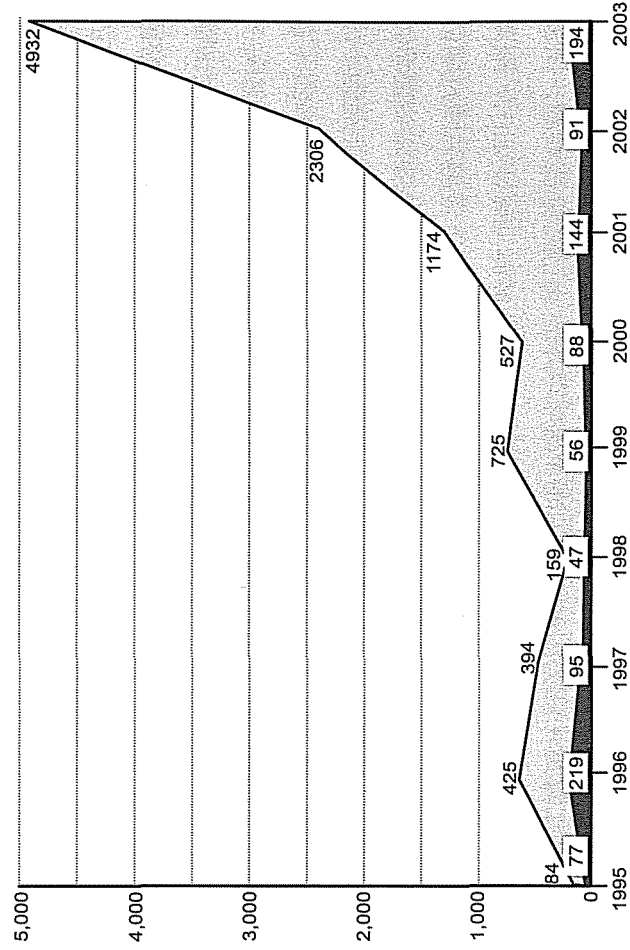


圖7.6 巴西進行農場檢視的次數以及被解放的奴工人數
（資料來源：國際勞工組織 2005）

代表農企業中最壞的那一面。對美國的黃豆農民來說，瑪奇是這場不公平競爭中的新面孔。瑪奇在國際上的評價充滿著爭議，不論你對他的看法如何，都有很多人會提供新的訊息來改變你的想法。舉例來說，有關奴隸制度的消息就在美國與巴西農民之間引發了不同的懷疑態度。在這場觀感與形象的戰爭中，我們甚至很難找到一個清楚的切入點。美國有一位種植黃豆的農民名叫佩納（Enlie Peine），她是美國家庭農場聯盟的一員，同時也是研究生與音樂家。佩納在美國田納西州長大，但是現在她和夥伴在紐約上州耕種四百英畝的農田，他們在這裡種植有機黃豆、燕麥、小麥、豌豆、甘藍菜，養了幾隻雞。她拜訪過巴西的黃豆農場，因為「身為世界上最大的黃豆生產國，美國農民很擔心自己會失去競爭力」。她繼續說道：

在美國農民眼中，巴西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也是一個找不到規則的地方。我們把巴西的農場想像成加工廠一樣。當然，有很多農民一點也不在乎森林砍伐的問題。在馬托格羅索州最偏遠的一個小鎮，我開著一台牽引機穿越整片農田，那時候是當地種植黃豆的第一年，有位農民站在四周都是森林的農田裡向我揮手，他的眼裡散發著企業家的光芒，他說道：「五年之內，這裡就有黃豆了。」

所以，黃豆產業的戰火是不是真的已經跨越了國界？巴西的黃豆農民是不是一點也不在

乎環境呢？並不盡然。她繼續說：

我也參加了幾個巴西農民的會議，在會議中，我聽到巴西的農民討論著美國農民拿到很多補助，好像我們住在充滿牛奶與蜂蜜的富饒之地一樣。聽到這裡，我站起來說我們也跟他們一樣面臨到許多的壓力、想著如何降低成本。當他們發現到我是美國人時，有很多巴西農民要我回美國之後，不要大肆宣傳他們砍伐亞馬遜雨林的事情，因為他們並沒有濫墾濫伐。我當時認識的許多黃豆農民都只是經營普通的家庭式農業，而且他們也跟我們一樣關心自己的土地，也知道要為自己的子孫留下一些什麼。

這兩個在巴拿馬運河南北兩岸的國家對彼此的誤解似乎有跡可循。美國農民發現，要相信所有巴西人都會奴役工人、導致腐敗的社會與生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巴西的農民則相信美國農民都是靠納稅人的錢在過活。不管在美國還是巴西，人們普遍都抱持著這種錯誤的看法。我們看到美國人在環境運動的幻想中把瑪奇塑造成什麼樣的角色；在美國中西部與北美大平原的許多農業期刊中，也有無數的文章都預言巴西破壞環境的行為將導致地球的毀滅。巴西人的看法也同樣受到煽動，他們認為有些美國農民因為政府的補助而變得很有錢。

跟巴西一樣，美國的選舉政治體系同樣也是企業競逐各項利益的權衡戰場。正如瑪奇

既是巴西的州長又是黃豆出口商一樣，為了自身的利益，企業也會有許多政治說客，因此一般說來，美國農業部長通常都具有農企業的背景。在二〇〇一年到二〇〇五年之間擔任美國農業部長的維尼曼（Ann Veneman）曾經是都樂食品（Dole Foods）的律師，也是卡爾基公司（Calgene）的董事會成員，因此在眾多有資格的基改企業中，卡爾基公司是第一家獲准進行基改作物田野試驗的公司。洛克西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的總裁能夠當上美國國防部長也是基於類似的理由。

農企業的主要需求就是自由貿易與減稅。美國與巴西的農企業遊說團之所以會彼此角力，主要是因為美國選舉政治體系內的非民主結構。以農業為主的州通常人口都比較少，但是在選舉團中，它們所擁有的參議員人數與選票數都跟人口眾多的州一樣。從巴西的角度來看，很輕易就可以看出美國在二〇〇二年通過總經費高達一千八百億的《農場法案》（Farm Bill）為何會成為眾人嘲笑的對象了。

然而，在農場法案之下卻藏著許多的不公平。在稍早以前的農場法案，也就是一九九六年通過的《聯邦農業革新法案》（Federal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and Reform Act）規定下，富有的農民與企業可以獲得比大多數農民更多的補助。從一九九六年到二〇〇〇年之間，國際紙業（International Paper）、維實偉克公司（Westvaco Corp.）、雪佛龍公司（Chevron）與杜邦公司總共獲得了超過一百萬美金的政府補助款，但是在政府補助的所有對象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

的補助金額還不到六千美元，他們的平均年度支出只有一千兩百美元。新的農場補助系統一樣偏重有錢人，而且企業的遊說團還成功地說服政府取消二十五萬美元的年度支出限制，他們的理由是，如果政府的經費必須刪減，應該可以從環境保護與窮人福利等其他政府補助案中找到更多適合刪減預算的對象。

佩納說：「這就是我來巴西的主要原因。」她繼續說：

不只是因為美國與巴西的農民應該增進對彼此的了解，也是因為這些農民必須了解他們為什麼會互相競爭。最讓我能夠理解其中緣由的例子就是卡吉爾公司，它不只是最大的美國黃豆出口商，同時也是最大的巴西黃豆出口商。這樣一來，怎麼會有貿易法規的衝突呢？農民必須了解，在每個國家中，每個獨立的商品生產者都是受到同樣幾家公司的剝削，這些公司包括大貿易商、大型加工業者以及大型零售商，問題的根源就在於全球農業經濟的集團結構，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國家對農民的補助，也不是另一個國家的環境政策所造成的。

在巴西的黃豆產業路線上，也可以明顯看到全球農業經濟的集團結構，而且它似乎沒有在不同的企業之間引發太多的爭端。不但如此，企業之間有很多的貨物往來。一輛輛載滿貨物的卡車轟隆隆地穿梭在馬托格羅索州的黃豆農田間，馬路上的柏油都被這些貨車壓出一條條

深深的車輪痕跡，這些車輛轟隆隆的聲響和難聞的汽油味正宣示著巴西的未來。較大的黃豆城市例如隆多諾波利斯（Rondonópolis），四周都環繞著種植黃豆的農田，它看起來雖然像是農業大城，但是卻很難找到新鮮的水果和蔬菜。對黃豆運輸路線上那些比較小的城鎮來說，要吃到新鮮的水果和蔬菜就更加困難了。在黃豆的運輸路線上，道路兩旁一片荒涼，偶爾才會出現幾家餐廳或旅館讓幸運的卡車司機吃點東西、休息一下，或是讓這些無法回家的送貨司機可以停留一晚。鐵路建設老舊得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正等著中國大陸出錢來投資。因此，目前黃豆只能靠公路來運輸。載滿黃豆的卡車被衛星監控著，所以把黃豆載送到港口碼頭的路途中，卡車司機不能在路旁的旅館多加逗留。這就是黃豆產業所促成的農村發展景象。在黃豆運輸道路的盡頭，情況看起來就比較好一點。

巴拉那瓜（Paraná）是巴西主要幾個黃豆出口港之一。這個城鎮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風貌。在這個半島的其中一邊是巴亞巴拉那瓜（Baía de Paranaguá），一個美麗且慵懶地延伸到海裡的地方，周圍有山丘環繞，海邊還有許多漁業活動。另外一邊則是大規模產業化的農業出口港，四周都是各項現代化的搬運設備，在這些運輸設備的背後則藏有許多脫衣舞酒吧，讓暫時停留在這裡的水手和卡車司機縱情享樂一下。隨著性工作產業的增加，女性遭受暴力、人口販賣以及健康方面的問題也愈來愈多，這些問題幾乎成了天然資源產業無法避免的黑暗面，尤其是一個雇用許多男性勞工跨越貧困地區的產業。在黃豆產業的影響下，一個寧靜的小

鎮彷彿轉變成喧鬧複雜的賭場酒店。同樣的景象也出現在巴拉那瓜，在距離幾家重要的美國農業出口商四個街區以外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星條旗隨風飄揚，這些出口商包括了卡吉爾、邦吉與ADM公司。毫無疑問的，這些公司都是黃豆發展熱潮下的大贏家。在眾多企業之中，卡吉爾、ADM歐邦吉公司資助了巴西百分之六十的黃豆相關生產，而且歐洲有四分之三的食品加工廠都屬於這些公司所有，這些加工廠所使用的黃豆全部來自於巴西。卡吉爾比競爭對手搶先一步，在雨林區建造了一座非法的運輸站，讓黃豆出口變得更容易。然而它的對手們也不遑多讓。雖然這幾家公司互相競爭，但是有時候它們也會放棄成見、共同攜手合作。

在正常的情况下，貨輪每隔四十八天就會到巴拉那瓜港停泊。但是在二〇〇五年中期，整個港口都空蕩蕩的、看不到一艘貨船。這是因為在幾個月以前，巴拉那州決定支持禁止種植與運輸基改黃豆的法規。出口商為了反抗州政府，便把整個黃豆出口業務轉到沒有實施禁令的桑托斯港（位於聖保羅附近）。以往總是彼此競爭的大型農業出口商，這一次竟然聯手轉移出口業務，目的就是為了逼迫巴拉那州政府撤消禁令。這種情況有點不尋常。當農企業要在巴西組成聯盟，通常都會尋找跨領域的公司來合作。舉例來說，黃豆貿易公司卡吉爾就會跟生產黃豆種子的孟山都公司合作，以確保他們能掌控整個生產與出口的流程，就像康艾格公司和諾華公司會選擇跟ADM公司合作一樣。這一次的出口商聯合行動，顯示出州政府對基改作物的禁令確實對他們的業務造成了威脅。而且由此看來，企業集體「罷市」不僅比工人進行罷工還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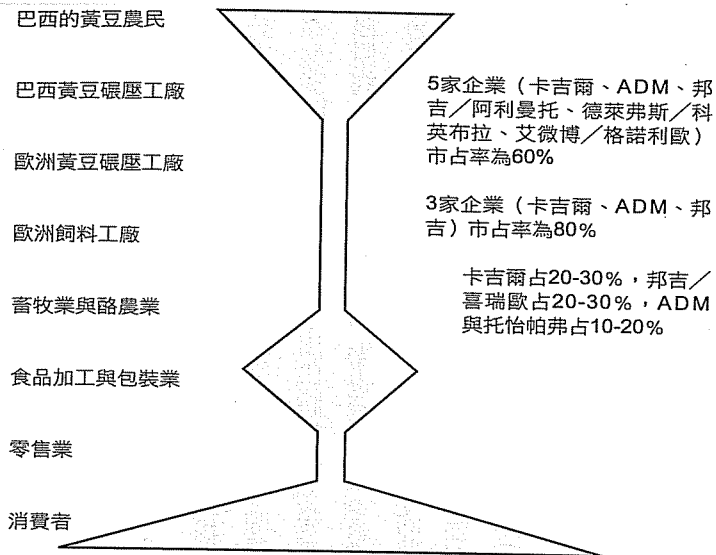


圖7.7 黃豆產業從巴西到歐洲的「瓶頸」
(資料來源：Vorley 2003)

這正是佩納指出的問題。她曾經表示：

這是巴西與美國農民都必須了解的一件事情。它跟你在食物體系中具有什麼競爭力沒什麼關聯，農業遊說團從來不會批評或提起競爭力有關的部分，比如說「信用」。這是因為農業遊說團背後的操控者就是農企業。這個聯結其實不難發現，只要看看美國黃豆協會的贊助者就可以知道。一般的農民無法打進這個圈子，但他們不應該被排擠在外。

嚴格說來，這些企業的聯合抵制行為並不違法。它甚至讓農企業感受到自己可以藉此來對政府施壓。如果這些行為就足以讓企業影響政府，那麼我們也不會訝異企業能直接控制農民、塑造經濟趨勢，必要時付錢收買農民，並且在農民無法被收買時直接施壓。只要觀察巴西黃豆產業的結構，就可以明顯看出其中的壓力來源。

美國黃豆協會與政府（二〇〇四年，協會獲得的二千七百萬美元預算大部分來自聯邦政府）以及農企業都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雖然美國黃豆協會在代表黃豆農民利益的組織中絕對

是資金最充裕的，但是它並非唯一的農民代表組織。有些農民也自行成立有別於美國黃豆協會的組織。跟黃豆協會比起來，美國黃豆生產者組織就是一個很小的團隊，他們關切的是，在一連串的政策背後，美國黃豆協會似乎「比較在意少數幾家大企業能賺到多少利潤，而不擔心他們對美國農耕家庭會造成什麼負面的影響」。佩納也體認到這一點，她說：

農企業與農民之間的關聯被隱藏在政治角力之下。跨國公司對農民的生計有什麼樣的影響呢？這個問題並沒有很多人提出來討論。大家都在討論有關種子的問題，這倒還好，但是他們完全不

關心為什麼要使用這些化學種子。他們討論要如何加強競爭力，但是卻一點也不追究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市場之戰。

國家發展的險境

這個市場之爭不只是把貧窮的農民排除在外，它也遺棄了那些原本生活在這個自然環境中、沒有農田、只能靠自己的勞力生存的原住民。這些原住民的人數遠比種植黃豆的農民還要多，當政府告訴他們農業出口將為他們帶來更多好處的同時，巴西的黃豆產業卻也嚴重傷害到他們的生活。這種情境一點也不矛盾。整體而言，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農產出口企業因為黃豆的交易而獲得不少利益。他們風光的榮景也掩蓋了其他人所遭受的損失。舉例來說，根據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的資料顯示，在一九九〇年代，巴西的糧食消耗量出現明顯的波動；此外，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六年這段過渡時期中，巴西貧窮人口所消耗的每一項主食數量都不斷下跌，而且在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一年到二〇〇一年這兩個時期中，稻米、玉米與樹薯等主食作物的供應量也持續地下滑。比起因黃豆產業而大發利市的現象，巴西在食物供應方面的巨大波動其實對人民造成了更大的負面效應，然而，黃豆產業的蓬勃發展卻讓人誤以為它將整個巴西帶到了更繁榮的境地。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忽略了巴西的不平等現象，也因此，許多的爭議便接踵而來。舉例來說，國際間有愈來愈多人關切亞馬遜雨林的砍伐問題，這些關切的聲浪也使得大型黃豆業者做出了一些調整。其中，有些企業開始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動「永續黃豆」。他們試圖引進「最好的耕種方法」，鼓勵巴西政府停止對塞拉都與亞馬遜接壤地區的濫墾行為，並且重視與黃豆有關的環境問題。這種創新的想法一方面鼓勵巴西政府專門生產更高價值的黃豆相關產品，一方面遊說政府減少這些產品的關稅。他們的目標是讓巴西從一個只種植黃豆的角色，轉變為各種黃豆相關產品的生產者。雖然這些目標因為提倡環境保育而值得讚賞，但是從它們身上看不出任何積極發展的企圖心。這或許只是農企業為了提高人民接受度所喊出的口號而已。舉例來說，在這個「永續黃豆」的推廣運動中，最關鍵的權衡人物就是阿根廷森林生態基金會（Foundation for the life of the Forest）與阿根廷農企業協會（Argentinean Agribusiness Association）的主席，他同時也是杜邦旗下的先鋒海外公司（Pioneer Overseas Corporation）的副總裁。除了種種的限制之外，還有許多問題讓提倡「永續黃豆」的人士不敢大力推廣這項觀念，特別是考慮到跟土地使用有關的各種社會議題，以及在提倡保護生態的永續生產方法時，其造成的疑慮很可能會讓農民不再大量使用基因改造種子。我們應該知道，當永續發展的觀念被提出時，必然會出現這種邏輯上的矛盾。如果非政府組織倡導「永續黃豆」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雨林，那麼這樣的干涉還可以理解。但如果他們關注的是造成生態災難的所有社會

問題，那麼其補救辦法就必須更深入才行。

保守主義不只是「永續黃豆」這項運動背後的一種思想疑慮，它的影響層面更超越了其主要參與者的權力所及。不可否認的，想要讓產業型的農民轉變為注重生態的耕種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推廣生態農業的主要目的，是要農民全面放棄單一種植以達到更精緻、健全的農業系統，那麼轉型所面臨的困難還比較容易解釋。然而，生態農業的推廣卻連在一些看似較容易推行的地方都舉步維艱。舉例來說，在大型的化學農業區之外，還有一些比較次要的農耕地區，即使這些次要地區的耕種成本更便宜且更有效率，也很難將它們變成生態農業。佩納又說道：

在我們的農田上，我們已經種了四年的黃豆。我們是附近地區唯一使用有機耕種法的人。看到我們的做法，鄰居們的反應相當有趣。他們覺得我們一定是瘋了，因為我們不使用除草劑，而是把紅苜蓿跟燕麥種在一起，好讓紅苜蓿長在燕麥之下，當燕麥收割之後，紅苜蓿就會長滿整個農田。這種方法不僅便宜，還能讓土壤更肥沃，而且我們還能把這些經過有機認證的紅苜蓿種子賣給別人，一磅能賣兩塊美金，每英畝能賣到兩百七十美元呢！我們把這個好消息告訴附近的農家，但是他們不太感興趣。真是的，就連索爾（佩納的農耕夥伴）也說他剛開始耕種的時候，他根本沒想過有機農業。索爾在康乃爾大學被訓練成一個「笨蛋」。現在，他

也把這個綽號套用在那些使用除草劑、殺蟲劑與化學肥料的農民身上。但是其實他們一點也不笨。他們知道自己正處在科技的最前線。這就是他們所學到的。這就是所謂的現代化農耕方式。

佩納的這番談話點出了「永續黃豆」運動沒有提及的第二個層面，也就是農業社群裡的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能夠讓農業經營保持在某一條軌道上，也有能力將它轉換到另一條軌道。畢竟，農耕本身就是一項不自然的人為活動。在複雜的社會與環境網絡中，不同的社會關係會互相干涉與取代，形成混亂的農業社群。正如美國的情況一樣，巴西在黃豆市場的優勢也不是市場力量所促成的神奇結果，而是政府與私人企業共同進行廣泛的研究與大量投資的結果。從改變資金與能源的投入方向來看，這個過程必須付出某些機會成本。舉例來說，在一九八〇年代，拉丁美洲有百分之九十的研究資金都直接被用在糧食作物的研究上。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有百分之八十的資金被拿來研究出口作物。當巴西的黃豆農業興起時，政府也不得不設法壓制農村地區的反對聲浪。當初巴西政府之所以支持黃豆發展計畫，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抑止農村地區的反抗，有時候政府會直接以暴力來鎮壓農民（就算強取豪奪、雇用職業殺手也不會受法律制裁，而且這種事件不斷地發生），有時候也會以驅逐與奪取的方式來達到壓制的目的。

世界上最重要的社會運動

巴西的土地持有結構一直都非常地不平等。在一九七〇年時，巴西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農田面積小於一百公頃，同時，只有百分之零點七的農田面積大於一千公頃，這些大面積的農田約占巴西國土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土地自由化讓這種情況更加明顯。到了一九九六年，巴西已經有百分之一的農田面積大於一千公頃，但是它們的面積卻占可耕農地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在黃豆產業中，由於種植黃豆需要大片的土地，因此這種神奇的豆子就把貧困的小農民趕走，領他們的土地。二〇〇二年時，巴西共有五百萬個家庭沒有自己的土地，其中有十五萬個家庭只能在馬路邊搭棚睡覺。當巴西開始發展黃豆產業之後，這個經濟發展的結果更加深了國內的不平等現象。在巴西，土地取得會如此困難，都是因為社會關係、人們的選擇與歷史的沿革所累積而成的結果。很少有力量能夠改變這種現象，但是，巴西有一個組織已經撼動了這種不平等的現狀。

喬姆斯基博士 (Noam Chomsky) 稱它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社會運動。自從它於一九七〇年代首次出現在巴西西南部以來，它已經成功安置了一百萬以上的人口。除此之外，它還發展農業、維持民生計、建立健康醫療制度、成立教會，最重要的是發展教育。雖然這個組織所採用的策略仍然無法讓該組織免於遭受政府、地主、職業殺手以及媒體的暴力壓制與斥責，但是經過時間的證明，它的土地策略確實比政府的土地政策更有效。這個組織就是「無地農民運動」，它誕生自天主教會的激進派、貿易聯盟以及一九六〇年代農民聯盟的殘餘勢力，它不致力開創新的農業，更創造出新的人民。

看了上述的介紹，可能會有人認為該組織的成員都是狂熱的激進主義者。事實上，巴西的主流媒體確實把它塑造成極端激進的組織，媒體為他們冠上的罪名包括對人民洗腦、挑起暴動，甚至說他們鼓吹史達林主義。為了找出真相，我親自來到巴西這個黃豆國家中部一個名叫「八月十四」(14 de Agosto) 的地方，這個地名所採用的日期，就是「無地農民運動」首次在馬托格羅索州建立城鎮的日子。該小鎮的面積約有兩千公頃，其中大部分都是貧瘠的牧地，有七十個家庭在這裡落腳，它距離繁榮的黃豆城市坎普韋德 (Campo Verde) 大約幾公里遠。在這個地方，大部分的建築物都是在十年之內建造的，甚至連教堂的禮拜型式都融合了天主教聖公會高教派與現代的搖滾風格。整個小鎮表面看似平庸，實際上卻有著深度的美感。

在「八月十四」這個地方，每個家庭的兩房小屋都是緊靠著周圍鄰居而建，其緊密的程度就連鄰居吵架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在小鎮最繁華的街道上，有一家小小的酒吧、幾個大穀倉，還有一個供孩童玩樂的運動場、一個很大的貯水池以及一個釀酒廠，當地著名的烈酒「卡恰沙」(caçula) 就是在這裡釀造的。在酒吧裡，人們打著撞球，地方電台也透過簡陋的

廣播設備播送著音樂，每個人都穿著普通的圓領短袖衫與寬鬆的長褲。這些人看起來與眾不同，他們的內在也是如此。

的確，在這個小鎮上，許多居民都經歷過多次的農村抗爭。在爭取到這塊土地之前，他們曾經是在這裡紮營的一群開拓者。在土地的占領過程中，這是最重要的一段時期。紮營的過程相當艱辛。人們只靠著少量的水和糧食過活，有時候甚至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吃。他們不僅住得很簡陋，就連醫療與教育設施也相當有限。這些設施也都是開拓者自己建立的。雖然說初期的居所只是暫時的，日後便能漸漸發展成更好的生活環境，但是這些家庭卻在這個「營地」待了好幾年，只為了等待土地的開拓。然而，這幾年卻成為「無地農民運動」的重要政治教育時期。身為激進份子與學者的惠特曼（Hannah Witman），描述當時他們如何透過該組織的基本組成單位（大約由二、三十個家庭所組成）進行紮營抗爭：

每個單位都有兩名同志（一個男人跟一個女人），一個負責生產的部分，另一個負責環境、健康、安全、政治型態以及教育。這樣的組織型態是為了確保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任務，讓所有人都必須為全體社群的福祉而努力，同時也是為了激起每個人的自我教育與責任感。

在這個過程背後具有一項政治邏輯，「無地農民運動」則直接清楚地將它表達出來：

「沒有人能夠代表其他人，每個男人與女人都只能代表他或她自己。我們要克服代表制度以及權力委任所產生的問題。只有透過親身參與，每個人才能代表他們自己。這樣的結果也讓我們能夠驕傲地培育出一群新的人民。」

「無地農民運動」的營地就像學校一樣。在充滿貧窮與災難的困境中，這個組織開始進行一項政治教育的意識型態計畫。他們教導民眾有關公民與社會的各項約定，讓未來的開拓者也能夠在這樣的規則下彼此共同生活，同時能夠依循這些規則與其他人民、甚至與政府和和平共處。整個過程就像是一個訓練營一樣，但是它的影響更為深遠。兩者的不同點在於，在訓練營中，你通常不會去思考糧食從哪裡來，也不必擔心房子的水管系統；但是在「無地農民運動」的營地中，物質環境以及人際關係都非常重要。在每個營地裡，尋找水源與種植糧食都是政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正因為「無地農民運動」的政治教育著重在自然與社會系統的整合，因此他們的行動才能稱為真正的生態運動。這個運動讓每個成員都能為自己著想，並以民主的方式來討論，同時也能擁有犯錯的空間。畢竟，沒有什麼比專家主導的發展計畫更讓人厭惡了，在專家導向的計畫中會出現一種小小的讓步，也就是所謂的「公共參與」。在「公共參與」的旗幟下，「全體民眾」聚集在一個地方、聽聽專家的說法，然後人民就被迫認可了那些專家為他們擬訂的計畫。

這些心理重建行為以及對政府「說實話」的做法，或許聽起來就像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

期的「農村再教育」，但事實上他們完全不一樣。在「無地農民運動」中，每個人都是自願參與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加入或離開。在「八月十四」這個地方，有少數的人選擇了離開，也有很多農民在獲得了自己的土地之後，就不願再加入全體耕種的行列，但是大家都尊重他們的選擇，沒有任何人仇視或指責他們。

非但如此，追隨「八月十四」地區的其他營地與開拓區，更促成了許多重要的社會變革。看看下面的說法：

我們通常都有性別歧視的傾向；至少我一直都是一個性別歧視者。我從來不信任女性所做的判斷。我總是認為自己懂得東西比女人懂得還要多，我比我太太還要厲害。但是在營地中，常常都是女性解救了我，她們讓我們免於失敗。她們真是堅強啊！現在我們都是為了自己而耕種，我已經學會要相信我太太在農業經營方面的意見。我想，我仍然帶有一些性別歧視，但是我已經學到了一些事情。

接著你可以想想，你什麼時候曾經從歐洲或北美洲的任何男性口中聽到這一類的告白。這種不同以往的教育方式，不僅改變了我們，同時也改變了我們對自己的看法，這就是「無地農民運動」的目標之一。雖然男性的自我觀念中存在著一些對女性根深柢固的看法。但是在這

種教育方式之下，他們堅持女性有代表自己的權力，並且創造出一種表達方式、空間與範例來促使人們改變，正因如此，經過「無地農民運動」的教育之後，每個男人與女人都變得跟以前不一樣了。

該組織最近才慶祝它的第一個博士學位，史卓塞克 (Juvellino Strozake) 以一篇名為《土地使用與公民活動法則》的博士論文，獲得聖保羅天主教大學的博士學位。當初他也是在巴拉那州路邊紮營的開拓者之一，跟著其他沒有土地的家庭一起占領土地。但是他後來進入神學院就讀，接著又擔任「無地農民運動」組織中的祕書職務，在該組織中像他這樣努力上進的人還不少。在該組織的四十個合作夥伴中，就有十三所大學參與。值得一提的是，與這些大學建立連結，絕對不是他們涉足教育領域的唯一重要突破；獲得學位認可，也不是他們所面臨的最艱苦難題。在高度農業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他們位於開拓區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挑戰所在，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們對持續改革的努力更是倍顯艱辛。

「八月十四」開拓區的其中一位開創者莉蒂亞說道：「民主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達成的。」當開拓區裡的合作社試著對外販售他們的商品時，跟中間廠商的交涉就遭遇到許多困難。超級市場要求商品必須標準化並且打上條碼，但是這對一個生產多樣化產品的有機農場來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莉蒂亞繼續說道：「此外，當我們把一箱蔬菜賣給超級市場時，他們只給我們巴西幣二十里奧，但他們卻以四十里奧的價格賣給消費者。如果我們自己對外販售，我

們可以獲得三十里奧。」雖然該組織擬訂了食物的直接銷售計畫，但是「這很難引起人們的興趣，儘管人們應該知道他們的食物從何而來，但是有很多人根本不在乎這些。要吸引消費者真的很難。」

這真是遺憾啊！開拓區的田園裡一片綠意盎然，其間種滿了有機的小麥、豆類、甘蔗、香蕉、蔬菜以及一大片牧牛的草地（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他們的牛奶只能賣給雀巢的子公司）。有一種作物明顯在開拓區中缺席，因為附近的田野到處都可見到它的身影，那就是黃豆。他們是否有考慮過要種植黃豆呢？「沒有、沒有！」路易莎（Maria Luisa）說。「你瘋了嗎？我們絕對不會在這裡種植黃豆。這是不對的。」事實上，在這裡種黃豆也不合理。莉蒂亞指出，黃豆並不是一項可行的經濟作物。合作農場賣出他們所種植的農作物以獲得利潤，再把這些利潤轉換成糧食、工作與收入，平均分享給農民。但是「我們沒有足夠的土地或資金來種植黃豆」，莉蒂亞說道。考量到規模經濟、單一種植的結果以及沒有人認為種植黃豆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因此在「無地農民運動」的開拓區中不會有任何黃豆存在。它既是一個理性的經濟選擇，也是基於理念所做出的決定；由於美元貶值，因此對所有黃豆種植者、甚至是最大的業者來說，二〇〇五年都是相當糟的一年。就連黃豆之王瑪奇也沉痛地表示：「如果以美元來計價，全球的黃豆價格還不會太差。但是若以巴西的貨幣來計算，整個收入金額可說是慘不忍睹。」規模較小的黃豆農場也感受到二〇〇五年的困境。但是「無地農民運動」的開拓區卻躲

過了這場風暴。的確，黃豆價格的下跌確實舒緩了馬托格羅索州的土地壓力，讓「無地農民運動」在開拓農地時可以輕鬆一些，不必擔心遭受到其他地區常常會出現的暴力威脅。

所有的社群都想試著在不屬於自己的世界中，為自己打造一個未來，「無地農民運動」也同樣面臨著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如何讓社群不斷地前進。除非被父母送去參加訓練營，否則孩童永遠無法體驗到訓練營的痛苦生活。如果他們一出生就生活在開拓區，他們也無法獲得父母所經歷過的社會經驗。尤其當他們的父母是合作社的成員時，他們必然會在「無地農民運動」的各種價值觀之下成長，但是在成長過程中，他們一定會與外界接觸，不論是在學校、或是透過電視（在開拓區裡，每棟房子的屋頂上都有電視天線）、或是聽廣播。正如導演奈沙馬蘭（M. Night Shyamalan）那齣被低估的電影《陰森林》（The Village）所傳達出來的訊息一樣，要讓社群完全不受現代世界的影響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路易莎的丈夫奇（Ze）說道：「表現得最好的開拓區，就是那些遠離城鎮的地區。」他的三個小孩正攀在他厚實的臂膀上。開拓區的人發現，當城市對他們的誘惑較為微弱的時候，他們比較容易進行各項重建計畫。然而，隨著城市的增加，開拓區所面臨的挑戰也愈來愈艱難。開拓區裡的孩童如何能自由地選擇留下呢？就像孟諾教徒老早就知道的答案一樣，除了讓孩子離開，否則根本沒有一個完美的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路易莎說：「他們去了城市。如果他們想回到這裡，我們非常歡迎。」由於「無地農民運動」改善了教育與生活的品質，因此有愈來愈多的小孩選擇回到這裡。莉蒂

亞、路易莎和奇也不會搬到其他地方。

箇中原因顯而易見。這裡並不是什麼農村天堂，農業工作是很辛苦的。但這卻是一項非常現代化的工作。這裡有牽引機，這裡的農作物盡量不噴灑農藥。最重要的是，這裡的人都是在自我管理的前提下，深思熟慮做出最合理的選擇。這種民主生活以及每四年舉行一次的選舉之間所存在的巨大分歧，就像酒和可樂之間的差異一樣。這些開拓區的出現正好提醒了我們，雖然大部分的人都生活在所謂的民主國家，但我們卻從來沒有體驗過真正的民主。正因如此，所以我們從來不曾承認粗糙的民主抉擇所造成的錯誤，我們只是盲目地套用民主罷了。

回過頭來說，如果只看到這一個開拓區的情況，就概括地認為所有開拓區都一樣，那就不對了。「無地農民運動」的每個開拓區都有自己的經歷，彼此之間也存在著重要的地區性差異。但是，民主與集體社會轉變仍然是每個開拓區的相同原則。看到他們長期以來的成果，「無地農民運動」似乎真的做到了全面提升，跟政府那些徒有土地之名的計畫比起來，他們的努力也獲得了更好的發展結果。根據這項運動的主旨來看，他們成功的關鍵原因就在於政治與社會的重建以及組織成員的再教育。

然而「無地農民運動」並不是全然完美無缺。畢竟，每一項運動都不可能無懈可擊。這項運動之所以會引起人們的關注，是因為它嚴肅地看待民主並且重視其背後的哲學意含，因此它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從錯誤中站起來。「無地農民運動」經歷過許多艱苦的嘗試與錯誤之

後，終於成功地拓展了這項運動，並且讓更多人學習到開拓區的成功經驗，同時他們也創造出直接且具有代表性的健全民主機制。在一九八〇年代時，「無地農民運動」曾經試著強迫實行合作的機制。「無地農民運動」聖保羅辦公室的召集人豐特斯（Geraldo Fontes）說道：「那真是一場災難。」經過一九八〇年代與一九九〇年代之後，該組織的領導階層不再堅持集體農耕，而是讓人民自由選擇共同耕種或是個別經營，並提供與兩種農耕方式有關的各項資訊。有些開拓者選擇自行經營農業，但是愈來愈多人（特別是那些來自城市的人）選擇共同耕種。今日，「無地農民運動」正以農業生態科技為基礎、努力地發展新的農業經營方式。而且從過去的錯誤當中，他們也學會不再強迫成員們接受新的方式。在古巴與委內瑞拉政府的支持下，該組織成立了一所大學，專門負責先進農業生態科技的研究與訓練工作，同時，這所大學也是組織成員的訓練中心。二〇〇六年，也就是「無地農民運動」成立大學之後不久，他們就招收了第一批學生。

上述的錯誤並不是「無地農民運動」唯一克服的難關。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該組織幾乎被內部的分裂所擊垮，當時組織內部出現了各種爭議，包括資金來源、權力執掌以及改革運動如何進行等。然而經過了激烈的討論與深刻的省思之後，成員們決定組織的財務必須獨立（即使這意謂著他們將變得更加貧窮），改革運動才得以繼續推展。今天，這項運動的大部分資金都是來自於各開拓區的捐款，這些錢主要用來支付成員接受訓練或進行各項改革時的費

用，此外，各開拓區也從產品銷售所得中提出百分之五做為推廣運動之用。這樣一來，「無地農民運動」就能夠主導自己的未來，而不必受到外界（例如教會、政府或國際捐款人）的影響，因為他們的財務獨立，所以該組織的所有成員只需要對自己負責。豐特斯表示，在這樣的前提下，「無地農民運動」才能擁有今日的成就：在二十一世紀，當所有無土地、窮困與受壓迫之人民組織都在爭取平等、自主以及一種新的公民權利時，「無地農民運動」就是他們的一盞明燈。

自主的選擇

要對抗野蠻，就必須學習。要對抗個人主義，就必須團結。

——「無地農民運動」公報

如果「無地農民運動」的做法是踏實地往下紮根，那麼他們所對抗的黃豆則是在不斷虛華地向上發展。當黃豆離開了巴西之後，它就演變成多種不同的樣貌。黃豆粉、黃豆油、整顆黃豆還有雞；正如一位激進份子所說的，雞只不過是「長了翅膀的黃豆」。而且在所有黃豆產業中，都是少數幾家農企在賺錢。的確，在某些產業中，甚至只有一家農企獨霸。以卡吉

爾公司為例，這家公司在巴西成立非法的黃豆農場，把自家生產的黃豆送到工廠碾碎之後，再把初製品載送到巴西沿海的非法港口、裝上貨輪、再出口到歐洲，經由荷蘭送往歐盟各國以及英國，到了歐盟或英國之後，卡吉爾公司會把黃豆再次加工，或是賣給旗下的太陽谷（Sun Valley）公司做為動物飼料，在這裡既看不到太陽，也看不到山谷，這裡的動物長大後就會被屠宰並加工成食品，所有工作都由太陽谷公司包辦，直到這些食品被賣給麥當勞、變成麥克雞塊。這就是一條完全掌控的流程。而且麥當勞似乎相當讚賞這種做法，因為它在二〇〇五年還頒贈了「年度最佳供應商」的獎項給太陽谷公司。

但是「無地農民運動」卻在這條生產流程的源頭造成了破壞，他們反抗政府與黃豆產業接管他們的土地，此外，他們不僅建立了永續經營的農業模式，也創造出另一種經濟與生活方式，儘管「無地農民運動」有時候也會產生矛盾與缺陷，但是他們仍然以自由的方式進行各項試驗。簡單來說，他們已經根據自己的想法開拓出一條道路。經過了無數的困難之後，「無地農民運動」體認到一個不變的原則，那就是我們所居住的環境將會影響我們成為哪一種人。那些成長於「無地農民運動」開拓區與營地的年輕人可能難以抵擋城市的誘惑。如果孩子們不願意回到開拓區，父母親至少知道孩子們有自我選擇的權利，並且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但是，對大部分住在城市的我們而言，我們的選擇又是什麼？跟開拓區的人比起來，居住在城市的我們可能很難找到這樣的自由，因為我們跟那些為我們種植或製造食物的人之間的

關聯實在太疏遠了。當我們在麥當勞所操控的食物環境中，吃著沾上烤肉醬的麥克雞塊，我們跟雞塊其實都已經遠離了食物的生產源頭。既然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可能搬到巴西，那麼我們還有什麼選擇呢？或許我們可以選擇不要去麥當勞。但是我們有時候還是需要吃東西。我們已經吃了含有黃豆的巧克力。就算你沒吃過巧克力，冰淇淋裡面也有黃豆。如果你也沒吃過冰淇淋，那麼任何一種包裝或加工食品裡面也都含有黃豆。如果我們夠偏執，我們或許會瘋狂地查看每一個食品成分表，並且捨棄所有包含卵磷脂或不明「蔬菜油」的食物，當然，就連所有的肉類也都不吃。此外，我們還要自己烹煮食物（事實上，會自己煮東西來吃的人實在少之又少，最近一項研究指出，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菜餚是人們自己在家做的，而且有愈來愈多的人不知道如何把原始食材烹煮成菜餚）。所以，當我們到超市裡買菜，手裡拿著購物清單、上面寫著各種可接受的商品，希望能藉此避免落入企業的陷阱，卻只發現我們自己正站在食物體系的腐敗源頭。

1 譯注：Ompa-Lompas，小說《巧克力冒險工廠》中一群製造巧克力的小矮人。

8 超市巡禮

小傑克霍納

坐在角落裡

吃著肉餡餅

他用他的大拇指

挖出一個小李子

他對自己說：

「我真是個好孩子！」

——傳統民謠

葛瑞絲在超市中聽到人們說

我們的上帝是一個幾何學家

祂在這裡為我們做了一些事

祂已經把事物整理得井然有序（如果你願意這麼形容的話）

壓縮整齊並切成小塊的羊肉

圓筒狀的烤肉

橢圓形的火腿

午餐中不知名的肉則呈現出方形或矩形並帶有傾斜的切面

有時候則是球形（或者說是流線形以方便蒸煮）

稱讚祂吧

祂把美學帶進了我們的食欲

帶進了我們與生俱來的混亂權利裡

帶進了我們不得體的需求中

祂為我們添加了重要的形式與秩序

透過祂

野蠻的人類才能踏進純粹的幾何數學世界

才能從血腥的生活中解脫

在玻璃紙的包裝中、在透明的不知名的神祕容器中

食物以神聖的方式到來

我們終於像哲學家一樣

可以毫無畏懼地面對死亡

宛如偉大的至善一般

——霍華德·內梅羅夫（Howard Nemerov）

自助式商店

現代食物體系的最高殿堂，就是超級市場。連鎖超級市場乃是一個物流王國，它管理調控著食品產業中那些較小規模的商業行為，像是代理商對生產業者的操控、或者是分銷商對代理商的箝制等等。透過它的決策以及對生產鏈上每個步驟的嚴密監控，連鎖超級市場可以在採買的過程中讓南非貧困的農民失業，可以瞬間改變瓜地馬拉那些咖啡生產者的命運，也能夠影響泰國梯田的產出。

超級市場是一項具有專利的發明。就像其他各種發明一樣，它是一項在特定時空下、為因應時代需求而發明出來的。超級市場所誕生的時空環境，就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一個當時最富饒的國家。美國的產業之輪旋轉得非常快速，前所未見的大量產品被製造出來，經過包裝、上架以供應那些日漸龐大的都會人群。當時的製造商們曾經擔心，消費者可能無法消耗掉他們製造出的過多商品，同時製造商們也憂慮，即使消費者買得起這些商品，他們也可能因為不需要這些商品而缺乏購買欲。面對這個問題，一個能刺激消費者購買的不變技巧就是：降價。然而，降價對二十世紀初期的食品雜貨業乃是一項嚴峻的挑戰，特別是當利潤已經很低的時候。

如果想要賺取成本與價格之間的利潤，其中一種方法就是透過公司的規模來進行商業運作。當公司越大時，它就越有能力對原料的價格進行議價。不過，在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的食品零售者之中，沒有一家公司有足夠的規模。當時的農產品產業巨人主要都是食物處理與運輸公司，在這些公司之中，有一家名叫大西洋與太平洋茶葉（Atlantic and Pacific Tea Company；就是大家熟知的 A & P）的食品運輸公司，它發現除了食物運輸可以賺錢之外，將食物賣給消費者更是有利可圖。有鑑於此，這家公司便成立了一連串的雜貨商場，它運用美國正在茁壯的鐵路與道路運輸系統來運送貨物，並透過相對便宜的運輸成本以及將自家產品賣給自家零售商的優勢來賺取利潤。大西洋與太平洋茶葉公司在運輸補給方面的成功經驗，成為了

現代超級市場的基礎典範：只有精於運輸補給與行銷的巨大公司才有能力壓低成本價格，才有能力確保零售超市中總是擺滿了商品。不過，當商品送到了大西洋與太平洋茶葉公司的雜貨商場之後，它們的銷售方式和其他的雜貨商店並沒有什麼不同。當時，消費者與商品之間總是被店員們隔開，消費者必須指明他們想要購買的商品，而且還要明確地表達購買的意圖，他們才可以碰得到商品。然而，這一切就即將要改變了！

戰後的美國農業一片欣欣向榮，而其中發展最為興盛的地區就是加州。昔日的淘金熱潮都轉向了農業發展，加州的地主、園藝學家、研究人員、農民、鐵道大亨、剛好帶著種子與夢想的移民、擁有水資源的企業以及握有足夠資金以資助農業發展的銀行等，全都賺進了許多財富。當時的食品生產企業也跟著產生了劇變，而且這場劇變更拓展到其他的領域。在食品產業的零售端，大家開始實驗新的點子。例如，亞伯·傑瑞與休·傑瑞開始有了一種新的想法：與其把店員們阻擋在消費者與商品之間，不如讓消費者進行自助式的採買。這樣的改變一定可以讓消費者更有購買的欲望，而且也可以節省人力的成本。當消費者可以自助採購、可以隨心所欲瀏覽商品時，他們通常會買得更多，也更有機會從架子上拿起一些他們以前從來不曾開口詢問過的產品。不過，消費者必須知道各項商品的所在位置才行。有鑑於此，傑瑞兄弟用了一些行銷技巧，他們將零售商店中的產品以他們所認為最有規則的一種方式來排列，也就是按照商品名稱的英文字首順序排列。自一九一四年起，阿法貝塔零售連鎖超商就開始採行這樣的自助

採購模式，讓消費者可以自由地從開放的產品架上選購商品。從位於加州波莫那的第一家分店開始，他們成功地在加州開設了許多小型連鎖超商。

儘管美國西部率先採用自助採購模式，但是當田納西州一個來自維吉尼亞的精明商人與一連串具有地緣與國際關係的政治活動相結合之後，真正的零售變革才因此展開。一九一六年，由於兩個事件的結合，美國零售產業的命運就此改變。第一個事件就是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當美國參戰之後，食物的價格上漲了百分之十九。（一九一七年，紐約、波士頓與費城還因為食物價格飛漲而發生糧食暴動。）在這種情況下，零售商更必須想盡辦法來壓低成本，因為消費者寧可到很遠的地方尋找便宜的食物，也不願意就近在城市裡購買較貴的商品。壓低成本的其中一種辦法，就是透過大量進貨來降低成本，但是在一九一六年的九月十一日，地區零售商桑德斯（Clarence Saunders）卻完全顛覆了零售業的做法，它對世人所造成的影響甚至比美國參戰的影響更深刻。桑德斯在田納西州的曼菲斯開了第一家名為「小豬扭扭王」（King Piggly Wiggly）的商店。在這家店之中，他創造了一項關鍵性的零售變革，這場變革在整個二十世紀不斷地引發迴響。原本只是為了盡可能降低零售業者的成本，但他的手法卻因此徹底改變了採購者與銷售者之間的關係。下列就是桑德斯描述其美國專利第一二四二八七二號「自助商店」（Self-Serving Store）的一段話：

我這項發明的主旨在於提供一家能讓顧客自助的商店。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這家商店必須重新檢視庫存中的各類商品，並將商品以方便、引人注意的方式陳列出來。當顧客選好想要的商品之後，他們就必須通過一個檢查與付款的閘口，在這個閘口，商品的價格將會經過計算，商品也會包裝入袋，當顧客付錢之後，就能把購買的商品帶回家；這樣一來，就能大幅減少一般商店經營所需的雜項支出或是經常的費用……。

這種新型的商店結合了讓消費者自行採購的想法（並藉此減少人力成本）以及確保顧客能夠看到店內各種商品（如此就可以把潛在的收益提升到最大）。從桑德斯的專利平面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商店內部格局已經把商品的庫存控管與陳列方式全都考量進入，因此這可說是第一個消費工廠。你從商店的入口進去、通過旋轉門、拿起購物籃、在有如迷宮一般的商品陳列區走來走去，最後走到櫃檯結帳。店內只有一條路徑，在這條路徑上沒有店員會來跟你交談，而且商店的首要設計理念就是讓你在越短的時間內把越多東西放進推車，同時盡可能地降低商店成本。在這樣的商店中，消費者跟迷宮裡的老鼠沒什麼兩樣。

儘管如此，有些消費者還是不太了解這個系統。在澳洲，超市業者必須聘請一些指導員來教導男女老少如何推著購物車在店裡採購。到了今日，你可以在美國的超市裡看到大人的購物車前面附有小孩專用的小推車。雖然這項設計是為了讓爸媽容易找到他們的小孩，但是小推

車其實也帶有一個教育目的。它明顯地表示出：「顧客訓練」。

對桑德斯來說，這樣的超級市場不但代表著一種商品補給與陳設上的管理，他同時也具有教育意義。在傳統的雜貨店中，顧客把購物清單交給店員，店員就會照著清單把顧客想要的商品一一取出，但是新型的商店完全不需要這種店員的存在。雖然新的「小豬扭扭王」自助商店也跟傳統雜貨店一樣僱用店員，但是這些店員卻被明確地告知：他們根本不必協助顧客挑選商品。現在，顧客可以「自由」挑選商品。當店員變得跟特拉普教派一樣沉默時，顧客就必須靠著超市裡的各種指示牌來找出商品的位置。超市的空間結構雖然是依據業者搬運貨物的需要而設計，但是它也考量到銷售邏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就是招攬與訓練顧客。這樣的結構不僅開創出一門衝動型與纏人型的購買科學，也為「消費主義」提供了一場實地教學。

這個概念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消費主權」。然而諷刺的是：消費者的選擇自由竟然是誕生在一個籠子裡。我們所崇尚的「消費自由」其實都是商人規畫下的產物。以前我們或許還能從店員那裡獲得一些基本的資訊，但是現在的超級市場卻改變了這項做法。在刻意的空間布局管理以及對員工溝通權利的控管之下，購買食物的消費者與食物的生產者之間唯一可能的接觸點竟變成罐頭上的一張標籤。除此之外，我們無法期待那些販賣商品的人會知道商品的生產來源。就算他們知道一些資訊，他們也不會告訴我們。

桑德斯的創新做法讓他大發利市，至少一開始的時候他確實賺到不少錢。從他開設第一家自助商店以後的八年之間，全美各大州就出現了一千兩百家的「小豬扭扭」。由於桑德斯的新經營模式能夠降低成本，消費者也因此享受到比較便宜的商品，於是全美各地立刻掀起一股模仿風潮，自助式商店很快就出現在大街小巷。附帶一提的是，桑德斯後來為了維持「小豬扭扭」的股價而大筆舉債，最後反而失去了他一手創建的王國。在「小豬扭扭」發生股價危機時，儘管桑德斯以「打擊小豬扭扭就是打擊曼菲斯市」的口號向市民呼籲並暫時獲得財務上的協助，這位地方英雄抵抗華爾街掠奪的行為也獲得了曼菲斯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力支持，但桑德斯仍然於一九二四年黯然下臺、面對破產的事實。一九二八年時，他以自己的名字「克羅倫斯桑德斯」創立新的連鎖商店，試圖重建他的商業王國，但是卻碰上了非常糟糕的時機：一年之後，經濟大蕭條吞嚥了整個連鎖體系。在晚年的時候，桑德斯試著重新把「人」這項元素帶回消費模式中，於是他打造了「奇多佐」(Keedoozie，商店中的食物與飲料會透過機械包裝好之後自動送到消費者手上)與「食物之電」(Foodelectric)兩家商店，但是桑德斯卻在一九五三年因心臟病而辭世，「食物之電」也因此成為他未完成的夢想。然而，也因為桑德斯進行了這些實驗，現在的自助商店才得以成形。

桑德斯設計、裝配並運作了這台消費引擎，後來的速食業、網路零售業以及自助商店因此得以開花結果。到了一九三〇年代，超級市場結合大量販售與自助服務的想法。在一九三〇年代末期，就連大西洋與太平洋茶葉公司都轉型為超級市場（這項轉變讓它在二次大戰前獲得

豐富的收益，並成為全美第二大企業；甚至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晚期，該公司仍然是全美第二大零售企業，僅次於「適福威」〔Safeway〕公司。

當然，桑德斯的創意也改變了消費者。以前，當我們看到自己只能照著商店裡的單一購買路線前進，或是找不到任何店員來協助我們時，會感到十分驚慌。今日，現代化的零售商店讓我們能夠自己推著購物車在店內閒逛，而且當顧客找不到商品時，大部分的超市至少都會有一個值班店員來解決顧客的問題、或是找其他店員來幫忙。然而，現在的服務方式之所以行得通，是因為顧客早就把這種節省成本的自助服務視為理所當然，因此不管超級市場的表面形態如何改變，都不會影響到它的貨物供給基礎。超級市場仍然不斷地調整商店的布局，你會發現收銀台附近的衝動購買區常常在改變，酒類的陳設也經常在調整。但是沒有一家超市會改變自助服務的形態。這是因為今日的消費主義早已造就出現在的我們，在發展消費性商品的同時，它也塑造了現在的消費人口；其改變的方式與程度完全超出了從前消費者的想像，就好像是一九一六年第一個通過桑德斯旋轉門的顧客心中的感受一樣。

幾乎就是歐威爾

除了加護病房之外，很少有地方會像超市這樣嚴密地監控或是經常重新裝配。為了盡可

能在越短的時間內變換最多產品，超市業者更不惜砸下重金。這樣的行為牽涉到一種複雜的平衡策略。超級市場必須達到快速的貨品補給與即時的存貨管理，同時又不能讓消費者覺得自己在一間明亮的倉庫裡買東西。於是，一個小型的學術產業便開始研究零售環境，希望能根據消費者的意見找出最佳的折衷辦法。這些研究人員為他們的工作取了一個名字，叫做「氣氛學」。這個標題吸引了許多公共與私人的投資，舉例來說，機場、商店與餐廳等公共場所播放的背景音樂「繆扎克」(muzak)就非常的重要。有不少文章都在討論音樂的拍子會對我們的消費型態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在考量這個問題時，我們必須顧慮到消費者待在商店裡的時間以及等待結帳時的不耐情緒。有些人認為，超市播放的音樂越輕柔，越能讓消費者在採購時感到放鬆，同時也能讓消費者在店裡逗留得更久。其他人則認為，跟音樂的節奏比起來，消費者對音樂的熟悉程度才能幫助消費者很快地忘掉痛苦的採購經驗。除了音樂之外，研究人員也深入地探討顏色對消費者的影響；他們發現，顏色會影響到購買的商品、購買率、在店裡停留的時間、愉快的情緒、鼓舞消費者的程度，還會影響消費者對商店與企業的印象、以及消費者對商品的注意力。事實上，每樣事物都是研究人員鑽研的對象，包括空氣中的味道、燈光照明、商品的擺放位置與店面的裝潢等。儘管它們的威力比不上我們在尋找牛奶時遭受的一連串商品轟炸（我們往往是為了買牛奶才會去超市，因此為了盡可能讓我們看到最多商品，業者就會把牛奶的位置擺在後面），但是這些因素同樣是引誘我們掏錢的元兇。

儘管業者常常會以不同的方式來改變購物環境，但是，消費者才是他們最主要的操弄對象。只要到超市購物，我們就等於一場大規模實驗裡的白老鼠，雖然業者會盡量把這種經驗設計得自然一點。以商店的會員卡為例，我們每次購物時只要出示會員卡，就等於把我們的資料提供給超市業者，讓他們得以建立一個歐威爾式的消費極權體制。透過會員卡，超市就能將我們的消費習慣與我們的名字、地址及其他基本資料串連在一起。接著，消費者的想法就會被加以分析（著名的「維普」〔VIPER〕就是最受歡迎的分析軟體之一），業者就可以藉此訂出市場取向。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分析變得愈來愈精準。在一九九六年，英國的連鎖超市特易購（TESCO）就區分出十二個市場區塊，每一個區塊鎖定的對象也不一樣。到了一九九六年底，特易購發行了五千種不同版本的直銷雜誌，並將這些雜誌分別寄給不同的顧客群，到了一九九八年中，雜誌的版本已經增加到六萬種。今日，每一本雜誌都是根據顧客會員卡上顯示的資訊所量身訂做的。當然，這種特別的服務正是我們認為自己想要的。由於每個人對於安全、舒適、新的體驗與健康方面都有不同的需求，因此我們很高興自己能享受到與眾不同的待遇。此外，當企業越能夠迎合我們的偏好，它的產品自然也會賣得越好。自從業者把所有的商品都陳列在消費者眼前、讓消費者自行挑選之後，這場消費型態的革新更是在現今的商場中發展出精確無比的市場策略。這其中的成功關鍵，就是因為業者能成功掌握顧客心裡的渴望。

然而，這些業者們所追蹤與分析的資料，並沒有受到妥善的保護。電子前沿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董事長坦伯頓（Brad Templeton）就對此感到十分擔憂。他講了一個消防員的故事，在故事中，這名消防員雖然自己從事消防工作，但是他在美國華盛頓州土克維拉的房子卻被火燒掉。坦伯頓說道：「這個故事除了有些諷刺以外，它的後續發展其實更是發人深省。」警方調查起火原因，他們發現火災發生時，消防員的妻子與小孩都在家裡，而且這場火災是人為蓄意縱火。警方在法庭上供稱該名消防員有縱火的嫌疑，最重要的證據就來自該名消防員的適福威超市會員卡。從會員卡的購物資料中，警方發現火災現場遺留的火種跟該名消防員購買的火種完全一樣。很幸運的，在法庭開始審判之前，真正的縱火犯就坦承犯案了。這個故事雖然有個好的結尾，但是它卻帶出一個明顯的課題：消防員的購物資料被警方取得，而且變成對他不利的證據。坦伯頓說：「沒有人能證明這種監控權不會遭到濫用。」「當然，它或許能為我們帶來一些好處，但是我們又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呢？」為了避開超市的監控，坦伯頓跟朋友交換適福威的會員卡，這樣一來，適福威超市所取得的資料就是錯誤的，但是坦伯頓跟他的朋友還是可以享受會員卡提供的各項優惠。

然而，為了取得精準的資料，超市業者正在發展新的方式以確保顧客的資料正確無誤。

666 與其邪惡代表

當消費者在超市的櫃檯結帳時，也同時把賺錢的資訊提供給他們。儘管這種資料蒐集方法對超市業者而言是一項最佳發明，但是它的由來卻平淡無奇：一切都是為了做好存貨控管。就拿條碼來說吧，當它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首次出現在世人眼前時，消費者不怎麼喜歡它。人們喜歡看到價格清清楚楚地印在商品上，就像以前的做法一樣。條碼不是專為消費者設計的新科技，而是為了零售商。有了條碼之後，零售商在彙整存貨資訊時就會更精確，而且比每天用人工盤點便宜多了。的確，條碼的誕生乃是源自於零售業者的夢想（桑德斯的自助商店就是他們的夢想之一），在這個夢想之中，顧客不是直接挑選他們想要的商品，而是在一張打洞卡上選擇他們需要的東西，接著顧客必須將這張紙卡放入櫃檯的自動販賣機，並且在這裡結帳。等機器判讀了打洞卡上的商品資訊後，店裡的巨大供貨引擎就會從貨架上取出顧客想要的商品，並將它們送到客人面前。在把雜貨店變成工廠的趨勢下，這種設計似乎很合乎邏輯。然而當這種自動化的構想首次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出現時，卻因為成本過高而無法實現。

經過了三十年的時間，科技發展的脚步才終於跟上零售商的偉大計畫，或者至少實現了他們部分的夢想。到了一九七四年，國家收銀機公司（National Cash Register Company）進行了一項低功率雷射的實驗，研究人員以雷射光來判讀製造商印在貨品上的代碼。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一包黃箭口香糖通過俄亥俄州特洛伊市馬許超市（Marsh's）的櫃檯，成為第一個通過雷射掃描機的商品（現在這包口香糖已成為美國華盛頓特區史密森尼研究中心的展覽品）。

然而，商店至少要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商品通過掃描機，這樣一來，業者在雷射掃描設備上的投資才划得來，庫存管理所花費的時間與金錢才能明顯地減少。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後期，條碼管理系統已經成為一項熱門科技。除了節省櫃檯的結帳時間（以及勞力）之外，這項科技也讓存貨管理變得更方便、快速，業者們發覺他們擁有了一項更具價值的東西：每個顧客獨特的商品購買資料。

每個條碼都包含兩組數字：一組製造商專用識別碼以及產品號碼，其形式為6（製造商識別碼）6（產品號碼）6。因此以前常常聽到有人把條碼戲稱為「惡魔的數字」。但是，這個笑話很快就會過時，因為條碼正不斷地翻新當中。最新的存貨管理科技就是所謂的「無線射頻識別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簡稱RFID），它是在現有科技上增加一小段資訊，也就是多了一組個別品項代碼。下次去超市購物時，記得仔細看看商品上是否印有EPC三個字母。

EPC就是電子產品編碼（electronic product code）的縮寫，它也代表了條碼概念的進一步延伸。每個印有電子產品編碼的商品都內建一個極微小的無線射頻。讓這個頻率會發送出三組識別號碼，只要使用相對應的科技，就可以判讀出製造商識別碼、產品號碼、以及該產品的個別品項代碼。只要使用相對應的資料庫與軟體（也就是所謂的「專家」系統），零售商就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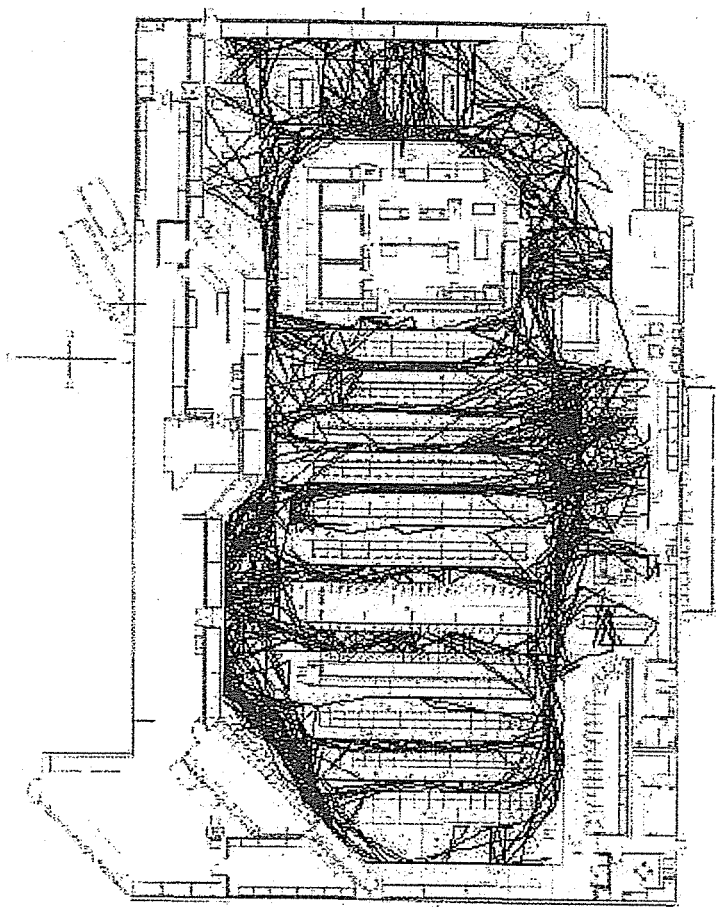


圖8.1 無線射頻識別系統晶片所追蹤到的購物路線

(資料來源：Larson, Bradlow and Fader 2005. PathTracker® by TNS Sovensen. 經同意使用)

找出顧客手上的各項產品資訊。包括在哪裡製造、如何運送、使用期限等，當同一項商品大量集中在一台購物車時，它也可以顯示出來（這很重要，例如刮鬍刀片就種小商品就很容易被客人整批偷走）。

隨著條碼的誕生，這項新科技卻沒有為消費者帶來很多好處。它或許讓結帳的時間變得快一點，事實上，如果把這項科技解釋為三種零售業科技應該會比較恰當，那就是防盜措施、條碼以及閉路電視。當你離開商店時，電子產品編碼不是只有提供購物籃裡面的產品資訊而已。它同時也會告訴店家哪些商品是你放在購物籃裡但後來決定不買的，以及你在採購時逛過哪些地方。根據這項科技所提供的資訊，我們就可以畫出類似圖8.1的圖案。

這就是我們的採購地圖。每隔幾秒鐘，購物車裡面的無線射頻識別系統就會把我們的位置回傳給中央電腦。雖然整張地圖看起來有點混亂，但是它也可以個別顯示出每一段購物路線。根據這項技術，研究人員很驚訝地發現消費者並非像割草機一樣在每條走道上來回走動，而是以節省時間的方式迅速走過超市周邊的主要通道（他們稱之為「跑道」），並衝進陳列區中拿取我們需要的商品，拿完之後又再次回到周圍的通道。這個結果讓研究氣氛學的學者感到十分驚訝，因為他們仍然抱持著桑德斯所構思的原始平面圖以及其中背後的購物原則。然而，他們實在不應該感到如此地驚訝。因為，我們不需要桑德斯在「小豬扭扭」商店中規畫的任何一條路線，透過店內各項商品與服務，我們自然會開創出屬於自己的道路；我們已經突

破不知名的建築師為我們設計的狹窄路徑，我們以自己的意願為羅盤，讓時間壓力變成揚帆的風，穿過商店裡的走道，開闢屬於自己的道路。即便如此，我們仍然是迷宮裡的老鼠。

走道之間的紀律

在超級市場裡，消費者並非唯一接受紀律實驗的受試者。回想一下，當桑德斯創立「小豬扭扭王」時，他不僅重新教導採買東西的顧客，就連以往負責協助客人採購的店員也接受了再次的教育。店員的服裝改成新的「小豬扭扭王」制服。他們的工作內容也從擁有專業客服知識、贏得顧客信賴與提供豐富資訊，降級為陳列商品、堆放貨物以及指示顧客如何在迷宮裡行走。在自助商店發明以前，店員具備了多項功能，然而在超級市場的物流體制下，這些功能不是被廢除、就是被重新分配。現在，顧客的個人消費習慣已經改由電腦掌管。商店裡的存貨狀況也是電腦在負責，不僅如此，電腦還會指揮陸地上的貨車、海上的貨輪以及空中的貨機，以確保貨物供應無虞。誰負責制訂工作時程？是電腦。至於賄賂政府單位、好讓店家能獲得經營上的好處與其他額外補助的又是誰呢？那是總公司。此外，總公司還負責與食品業者談判、選擇顧客想要的商品。店面陳設呢？是總公司、顧問以及學者。就連結帳的流程也自動化。但是，將貨品上架、店內的清潔、收錢以及保管財物的工作主要還是由人力負責。在所有工作都

在不斷專門化的過程中，負責帶著微笑迎接客人的「接待員」角色誕生了。在超市產業中，接待工作代表著專門化的顛峰，因為電腦負責記得你買了什麼東西，低薪人員負責把你買的東西裝袋以及把貨品上架，慈祥的退休人員則是負責站在門口笑臉迎人。

零售業這種自助型態所產生的效用跟福特所發明的大量生產有許多共同點。早期的超市員工跟汽車產業的勞工一樣，在針對時間與動作的研究之後，業者把員工的工作加以專門化，藉此提高生產力並節省成本。然而，正如福特工廠裡的情況一樣，生產線專門化之後，零售業的生產力雖然提高，但是員工也因此變得麻木且不快樂。為了克服這個人性問題，業者曾經嘗試過許多辦法，從贊助彈跳球遊戲到留住人才方案等。為了解這些解決方案如何奏效，就讓我們來看看零售業的龍頭如何對待它的員工。

沃爾瑪 (Wal-Mart)

沃爾瑪是世界上最大的企業，它的產值占美國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它所使用的電腦系統是全美第二強大，僅次於美國國防部。在美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沃爾瑪的顧客，其創辦人的子女也因此變成億萬富翁。二〇〇七年，它創造的工作機會超過了十三萬個，它受歡迎的程度讓好幾十個人爭搶一個職缺，其公司內部的升遷與獎勵制度讓人稱羨，

它的商品價格也低於其他的零售業者。它的對手批評它是吸取人民血汗錢的吸血鬼。毫無疑問，沃爾瑪確實是一個吸金的惡魔，它的總裁說道：「我們是那最有系統、策劃最精密、代價也最昂貴的一次對抗單一企業的運動的目標。」目前，沃爾瑪面臨好幾項集體訴訟案，包括歧視女性員工、反工會行動以及非法僱用勞工，訴訟成本高達數十億美元。你可以說沃爾瑪一定是做了什麼壞事，所以工會團體、女權倡導人士與反對勞力剝削的組織才會對它提起這麼多訴訟與調查。但是不可否認的，它所提供的購物方便性、低廉的價格以及多樣化的商品選擇，確實伴隨著哄抬價格、歧視、剝削勞工、破壞地方社群、降低環境品質與謀取暴利。儘管它的規模很龐大，但是沃爾瑪仍然是一個零售商，它只不過讓我們再一次見識到超市的便利性。然而，當你在陳述有關全球食物體系的真相時，很難不對沃爾瑪的做法感到驚訝。

從沃爾瑪創辦人山姆·沃爾頓 (Sam Walton) 的做法之中，我們可以了解沃爾瑪其實是小鎮價值觀、努力工作、犧牲奉獻與獲得基本權利等觀念之下的產物。我們也可以從許多事件當中看到沃爾瑪的內部文化，例如公司主管指示員工要回收會議中所用的文具、山姆·沃爾頓搭乘飛機只坐經濟艙、與其他人同住一個房間來省錢。但是除了老闆生性節儉之外，沃爾瑪還制定了新的管理辦法來掌握顧客、員工與供應商，也因此，除了美國軍事情報網之外，全世界就屬沃爾瑪的物流網絡最嚴苛、範圍最廣泛。

根據山姆的解釋，這些做法全都是因為：「我們地處偏僻，所以我們沒辦法像大城市的競爭對手一樣獲得經銷商的傾力相助。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建立自己的倉庫，這樣我們才能以低廉的價格大量進貨。」山姆解釋說，因為寶僑家品 (Procter & Gamble) 不可能搬到阿肯色州的本頓縣，所以沃爾瑪才必須自己擔負貨物供給的任務。跟其他零售業者比起來，沃爾瑪背後的物流王國更龐大。在資訊科技的世界中，他們就好像一家碰巧從事零售業的科技公司一樣。他們率先發展出一系列的分配與管控標準，也就是所謂的「電子數據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現在，任何想要跟沃爾瑪做生意的人都必須使用這套標準。此外，他們也是最先採用「電子數據交換」技術的人，特別是因為這項技術能夠防止員工監守自盜。沃爾瑪的庫存失竊率只有百分之二，比零售業平均百分之三點五的失竊率還要低(二〇〇六年沃爾瑪的營業額高達兩千八百五十億美元，這樣算起來，被收銀人員挾帶回家的商品總值還是非常壯觀)。沃爾瑪對他們的物流管理制度頗為自豪。他們認為資訊科技部門就像是整個企業的神經系統，也是公司全體所崇信的對象。在他們的年度股東報告中，他們告訴我們，他們的資料庫容量比網際網路的固定頁面總容量(五百七十兆位元組)還要大。接著他們又透露：

我們擁有一項卓越的即時顯示功能，可以隨時監看商品的狀況。因此當颶風伊凡朝著佛羅里達州前進時，我們馬上知道家樂氏草莓餡餅的需求量將大幅提高。

這項說法值得我們花時間反覆思索。的確，如果你經營連鎖零售商店，而且你預期最近的天候狀況將會變差，你就會多訂購一些手電筒專用電池、瓶裝水，並且多儲存一些肉類罐頭。但是沃爾瑪的資料採擷系統卻能夠精確地指出，在特別的天氣狀況下，有哪些特定的地區與特定的產品將會受到影響。例如某個地區消費者遇到緊急情況時，總是特別喜愛某些可長期儲存的早餐類食品。這樣的資料採擷能力真是令人欽佩啊！

沃爾瑪的員工關係也同樣令人敬畏。根據沃爾瑪的說法，它的員工都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十分滿意，幾乎可說是全心全意為公司犧牲奉獻。在公司成立初期，沃爾瑪制訂了一項利潤分享制度，對一些表現傑出的員工來說，這個制度就像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樣，例如一個在一九七二年進入沃爾瑪的卡車司機，他在一九九二年離職時竟然拿到七十萬七千美元的分紅獎金。但是大體上說來，並不是每個沃爾瑪員工都能享受到這麼好的福利，事實上，有很多員工都無法分享公司的利潤。沃爾瑪不但是美國最大的私人企業，從最近剛剛公布的營收報告看來，沃爾瑪同時也是墨西哥最大的私人公司。它在世界各地共有一百六十萬個員工。然而這些員工的工作條件非常嚴苛，因此有幾位美國政治人士甚至不惜觸怒這家全美最大的公司，也要指出這項令人憂心的事實。

眾議員米勒（George Miller）就舉出沃爾瑪的幾項弊端，包括在二〇〇〇年七月對沃爾瑪的二萬五千名員工所進行的隨機審查，結果「發現有一千三百七十一名未成年員工在上學時間工作到太晚，或是一天工作太多個小時。此外，有六萬零七百六十七名員工沒有休息時間，一萬五千七百零五個人忙到沒時間吃飯」。這些休息時間都是員工依法享有的權利，但是沃爾瑪的管理制度卻讓員工無法享受到這些權利。順帶一提的是，所謂「沒有休息時間」是指沒時間上廁所。有好幾位以前曾經在沃爾瑪擔任收銀工作的人甚至表示，由於沒時間休息，因此有些員工只好被迫直接在櫃檯內上廁所。的確，對沃爾瑪的員工來說，有時候廁所是唯一一個可以讓他們暫時拋開工作、稍微休息一下的地方。當沃爾瑪第一次在德國開分店時（最後德國的分公司並沒有成功），員工寧可躲在廁所裡面，也不願做公司規定的晨間歡呼。它的歡呼口號是：「給我一個W，給我一個A、一個L，還有一個彎彎曲曲的M，一個A、一個R、還有一個T。你得到什麼？」然而，這個歡呼就跟計時的「休息時間」一樣，都是公司為了提升工作效率與提供「每天都超低價」的商品所設計的。的確，沃爾瑪規定管理人員必須讓員工們維持在「每天都超低薪」的程度，如果薪資成本高於公司嚴格規定的門檻，也就是只要超過營業額的某個百分比，管理人員就會被罰款。

為了達成這些目標，沃爾瑪採用了許多辦法，其中一種就是仰賴各種傳統權力手段。儘管在國會中有一些不滿的聲音，但是沃爾瑪在政府階層仍然有許多朋友。例如，美國勞工部工資與工時管理處就曾預先通知將突擊檢查沃爾瑪是否違反童工法規，後來又讓沃爾瑪跟他們一起擬定新聞稿。

然而，有時候沃爾瑪依賴的權力手段比上述的做法更加傳統，像是性別歧視。在沃爾瑪遭受的眾多指控當中，最重要的一個案子就是杜克斯（Dukes）對抗沃爾瑪事件，這個案子雖然還在審理當中，但是它已經克服了重重的難關，進行到集體訴訟的階段。這個訴訟案是根據主要提告人杜克斯（Betty Dukes）來命名，杜克斯是一位非裔美籍女性，目前她仍然在加州匹茲堡的一家沃爾瑪工作。在此訴訟案中，原告指控沃爾瑪的管理結構對女性員工（佔沃爾瑪員工的多數）不公。支持原告的證據正是來自於沃爾瑪公司內部，也就是人力資源部門的主管彼得森（Coleman Peterson），他曾經多次抱怨沃爾瑪的女性員工升遷制度遠遠落後其他的競爭者。此外，彼得森認為沃爾瑪的「宿舍助理」計畫已經不合時宜，因此取消了這項計畫（這項計畫原本是專為無法配合公司管理訓練而調動工作地點的女性員工所設計的）。似乎有許多資料可以證明沃爾瑪確實有系統地將女性排除在管理職位之外，而且該公司的管理文化也顯示出對女性的嚴重鄙視。無論沃爾瑪如何努力地編造資料，看來這場官司它是輸定了。這讓公司高層感到十分頭痛。共有一百六十萬人有資格向沃爾瑪索取賠償，也就是自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後曾在或現在沃爾瑪任職的女性員工。儘管這個案子仍處於法院審理階段，沃爾瑪仍然每天開門營運。

對沃爾瑪而言，每天開門做生意就是在做割喉戰，但它可不保證「永遠最低價」。如果有些分店附近出現了競爭對手，那麼這些分店的商品價格必然會比較低。但是在內布拉斯加曾經有過一個例子，有一位顧客分別在兩家不同的沃爾瑪分店購買同樣的商品，卻出現了百分之十七的價差。理由是什麼？因為售價較高的那一家分店已經擊敗了對手，所以能夠任意調高商品價格。

我們或許只想把這種情況視為自由市場上的激烈競爭，因為雖然沃爾瑪的員工可能會害怕公司的壓榨行為，但是身為消費者的我們卻很高興有沃爾瑪的存在。這是前美國總統柯林頓的幕僚瑞奇（Robert Reich）提出的戲謔觀點。但是，正如「新規則計畫」²的資深研究員米契爾（Stacy Mitchell）所說：「沃爾瑪既是消費者的選擇，也是公共政策下的產物。地方與中央政府提供了數十億的減稅與補助金額，來協助連鎖商店的發展。有好幾個州的賦稅政策都允許全國性的零售業者可以減免許多所得稅，地方上的小公司反而沒有享受到任何減稅優惠。」保守估計，美國聯邦公共補助款至少有十億美元直接進到沃爾瑪的口袋，若是把州政府以及其他外來的補助都計算在內，實際的金額將會更驚人。這項證據同時也顯示，沃爾瑪的進駐使得地方上的經濟與社群都受到嚴重的威脅。而且一旦沒有收入，人們更不可能到沃爾瑪以外的商店消費。

操控供應鏈的惡霸

沃爾瑪對內部員工施以嚴格的管理，而它對待那些供應鏈上游的人更是嚴苛。正因為連鎖超市是如此龐大、買賣的貨物如此多，因此他們才得以控制供應鏈。在這種情況下，沃爾瑪再度成為最大的違法者，因為它乃是最大的企業。然而，它並不是唯一違法犯紀的公司。

讓我們看看世界上規模第二大的連鎖超市，也就是英國的超市巨人特易購。「行動救援」(ActionAid)最近調查英國超市所賣的蘋果，一路追溯至南非西開普省喜瑞斯地區的果園。南非就像紐西蘭和智利一樣，能夠為歐洲與北美洲提供大量非常當季的水果。在全球貿易之下，各國紛紛撤消管制規定，這些農業國家的果農也直接面臨彼此之間的競爭，他們不僅較量天候條件、金融匯率，也比較誰能獲得經銷商和超市的青睞。這股由上往下傳來的成本壓力，不斷鞭策著整個供應鏈。正如特易購或是阿斯達(Asda，沃爾瑪在英國的子公司)把世界各地的水果供應商操弄在股掌之間，讓他們彼此競爭，這些供應商也用同樣的手段來對待他們的員工。國際間愈來愈大的成本壓力影響了國家經濟，其重擔最後就落在世界各地的田野上。這意謂著農田裡的工作變動愈來愈大，勞工的飯碗也愈來愈危險。男性勞工的每月平均工資是南非幣四百元(約美金五十五元)，女性勞工的薪資比男性低，而且她們獲得的非貨幣性補償也比較少。莫里森(Aruna Morrison)是在喜瑞斯農場工作的女性員工，她直率地表示：「男人可以得到所有的東西，像是靴子、制服等等，而且都是免費的。季節性的女性工人卻什麼也拿不到。為什麼我們得自己付錢買，而男人卻不用？」更糟的是，女性還要帶小孩。

「當我的小孩向我要東西時，我感到非常心痛，他哀求著：『媽媽、媽媽，拜託、拜託。』但是他們一點也不了解。」然而，最痛苦的是她在同儕之間感到無地自容。「我根本沒有勇氣抬起頭來面對別人。」

莫里森是「女性農工」組織(Women on Farms)的成員，這個組織目前正積極地爭取西開普省農場勞工的權利。組織裡的所有成員共同對抗開普省的農場業者，強迫業者要設法改善女性勞工在農業體系中普遍面臨的不平對待。就像其他領域一樣，農企業也把女性視為很好應付、容易掌控的對象，他們認為跟男性比起來，女性不需要太多的支助，也不需要太多的薪水。透過勞工組織，女性勞工才有機會團結起來爭取與男性一樣的尊嚴。但是跟美國的農場工人比起來(請見第三章)，她們所爭取到的尊嚴實在太微不足道了。

便利性帶來的矛盾

然而，當我們著眼於零售業對那些負責為北方生產食品的人造成什麼影響時，我們也應該思索它對那些剛剛加入世界消費主義行列的人帶來了什麼衝擊。在第六章中，我們已經看到馬卡哈席尼人民對基因工程所帶來的「奇蹟」嗤之以鼻。當然，馬卡哈席尼人民面對的不只是基因改造作物的影響而已。當我們跟馬卡哈席尼之間離得越遠，我們越有可能只看到事情的一

面，對馬卡哈席尼的印象也只有一種，那就是「種植基改棉花的地方」。就好比古巴跟雪茄總是連在一起一樣。

在這些地方，顯然還有許多的人生故事與經歷。下列就是八位女性談論有關營養的一些對話，她們也提到了自廢除種族隔離政策以來，南非人民的生活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我不認為種族隔離政策解除以後，我們的生活有任何的改變。」

「事情不是你說的這樣，我們現在可以在超市以外的地方賣我們的蔬菜，而且不會被四處追趕。」

「現在還有兒童補助金。」

「還有商店。」

「喔！對了！商店。」

「商店怎麼樣？」

從一九九〇年代中期開始，也就是種族隔離政策瓦解之後，販賣廉價雜貨的小店鋪便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是對大多數的人民來說，這樣的商品價格他們還是負擔不起。這幾位女士表示，就在這段時期，孩子們開始偷拿父母親的錢去買玩具手機和手電筒。然而這並非唯一出

現的改變：「那些店鋪開始販賣麵包、香菸、糖。小孩子不想吃玉米麵包，他們要吃阿爾巴尼的切片麵包……上學的時候，他們不願意吃父母親幫他們帶的午餐，反而要父母給錢讓他們自己買食物。」

然而，這並不表示他們仍然想念種族隔離制度。事實上他們一點也不這麼想。我們訪談的幾位女士都說他們很高興能在超市買到磨好的玉米粉，這樣他們就不必自己動手。德拉米尼 (Thoko Dlamini) 說，這真是兩面刃，「一開始人們懶得自己磨玉米，後來就變得愈來愈懶惰。」

這幾位女士也氣憤地表示，當地的思巴爾超市不願意購買他們的水果和蔬菜，反而從其他地方運來各種農產品，以這種手段破壞他們的計畫、迫使他們種植其他作物，像是棉花。這些事情對整個社群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響，這幾位女士（她們都有小孩）都對這種情況感到很生氣。後來，當地一位主要的棉花農民裘比 (Zacharia Jobe) 告訴我：「現在的我們變得比以前還要虛弱。但是這不是因為我們愈來愈老。就連我們的小孩也沒有他們這年紀該有的充沛體力。」在世界各地的農場中工作的女性們很快就發現，食物體系中的農藥不僅讓人們變得愈來愈不健康，也讓食品中的營養成分愈來愈低。然而馬卡哈席尼的婦女還是繼續購買超市裡的玉米粉，因為自己磨玉米是一件既費力又煩人的工作。

換句話說，超市對女性消費者來說很方便，即使他們對女性生產者來說並不是什麼好東

西。超級市場能節省女性的時間，但是卻減少了女性的自由。這就是超級市場的矛盾之處，而且無論是在夸祖魯納塔爾北部、洛杉磯或是墨西哥市，我們都可以發現這樣的情況。在馬卡哈席尼平原，我們訪問到的幾位女性都已經想到如何解決這種矛盾：最好的辦法就是自己擁有一台碾磨玉米的機器，這樣就不必辛苦地親手碾磨。如此一來，他們就不必依賴超級市場，但還是可以享受科技所帶來的便利。換言之，這些女性想要自己掌控生產的方法。

這個解決辦法當中隱藏著相當重要的實際意涵。超級市場為人們帶來方便，完全是因為他們能夠掌握某些科技，以玉米粉的例子來說，這項科技就是碾磨設備。然而，除了這項科技之外，還有其他許多因素牽涉其中。舉例來說，由於馬卡哈席尼地區並沒有生產玉米，因此就算當地的婦女擁有研磨設備，她們還是得向超市購買玉米才行。對馬卡哈席尼的婦女來說，為了擁有更多自由以及真正的便利，她們不想讓超級市場完全消失，她們只想要以更民主的方式控制食物體系的兩端。這個社群之中的女性不會害怕科技，她們只希望能夠自己按下開關來磨碎玉米。但是她們沒有錢能購買碾磨的機器（其中有很多女性的年收入趨近於零，尤其是那些沒有小孩的人），因此她們希望有人可以免費提供這項科技。

在馬卡哈席尼，還有很多人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達出跟這幾位女士一樣同樣的想法。超級市場可以是農民銷售農作物的管道，但是，馬卡哈席尼的超級市場根本不向小農購買農作物。同樣的，馬卡哈席尼的農民只是想要透過超級市場的供銷網絡來接近消費者。以前政府曾經提供這種銷售管道，但是範圍有限，效果也不好。現在，供銷網絡操控在私人企業手裡，窮苦的農民更是完全被排除在外。北方國家的零售業歷經了幾個世代才轉變成今天的模式，但是不到十年的時間，馬卡哈席尼的零售業就已經完全轉型。現在，許多馬卡哈席尼的婦女不僅清楚地體認到現代零售型態對她們所造成的影響，她們也明白地知道哪些替代方案才是她們想要的。

馬卡哈席尼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尚比亞的農民也指控南非購物樂（Shoprite）連鎖超市「偷走了整個市場」。農民與超市之間的對抗情勢非常緊繃，他們甚至揚言要燒燬所有超市店面，因為這樣，購物樂終於派出代表與農民談判。但是超市的擴展計畫似乎沒有因此停止。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的拉丁美洲，超級市場大約掌握了百分之十的食物市場；二〇〇〇年，拉丁美洲的食物市場已經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都淪於超市手中。在美國，超市業者花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才掌握了半數的食物市場，然而拉丁美洲的超市業者在十年之內就達到這樣的成績。同樣的情景也出現在亞洲。信賴集團（Reliance Group）在印度投入了七十億美元的資金，成立一個完整的產銷連鎖超市體系，並依循法國國家樂福超市的發展路線。在二〇〇七年第一季，家樂福超市的營業額就超過了二百一十億歐元（約兩百九十億美元），其總營業額有一半以上都是來自海外的據點。家樂福集團當初之所以會轉向海外發展，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它在法國國內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一九七三年，眼見巨型超市對商業街上的小雜貨店造成衝擊，法國政府

便出手進行管制。由於家樂福的擴張與法國國內的社會福利政策有所衝突，他們便轉向那些政府較不那麼強勢的國家。一九六三年，家樂福以「各種商品，應有盡有」的概念（大超市的名稱就是因此而來）在安錫以及巴黎近郊成立了最初幾家分店，自此之後，他們在全世界一共擁有一萬一千零八百家分店。這裡面包含了八百六十八家巨型超市，其中有一百二十九家位於拉丁美洲，亞洲則有一百七十三家。

超級市場能夠在南方迅速成長的另一個主要原因，跟總體經濟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馬卡哈席尼的居民希望政府能提供一個市場給他們。事實上，世界各國的農民都要求政府提供銷售的管道。以前，政府會設置農業產銷委員會，並透過詳細的規畫，以保證價格向農民收購農產品，藉此提供足夠的收入讓農村社群得以生存、甚至更加繁榮。但是，當世界銀行於一九七〇年代後期開始實施「結構調整策略」（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SAPs）之後，各國的農業產銷方式就此改變。世界銀行認為，為農民準備好一個市場，根本就是浪費納稅人的錢。如果政府想要增加農村地區的收入，應該直接把可用資源提供給他們。於是，產銷委員會就被廢除了。

然而，農村選民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他們的需求也不被重視。舉例來說，在印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地區，但是政府有百分之八十的支出都是花在城市。政府以結構調整策略為藉口，違背了他們對農村人民的承諾。南方國家的產銷委員會幾乎蕩然無存，北方國家的產銷辦法雖然在強大政治壓力下勉強保留下來，但其本質卻已經改變，這些產銷委員會的角色也漸漸被超級市場取代。以往，貧窮國家的產品採購、銷售與運輸工作都由政府承擔，現在，超級市場的貨物供給系統已經慢慢接管了這些任務。與政府不同的是，除了必要的投資之外，超級市場不會在農村地區多花冤枉錢。或許超級市場沒有直接造成第二章所討論的農民自殺壓力，但是他們確實靠著低價收購農產品獲得不少利潤，而且他們也間接使得農村經濟陷入拮据，導致農民走向死亡。

大體上看來，超級市場以及農企業都在結構調整策略實施之後顯得更加蓬勃。這些企業在南方的發展已漸漸成為今日零售巨人的搖錢樹。食物的銷售管道從提供「完整服務」的小攤子（通常都設置在人行道上），到公共市場與自助式服務的零售商店，現在變成超級市場。在拉丁美洲，超市型態已經成為食品零售企業的主流，而且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提供全服務的商店與市場都漸漸遭到淘汰，這種情況就像八十年前在美國發生的變化一樣。在拉丁美洲，有許多本土企業都組成聯盟、相互合作。例如烏拉圭與阿根廷的迪斯科（Disco）連鎖超市就曾經先吸收了其他規模較小的阿根廷公司，後來又跟智利的聖塔伊爾公司（Santa Isabel）合作，藉此在地方市場上站穩腳步，最後又與荷蘭的阿霍德公司（Ahold）合併。隨著北方市場的飽和，我們一點也不訝異世界三大零售商的最佳發展情況將來自海外區域。

超市差別待遇

在討論其他可能的銷售型態之前，我們要再替大家介紹一下超級市場的整個發展背景。不管是在北方或是南方，超級市場皆四處蔓生，他們巧妙地突破城市的界限，滲透到各個角落，形成一種奇怪的新地貌。超級市場除了會改變其內部結構，更會對周遭的地理環境帶來更大的影響。舉例來說，由於人們認為擁有汽車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通行距離的擴大正好創造一個聽廣播的最佳機會，於是城鎮也變得越來越大（即使有的城鎮裡的居民反而越來越少）。然而，美國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根本不開車；在南方國家中，不開車人口的比例更大。沃爾瑪這樣的大型零售業，以及那些為了維持競爭力、努力想變成零售巨人的大部分連鎖零售商店，卻提高了人們對汽油的依賴。

然而，在這種擴張情況背後還隱藏了另外一面。雖然大型零售業者的經營版圖隨著城市的擴張而不斷延伸，但是他們並不是平均地往外延伸。超級市場原本就是一個挑肥揀瘦的「吸脂」行業，他們一定會選在消費能力較強的地區開店。超級零售中心本來就設定為開車才能到的地方。超級市場不願意把店開在一望無際的田野之間，而傳統的雜貨鋪又在衰退當中。這意謂著在種植糧食的鄉村地區反而很可能產生「食物沙漠」，一旦陷入這種局面，沒有交通工具的人將很難取得新鮮的食物。反觀城市地區，尤其是在美國，被超市排除在外的人通

常都是有色人種。

不過，我們才剛剛大肆批評過超級市場，那麼就算窮人被排除在超市的服務對象之外，又有什麼好抱怨的呢？這其中的緣由就要從低收入地區的生活情況來觀察。我們已經知道人們在超市中感受不到多大自由，但若看看低收入地區，他們可以選擇的東西則更少。這真是一個出乎意料的轉變。超級市場一開始是以窮人為目標的，窮人願意不要個人服務而換取高價商品的折扣。但是後來超級市場愈來愈不願意進入有色人種居住的地區。從經濟觀點來看，超市的這種做法真是讓人難以理解。根據研究指出，有色人種社區能夠為超市帶來不少利潤。因為這些人需要食物，而且他們願意犧牲一些服務以換取便宜的糧食。此外，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貧窮的都市居民與中等收入的郊區家庭在食物支出上始終有著明顯的差異。根據紐約市消費者事務局在一九九一年做的一項調查，低收入地區與較富裕的地區之間的商品價格差異達到百分之八點八。窮人付的錢反而比較多。一九八〇年代，曾經有一位時事評論家注意到這個趨勢，他估計：「跟郊區家庭相比，一個年收入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的四口之家在食物上的支出多了一千五百元。」低收入地區不僅食品價格比較高，同時，由於超級市場已經成功關閉了鄰近地區配銷新鮮蔬果的管道，貧窮社區通常只能買到過度加工與飽含脂肪的食物。這就是「超市差別待遇」（這個名詞原本用於銀行暗中把有色人種社區以紅色圈選起來，並拒絕核發貸款給任何住在這些地區的人）引發的效應。

當超級市場決定不進入貧窮的有色人種社區，其他的蔬果銷售管道也早已因為他們的存在而受到限制，此時，貧窮地區的居民只好每天都吃一些「冷凍比薩、豬皮、牛肉餡餅與玉米熱狗」。根據一項美國研究顯示，超級市場的存在跟較低的肥胖程度有關，看了以上的描述之後，這個研究結果似乎不足為奇。由此看來，居住地區附近有超級市場似乎還是一件好事，當你居住的地區沒有超市時，那可就糟了。另外，超市當然也反映出種族之間的差異。跟白人社區比起來，在黑人社區的超級市場通常都會常態性地缺少健康食品。有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當健康食品變得更容易取得時，人們攝取的蔬果數量也會增加。

充滿愛的貨架

當我們在超市採購時，我們往往會忘記商品背後那些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最近有關有機食品的爭議，更顯示出人們對整個產銷過程的忽視。二〇〇〇年，當時的美國農業部長是格里克曼（Dan Glickman）。在此之前，美國農業部已經遭受一連串嚴重的打擊，不僅黑人農業組織指控它在農產品銷售補助款方面的不公，同時還面臨史上最大的種族歧視訴訟案（農業部付出的和解金額為二十二億美元）。格里克曼上任之後，婦女與年長的農民也控告美國農業部歧視，並要求三十億美元的賠償金。就在這個多事的時期，格里克曼宣布「世界上最嚴格、最

詳細的有機標準」，有了這項食品生產標準之後，全美各地的農民將能夠藉由生產有機食品而獲得高價的報酬。

然而，這項標準卻在美國國會中受到了無情的改造。在個別產業的遊說下，美國國會在該項標準中增加了許多奇怪的規定，使得這項有機標準比較偏向企業，反而不太符合一般人所認為的「有機」定義。在這種情況下，這項標準的主要受益者不是轉為有機耕作的小農民，而是大型的食品業者。

然而這或許不是一件壞事。現在，人們都在吃有機食品，這表示大家都十分贊同有機食品與減少使用農藥。既然如此，為什麼一看到大公司在賺錢，我們就過度緊張呢？大公司應該能讓有機食品更加普及，讓原本買不起有機食品的人更有機會接觸到好的食物，不是嗎？為了讓更多人都能吃到好的食品，最好的辦法應該是讓那些生產不健康食物的企業轉而生產有機食品不是嗎？

或許有人會反過來主張，只在沒有大企業投入有機生產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讓更多人吃到有機食品；然而，我們以前就已經看過類似的爭辯了。在基因改造作物的爭議中，田野試驗只提供了兩種選擇：基因改造作物、或是配合標準農藥來種植的「傳統作物」。然而，保證有利生態環境、不使用危險農藥來生產食物的第三種農業生態技術卻被摒除在外。在有關有機作物的爭議中，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為了讓企業參與有機生產，就制訂符合他們利益的

法規，這種做法等於是承認企業在食物體系的必要性，這就好像在「高度使用農藥的耕種方式」或是「種植基因改造作物」中只能選一種，不論使用哪一種方法，農藥公司都會在食品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除了這些方法之外，一定還有其他的選擇存在。

在食物生產的那一頭，總是有一些永續經營且產量豐富的生態農業。另外，在零售行銷的這一頭，也存在著一些地方性的蔬果與食品市場；透過這些市場，我們可以知道是誰在生產我們所吃的食物，在與他們的對話與交流中，我們將可以體驗到自然的季節性食物變化。今天的市場上，成長最快速的食品包裝產業就是有機食品加工。可是，當漢斯公司（Heinz Corporation）生產有機番茄醬時，它並沒有幫助到任何農民，也沒有積極鼓勵消費者以更健康的方式來吃東西。企業們認為，所謂的永續農業，就是依照顧客要求，在食品生產過程中減少農藥的使用。這種觀念不但讓社會關係在食物生產過程中變得一點也不重要，它也讓當初為了允許這些關係而推行的政策失去意義。

因此，儘管企業化生產的有機食品與非有機食品之間存在著重要的環境差異，儘管我們贊同重視生態的有機食品，也知道非有機食品缺乏環保與健康概念，然而在超級市場裡，這兩者之間的社會差異卻微小到讓人幾乎看不見。對於這種近乎沒有選擇的選擇，我們已經有一個非常口語的描述，也是很早以前就在超市出現的：「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一種烹飪標本，在製作過程中，活生生的社會關係被射殺、剝製處理、鑲嵌在超市的貨架上。如果我們從來不曾直接跟食物的生產者接觸，就很容易被這種假象所欺騙，誤以為這些早已死亡的綠色「有機認證」產品就是一種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鮮活關連。任何人只要曾經吃過本地農民親手採摘的當季新鮮食物，就會明白超市裡那些千里迢迢運送而來的有機食品跟本地農民種植的有機食品確實有著明顯的不同。其中的差異不是我們的味蕾可以輕易辨識出來的。但如果我們只能透過標籤來了解我們所吃的食物，我們常常會被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搞得暈頭轉向。偏偏超市裡的商品都有一個讓人看不懂的標籤。雖然有機食品加工產業正蓬勃發展，但是緊接在後的一塊市場大餅（不僅具有更高的利潤，而且其範圍幾乎涵蓋所有食品與非食物類商品）卻完全推翻標籤邏輯，那就是超市自有品牌。超市的自有品牌商品不但跟知名品牌擺在一起，售價也比較低，它的包裝上沒有註明產品來源，也沒有任何商標，因為它們不需要這些東西。畢竟，當你到超市採購時，你已經認同超市這個大商標了。

在黑豹黨的花園之中

如果我們改變在超市購物的習慣，轉而與生產者建立更直接、更密切的關係，我們將比較容易了解超級市場為何不願意提供更多的選擇給消費者。舉例來說，「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體系就是農場與消費者訂定契約，並且每週提供最新鮮

的當季食材給消費者享用。一九八〇年代時，美國並沒有「社區支持農業」，但是近年來，這種體系在美國各地漸漸推展開來，一九九五年時，全美大約只有五百家左右的製作農場，現在已經超過了一千家。農民市場也有類似的復甦經驗。一九七〇年代，美國只有少數幾個農民市場，但是到了二十世紀末，已經成長到兩千五百個。這種組織化的生產方式不需要依賴都市或是都市近郊的分銷中心，而是由生產者直接把食物送到消費者的家門口，這樣一來，不但能確保生產者與食用者之間只有短短的運送距離，還能省下許多冷藏與運輸設備的資源。在「社區支持農業」的運作原則下，任何商店都能經營得很成功，例如奧地利自實施「社區支持農業」體系以來，不僅減少百分之七十五的浪費，在空氣污染方面也降低了百分之六十三，此外，更節省了百分之七十二的能源以及百分之四十八的用水。雖然省下了這麼多資源，但是這也表示我們原本期望能隨時吃到世界各地食物的消費方式，將會造成許多資源的浪費。

「社區支持農業」主要是為了讓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能夠重新建立連結，但是它卻不敢保證食物體系中的工人能夠獲得公平的報酬。為了保障勞工權益，人們從一個截然不同的模式中獲得了靈感。在舊金山灣區，有一位人稱阿瑞茲曼迪 (Arizmendi) 的巴斯克神父，他對當地的一些商店團體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在西班牙的後內戰時期，阿瑞茲曼迪協助西班牙人民成立了一個合作體系，其總部就設在西班牙的蒙德拉貢 (Mondragón)，這個合作體系有著許多我們曾經介紹過的特色。簡單地說，這個合作體系是開放給所有認同其基本原則的人，在強大的

自我管理、社會改革與教育的基礎上，每個成員都有平等的地位，所有的工作者也都能自己做決定。阿瑞茲曼迪的合作理念非常引人注目，他說：「要建立合作體制，並不是要推翻資本主義、好像這種體系一點用也沒有……合作體制必須超越資本主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充分理解解資本主義的方法與原理。」這個理念跟本書所提到的各項社會運動一樣，在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人要遠離市場，他們只是想要改革、想讓整個社會更能發揮功效。他們只是想要求自己掌控市場，而不是被市場掌控。在食物體系中，這種想法將是可行的。

貝爾德 (Terry Baird) 是奧克蘭的阿瑞茲曼迪烘焙坊的創辦人之一，他們的營業範圍包括整個舊金山灣區。在這裡，貝爾德和他的同事每天製作各種美味的麵包、麵包捲和比薩。貝爾德說：「我們的麵包會如此與眾不同，祕密就在我們的麵團之中。我們使用的老麵會不斷地成長。」這些老麵是由無數的乳酸菌、酵母、麵粉和水所組成的。「我們每天會取用大約百分之八十的老麵（來製作麵團）。活酵母會讓麵包發酵。每天晚上我們都會拌入更多麵團，並用傳統的方法來讓它發酵。我們的老麵是從『起司合作社』 (Cheeseboard Collective, 灣區另外一個食物合作社) 取得的，他們的老麵則是從二十年前就開始培養。」他們的麵包有一股很特殊的酸味，這種氣味也成為當地的特色之一。由於他們的麵包具有這股獨特的濃郁香氣，因此人們就將這種舊金山特有的乳酸菌命名為「舊金山乳酸菌」 (Lactobacillus Sanfranciscensis)。但是，每個合作社的工作文化並沒有什麼差別。貝爾德說：「我們的模式就是一個教一個。」這

種教育方式不但有成效，而且成果還相當豐碩。「我們的工資是每小時十六點五美元，但是我們還可以得到四塊錢的贊助者回饋金，依照你每天工作的時數來計算你能分享多少利潤。除此之外，我們還享有不錯的醫療服務，包括五塊美元的處方藥和共付金。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工作場所與工作時間都更有彈性。」跟超市巨人比起來，這些合作社的工作條件、薪資與福利都成了明顯的對照。沃爾瑪的平均工資是九點六八美元，而且每六個沃爾瑪員工中就有一個沒有醫療保險。「此外，從員工上班的第一天開始，每個人的薪資標準都一樣。就連實習生也不例外。事實上，由於實習生同樣受到州政府的法律保護，因此他們跟正職員工一樣可以加班，而且加班費比正常時薪多了一點五倍。如此一來，這些實習生最後可能賺得比合作社成員還要多。」

為了面對食物與工作所帶來的挑戰，城市中出現瞭許多新興團體，阿瑞茲曼迪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奧克蘭這個城市有著一連串的鬥爭歷史。在最近的一場爭戰中，民眾群起抗議警方與政府公然種族歧視的行徑，所有州民的怒火都被這種不公平的行為給喚起。這場抗爭是由黑豹黨（Black Panthers）發起的。該黨派的大部分領導人不是被關進監獄就是被殺，接著又因為都市發展計畫以及大眾運輸系統使得黨派四分五裂。不過，過往鬥爭的灰燼卻為後繼者留下了重要的學習經驗。

如今，西奧克蘭地區的麻煩雖然跟以前不太一樣，但當地仍經常出現鬥毆的火爆場面。

然而，現在造成當地民眾死亡的主要原因並非警察或是槍枝，而是心臟病。根據我們先前介紹過的「紅色區域」以及美國有色人種所獲得的食物品質來看，這個死亡原因或許不會令人感到驚訝。西奧克蘭緊鄰著北加州灣區十分富裕的艾莫里維（Emeryville，著名的皮克斯動畫公司就位於此地），那裡有很多占地寬廣的超市以及大型零售店。另一方面，擁有三萬人口的西奧克蘭地區卻只有三十六家便利商店兼賣酒的小店鋪，以及唯一的一家超級市場。西奧克蘭是一個被紅筆圈起來的城市，也是「人民雜貨店」（People's Grocery）的所在地。「人民雜貨店」是由阿瑪迪（Brahm Ahmadi）、艾德華茲（Malika Edwards）與塞勒斯（Leander Sellers）這三個年輕的激進主義者所創立，它是一家集合了教育事業、商品物流以及改革目的之超級市場。如果再進一步來看，你會注意到它的工作人員都是不支薪的義工，商店也是靠著政府的微薄補助來經營。在市議會的同意下，「人民雜貨店」利用城裡一塊兩百平方公尺（約為兩千一百五十平方英尺）的荒地經營一個小小的蔬菜園，裡面的員工都是自願來這裡服務的義工。但是，「人民雜貨店」與一般超市的相似處就只有這樣。該雜貨店在這塊政府捐贈的荒地上種植了許多農作物，他們的橘色貨車載著政府補助生產的有機新鮮蔬果以及他們用極低的折扣從「山人批發」（Mountain Peoples Distributors，美國最大的有機食品批發商之一）買來的有機加工食品在附近地區兜售。

除此之外，「人民雜貨店」還認真地舉辦各種教育活動。居民可以到當地的基督教青年

會 (YMCA) 參加該雜貨店舉辦的營養課程，學習有關當地食材的各種知識。此外，「人民雜貨店」也經營教育事業，他們為當地社區提供各項沒有人願意提供的服務，並讓民眾能夠以宏觀的角度了解社區的轉變。從某個角度來看，他們的某些做法跟「黑豹黨」頗為類似。對「黑豹黨」來說，他們面對的乃是社區的存亡問題，他們努力地讓社區民眾獲得食物（他們免費發送食物並提供免費的早餐），並運用全體社區民眾的力量，做出一些讓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

這一類激進主義所產生的危險性都不一樣，以「人民雜貨店」（以及世界各地許多對抗社區飢餓的類似團體）與「黑豹黨」來看，由於它們各有不同的特性，因此產生的危險性也有所異。跟後者不同的是，前者通常會受到政府與其他捐贈者的歡迎。萊瑟 (Suzi Leather) 在描述英國的情況時就明確指出：「政府樂於支持那些以『自助』為宗旨的組織，因為這樣政府既可以省下許多資源，又不必承認貧窮的存在。」

「人民雜貨店」裡的工作人員都知道他們的工作是一種政治計畫。他們商標上那些高高舉起的拳頭代表的不只是對黑人權力的遵從，同時也表示他們樂於迎接前方的重要挑戰。阿瑪迪談到他們一開始曾面臨西奧克蘭漸漸被「艾莫里維化」（大型零售店從北方的艾莫里維擴展到西奧克蘭）的危機。但是「人民雜貨店」跟奧克蘭議會共同合作，試著進行一個以食物為中心的新興發展模式，這個模式的範圍非常廣泛，包括了改變議會的會計方式、好讓無主的荒地能夠搖身一變成為社區的花園，以及改變學校課程、使學生也能學習到各種有關食物的知識等等。

如果我們認為這個計畫就能讓西奧克蘭改頭換面的話，我們未免太過天真。或者應該說，我們不應該天真地以為西奧克蘭能夠在沒有爭鬥的情況下改變，也不應該天真地認為只要透過一般的民主制度，窮人的需求就能很快地戰勝企業的需求，特別是當企業不斷買通地方政府的情況下。目前為止，「人民雜貨店」透過智慧、努力、創意以及在社區民眾的支持下，獲得了豐碩的成果。未來，當它的成就愈來愈高並且開始改變商業環境時，預料將會引發一場更大的爭戰。這是因為不只超級市場的主導趨勢面臨威脅，人們的整個生活、工作與消費模式也會出現變化，這個變化不僅會影響我們的選擇，同時也影響到下一章所要討論的主角，我們自身。

1

譯注：Trappist，是天主教熙篤修會 (Cistercian) 最嚴格的支派之一，其特色為生活嚴肅、緘口苦修。

2

譯注：The New Rules Project，由美國「地方自力更生協會」提出，目的是支持健全的環境與平衡的社區發展。

9 | 食物選擇我

地點、口味、食物

人類學家李維史陀曾說，食物講究美味之前，要先讓人想到就心曠神怡。食品公司每年引進市場的新食品有一萬五千到兩萬種。我們當然不會特別留心這些食品，甚至看見商品架上出現新產品也不覺得憂心。這背後顯然有某種思考模式，儘管我們並無察覺。對食物的這種反應，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習慣中。結果變成，這種生活、工作和娛樂的方式，並沒有讓我們真正選擇吃下肚子的食物，反倒是食物選擇了我們。要把這點想得透徹並認真看待並不容易。這麼做必須多方面抽絲剝繭，不光只是剖析我們吃薯條要搭配什麼這種簡單的決定，而是要從頭質疑我們下決定時的第一直覺。

首先，我們來看反撲全球糧食系統的核心重鎮中存在的矛盾。把場景拉回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的「八月十四」聚落：晚餐時間，大家一起享用豆子飯，這餐豐盛，美味，又窩心。這晚氣候宜人，向晚的天空藍中透著粉紅，大家在充當休閒室的簡陋小屋下聊天。鐵皮屋頂下，聚落裡的青年圍著一張破舊的桌子打撞球。餐後，麗蒂亞到小屋櫃臺要了一包洋芋片和一瓶啤酒。我有點驚訝。無地農民運動不就是抵制企業食品的尖兵嗎？難道不該立下規矩，抵制工業化生產的洋芋片，還有在數百英里外裝瓶的啤酒嗎？

是我錯了。這個聚落又不是什麼捍衛純正美食的地方。要比熱血，我在這些占領土地的巴西農民身上看到的，遠遠比不上經濟系的學生。想想一個不抽菸的演員要詮釋一個抽菸的角色。這名演員可以輕易學會然後放棄抽菸的習慣，換成平常就抽菸的人，要他戒掉一定很痛苦。那是因為，這名演員平常並沒有抽菸的習慣。同理，聚落裡的一包洋芋片也跟外面的洋芋片不同。在聚落裡，洋芋片是種特別的、難得吃到的食物，是聚落內對於食物、食物的種植和取用方式的另一種選擇，大家都容許這種例外的選擇。在聚落裡頭，這些選擇是經由自覺的、民主的方式產生的。在聚落以外，我們很多的決定都受限於環境、習俗和慣例。「選擇」二字，是我們唯一會拿來形容自己從商品架上抓下這樣商品而非那樣商品時所使用的詞，我們漸漸被教會使用這個詞。如果有人問我們，為什麼用「選擇」二字來形容這個過程，我們可能會回答：「又沒有人拿槍指著我的頭，也沒人逼我啊。」直覺是也。而我們的直

覺已經完全全被我們無能掌控的力量箝制，所以從頭到尾都很可疑。

說人類大概已經發展出闖蕩現代超市的直覺，難免有點愚蠢。不過，有些飲食及選擇的方式，確實已經成了我們的第二天性。這種現象不在物競天擇的痕跡或是季節遞嬗的規律中，我們得從人為活動中去尋找線索，比方戰爭、工作、建築、電視節目、食品公司，最後才是我們自己。我們站在糧食系統的消費末端自以為的「選擇」，大多在我們甚至尚未自覺地去思考食物之前，就已經窄化、定型了。

這一章就是要揭開這些選擇的面紗，證明今人的飲食方式，其實是隱而不見的力量造成的結果，而我們對此幾乎毫不留意，因為造成的影響已經變成常態。透過一些例子，我們才能較為清楚地看見，今人選擇食物的方式，其實源於並不尋常的直覺，而「尋常」往往是一層薄紗，免於我們看見貧窮、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等等。很多團體都努力要挖掘、改變，並重新定義他們選擇食物的方式。本章指出的團體付出的努力，並不是為了要列出一連串意識型態正確的食品，或是推動或指定某種極端的飲食方式。大家努力開發不同的飲食方式，其實是一種掌握及了解的過程及途徑，這麼一來，我們選擇食物時，才會有更高的認知和掌控。

戰爭改變飲食

以往，改變人類飲食的最大動力一向都是戰爭。跟食物有關的戰略中，最廣為人知的是圍城，從遠古沙場到今日的美伊戰爭，都有它的蹤影。不過，很多飲食方面的技術和可能性，並不是從圍城戰略中發展出來的。戰爭和食物的關係，對人類的日常飲食有更深遠、更細微的影響，不論那影響是好是壞。想想以下有關食物和軍隊的故事，這不只是攝取營養的重大技術性突破，也是現代對照實驗的先聲。

早期的英國艦隊深受敗血病所苦。很早以前，英國軍方就發現士兵有牙齦流血、皮膚長斑、頭髮掉落的症狀，今日我們知道這是缺乏維他命C所致。船員太容易折損，對探險事業是一大阻礙，對之後的商業活動也是。中國船隊比歐洲人更早克服了這個問題，至少一四〇五年明代的鄭和下西洋時已經克服：中國船員會在船上種黃豆，因為黃豆芽富含維他命C。雖然英屬東印度公司的醫療長約翰·武德(John Woodall)曾於一六一四年開出一串藥方，從新鮮食物到硫酸都有，但我們並不清楚哪一個對治療敗血病最有效。一七四六年，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出任薩里斯柏里號軍艦(海峽艦隊之一)的船醫。他在船上進行一連串實驗，後來將實驗成果發表在《論壞血病》一書中。林德利用手邊的資源，對罹患壞血病的船員進行實驗：他給一些人吃肉荳蔻，一些人喝麥片粥或硫酸鹽，或是大蒜、芥末子、祕魯香膠和沒藥混合而成的雜糧。最倒楣的兩個病患喝海水。另外兩個每天吃兩顆橘子、一顆檸檬，林德說：「他們在不同時間食用，因為飢腸轆轆都狼吞虎嚥。」六天後，吃了檸檬的船員好轉，

其他人反而病情加重。這次對照實驗的結果清楚明瞭。於是，在英國軍艦上供應這種水果成了固定的政策，達成此結論的實驗方法也深獲肯定。皇家海軍艦隊開始規定船員都要飲用萊姆汁。漸漸的，大家乾脆稱英國人和英國船員為「萊姆汁飲仔」(limejuicer)或「萊姆佬」(limey)，由此可見食物、權力和語言之間的錯綜關係。

後來，第一種儲存食物的工業機制，也運用了林德的實驗方法，而且又是透過軍方達成的。英國軍艦上的伙食多半還不賴，只是有點難消化。一七八五年，海軍每週配給的伙食是七磅餅乾、七加侖啤酒、六磅肉、兩品脫豌豆、三品脫燕麥片、三分之一磅奶油，還有三分之二磅起司。要是長時間在海上，當然就得攜帶糧食。陸軍吃得比較差，伙食都外包給一班隨軍移動的「軍中小販」，由他們負責取得並轉售當地食物。順道一提，這就成了新口味往外傳播的主要途徑，而士兵也會把新口味帶回家鄉。不過，現在我們不會期待士兵從伊拉克帶回什麼好吃的，比方鹽膚木香料，或是阿夫罕狄加比廷(以無花果醬汁燒烤的雞腿)。這是因為，軍中取得食物的方式已經改變，起碼有個原因是：如果當地人並不友善，靠軍中小販取得食物就有困難。法國督政府為了避免食物在運送過程中受損，便提供一萬兩千法朗的鉅額獎金，鼓勵大家發明保存食物的好方法。

最後勇奪獎金的是尼可拉斯·阿佩爾(Nicolas Appert)。他的一連串重要發明，改寫了現代的飲食習慣。當局運送他的第一項發明越過赤道、遠渡重洋，經過溼氣的考驗，送回法國再

試吃，結果發現食物完好無傷。他的發明就是把食物裝進罐子，煮熟，再以軟木塞封住。此發明也為他後來發明的罐頭食物打下根基。一八二〇年，阿佩爾再度贏得督政府的獎金，這次的題目是「在同一艘船艦上要能把八到十公斤的肉品保存一年」。這次的目標不只要解決軍糧供應的問題，也要符合大規模的食品製造流程。畢竟，八到十公斤（二十二磅）肉品可不是靠手工業就能配送或販售的可口小點心。這麼大的分量，原本的設計就是要靠機器而非人力才能配裝完成。軍方有那麼多的肉品可以使用，暗示了一件事：隨之發跡的產業可不是製造罐頭的大產業，而是要把罐頭填滿的食品加工業。當然了，想想實在諷刺，把加工食品放進爛糊糊的大罐頭裡的，竟然是發明極致饗宴的國家——法國。

有利保存食物及長途運送食物的食品加工法發明後，馬上擴大了什麼食物可以在哪裡吃、吃的人又是誰的可能性。新的運輸和通訊科技問世後，作戰範圍愈來愈遠。這些科技在歐洲戰場創下佳績，後來傳到大西洋對岸，用在美國南北戰爭上。戰爭結束後，這些新技術在戰後工業找到了新出路。南北戰爭於一八六五年結束，到了一八七〇年，美國大批肉品罐頭不只流傳到美國大江南北，甚至繞了一圈又回到大西洋對岸倫敦、利物浦和曼徹斯特的店鋪。不得不說，那些罐頭肉實在不怎麼樣。一八七四年有人怎麼形容它：「肉就放在又大又厚又粗糙的紅色髒東西裡，而且很廉價……我還清楚記得裡頭的東西看來多倒人胃口：一大團纖維粗糙的瘦肉好像會碎成一片片，旁邊一大團看起來不太可口的肥肉，中間不規則的空隙填滿了湯汁。」現代人吃的麥香堡若要追本溯源，就得從這種罐頭肉，尤其是可長途配送、將此產品普及化的技術說起。

跟軍隊有淵源的速食品不只麥香堡。從戰爭中最能看出，軍隊怎麼透過微妙的方式改變我們的口味、怎麼把食物跟愛國意識畫上等號。如果說英國人愛喝茶是工業革命的產物，那麼美國人愛喝可樂，就是在二次大戰的舞台上第一次形成共鳴。戰爭期間，可樂並未對外供應，但馬歇爾將軍竭盡所能讓美軍駐守之處，都能免費取得可樂。可口可樂公司不受限量配糖的限制，因而得以生產這種對美國士兵來說，象徵著祖國生命泉源的飲料。有個士兵說，將軍竭力「捍衛喝可樂的習慣，就像我竭力捍衛我國賦予國民的許許多多權益一樣。」就這樣，從它在二次大戰占有的地位開始，不論在國內或海外，可樂都漸漸成為美式作風的極致展現。

其中當然也有黑暗面。普藍德格拉斯（Mark Prendergrast）的這篇〈為了上帝、國家和可口可樂〉讀來猶如《第二十二條軍規》¹，看以下段落就可見一斑：

戰地記者法斯特（Howard Fast）……無法了解為什麼載他的飛機會在沙烏地阿拉伯某個氣溫高達華氏一五七度的偏僻基地降落。原來飛機要去收拾數千個可樂空罐。超載的C-5運輸機笨重地駛離沙漠跑道，勉強越過了沙丘，但飛不起來。作家當然就建議把空罐子丟了，但得到的回答是不可能：「槍他們可以丟，吉普車，彈藥，甚至榴彈炮都可以……但可口可樂罐？」

絕對不行。除非你想放棄軍階，再回去當一等兵。」飛行員一句話就道出大家都心裡有數的準則：「沒人會跟可口可樂過不去。」

即便今日，食品公司眼看戰火四起，都競相要搭上愛國意識的邊。救援車還停在國界等待正式停戰，引擎一陣一陣顫動的時候，漢堡王就已經在伊拉克開了第一家分店。漢堡王企業在巴格達國際機場設立固定賣點，還有二個活動賣點，再加上供應免費華堡給平安歸來的美軍，藉此搭上了「家鄉味」食品的順風車。另外，漢堡王的賀喜巧克力派滿滿都是油、糖，還有特殊的意義，以第一裝甲師某上尉的話來說，這道甜點「自己會說話」。

小麥真要命

食品科學始於戰爭的需求，它本身也是塊激烈戰場大概也就不令人意外了。營養學是說服大眾某種新食品優於另一種食品的堅甲利器。每次讀到植物性奶油比動物性奶油有益人體（或相反）時，我們就會看到這類爭辯。當工業化生產的食品公司加入科學論戰時，目的就是設法改變大眾的口味，甚至扭轉先前受到肯定的科學。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種主食，因此也是最賺錢的一種食物：麵包，就是一個例子。

從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英國的營養學就證明黑麵包的營養價值高於白麵包。麵粉廠對這種結果可不滿意。他們想盡辦法要充分利用麵包的製作原料：小麥。先將小麥進行加工，加入酵母菌添加營養，粗糙的麥麩就拿去餵牲畜。況且，白麵包去除了小麥中的基本養分，就可以延長放在商品架上的時間。相反的，要做出黑麵包，必須使用未加工且保留麥麩的全麥。但將小麥加工成不同產品就表示，最後做出來的麵粉不是褐色，而是白色的。到這裡，麵粉廠就面臨了一個問題。一開始，黑麵包獲得國家的青睞，並有科學在背後撐腰。那麼，想要改變國民麵包的顏色，勢必也要有同樣堂而皇之的理由。因此戰爭結束後，就有人巧妙地利用林德在薩里斯柏里號上想出的方法，將國民麵包漂白。

首先，英國醫學研究會針對白麵包和黑麵包哪個營養價值較高來進行實驗。實驗對象是德國伍柏塔和杜易斯堡的棄兒。兩組兒童吃的食物都一樣，只有麵包不同，有些吃黑麵包，有些吃「添加了營養素」的白麵包。食物豐盛、營養又富變化，對這些孩子來說是幸運，對科學卻是不幸。兩組小孩都長得一樣好。實驗結果顯示，孩子攝取充分的營養就會長得很好。但正是因為孩子吃得好，有對照組等於沒有——這是林德最初實驗的主要特點——根本無從判斷這些小孩之所以發育健全，究竟是因為營養均衡，還是因為兩邊攝取了不同的麵包。科學家並未因此退卻，反而欣然向大眾宣布一個無關科學但攸關政治的結論：吃白麵包和黑麵包的兩組小孩，「他們的身高和體重都比美國兒童成長得快。」後來，官方根據這些氣色紅潤的孤兒呈現

的結果判定：白麵包不比黑麵包差。麵粉廠因而得以名正言順打著促進國民健康之名，製作獲利更豐的白麵包。反正，實驗結果證明，新的英國白麵包絲毫不比黑麵包差，甚至比美國麵包更好。

英國當局得以建立國民對小麥製品的愛好，甚至把觸角延伸到海外市場，有一部分要靠扶植國內麵包業才能達成。二次大戰結束後，冷戰繼之改變了南方的飲食習慣。如同弗瑞曼 (Harriet Friedmann) 所說，不管當地原本的主食是什麼，「原本自己生產糧食的國家，從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開始進口糧食，進口最多的糧食就是小麥，因為那是糧食援助的項目……結果呢，他們漸漸對進口食物產生依賴，而且還迷上了最昂貴的穀物。」小麥的價格很高，是稻米的五倍多，每噸汽油的六倍。韓國一直以身為「稻米之鄉」為傲，但韓國學董卻必須學習怎麼吃麵包，而且這還是由美國的「四八〇號法案」糧食援助計畫穿的線。他們供應學校免費的午餐麵包，心裡打的如意算盤以李勒 (Tom Lehrer) 那首《老毒販》的話來說就是：「今日純真的年輕臉龐，明日的老主顧。」在此同時，南韓的小麥產量下滑。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年間，產量減少了百分之八十六，而進口的小麥卻增加四倍。其他接受「四八〇號法案」援助的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小麥是美國農業的強大武器。冷戰期間的糧食援助計畫不只有政治和經濟目的，還多了教化薰陶的意味。它重新操作這句古諺：「給他魚，可以餵飽他一天；教他釣魚，可以餵飽他一輩子。」糧食援助把當地人的飲食習慣，從原本的常規

(通常較為健康) 轉向單一的商品，亦即美國生產過剩的商品。「給他麵包，可以餵飽他一天。慢慢教他愛上麵包，你就造就了一輩子的忠實顧客。」

上述所有例子中，大家競相爭取的，都是食物對我們的意義，還有我們接受及思考食物的方式。這個問題絕非微不足道，因為飲食使食物成為人的一部分，不管在生理上或語意上都是。畢竟，法國拒絕出兵伊拉克之後，有些美國餐廳半開玩笑地把「法式薯條」改成「自由薯條」，這種誇張的舉動不就說明了，食物不只是食物而已？另外，法國人在美國大眾文化中多了個有關食物的綽號：吃著起司逃跑的猴猴。

當然了，這個例子不大正經。不過，有心人士多麼努力要扭轉食物的意義，由此可見一斑。食物不只跟國家、社群和認同有關，跟地位、性別、意圖和欲望也難分難捨。致力改變我們對食物的看法和食物的意義的所作所為已經如此普遍，甚至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們根本不會產生質疑，真的是徹底洗腦成功。電視餐就是再好不過的例子。

迷上電視餐

戰爭、國家安全的需求、科技，還有賦予食物意義以從中獲利的公司，塑造了現代人的飲食口味。罐頭這類技術讓某些食物得以長時間保存，但另外還有兩種新科技，也無可挽回地

改變了二十世紀的飲食和口味，那就是冰箱和電視。二次大戰結束，供應和加熱食物的技術隨著軍隊返鄉。研發戰場上的烹調設備和技術的公司，如今個個都想賺家庭主婦的錢。他們強調現代女性只要花少許時間，就能烹調好冷凍食物。表面上是替戰後嬰兒潮的忙碌女性著想，但冷凍餐點的方便設計其實方便的是製造者，其次才是消費者。想想電視餐的起源就一目了然。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底的感恩節週末過後，兩百四十噸過剩的史萬生牌（Swanson）冷凍火雞，坐上美國火車的冷凍車到處遊蕩，因為沒人要買也沒地方儲藏。眼看砸下的錢就要飛了，火雞業者靈機一動，想到只要重新包裝，昨天的剩菜也許可以變成明天的一餐。於是他們買來金屬淺盤，花點小錢打廣告，及時在聖誕節推出TV牌冷凍餐。一鋁盤火雞不到一美元，過剩的火雞很快銷售一空，成了食品市場的一則傳奇。不過，這裡必須說明一點。雖然TV冷凍餐的包裝設計得像電視機，但大家並不是受了行銷手法影響，才對著電視吃——TV餐是大家夢想有天有錢能買來吃的食物。要在電視機前吃這種冷凍餐，得要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才行。但當初推出的時候，家裡有電視的少之又少。一九五〇年，只有百分之九的美國人口有電視。到了一九六〇年，十戶幾乎有九戶有電視。家家戶戶都有電視後（一九六三年），史萬生企業就不再叫這種冷凍餐為TV餐了。

TV餐的包裝設計有兩個主要元素，超出了鋁箔盤內的食物代表的意義。第一是電視的圖案，第二是一個笑容可掬的女人拿著電視餐（上面印著食物、電視，還有一個女人拿著TV餐等等的圖案）。行銷訴求是，讓戰後既要負擔家計、也想自己做三餐的女性更加方便。不過，主婦得學習烹調這種新食物的方法。商店經理經常碰到家庭主婦氣沖沖跑來，說她們為了「保險起見」把冷凍豆子煮了二十五分鐘，結果成了一團爛泥，還堅稱一定是製造商的錯。美國食品局曾多次利用女性雜誌，在兩次大戰期間成功推動營養新觀念。後來也利用女性雜誌宣導電視和電視食品。女性雜誌把電視塑造成幫忙母親處理棘手家務的救星，比方勸服任性的小孩（通常是兒子）好好吃東西。有則澳洲的廣告就帶有這種意味：

廚房電視是家庭主婦的福音……小朋友放學回家，搜刮冰箱，待在廚房看電視。不會弄亂客廳，又在母親的監視範圍內。而且如果廚房跟飯廳相連的話，還用不著哄孩子下來吃晚餐——他眼前的電視就夠吸引人了。

在社會風氣和電視節目的推波助瀾下，電視行銷達到最高峰。黃金時段是金錢和食物的交叉口。一開始，《電視晚餐派對》（TV Dinner Party）這齣節目就看上了這種新趨勢：親朋好友都圍著新電視打轉。中產階級女性為了配合電視節目時刻得及時做好飯，加上自己也不想錯過節目，便發現自己需要一種簡單弄一下即能享用的食物。這種社會新潮流創造也滿足了大眾

對方便的需求，為了順應潮流，T V牌冷凍晚餐搖身一變成了名符其實的電視餐。電視和食物的交互關係，也確立了現代的飲食方式。今日，美國十戶家庭就有六戶邊看電視邊吃飯。不過五十年前，這簡直無法想像，因為當時根本沒電視可看。

邊看電視邊吃飯當然不是美國獨有的現象。家庭的飲食習慣如何隨著電視的出現而改變，如何將女性角色收編其中，是全球皆有的現象。不過，這裡要再指出一點：電視引發的轉變，造成

表9.1 1980至2003年英國電視用電量激增排名
(資料來源：英國國家電力公司 2006)

日期	電視用電激增量 (單位：百萬瓦特)	電視節目名稱
1990-7-4	2800	1990年世界盃足球準決賽：西德對英國（延長賽最後）
1984-1-22	2600	影集《刺鳥》
2002-6-21	2570	2002年世界盃足球八強賽：英國對巴西（中場）
2002-6-12	2340	2002年世界盃足球賽：奈及利亞對英國（中場）
2001-4-5	2290	影集《東區風雲》
1991-4-28	2200	影集《五月的花朵》
1991-5-12	2200	影集《五月的花朵》
1989-7-20	2200	影集《刺鳥》
1984-1-16	2200	影集《刺鳥》
1985-5-8	2200	影集《朱門恩怨》
2003-11-22	2110	2003年世界盃橄欖球賽：英國對澳洲（中場）
1994-4-18	2100	影集《加冕街》
1998-6-30	2100	1998年世界盃足球賽：英國對阿根廷（中場）
1986-2-19	2100	影集《朝代二》
2002-4-7	2010	影集《加冕街》
1984-4-2	2000	影集《加冕街》／電影《藍色霹靂號》
1981-7-29	1800	查爾斯和黛安娜的皇室婚禮

了全面的影響，個別家庭的飲食方式只是冰山一角。表9.1的例子來自英國，也跟電視有關。從中可見為了配合節目時刻表，一大群人的活動和飲食方式如何產生變化。

晚間五點到七點之間，是英國國家電力公司的尖峰供電時段，輸電量高達六百億瓦特以上。為了確保供電量足夠，電力公司會記錄消費者的需求量。最讓配電所頭痛的是一「電視尖峰」，也就是熱門電視節目廣告時間或播畢之後，電力需求遽增的時段。這時候，觀眾會起身去泡茶，煮水所需的電力使電力需求同時間大幅增加。「電視尖峰」反映了生理需求（口渴）、文化特色（如第四章所說，茶是典型的英國飲料），還有住家的空間配置（電視在客廳，茶壺在廚房），顯然也反映了「種社會現象：一大批人在同一時間收看同一個節目」。這很詭異，因為我們總喜歡想像自己的選擇更有主見，是自由意志的產物。但數百萬人

在同一時間跑去泡茶再回來，那不是集體行動是什麼？

從大家同步收看電視節目可見，我們的口味甚至飲食的時間，都受到我們幾無察覺甚至想都沒想過的力量同化、制約了。把目光拉遠，這也說明了食物無所不在，不管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是。這點有多重要，我們絕對想像不到。我們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決定我們吃什麼喝什麼，還有怎麼吃怎麼喝。我們有必要深入探討是誰控制了空間，又如何有計畫地左右我們選擇吃下肚子的食物，甚至最直接受我們掌控和影響的私人領域：家庭，也難以倖免。想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我們必須探討最大規模、且循序漸進地掌控大眾飲食內容和地點的計畫。這就要說

到種族隔離政策。

現今的飲食版圖

一九四八年，南非國民黨險勝後，就迅速通過種族主義的方案，支持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政策。政府打著種族隔離的政治理念，通過多項法案，正式實施種族區分（一九五〇年的人口登記法），禁止不同種族發生性行為（一九五〇年的妨害風化法），將國家分為白人區和黑人區（一九五〇年的種族分區法），還有禁止黑人和白人共用海灘、廁所和其他場所（一九五三年的隔離設施法）。這麼一來，南非政府不僅推出了正式的国家種族主義政策，還孕育出一種新食物，以及新的食用方式。

在種族隔離監獄裡，當局當然嚴格控管食物、空間和種族互動。例如，「有色人種和亞洲人」的配給食物跟「班圖人」（非洲黑人）不同。白人政府可能不會給「班圖人」吃麵包或果醬。這些加工食品是白人的特權，是優待有色人種和亞洲人的甜食，因為他們比黑人「文明」。在監獄裡，政府可以二十四小時強制執行並監控其理想中的種族隔離政策，但它試圖形塑監獄外數百萬人的飲食習慣卻未能如願；到頭來，是帶刺鐵絲網外的世界，讓今人學到了有關食物和飲食的教訓。

一開始，黑人被禁止跟白人一起用餐。例如在德本（Durban）的格維爾高爾夫球場上，黑人桿弟不能跟白人球手用同樣的餐具和洗滌設施。黑人吃飯得速戰速決，盡量減少離開工作崗位的時間。這就得動點腦筋了。後來，有人結合兩種烹飪傳統來解決這個問題，而且兩種都是外來的傳統，誕生了一種可以適應種族隔離政策的新食物：把咖喱（簽下契約跟著英國人到南非納塔爾省的蔗糖園工作的印度人帶來的）填入挖空的白麵包（英國人也喜歡的食物）裡。而且一律白麵包，黑麵包想都別想。勇於嘗試、最先結合這兩種食材的古加拉印度人，他的種姓是邦尼亞（Buntia）。因此德本的招牌食物就取名為「邦尼小吃」（bunny chow）。做得成功的話，咖喱就又濃又熱，挖出的麵包可以沾邦尼吃，麵包邊邊可以用來舀起盤子裡較大塊的馬鈴薯或雞肉。吃的時候用兩手抓，因此雙手很快會沾上咖喱的薑黃色。而且，味道好極了。

邦尼小吃的最大特點是：熱騰騰，方便，吃得飽，很開胃，而且可以拿著走（不過不能太遠，要在咖喱浸入麵包弄得髒兮兮之前吃掉）。這就表示桿弟可以邊忙邊吃自己喜愛又能補充體力的食物，而且這種食物體現、肯定了某種反抗種族差別待遇的姿態和意義。邦尼小吃在實施種族隔離的國家豎起的藩籬內，結合了黑人和白人的食物，一方面服從現行法規，一方面又藉由食物表達不爽。

種族隔離的殘忍無情，還有利用邦尼小吃反擊的創意巧思，多少讓我們窺見自己的口味和選擇的實際版圖。南非政府不但准許民眾設立只服務白人的餐廳、對黑人囚犯有差別待

遇，還迫使數以千計的飲食業者不得不研發出可讓窮人（其生活步調和活動範圍大多操控在他入手中）速戰速決的新食品。在這一方面，種族隔離預告了今日大都會生活及都會人口的飲食方式。

在北方國家中，富人和窮人、白人和黑人之間的飲食區隔跟實施種族隔離的南非異曲同工的，就是美國。美國和南非人口的肥胖程度幾乎一樣，令人不可思議。南非是南方國家中最富有的之一，而美國是北方國家中最多人口低於貧窮線的（百分之十二點七）。美國的有色人種和窮人接觸的環境較容易導致肥胖，相反的，較富裕、膚色較白的人口要取得新鮮營養、少油低鹽的食物比較容易。在某個範圍內，美國窮人分配到的超市可能比富人少四倍，可以喝酒的地方卻多三倍。即使已將商業活動的程度、公路的分布狀況，還有中等家庭的價值觀納入考量，但調查後仍然發現：速食餐廳集中於窮人和有色人種居住的區域。

但商店只是環境的一部分。環境就是住家的建築規畫，是我們工作、飲食、休閒、學習、休息還有祈禱的空間。透過孩子的眼光來觀察其中的結構，會更清楚。在家中和公共機構裡，尤其是學校，兒童被迫接收一大堆電視廣告和聯合品牌的勸學方案。例如，必勝客推出「閱讀獎勵計畫」；麥當勞有「全美閱讀挑戰」；可口可樂旗下的美粒果汁祭出「美粒果暑期閱讀計畫」；德本的溫痞牛肉堡連鎖店甚至有意贊助一所印度教學校。食品公司藉由一系列精明的合作計畫和贊助方案撒下天羅地網，吸引孩子的注意。這麼一來，以兒童為銷售目標

的食物（尤其是甜食、零食等）就更易獲得，兒童吵著要爸媽買這買那的環境也隨之增加，行銷人員當然知道怎麼善用父母心，最後的後果就是：兒童的健康急遽惡化。英國公益團體續存（Sustain）的兒童飲食計畫主持人理察·瓦特（Richard Watts）指出，美國一年光是向兒童推銷食品的花費就超過一百億美元，每花一美元向全球推廣健康食品，就花了五百美元在推銷垃圾食物上。

導致兒童健康惡化的廣告，並不僅限於電視或平面廣告。廣告媒體及由媒體滿足的需求，全面滲入兒童的生活，從課本、網際網路、遊樂場、公園到包裝，無孔不入。這並不是說食品公司蠻橫地控制孩子的一舉一動，而是周遭環境替孩子作了選擇，而糧食系統進一步融入並擴大了最有利可圖的消費環境。因為如此，看兒童的例子才那麼發人省思。我們總以為必須從旁協助兒童作選擇，因為外界環境不止會影響他們的選擇，也會影響他們自身。我們以為兒童最不能獨立自主作選擇，但一次又一次的研究（有時由廣告業發起，有時不是）顯示，兒童往往能分別什麼是廣告、什麼不是。這似乎在說，讓兒童接觸廣告無妨，因為他們自己會判斷。但也可以用不同觀點來詮釋這個發現。我們可以說，大人面對誘人消費的廣告，反應其實不比三歲小孩高明到哪兒去。這實在意味深長。

確實，向兒童推銷食品造成的結果，已經模糊了大人和兒童之間的疾病差異。由於患糖尿病的兒童日漸增加，只好將「成年發病型」糖尿病改名為「第二型」糖尿病。中國城市的肥

胖兒童比率，一九八九年是百分之一點五，到一九九七年升至百分之十二點六。在巴西，從一系列具指標性的研究清楚可見，貧困的孩子的肥胖問題最嚴重；幼年就營養不良，長大肥胖的機率就越高。而兒童的命運會在大人的身上重現，現在和未來都一樣。換句話說，兒童是礦坑裡的金絲雀，因為衝著大人來的廣告轟炸不會比較少，在在誘惑和暗示大人做出不良的消費抉擇。我們以為孩子只會衝動行事，無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難以迎戰充滿垃圾食物和零食誘惑的世界。他們每天被劣質甜食包圍，身體早已漸漸嘗到苦果。這是他們成為食品業的銷售目標，所要付出的代價。然而，圍繞孩子的食物，還有他們接受的營養資訊，跟大人得到的並無太大差別。至少可以斷定，我們周圍的世界充滿了可能有害、肯定不健康的食物。

外在世界創造出的意義，還有我們跟這些意義的相互作用，都促成了布朗尼爾 (Kelly Brownell) 所說的「有毒環境」。大街和公路已經轉變成商業空間，提供簡單、圖像化的途徑，讓人快速獲得卡路里。《金氏世界記錄》上說，麥當勞的金拱招牌已經比基督教的十字架更廣為人知。甚至，在工作場所裡，販賣機吞下零錢，吐出甜食，陪伴我們度過愈來愈不規律的工作時間。至於工作之外的休閒時間，我們發現周遭環境同時塑造了我們獲得以及消耗卡路里的方式。

不管在美國或其他地方，都市裡的窮人接觸綠地和休閒設施的機會，整體來看就比較少。如果把收入設定為控制變數，那麼在歐洲各城市，綠地多就表示該區居民的運動機率，會比綠地少、塗鴉多的地區的居民多出三倍，肥胖機率則會少四成；後者體重過重的機率會比前者多一半，運動機率會少一半。

在美國，窮人住的地區明顯缺少休閒設施，而且跟南非都市的黑人一樣，美國黑人住的地方普遍較少綠地、海灘和游泳場地。對那些帶小孩想喘口氣的父母、想找地方玩耍的小孩，還有聚在一起和家人來說，綠地是很重要的生活資源。但享受公共綠地卻日漸變成只有富人負擔得起的享受。

飲食習慣不只受空間影響，時間也是。對美國的受薪階級來說，時間不夠用是個嚴重的問題。以房市目前的狀況來看，窮人的通勤路程勢必比富人長。最近美國有份報告指出，通勤者在房價上省一美元，就要花七十七分錢在交通上。省下來的二十三分還沒扣去通勤花去的時間。而且愈來愈多證據顯示，通勤竟然會提高超重的機率。也就是說，通勤時間越長，越容易超重。這還不止，就因為這些窮忙族趕著上班（說不定下班還得趕去兼差），所以更有可能會促解決一餐。在這種情況下，也難怪速食產品縱使有來自糧食系統上層和下層的壓力，仍然是很多人偏好的選擇。就好比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工人靠喝茶提振精力，一美元的雙層起司堡和薯條對辛苦了一天（甚至一夜）的美國勞工來說，也是溫暖又愉快的一餐。

邦尼小吃的故事，指向一般人思考這件事的一個有趣歧異點。在種族隔離的監控下，我們很容易看出空間如何被強制規範，黑人的生活步調和生活空間如何被剝奪。法規上寫得一清

二楚以外，警察也會嚴密監控是否有人逾越這種空間秩序。這種歧視是種社會問題，不是個人改進就能解決，必須靠群眾去抵抗、推翻，必須全面革新才能改變，這點每個人都會毫不遲疑點頭認同。今天，愈來愈多窮忙族被逼上類似的窘境，但眾人撻伐的不是社會或政治層面，卻是整個問題最表面、最膚淺的結果：肥胖。這就好像說，種族隔離制度下的黑人之所以生活悲慘，不是因為制度本身，而是因為他們很窮。所以解決的方法不是去推翻種族隔離政策，而是變成有錢人。

向肥胖宣戰

如果吃下肚子的食物是好是壞，深受我們的工作、休閒，還有居住的區域、能找到的工作，以及在住家和公司之間往返的時間影響，那麼我們也許會認為，不好的飲食習慣，是我們未能全面掌握生活和空間而引發的症狀。然而，媒體和政府都駁回這種診斷。相反的，一般認為飲食習慣不良就會導致肥胖，而肥胖本身就是結論，既是症狀也是疾病，這種沒什麼大不了的病用不著進一步解釋，因為大眾已經熟諳解讀身體訊息之道。食物甚至肥胖代表的意義，早已眾所皆知。總而言之，各界都鼓勵我們把肥胖理解成一種個人的弱點，一種面對紛雜選擇不知所措的無能表現，證明一個人欠缺自我約束力。一般認為肥胖是不善選擇所引發的徵狀，絕

不是缺乏選擇的結果。這是因為，針對肥胖這種社會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法，多半都以個人為對象。

主張肥胖是窮人欠缺自我約束力所致，這類論調引發了一連串的社會焦慮。如果說，二十世紀初，這種焦慮以社會安全福利，以及窮人若憤而掀起暴動會怎麼對付富人等問題呈現出來。那麼，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同樣的焦慮又跟社會安全福利，還有殘障人士和窮人會跟年輕人、富人和生產力強的人爭取什麼權利，相互扣合。二〇〇五年《新英格蘭醫學期刊》有篇影響力極大的文章，文中的學者如此呈現這個問題：

平均壽命還能增加多少？這不只是個學術問題。今日計算出來的答案，將會大幅影響課稅率的高低，還有年齡相關補助方案的償還力。社會安全局達成了……共識：美國的平均壽命會持續穩定提高，在本世紀下半達到八十五、六歲。社會安全局估計六十五歲以上的國民將大幅增加。現在就根據這點，悲觀地預言說社會安全局即將破產，未免言之過早。不過，這種「福利」會傷害國家經濟，屆時會出現國民未達退休年齡就喪失生產力的現象，另外，跟肥胖和肥胖併發症有關的醫療保險費用會大幅提高。目前，每年跟肥胖有關的醫療費用，保守估計有七百億到一千億美元。糖尿病患者激增，發病平均年齡下降，治療糖尿病併發症的費用將大幅提高，例如心臟病、中風、截肢、腎衰竭，還有失明。其他跟肥胖有關的併發症勢必也會跟

著增加，例如心血管疾病、高血壓、氣喘、癌症以及腸胃病。美國人民變得愈來愈胖，也許會無意中救了社會安全局一命……

到處可見這些憂國憂民的美國科學家類似的煩憂，而且全都跟後來所謂的「肥胖傳染病」脫離不了關係。問題顯然很嚴重。但國人憂心肥胖問題日益嚴重，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一九五二年，國家健康需求委員會的總統顧問布雷斯洛（Lester Breslow），就敲下警鐘，他說：

美國人的肥胖比例很高。接受波士頓保健診所檢查的「健康人」中，六個就有一個超重百分之二十或更多；一群在舊金山從事勞力工作的人當中，五個有兩個超重百分之二十或更多。顯然，現今最主要的大眾健康問題，就是控制體重。

如果憂心肥胖的現象，比我們以為的還要普遍，似乎就應該要問，大家到底有沒有必要為肥胖感到不安。一九九一年到二〇〇一年間，美國的肥胖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一，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也出現類似的數據。這似乎沒什麼好爭辯的。但很多人為了我們該如何理解肥胖的意義而爭論不休。以粗略的數據來看，美國的肥胖增加率，相當於每隔一代平均每人的體重

就增加三到五公斤（六到十一磅）。這會把每個人的體重鐘形曲線稍微往右移，進而導致愈來愈多人都符合甚至超過肥胖界定點。以生物學家費里曼（Jeffery Friedman）的話來說：

假設國人的平均智商是一〇〇，百分之五的人口智商高達一四〇，這些人是大家眼中的天才。現在假使教育提升了，平均智商提高到一〇七，百分之十的人口智商高達一四〇。這個數據有兩種詮釋方式。你可以說平均智商提高了七分，也可以說因為教育提升了，所以天才多出一倍。整個關於肥胖的論辯，就好比從天才多出一倍這一點，來評論國家的教育計畫。

那些要大家謹慎解讀肥胖數據的人並不否認，有些狀況確實值得我們擔憂。愈來愈多人因為病態肥胖而健康惡化，對此感到憂心完全正確。每隔一代平均每人就增加三到五公斤，光看這點就知道吃掉的食物和消耗的能量中間的落差，這也值得我們憂心。而且以市場的用語來說，目前看不太出這種落差有「自我修正」的傾向。再者，體重增加的原因，也是罹患心臟病或糖尿病等病症的原因，這點日漸受到認同。但觀察大眾如何描述肥胖傳染病的批評家指出，這類論點或關懷不常在有關肥胖的討論中出現。相反的，他們發現，當肥胖傳染病被視為一種社會問題來討論時，某些社群就會變成標靶。最近有份研究檢視了兩百二十一種醫學和書報資料，發現其中有三分之二提到導致肥胖的個人因素，但提到結構性因素（如食品業或地理

因素)的不到三分之一。更驚人的是：

提及窮人、黑人或拉丁美洲人的文章，把肥胖歸咎於不當的飲食選擇的占百分之七十三，相較之下，未提及這些社群的文章只有百分之二十九持此論點。同樣的，提及窮人、黑人或拉丁美洲人的文章中，有百分之八十將肥胖歸因於久坐不動的生活習慣，未提及這些社群的文章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九持此論點。

確實，窮人、有色人種，尤其是移民，常成為危害健康的罪人。克萊澤 (Greg Critzer) 在《哈潑》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就是個廣為流傳的例子：「在裡頭，媽咪拿個好大的炸蘋果餅安撫米古里托。爸比說笑話，往他兩盎司的咖啡裡倒了一盎司又一盎司的糖和奶精。從肥胖的角度來看 (我傾向的角度)，這個畫面不怎麼宜人。」或者可以再看另一個例子。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三日的《紐約時報》有篇文章談到巴西的肥胖問題，還附上一張「巴西胖子」的照片：三個體型龐大、身穿比基尼的女人，後來發現她們是歐洲女人。儘管如此，字裡行間還是鼓勵讀者找出她們身上反常和醜陋的部分。

這並不是要說，窮人並無面臨嚴重的健康問題。畢竟，糖尿病患者有百分之八十集中在低收入國，而且富裕國家罹患糖尿病的也以窮人居多。近二十年來糖尿病患者增加一倍，尤其在第二型患者，但研究糖尿病的資金卻持續下滑。糖尿病跟肥胖密不可分，而肥胖又跟缺乏運動、飲食不良和抽菸有關。調查發現，跟飲食和運動習慣息息相關的心血管疾病，在中國和印度所占的比例比所有北方國家加起來還要高。這些疾病顯然應該得到大眾的關注。但最要緊的不是這個。真正值得大家一齊探討深思的，是分析病因的過程中隱含的政治和經濟手段，還有潛藏的副產品：推責誘過的政治和經濟手段。

全民瘦身運動

把錯推給個人，跟鼓勵社會大眾對抗肥胖相輔相成。健身、使用機能食品和節食，往往是相當個別化的經驗。在健身房裡，集體管理脂肪其實是大家排成一列在定點上跑步，健身器材靠著鏡面排放——因此大家都跟不完美的肉體殿堂面對面。食物後面有食品工業，個人對體重的反應後面也有一整個工業。二〇〇五年，英國健身業雇用了二十萬人，收入高達二十億英鎊，到了年終英國有百分之十二的人口都是健身房會員。在美國，三千九百四十萬人在兩萬六千八百三十間健身房裡花費了一百四十一億；三百萬日本人花了三十億；巴西有兩百五十萬人 (人口的百分之一點四) 花了六億八千兩百萬健身。圍繞著肥胖效應而生的憂慮橫掃全球——瘦身工業也是。

但就如艾特金斯 (Robert Atkins) 在他的「艾特金斯飲食法」中所說，左右我們飲食的力量，其實是社會的、集體的力量：

我發現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很多患者都有某種癮。不是毒癮，而是對飲食中的某種成分上癮……那種成分就是糖……因為好多人都把甜點和甜食視為一天美食享受的最高潮，我們都心甘情願聽信甜食工業的宣傳詞，相信「沒有糖分，我們的大腦就不能運作」這種誤導大眾的說法。下一個十年，同樣的聲音會告訴我們：「沒有證據顯示糖分會導致心臟病、糖尿病或低血糖。」

顯然，甜食工業要負很多責任，而且會持續打擊維護大眾健康的行動，例如設法約束它的二〇〇四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飲食、運動和健康策略。然而，塑身工業高舉反甜食工業的論調，引起瘦身的熱潮，成功把自己塑造成正義的反對陣營——而且是財源滾滾的陣營。雖然目前的數據還未百分之百確定，但全球塑身業的年營收輕鬆就達到一千億以上。這是台很大的樂隊花車。你在上面會看到製藥工業，這種工業致力尋找治療肥胖的醫療方法及開發抑制食欲的藥物。上面還有食品加工業，他們試圖讓食物棄邪歸正，例如推出食用代油 (Olestra)，一種人體無法吸收因此零熱量的烹飪油 (壞處就是含有此油的食物上以小字體寫的：偶爾會

「肛門滲漏」)。結合飲食和製藥的是保健食品業，就是添加了醫療成分的食品。再不久，結合營養學、食品銷售和化妝品業的藥妝業就會加入陣容，因為可口可樂和化妝品集團萊雅將推出共同研發的美肌飲料露美 (Lumae)，據說此款飲料能改善膚色。可口可樂已經在日本推出不少商品，包括據說有豐胸效果的茶飲：Love Body。食品和藥品以外，當然還有推銷塑身餐的雜誌 (美國最暢銷的飲食雜誌是《輕食塑身》) 和塑身工業。

雖然節食的聲浪多於社會上對胖瘦標準的反彈，但後者的確存在，而且歷史輝煌。例如，國立胖子協助會 (現在改為接納胖子的促進會) 一九六七年在新約發起「胖子無罪」運動 (Fat-In)。某種身材獨受青睞，還有對外貌、對自己看起來應該瘦骨嶙峋，甚至對穿著的精神焦慮，一直都是種反抗的切入點。不過，「接納」胖子只是其中一面。學刊中愈來愈常出現「胖瘦都健康」的主張，肯定健康的生活方式，並在反對傳統的美醜標準之外，提供另一種制衡點。它提倡融合健全的飲食和運動，同時也對社會認可的身材類型說「去你的」。我們可以過健康的生活，同時拒絕所謂的「正常」和「正常人會渴望」的身材這種霸道觀念。透過這類主張，喚醒我們對美的感受力，鼓勵人多去想看起來迷人的方法，才可能擴大我們對美的想像。如果你覺得這種觀念很難打進主流，那麼也許可以想想，包括印度、中東和南太平洋在內的很多社會，都不認為俊男美女就要又高又瘦，直到最近才改變。不過一代的時間，特定的美醜標準就橫掃全球。一九九〇年，斐濟群島上幾乎沒有厭食症和貪食症。一九九五年電視開始

流行，其中又以美國的地面波電視居多，不到三年，斐濟的少女就有百分之十一點九患有貪食症。

深入飲食和肥胖的政治層面之後，我們看見了糧食系統經由某種結構形成的原因和造成的影響。而且，這些政治運作是複雜的系統導致的結果，如果放任此系統不管，它根本不可能自我修正。只要看看誰塞一大堆食物給我們，再除掉我們身上的肥肉並從中圖利，就能看清這點。二〇〇六年，瑞士巧克力製造商雀巢併購奎格減重中心（Jenny Craig）。這類併購案已經不是第一次。二〇〇〇年，聯合利華（Unilever）併購了快瘦塑身食品公司（Slimfast），班和傑瑞冰淇淋（Ben and Jerry）也在旗下。

現代人的飲食來源日漸集中化並受商業力量操控，伴隨而來的病痛日漸獲得控制，這點反映了另外一種結構效應。還記得孟山都農業生技公司把基因改造黃豆跟除草劑配成一組一起賣嗎？農民很難抗拒這種誘惑，他們原本只要買基因改造作物，結果也得把除草劑買回家。在兩種例子當中，消費者都買到了短期看來很有吸引力、長期使用卻可能上癮的產品。

為了擺脫這種不健康的循環，我們需要調整步伐，重新開始。這就是為什麼社會上對糧食系統產生的反彈（儘管一開始可能存在盲點和矛盾）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不攻擊身體症狀、個人意見或產品本身，反而試圖重新思考食物，選擇踏上捷徑尋找一種嶄新——也更獨立——的方式，以修正人類跟食物、身體的關係。

你的步調還是我的？

最先關心食物由誰生產、從何而來，我們如何才能更加享受食物的運動，就是慢食運動。慢食運動的目的，是要爭取選擇不同食物並好好品嚐食物的權利。它在義大利贏得勝利，並漸漸在全世界獲得共鳴。時至今日，慢食運動的分會遍及一百個國家，共有八萬三千名會員和八百個「convivia」，即品嚐和讚揚食物的分會。

食物真的很神奇——這還用得著說嗎？番茄好像是大多數人的比較標準。我不確定為什麼，但幾乎每個人都記得過去的番茄嘗起來遠比現在好吃。佛羅倫斯的慢食番茄確實好吃極了。況且，那只是兩片少見的起司上的小裝飾，卻在我的嘴巴引起了再也無法複製的震撼：所有味蕾為之一振，味覺煥然一新，喜悅緩緩升起。這些食物都是當地生產的。慢食運動主張食物要在一定的地方生長、食用。食用當地種植的作物，可跟生產者建立社會聯繫，了解農作物如何、何時種植，又為什麼照目前的方式種植。這是一種透明的食用方式，而且跟社會緊緊相繫，是工業化生產的食物無法達到的。慢食運動奉行它立下的美好原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達利歐弗（Dario Fo）也是慢食宣言的連署人：

我們的世紀在工業文明中展開，也在輝煌的工業文明下發展，先是發明了機器，後來機器甚至成了人類效法的對象。

我們都被速度奴役，全都屈服於同樣的有害毒素下：快步調的生活。這種生活打亂了我們的習慣，滲入住家的私密空間，迫使我們吃下速食產品。

人類必須擺脫速度的奴役，才不愧身為萬物之靈，要不然就會淪為瀕臨滅絕的物種。堅決捍衛合適的物質享受，是抵抗全球愚昧地追求快步調生活的唯一方式。

願受到保護的適量感官愉悅，以及緩慢而持久的生活享受，能免於我們被誤把狂躁當成效率的多數人污染。

捍衛慢食應該從餐桌上開始。讓我們重新發現當地美食的風味和美味，擺脫速食引發的負面效應。

快步調的生活以生產力的名義，改變了我們生存的方式，威脅我們的環境和土地。因此，慢食是目前唯一能讓我們持續進步的答案。

這才是文化的真正目的：發展各種口味，而不是貶低口味。還有什麼方式比各國互相交換經驗、知識和計畫更好？

慢食確保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慢食運動需要許許多多具備一定資格的支持者，貢獻一己之力，把這個（緩慢的）運動變成國際運動，小蝸牛就是它的象徵符號。

相當激動人心的呼籲。而且受到愈來愈多美食愛好者擁護。但慢食運動關心的不只是享受食物，還有生產食物的過程。他們給予生產者很大的支持。慢食援助計畫（*presidia*）把不同食物的生產者串連起來。弗瑞曼如此描寫北美的酪農業援助計畫：

工業化的生產模式已將北美洲的乳製品和乳酪全面標準化，創新的酪農於是重新推出古早的乳酪，並研發新種類的乳酪。這些乳酪通常都用自家農場的牛奶製作，並只在當地販售。慢食援助計畫將不同地區使用生乳、並有違反無數有利工業化生產模式的衛生規定之虞的乳酪生產者串連起來。這場戰爭在歐盟已經打了很久。

在歐洲，慢食運動的一個特點，就是保留傳統以及口味和風味的美好享受，反抗現代資本主義下工業化、機械化生產的食品，還有進口的食品及菜餚。不過，北美的援助計畫則是為經過多次移植和全球化而產生的食物提供避風港。如弗瑞曼的精闢分析，美國和加拿大的消費者跟食物的關係不太一樣：

北美的消費者較少對當地的產品忠心耿耿。援助計畫串連了「三十多個生產者，這些人

不是因為歷史或地理因素才結合，而是因為共同的目標：提升美國生乳乳酪的品質，並建立乳酪生產者之間的聯繫。慢食和乳酪製作專家組成的品嘗團，每年會從參賽者中選出最好的農莊自製生乳乳酪。美國的乳酪向來都是從歐洲引進的，因此缺乏*terroir*——這個法文字表示特定地區難以形容的品質，專指某地的土質和氣候，但跟農耕系統密不可分。農民和工匠具備的知識和手藝，也必定會反映在產品之中。美國乳酪都是根據歐洲原有的乳酪製成的，例如傑克乾酪參考巴馬乾酪、塔勒馬參考塔雷吉歐乳酪、磚塊乳酪參考林堡乳酪。

慢食運動引進美洲新大陸後，成立的組織確實凸顯出各地都存在的矛盾。究竟要保存飲食傳統，還是承認烹飪傳統不停變動，兩者之間陷入緊張拉鋸。對一個日漸成為純正傳統的守護者、新潮流的排斥者（某些分會）的運動來說，這個問題十分重要。但正因為這股拉鋸的力量，幾世代以後，說不定我們就會有為美國雜碎或英國雞肉咖哩而成立的慢食會。要是真有可能，那我們還等什麼？就連義大利菜必備的番茄都來自美洲。歐洲人發現新大陸後，義大利人才認識番茄這種蔬果。已故的英國外交大臣羅賓·庫克（Robin Cook），曾稱頌雞肉咖哩是道地的英國菜。確實沒錯：這道菜用的「瑪莎拉醬」在北印度菜色中根本找不到，是後來喜歡以肉汁調味的英國大眾加進去添加美味的。如果庫克先生能大方讚頌外來的食物，慢食運動為什麼要將它排除在外呢？因為它不是傳統英國菜嗎？所謂的傳統，以及支持「社群中」某些人的

權益甚於他人權益的傳統力量，本來就很可疑。傳統是惡霸遭人驅逐只好投奔愛國主義之前的第一庇護所。

記住食物體現了勞動者的勞心勞力和歲月累積的智慧固然重要，但我們也要記住，烹飪不是固定不變的。慢食運動者意識到了這其中的緊張關係。比薩大學的布魯諾里教授（Gianluca Brunori）跟慢食運動關係深厚，他說：「慢食地方分會希望藉由交流飲食文化和飲食觀，跟外來移民建立關係。」他在有史以來最大的慢食會議，即二〇〇六年在杜林舉辦的大地之母會議中，說了這番話，十分受人矚目。這次會議邀請來自一百五十個國家的成員在慢食的大傘下，分享美食和他們對食物制度變遷的看法。布魯諾里主張我們確實需要接受變遷，而慢食運動已經開始往這部分探索。

設法找出一個全新的飲食方式，並在今日的處境下開始推廣，無可避免會面臨自我矛盾的僵局。慢食運動遇到的一個最大矛盾，除了定義道地、純正的傳統食物有其難以化解的困難之外，就是買不起的問題。我們先看看慢食運動的起源，會更清楚其中的緊張關係。慢食運動始於一九八九年，一開始是義大利共產黨黨報《宣言》的插頁，題為「Garbero Rosso」，意指「紅蝦」，其實是一語雙關，主要在影射共產主義運動之歌《紅旗》。本來的訴求之一是要左派重新接納享樂的觀念，並把享樂跟大力支持勞工權益互相結合。但在義大利以外，甩掉慢食運動跟共產主義的掛勾對訂閱者來說比較輕鬆。確實，澳洲慢食運動一向好像沒有過去似

的，似乎也怡然自得。甚至有篇誇大的文章把慢食運動捧成某種高級的老饕俱樂部。慢食雜誌討論到南澳的芭羅沙谷（Barossa Valley）時說：「歐洲的富饒傳統和澳洲的新鮮活力融為一體，體現在此地的生活方式和土地景觀上。」說得好像芭羅沙谷真的是歐洲傳統大量湧入的無主土地一樣，其實這個地方是集合了中產階級的美食愛好者和葡萄酒農的特殊地區。

再說，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認同慢食運動。一般人對國家的想像中，也含有某種想像的、根深柢固的口味共同體，一種田園美景，一種懷舊之情，這就是保守政治觀念的原鄉。連義大利的慢食運動也無法免疫。每逢市長選舉，羅馬的慢食商店要不支持綠黨（左派聯盟的一員）的候選人，要不就支持義大利的右派政黨力量黨（Forza Italia）。

除此之外，對我們大多數的消費者來說，最要緊的問題當然是，要能踏上烹飪的探索之旅，甚至真正自由地品嚐食物、有時間開懷暢飲，大多數人都需要一舉囊括全部自由的通行證：金錢。但無可否認（慢食運動者承認的，不是我），這要花的錢會馬上讓你眼角泛淚，就像食物會馬上讓你嘴巴垂涎一樣。不過，慢食運動也指出，我們已經太習慣鄉下農家賠本賤賣的廉價食品。解釋這點時，慢食運動的發起人佩屈尼（Carlo Petrini）從口袋拿出手機，說：「食物的價格應該高一點。我們花那麼多錢在這個上面，卻不肯花錢買好一點的乳酪。」但有個羅馬消費者道出了一般人的看法，他這麼形容不久前才被網羅進慢食運動的肉販：「以前就夠貴了，現在光一塊牛尾骨他就要拿六十歐元！誰吃得起啊！」這是慢食運動遭受的批評之

一。大眾的反應是，這兩個例子都是指引改革的燈塔，是一種令人嚮往、等我們餵飽荷包才能一窺堂奧的美食烏托邦。

但我們其他人，也就是慢食宣言中所謂的生活步調超出荷包所能掌控的多數人，是不是就活該吃麥當勞？只要沒對麥當勞上癮就不是。

拒絕垃圾食物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二日，養羊也生產洛克福乳酪的法國農民喬思·布賀（José Bové），跟幾名友人涉嫌破壞法國南方米洛鎮一家正在施工的麥當勞。你可以說他「拆了」也可以說他「毀了」這間麥當勞，看你認同他的程度而定。這件事的導火線是歐盟和美國在WTO起了貿易衝突，導致法國洛克福乳酪受到關稅制裁。布賀幾乎是全家總動員：

包括孩子在內，大家都幫忙拆解建築內部：隔間，幾扇門，電線插座，還有屋頂上的金屬薄板；薄板上釘了釘子但輕鬆就能搖開，因為那是其中的一個配件，只是裝飾罷了。那根本就是一整片單薄又脆弱的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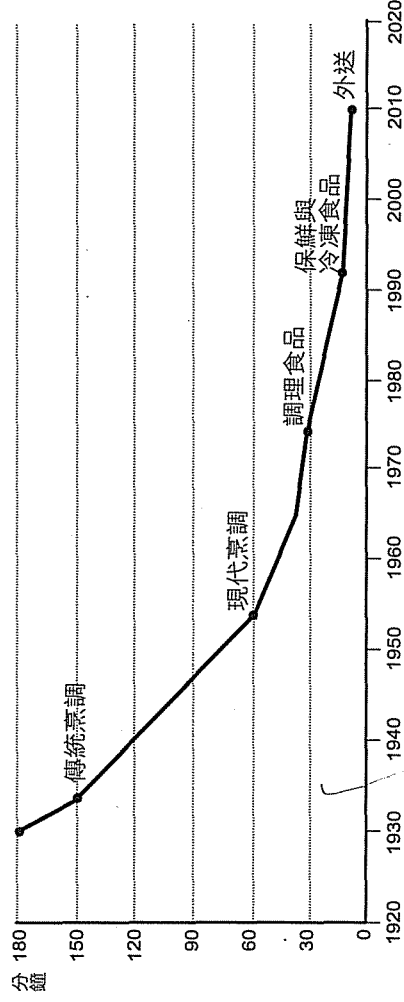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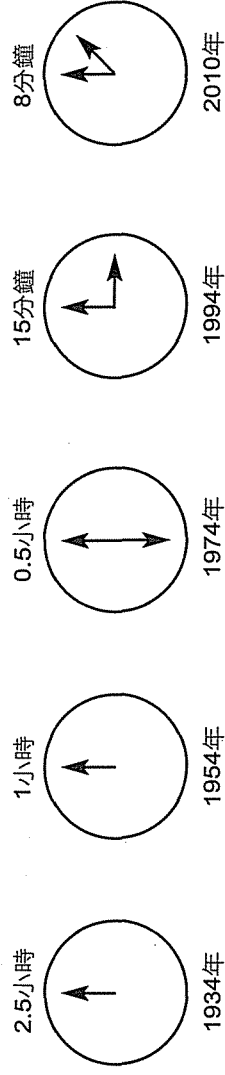


圖9.1 1934至2010年英國人下廚時間

(資料來源：David Hughes教授personal communication)

英國人在家做飯吃飯的時間大幅減少，世界各地皆然。這是因為女性在家中的角色改變、冰箱日漸普及、工作和通勤的時間變長、可簡單烹飪的食物愈來愈多，以及其他事比做飯更重要這種觀念愈來愈深厚。布賀投身的運動致力改變食物的意義，從人類對食物的需求和禮戰，他們也一樣。

布賀的行動是全球運動的一部分，但這場運動絕非未加思考的魯莽舉動。說真的，這場運動的目標就是要讓時間倒轉，尤其是圖9.1這些鐘面上的時間。

很明顯，這是一場全球抗爭。後來，布賀在基因改造作物農場上放火而遭羈押時，數百名來自不同農民運動陣營的印度農民展開環球之旅，踏上歐洲的土地。布賀被銬上手銬後，這些農民懇求法國警方也逮捕他們，因為他們跟布賀一樣看麥當勞不順眼。布賀對金拱招牌宣

戰，他們也一樣。

這不是一起反美行動，而是反垃圾食物的行動。我們決心絕不讓反美思想困住。這場抗爭要反抗的是自由貿易全球資本主義。針對的是某種經濟體制而非美國經濟體制的運作邏輯。反對的可能是任何一個國家，而不是持有美國護照的人。

有人抨擊布賀的盲目愛國意識和魯莽的反國家行動，但布賀跟慢食運動者一樣，很清楚他針對的不是麥當勞的發源國家，而是裡頭推銷的品質：

讀都包括在內。針對這點，布賀的觀察如下：

大家不再想要在家吃飯或自己下廚，一個家就會漸漸瓦解。居民接受這種命運就等於接受了一個失敗的系統，很難算是為孩子準備一個燦爛的未來。這些人就是默認全球疏離的共犯。他們必須要認清這點，而且要快。

跟大人一起用餐的孩子通常表現較好，這不是什麼艱深的學問。不過布賀的論點更為深入：慢慢用餐，欣賞食材還有把食材轉化成晚餐的手藝和用心，大人也會表現得更好。

然而，我們還是面臨一個問題：誰有那種時間和財力？

嘗試和了解如何朝這個方向努力的一個途徑，就是看看開始將鄉村和城市的貧窮問題結合起來的運動。如果有必要讓農場勞工得到更高的報酬，那麼農場以外的勞工也該有足以維持生活的工作，這樣大家才有錢吃得更好。這類運動在運動過程中將糧食系統的政治運作徹底翻轉。彼得·杜耶（Peter Dwyer）是南非爭取工作權運動的策畫人。他要求的不是給窮人便宜的食物，雖然過去兩百年都如此解決都市的飢餓問題。他要求的是消滅貧窮，這樣每個人都能取得健康的食物：

如果根本買不起，食物再便宜有什麼用？除非你有份合理的薪水和穩定的收入，不然根本買不起像樣的健康食品。所以我們才要團結起來。政府和企業不會想出錢的，但這就是我們要爭取的東西。這就是工會實際要解決的「肚皮」問題。在南非，工會贏得的福利大多都是為所有勞工爭取的。至於沒有工作的人，爭取工作權和其他類似的運動則會設法提供他們得以維生的收入。我們希望政府能大幅擴充公家單位，比方醫院、學校、教職，增加工作機會，這種作法會有更全面的效果。這麼一來，大家不只吃得更好，也會更健康、教育程度更高。

由此可知，近年來糧食政策的重點都是提供低廉的食品給都市勞工，以防止群眾抗爭，但有些組織卻發起抗爭，拒絕速食食品。這些人不只想要健康的食物，還要更健全的生活。他們想要的不是低廉食品這種治標不治本的短期對策，而是要長期提升薪資、就業機會、健康和個人尊嚴。

這一章涵蓋的範圍甚廣，讓我們看見我們每天作的選擇看似正常、自然而然，其實遠比我們所能想像的要奇怪、不自然。每一步都有食品公司的參與，他們設法改變大眾的選擇以從中獲利。這件事本身也許震撼力不夠，不足以讓很多人挺身而出，除非你開始把事件串連起來，了解背後的含意。我們今天吃的食物，看起來好像是為了迎合我們的需求，但這種狀況已經愈來愈少見。愈來愈常見的情況，其實是我們去迎合食物，儘管從生活步調和生活模式看起

來並非如此。我們漸漸成為消費傀儡，眼前所見的消費選擇也許並未真正將我們的最大福利考慮進去。跟飲食相關的疾病日漸增加，看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就可見消費者喪失清楚明確的選擇所造成的衝擊。而且，企業所做的選擇當然不會考慮到食品生產者——農民和農場工人——的最大福利。

但社會運動提出了或許可以讓我們選擇不同食物的方式，這些運動關心種植作物的人，也關心飲食帶來的美好感受。飲食的樂趣不應該只限於負擔得起的人。所有人都應該有時間和金錢吃得更好，而不是被迫選擇「垃圾食品」。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發起的政治行動必須是集體的、大眾的，不能局限於個人的消費選擇。這正是國際農民運動「農民之路」推動的政治計畫，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也是其中一員。他們建立了民主的運作架構，並在此架構中爭取所謂的「食物主權」。這樣才能把平等概念放回食物政治的核心，擴大對食物政治的想像。我們會在下一章結論探討這個問題。

1 譯注：美國作家 Joseph Heller 的小說，後引伸為左右兩難的處境。

2 譯注：印度教徒不吃牛肉。

3 譯注：採礦業有一說，把金絲雀放進礦坑，若牠沒事，表示空氣品質不差；若死了，表示走為上策。後引伸為警訊、前兆。

10

結論

沙漏裡面

於是國王穿著他華麗的大衣開始繞街。街上、窗前的每個人都說：「啊，國王的新衣多美啊！穿在他身上可不是完美極了嗎？看那長長的下襠！」沒人敢承認自己什麼也沒看見，因為這樣只會證明自己不識相或腦袋不靈光。國王穿的衣服第一次獲得所有人的肯定。

「可是他什麼也沒穿啊。」有個小孩說。

——安徒生〈國王的新衣〉

糧食系統並不是為你服務的，除非你是食品公司的經理。世界各地的農民和農場工人，

因為政府高官的縱容和市場的反覆無常，就快要活不下去。消費者肚子裡塞滿了加工食品而不可自拔。農企業的食品和行銷導致跟飲食相關的疾病病例數字創下新高，不僅危害成人的健康，也如同在兒童身上植入定時炸彈。含有低廉卡路里的產品打擊了本土經濟，但超市仍然在大量供應。我們跟食物的生產體系和飲食樂趣的距離愈來愈遠。大多時候，消費者渾然不知食物入口前所經歷的心酸血淚。而我們的住家環境和工作型態讓人不敢妄想現況可能改善。

然而，還是有希望的。本書的一個主旨就是，無論目前的飲食體制在哪個環節或在哪個時候受創，都已經有人團結起來反擊。有些觀念經過大家公開討論更臻成熟，指向嶄新的、更完善的糧食系統的途徑。沒有任何人或團體擁有全部的答案，但我在本章整理了一些過去的教訓，我們可以藉此畫出未來的藍圖。不過，還是先提醒大家，我們急需的是「改變」。我們有理由保持樂觀，相信情況會改善，其中一個原因是，目前的糧食體系不能持續下去相當令人懷疑。

我們為什麼要一個全新的糧食體系？理由很多，我能舉出的只是冰山一角。選擇本書的案例時，我一直堅守著一些理念和原則，是各種政治主張的人應該都會服膺的：從正義、公正和機會平等的觀點來看，我們目前的糧食體系是失敗的。而且它失敗之處不止於此。大多數人在乎的不只是政治主張。我們也在乎環境、永續、其他生物以及個人享受，在乎自己能不能比現在更好。從這些更大的角度來看，現行的糧食系統根本是一座荒原。它不只危害人類，也對

其他動物造成結構性的傷害。它永無止盡地消耗水和能源。它造成全球暖化，並成為疾病肆虐的溫床。它還麻痺了我們的受力和同情心。最諷刺的也許是，儘管糧食系統操控在世界上最有力的一些人手中，但它天生就脆弱不堪。

那是因為，這種飲食系統所造成的生態負荷、所需的資源以及所造成的剝削，規模都很龐大。就像任何一個有瓶頸的物流系統，現今的糧食系統本身就有系統上和結構上的缺陷。這些缺陷就存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表層，只消輕輕一撞，便會暴露無遺。這跟石油短缺的情況類似。一九七〇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時，學者兼社運人士羅拉·戴維斯（Laura Davis）住在倫敦的違章建築裡，她記得當時的衝擊：「大家到店裡瘋狂搶購。我很好奇如果食物都沒了怎麼辦。就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接觸到有機耕作。」如果商品架上的食物真的都賣光了會怎麼樣呢？剛走入新一輪千禧年，就有六千萬人差點知道答案。二〇〇〇年，英國拖運業帶頭掀起抗議潮，八大煉油廠有六家被抗議人士封鎖。加油站關閉。高速公路上的車流量減少四成。貨運和物流業停擺，幾個小時內全國就會斷糧。標榜「及時送達」的超市物流系統，以及英國百年來依賴別處生產食物的模式，統統無法動彈。架上的商品幾乎搶購一空。

英國人的肚子淪為燃料業的俘虜，這並不令人意外。英國馬路上的卡車有四分之一載送的是食品；英國家庭一年平均開車一百三十六英里（約二百一十八公里）去買食物。各國的相關數據不太一樣，要看商品、當地氣候和測量標準而定。不過，美國有份研究計算了本地

栽種的農產品和從平常產地送來的農產品，兩者所需的運送路程：一籃當地的農產品從農場運送到市場的平均路程是五十六英里（約九十九公里）；從平常產地送來的食物，平均路程是一千四百九十四英里（約二千四百零四公里）。這些運送成本便是現代糧食系統過分依賴化石燃料的最明顯跡象。「綠色革命」倡導的科技，例如化學肥料，需要大量能源才能製造。就如作家理查·曼寧（Richard Manning）所說，現今的糧食系統所需的能源，跟它製造的能源一樣多。沒有了製造、運送農藥和肥料所需的能源，傳統的糧食系統勢將停擺。

羅拉·戴維斯為英國政府研究地方公家單位的採購模式時試圖提出這點。她說：「我們正在討論發展一個健康的食品經濟，也正在規畫供應鏈。但他們不准我提出食物運送里程的論點，因為這帶有反競爭意味，因為這就是歧視外國食品。他們也不許我以石油經濟的例子來說明發展當地食品經濟的必要性。」

羅拉的論點也可用來說明水的狀況。現代糧食系統需要的大量淡水，超出了環境負荷；而大量淡水是為了讓「高產量品種」擁有符合實驗室標準的完美生長環境。巴西的馬托格羅索的社運人士要我代為傳達一個訊息：「告訴大家我們的水快用完了，是黃豆業榨乾了瓜拉尼（世界最大的地下水源）。「生產一公斤穀物要用上一公噸的水，而那些穀物大多是給動物的飼料。要是生產一公斤牛肉得用上七公斤穀物，就不難看出工業化的肉品生產體系為什麼會榨乾巴西的地下水了。這種現象在全球不勝枚舉，因此我們不難理解能源和水為何會引發戰

爭，而且不只在中東。可想而知，這類資源衝突會持續在這個世紀發生。順便一提，這可不是我的推測，而是前英國國防大臣約翰·瑞德（John Reid）的推測。

枯竭的化石燃料、土壤肥力與水資源，是現今糧食系統的逐漸下沉的基石。然而，設法指出這點的社運人士卻被快速消音。克麗絲汀·丹恩（Christine Dann）就有類似的經驗。她是紐西蘭綠黨的成員，曾在政府會議上呼籲發展永續糧食，卻遭到漠視，儘管許多無可置疑的事實就擺在眼前。她說：「這就是我們面臨的窘境：國王沒穿衣服，但誰都不准說他全身光溜溜。」

紐西蘭綠黨近五年來一直在推動「食物改革」運動，提倡安全食物。他們定義的「安全」食物為：以永續的方式生產，標籤明確實在，遠離化學藥劑、疾病和污染，以及行銷手法要有良心。克麗絲汀·丹恩表示，這個運動影響了許多不同的層面。他們成功說服政府資助有機研究、組織發展和種植者。另外，也有愈來愈多人支持學校不賣垃圾食物，轉而供應健康的食物和飲料。

丹恩說：「一般民眾對糧食系統的看法比政府更全面。他們想知道自己吃的食物從何而來，如何栽種和加工，還有裡頭到底有哪些成分。但當消費者的選擇自由碰到打著『自由貿易旗號的企業時——不用考慮倫理、健康和環境的自由貿易——紐西蘭政府一向站在企業那邊。」

政府竭盡所能地不理睬消費者和生產者的要求。有時候，當局只要緊緊摀住耳朵就行了。例如，我們看見美國有超過九成的消費者希望食品標籤上註明是否為基因改造，但政府卻不肯考慮。二〇〇六年二月，美國政府更進一步，不僅不顧消費者的要求，還準備在必要時封住眾人的口。法國農民喬思·布賀原本預定赴康乃爾大學參加會議，但因為他反抗麥當勞並因此被定罪，美國就不准他入境。將農運人士消息的不只有美國政府。同年稍後，八十位赴新加坡參加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的農運代表遭扣留，多位代表被驅逐出境，就因為他們對農村發展的看法跟國際金融組織不一致。二〇〇五年在香港召開的WTO會議，到場對強權說出真相的農民也有類似的下場。這些國際事件只是農村貧民平日受到的迫害中最明顯可見的，同時也說明了在警察的蠻橫之下，最不堪一擊的永遠是窮人。

不過，政府也不是全然不關心飲食。冷戰時代將糧食與國家安全結合的憂患意識，如今順應時代變遷，換上了新的面貌。各國政府愈來愈關注糧食體系，主要目的不為平息勞工的不滿，而是糧食體系可能禁不起恐怖攻擊。不過，就如記者史丹·考克斯(Stan Cox)雄辯滔滔地指出，美國農業經濟所受的傷害大多是自己造成的。以農業為目標的恐怖份子如果真的要破壞糧食供應，會發現他們的攻擊很難達到這樣的效果：美國每年的「一般」食物疾病病例就有七千六百萬宗，有三十萬人住院、五千人死亡。此外，農藥污染了美國多達四分之一的水井，使亞硝酸鹽含量都超過了安全範圍；要是恐怖分子想在井裡下毒，也得跟這個記錄較

量。

很多地方方的亞硝酸鹽污染都來自畜牧業。集中型動物飼養經營(CAFOS)就是生產愈來愈大量的肉品以供全世界消耗的殘酷家畜集中營。這些飼養場是獸血、抗生素(美國製造的抗生素有七成都用在畜牧業)和穀物(美國有六成穀物是用來餵養牲畜)的大煮鍋。當然了，還有動物糞便。在美國，飼養場一年製造三億噸糞肥；動物的排泄物在墨西哥灣造成面積如紐澤西大小的死海區。集中飼養場屬於農企業，不須遵守許多約束其他產業的環保規章。普通的豬製造的糞肥是一個人的四倍，因此畜養五千頭豬的集中飼養場就要處理相當於兩萬人城市的糞量——只不過它不設污水處理系統。集中飼養場製造的廢料有固體、液體和氣體，它們會危害土地、水，最嚴重的是自然環境。畜牧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百分之十八，它對氣候變遷的影響甚於開車。

糧食體系不只會破壞環境，事實證明它也很容易引起生物危機。狂牛症及其轉移到人類身上的變異型賈庫氏症，都是工業化糧食體系的產物。為了增加飼料中的動物性蛋白質(好讓牛快速增肥)，業主在飼料中添加肉和骨粉。牲畜被宰殺後，導致狂牛症的傳染性蛋白質仍可存活很久。導火線可能是一頭病牛。當這頭病牛的神經系統進入食物鏈，牠身上有傳染性的部位又經循環成為動物飼料。這樣的循環不斷重複，愈來愈多被污染的、以牛肉為主要成分的飼料，進了牲畜的肚子，一直到人類發現這種傳染病。這時候，要阻止它在牛或人類身上造成的

影響，已經來不及了。有人估計，人類罹患的賈庫氏症背後的活躍因子，可在人體內存活最多四十年，而英國可能還有將近四千人的體內潛伏著病原體。

大西洋對岸的美國似乎逃過了狂牛症的侵襲。美國農業部將此歸功於嚴格的檢查和衛生制度。但曾在肉品工廠工作的戴夫·路瑟（Dave Louthan）有不同的看法：

美國農業部告訴全世界，病牛已在此地撲殺，沒有進入食物鏈。睜眼說瞎話！我受不了政府這樣隱瞞實情，所以午餐時間就跟新聞人員一起離席。他們問我：「病牛有沒有進入食物鏈？」我說廢話，那是肉品，不在食物鏈裡會在哪裡？農業部說不再撲殺倒牛（不能走路的牛隻），基本上就表示不會再做狂牛症篩檢。農業部一發現感染的牛隻，就馬上停止牛隻的腦幹取樣和篩檢工作。為什麼？錢啊！而且是好幾十億啊。

可想而知，路瑟已經不在那間肉品工廠任職，他發出的警語似乎並沒有將糧食系統的危機減到最小。畢竟，又不止牛肉有問題。糧食系統最近爆發的危機是H5N1病毒，就是大家熟知的禽流感。報章新聞大多把癥結指向候鳥。但H5N1無可否認是一種家禽病。而且從每個案例都可看出，最終的原因都跟候鳥無關，問題在於附近地區的大規模養禽業。也難怪這本書付印之際，又爆發一次H5N1病毒疫情，地點是歐洲最大的火雞養殖場，即柏納·馬修

（Bernard Matthew）這家以英國為本部的企業。

工業化農業的前景並不樂觀。糧食系統要是繼續運作，就要為氣候變遷、生態系統惡化和嚴重的環境污染，負起最大的責任。要是出了什麼差錯，飼養場的培養皿上便會培育出新的致命病毒。H5N1病毒若能得到控制，人類文明就好比逃過一顆子彈；但糧食系統是把機關槍，時時刻刻製造新的威脅。這還沒把糧食系統中因為壓低薪資、剝削甚至奴役勞工而對人類造成的傷害計算在內，對動物的傷害就更不用說了。為了解決陸上的危機而轉向海上發展的人也很倒楣。目前的研究指出，以工業化的過度捕撈和消耗速度來看，魚資源到二〇四八年就會耗盡了。

除了我們，還是我們

我這輩子一直有個夢想、一個目標、一個理想鞭策著我：推翻我們國家不把農場工人當人看的農場勞動體制。

農場工人不是農耕工具，不是戴重的牲口，不是讓人用完就丟在一邊的。就算我們住在城市裡，農場工人——跟我們同樣膚色的男男女女——卻過著毫無尊嚴的生活，我們的文明又怎麼可能進步？

攻擊我們工會的人常說：「你們的團體才不是工會，而是社會運動，是民權運動，總之就是危險的東西。」

說對了一半。

我們在爭取尊嚴，我們在挑戰並抵抗不公義，我們在賦予力量給教育程度最低的人——還有最窮的人。

我們的訊息一清二楚：如果這種事會在農場裡發生，就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生，城市、法庭、市議會、國家立法機關等等。

社會改革一旦展開，就再也無法回頭。你無法讓一個學會識字的人不再識字。你無法羞辱一個有尊嚴的人。你無法壓制什麼都不怕的人民。

——凱薩·查維茲¹

糧食系統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也沒有必要這樣。每個人都可以藉由某種方式影響糧食系統，重新打造更好的。我們可以要回糧食系統從我們身上剝奪的東西：做人的尊嚴（拒絕別人硬塞給我們的東西，和硬要我們遵循的工作及生活方式）；對自己的生活、身體和自我形象的掌控權；不論孩子在哪出生都能吃到健康營養的食物、擺脫貧窮，並在這一代人不再破壞的世界裡成長；最重要的也許是，重新發現享用好食物的快樂。

最早對岌岌可危的全球糧食系統做出最重大且全面反彈的，應該是「農民之路」。他們的目標是爭取「食物主權」。這個運動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是由直接受現代農業體制迫害的一群人發起，也因為它提出了人人都可參與改革的深刻目標。「食物主權」的定義頗為冗長甚至有點累贅，底下擷取一小片段：

食物主權是人民、國家或聯邦決定他們的農業和糧食政策的權利，不是要丟棄……（來自其他國家的食品。這權利包含）農民的權利，還有消費者決定自己要買什麼、食物由誰及如何生產的權利……也要認可女人的權利，她們是農業生產和處理食物的主要角色。

食物主權是一個理想，目標是徹底剷除糧食系統中掌權者對無權者的剝削。這絕不是要呼籲大家回歸傳統而封閉的農村生活。舉個例子，從特別強調女農民的權利這點來看，就知道食物主權正中許多農業社會的要害，為徹底的社會改革開了一扇門，而且把家庭當作改革的起點。在南方國家，女性種植的糧食占全部的六到八成，但女性擁有的土地卻不到百分之二。爭取女權，以及認同糧食系統從培育種苗、收成、烹調到供應都少不了女人，這就是農民運動並不嚮往過去的農村生活，而是想打造一個全然不同的未來之明證。

不過，說這些人擁有權利是什麼意思？將女性、消費者和生產者的權利放進同一個大傘

下很奇怪，因為一般人認知的權利只有個人才能擁有。深入來看，這個明顯的缺陷其實是神來之筆。透過「主權」的角度來看，就會更清楚了。現今糧食系統的樣貌與內容都不是多數人決定的，而是把持在少數人手中。多數人只能承受少數人的選擇所造成的後果，不管在家中、農場或超市走道都一樣。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情況下，我們都沒有主權。奪回糧食系統的控制權需要個人和群體的努力，也需要個人和群體的權利。個人和群體的界線何在，需要經過嚴謹而民主的討論。定義不該取代討論，而該成為討論的起點。

爭取權利的行動從個人到全球都有。有些需要國際合作才能推動，有些取決於個人。行動和權利結合，形成一個循環：要改變自己，要先改變我們的世界；要改變世界，要先改變我們自己。兩者缺一不可。兩者都不容易。

列出這些改變很難，因為它們會根據情況而不同。不過還是有些大方向。若從個人開始做起，多數人覺得最困難（因為最根本）的改變是：

1. 改變口味。糧食系統造成的傷害，大多把「消費需求」當成擋箭牌。食品公司不過就是提供大家想吃的糖、鹽、肉和油脂——這是他們自己說的。抵制供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戒絕需求。當然了，說的比做的簡單。我們很難壓抑身體對加工和高熱量食品的固有渴望，尤其我們已經不認為這些食物有什麼問題。要戒絕它們怎麼可能容易呢？打從出生以來，我們就被食品工業團團包圍。食品工業的美學標準已經融入我們的味蕾。跳出那套標準等於不信任自己

的欲望。我們的飲食直覺是糧食體系的產物，不可能指引我們追求更好的飲食。占今日垃圾食物最大宗的點心和零嘴為什麼被稱為「衝動購物」，畢竟不是沒有原因的。食品業砸下重金培植並誤導我們的生理需求。所以「自主」就意味著重新檢視我們的衝動，將我們早已變質的直覺列入「管束」。要拒絕糧食系統幫我們做的決定，這麼一來，「我喜歡」就會暫時變成可疑的反應，而非購買的序曲。

不過，食物主權並不是要大家禁欲。學習吃當季的食物一樣可以心滿意足。改變口味是一種帶有文化意味的邀約，邀請你更深入、更敏銳地體驗無法運送、無法加工，一年只有短短一季能夠吃到的美食。這種體驗是一種感官的禮讚。享用食物的時候，我們五官並用，而重新要回對口味的自主權的樂趣之一，就是讓我們能更豐富、更深刻地品嚐食物。達成此目標最好的辦法，就是重新結合烹飪的藝術和自己下廚的感官享受。

我從一個好朋友身上學到很多烹飪的感官享受。他名叫馬里努奇（Marco Flavio Marinucci），是個藝術家，多半在舊金山活動，一直是美食愛好者。最近，他決定上網分享他對烹飪的熱情。他召集一群人一起去逛當地市場，然後在雜誌上貼文詢問是否有人有興趣一起烹飪當季、當地的菜餚。大家一起下廚才幾次，他的「現在就下廚」訂閱率馬上飆升，而且每次下廚都樂趣無窮，絕無誇大。他對自己的飲食哲學有很精采的闡述：

演化使人類必須頻繁進食，這是份禮物。我們可不要小看這份禮物。我相信當我們專注於自己做的事，心裡必定會更加滿足。每一餐我都會全心全意準備。從當地當季的食物中選擇最好的食材，有時間就盡可能從頭開始烹飪，而且牢牢記住跟你分享食物的是誰——這些都是烹飪的前戲，慢慢累積高昂的情緒，最後在美好的一餐中得到釋放。

馬里努奇把食物和性連在一起沒什麼不對。跟盡情品嚐的一餐比較起來，食品業的慣用手法簡直就是少男少女笨手笨腳的性摸索。馬里努奇刻意將食材的品質跟食用時的滿足連在一起，也很正確。只要嘗過優質的、當季的、自家烹飪的食物，很少人會再偏好工業化生產的食品。這是食物主權很重要的一點：改變口味就等於改變吃的食物，順應糧食的生長地和生長時節來吃。也就是要盡量：

2. 吃當地、當季的食物。不須在遙遠的地方種植或處理的食物，嘗起來較美味，花費較低，製造的二氧化碳也較少。這類食物就是當季食物。這種飲食方式意味著，比方說，冬天能吃的新鮮番茄比較少。但其實我們能選擇的食物種類比我們以為的多很多；我們要重新教育自己的味覺，這也是動力之一。當地種植、當地消耗的食物不須另外改良以利運輸。改變我們的口味就是拒絕食品業的粗糙食品，尋找用心製造的食物。這表示如果我們想吃魚、肉或動物製品，就要有永續的畜養方式，付出更多心血。改變口味不僅要改變吃的內容，還有食物的來源

及生產方式。所以，第三個原則就是：

3. 吃得符合農業生態。在北方國家，有機食品的優點日漸受到肯定。然而，「有機」現在已經成了一種工業。現今的糧食體系輕易就能轉變其工業化生產方式，生產出農藥減量的食物。如果到店裡購物的唯一準則是購買「大量生產的有機食品」，也許可以重挫農藥公司，卻無助於改變糧食的耕種方式。最要緊的問題是，有機耕作依舊跟單一栽培並行。資深飲食作家麥克·波倫 (Michael Pollan) 觀察道：「困擾現代農民的所有問題，癥結幾乎都在單一栽培。」就算農民戒掉對農藥的依賴，還是離不開糧食體系內的其他制度。更根本的改變，來自「有機」這個詞及奉行其精神的耕作方式：生態農法。這種耕作方式源於古巴，後來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版本，例如日本人富岡正信的「一根稻草革命」（完全不翻動土地的耕作法），還有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推動的永續農業連結與推廣計畫 (SANE)。這種耕作理念是跟著自然的規律來耕作，培育並保持土壤肥力，生產多種類作物，配合當地的需求、氣候、地理、生物多樣性，還有當地社群的期望。這種耕作方式能夠培育當地的專才，意味著農民不是「工業有機體」支配下那種用完就丟和可替代的資源。有機耕作不僅能餵飽地球，最重要的是，它將農業融入社會。

要確保食物的生產方式跟當地的環境互相調和，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認識當地的環境，然後自己種田。自己種田跟自己下廚有許多共同的優點，例如積極參與，花費便宜，還可以藉此

團結社群，更棒的是，這也是一項運動健身的方法。人民雜貨店和洛杉磯中南區的農民社群都能證明這點。你甚至不需要擁有土地才能種田。倫敦的「游擊園丁」²，便將公共空間轉變成有機食物的園地，改變了我們對地點和建築的認知。就算你很難找到時間或空間自己栽種符合農業生態的作物，應該也不難找到別人種的作物。這就要說到改革糧食體系的第四個原則。

4. 支持地方產業。雖然超市號稱種類齊全選擇多，但事實往往相反。超市的商品陳列架上看來琳瑯滿目，但它雇用的員工較少，新鮮食品少、價格也高於本地栽種者和商店的商品。傳統市場的食物比超市便宜約三分之一，而且多半來自本地。倫敦皇后市場的便宜商品和選擇通常比超市多，比當地的沃爾瑪或艾斯達超市約便宜一半，而且更能滿足不同民族的需求，更生氣勃勃。傳統市場的食物很少加工，所以通常比較健康，不過，它們必須很努力對抗能夠運用豐富資源的超市。

超市破壞了本地經濟是全球皆有的現象。我去逛過一個位於南非德本的傳統市場，幾英里外新開的一家大型百貨超市已經害它奄奄一息。當地消費者帕洛瑪女士（Mrs Perumal）道出了各地小鎮居民在沃爾瑪開張後應該都會有的感慨：「我們為什麼非去超市不可？大都會超市有這麼便宜的胡荽嗎？會有這種金盞花嗎？走路我根本到不了。難道為了吃的我要買部豐田車嗎？」

這個運輸問題的一個解決對策在本書第八章有提到：社區支持農業（CSA）。它在世界各地已有愈來愈多參與者。這類計畫鼓勵消費者跟特定農場訂購食品，這樣每週就能收到當季的新鮮食品，其中多半是有機農產品。響應本地的CSA，可以減少農產品運送到超市的時間，並能跟農民產生直接的互動。這也對本地經濟有利。大家的錢如果都花在本地市場，錢就會在社群中流通，持續花用在本地的產品上。這就叫做社區乘數效果。在英國的一個CSA計畫中，每花一英鎊就有約二點五九的乘數效果。那麼超市呢？超市的營收是送回總公司和股東手中，而不會再投入本地經濟。因此，在同一個城鎮的超市花一英鎊，乘數效果只有一點四。美國的CSA成員能省下百分之六十到一百五十花在超市商品上的錢；不過，低收入家庭負擔不起訂購費，因此仍難以參與。在美國，CSA還有團結社群的功能。在一份有關CSA和性別的研究中，有位女性說：「投入這個組織使我更有力量，就算只能聽、不能參與，我也覺得力量倍增。只要它存在，我知道它存在，而且從中學到東西就足夠了。」很少人會對超市有這種感受。

這波浪潮已經促使農企業做出讓步。食品業就像剛剛往我們家裡倒了一堆垃圾（或是反式脂肪、玉米糖漿、鹽、阿斯巴甜）的吸塵器推銷員，正大肆張揚要移除加工食品裡的有害成分。有些食品公司正跟藥廠合作研發保健食品——吃了之後效果跟均衡飲食一樣好的食物。零售商也發出回應。沃爾瑪逐步將自己定位成全球最大的有機食品零售商。特易購正在研究「碳標籤」，以標示出架上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所製造的二氧化碳量。有些超市像CSA一樣也

有宅配服務；有些甚至模仿傳統的露天市場，或在鐵皮屋頂下營造出類似的假象。

有些零售巨人不只供應符合生態倫理的產品，還試圖以企業責任的外衣來包裝其經營模式。以英國的連鎖超市威羅絲（Waitrose）為例，它最近宣布要將三十三萬英鎊再投資於南非的教育計畫，幫助那些替威羅絲種植、供應水果的勞工的居住地。這是超市展現出的關懷社會的新面貌。威羅絲的總經理史帝芬·艾森（Steven Esom）到這些地區造訪，「離去時對公司在當地做的事感到無比驕傲。造訪之前，我百分之百認同這種做法；造訪之後，我百分之一百一十認同。很明顯，能發揮效用的是貿易，不是援助。」他以同樣的自信說，消費者也覺得跟生產糧食的人有「強烈的聯繫」；不過，他承認，還沒真的把南非農民帶來英國跟消費者面對面。

我們其實不用驚訝艾森先生認為能發揮效用的是「貿易而非援助」。如果他這麼想就入錯行了。在批評威羅絲之前，我們當然要說，讓南非兒童受教育是件好事。南非政府一直感到良心不安，一來他們努力要改變種族隔離的教育制度但效果有限，二來欠北方國家的債務一直阻礙南非和世界各地的發展計畫。

但我們還是必須批評。當威羅絲說「再投資」時，他們忘了說這筆捐款其實是他們從當地榨取來的金錢。不只他們的善行基礎相當可疑，他們用來獲取利益的資源也是非法占有的。南非最賺錢的出口作物農場，是建立在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下非法盜取的土地上，南非的

「無地人民運動」（「農民之路」一員）一直設法要回這些土地。種族隔離制度廢除後，白人還給黑人的土地還不到百分之六。

全球都有人展開具體行動，在糧食體系中爭取土地與正義。本書即將完成之際，我打電話給無地人民運動的組織者庫赫卡（Mangaliso Kubheka），問他怎麼看待威羅絲的慈善行動。但他沒辦法說話。他人在省府的地政廳長辦公室外抗議，剛受到催淚瓦斯攻擊，連人帶手機被抓進警車後座。同一天，在世界的另一邊，推土機開進洛杉磯的中南農場，夷平已耕耘了十四年的作物、社群和希望。

企業要不要履行社會責任，最主要的考慮是，做善事能不能讓他們獲利。超市巨人特易購大肆宣傳其學校電腦贊助計畫時，總是刻意忽略說明：家長得花十萬英鎊以上才能獲得足夠買一台電腦的禮券。不管是全都有（Whole Foods）或沃爾瑪超市，零售巨人的道德責任都只能從超額利潤中兌現，而且不管公關室怎麼說，在幕後操縱的那隻手都是股東。超市跟所有處於糧食體系沙漏瓶頸的企業一樣，只有在有錢可賺時才會滿足消費者的期望。他們按照嚴格的市場規則運作：一元一票。因此，沒錢可賺的消費者需求，他們根本不理會（只要看看超市員工的薪水就會知道真相）。這就是零售商想像中的良心消費跟食物主權的理想不符的地方。在美國，把自己放在企業社會責任前線的連鎖超市是「全都有」，其管理者聲言他們的使命是：「一，改變全球的飲食方式；二，創造一個以愛和尊重為本的工作場所。」確實，世界上有愈

來愈多人是在超市找到自己想要的食物，而且「全都有」超市對這種全球性轉變功不可沒。然而，改變全球的飲食方式，需要的不只是盡力提供本地生產的食物，也要讓社會上最貧窮的人有能力吃得不一樣。「全都有」超市也被戲稱為「全都付」，它當然鼓勵我們多花點錢在食物上，但多付的錢最終是否到了最需要的人手上，誰也不知道。要達成這個目標，糧食體系需要進行徹底的、政治的改革。超市絕不是進行這種改革的場所，無論業者宣稱自己造成了多少改變。而商品架上的新奇商品絕少呈現這個事實，只有貼上公平交易標籤的商品才能。

公平交易標籤代表一個承諾：農民生產的作物起碼能賣到高於市價一些的價錢。這種認證是農民得以從看輕他們的糧食體系中多抓回一點尊嚴和收入的途徑。這是我的看法，也是我買公平交易商品的理由。對其他人來說，公平交易更不只如此。它也是邁向新的後資本主義未來之路，剝削的鎖鏈將被團結的力量取代。這是多令人嚮往的未來。但公平交易不太可能實現這樣的未來。確實，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公平交易只是難以長久維持的糧食系統的小塊補丁，是讓快撐不住的農民能再撐久一點的方法而已。

這問題在於公平交易認證體制中的農民代表人數不足。再怎麼說，公平交易都是為了農民而成立的，但農民常發現他們的人數少於從公平交易標籤中獲利最多的人：配銷商和零售商。這個問題不是不可能解決，而且公平交易產品的價格也可能大幅提高，讓所有人都得到合理的薪資。不過，問題不只是認證過程中的結構性瑕疵那麼簡單。農產品的基本價很低，公平交易制度稍微提高了價格，卻不足以撐起、更不能發展南方國家的農業社群。公平交易的過程還鼓勵單一栽培，它讓農民和農村經濟只依賴單一作物。這制度等於把全球廣大地區的財富繫於北方國家的消費欲望。如果你負擔得起，是可以丟一兩分錢給種植大麥或可可豆以生產啤酒或巧克力棒的農民。但支配遙遠的南方國家人民的生活、農場和土地的還是消費者的欲望、善心和同情；南方人民的選擇、期望、尊嚴和需求還是普遍遭到漠視。再怎麼說，超市都是現代消費主義的教室，是我們學會忘記商品如何生產、學會令人上癮又有些罪惡感的消費樂趣的聖殿。社會改革在超市裡最多只是在消費者面前兜售的小玩意兒，怎麼也比不上獲利與剝削的資本主義力量。

良心消費很容易掉入的美麗陷阱是：以為我們只能透過市場跟生產者互動交流，以為採取集體行動的唯一方式是說服大家跟我們一樣消費。這種錯誤的認知改變了我們與社會改革的關係，使我們自以為是民主殿堂裡的消費者，可以隨心所欲抓下商店架上的商品。但我們並非民主的消費者。我們是它的所有人。民主不只在我們消費時發生，而是時時刻刻在生活中發生。吃的人和生產糧食的人之間的關係不能以品牌忠誠度或花費的金錢來衡量。縮短糧食系統、了解糧食的生產者，不只是建立賣者和買者之間的聯繫，而是建立某種人際互動。這種互動超越了簡單的交易關係，並看穿了某些共通性、某種主從關係，也致力終止結構性的權力不平等，就是這種不平等造成了今天的貧富差距。如我們所見，糧食體系造成貧窮問題，同時

也導致食物生產過剩。糧食的生產和分配機制助長了飢餓和疫病的問題。這種制度會成形，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擔心都市勞工和鄉下農民會站出來爭取平等。它的目的就是要吸收農村的財富，只給足夠的資源來堵住農民的嘴。但人民終究還是挺身而出，因為爭取平等一直是改革世界的唯一力量。正因如此，爭取食物主權比有財力才負擔得起的良知型享樂主義有更加豐富的意義，也更能創造豐富。

這就需要我們成為更完整、更有政治責任感的人，需要我們採取具體行動，培養對全世界人類的同情和團結心。比方說，我們需要投入以下的事：

5. 所有勞工都有維護尊嚴的權利。現今的認證制度很少保障勞工的權益。最能保障勞工獲得他們想要權益的方式，就是讓他們擁有自己的公司。屬於勞工的合作企業逐漸崛起，為經濟民主提供了一個模範。從勞資關係史上可見，勞工都要經過多次抗爭和全面成立公會後，才可能改善生活。勞工得到的讓步從來不是免費的。團結在一起，勞工才能談判，分開了就只能搖尾乞憐。若要強化農場工人的協商地位，一定要讓他們能組織起來並免於遭受迫害，就算是公平貿易的協商也不例外。過去二十年來，在政府有計畫的破壞下，南方和北方國家有愈來愈多工會瓦解，而自由貿易協議也幾乎宣告了工會的終結。

勞工的抗爭也凸顯出了一項需求：

6. 農村需要徹底的、全面的改革。世界上最貧窮的人口集中在農村地區，但他們得到的發展援助和投資卻少得不成比例。所謂的援助基本上是獨厚富人，要不就是地主，要不就是從農民身上獲利的農企業。很少有人居中將資源（包括土地）重新分配給赤貧人口。近來有計畫地實施土地改革的國家（如日本、南韓和中國）的人民，都比土地所有權集中的國家要富裕。但教育、醫療保健、基礎建設和就業機會要是不改善，土地改革到頭來只會讓人民賣了土地、遷居城市。全面的農村改革，就是要建立足以提供經濟發展機會和優質生活，好讓家庭想要遷入並貢獻心力的農村。這過程就如食物主權的原則一樣，必須由每個人一同投入心力，同時他們的權益要得到保障，而不是靠技術官僚或農企業來推動。不過，不管我們選擇住在哪裡，如果想要有更公平、永續的糧食體系，前提是要：

7. 人人都有可維持生計的收入。目前，只有負擔得起的人才能享用好的食物（更別提公平交易的食品）。沒有收入或時間的人只能選擇品質不良、沒有營養、黑心製造的食品。追求公平的糧食系統表示要致力重分配所得，讓每個人和每個人的子孫都能取得優質健康的食物，並有時間、空間和資源好好享用這些食物。因此，我們必須支持那些爭取最低生活工資、良好工作環境和勞工尊嚴的社會運動。這就表示要：

8. 支持永續的糧食供需結構。支持本地市場、錢在本地流通與社區支持農業，都是從企業手中奪回糧食系統操控權的重要途徑。但我們的口味受制於生活四周的建築環境，以及難以長久持續的工作與休閒節奏。爭取食物主權最徹底、最長久的一個方式，就是改善人類一磚

一瓦建立的世界。挑戰本地的糧食供需結構就表示去重新思考開放的空間與雜亂的場所。住家、學校、醫院、辦公室和監獄都必須改變。而這些都是為了：

9. 突破糧食體系的瓶頸。從不公平的糧食系統獲利最豐的公司，也是最抗拒徹底改革的公司。所以，對農企業的補助非停止不可。不只要終止美國的農場法案和歐洲的共同農業政策所提供給企業的補助，也要刪減工業化農場從化石燃料和（即將出現的）生物燃料業者所得到的碳補貼。要嚴格約束那些剝削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獨占企業，更要積極推動反壟斷法案。糧食系統讓環境和大眾健康付出的成本，應該全部反映在商品的價格上。換言之就是要對加工食品課稅，反映這種食品對人類和地球造成的傷害。有些地區和城市將此視為大眾健康的問題來處理，對食品公司的活動範圍加以限制。例如將加工產品趕出學校，或禁止使用有害的添加劑（紐約就禁用反式脂肪），都已經有人成功地督促政府去約束農企業。然而，我們還有漫漫长路要走。對北方國家的居民來說，這表示要：

10. 為過去和現在的不公提供補償。北方國家幾乎每個人都從對南方農民的剝削中獲益。比方說，大英帝國靠著強迫他國進行小麥交易來餵飽人民。生產糖和菸草的農場就是奴役人的工具。許多南方國家至今仍要輸出農產給北方國家以清償債務，好比在進貢。該是取消這些債務、讓北方國家補償南方國家的時候了。北方欠南方的可要好一段時間才能還清。北方的工業活動導致全球氣候改變，衝擊最大的就是南方的農業。再者，是北方用政治手段操控糧食體系，將生產過剩的作物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傾銷到南方，才導致南方農民生活更加困苦。這樣的行為也該到此為止。食物主權的意義就包括，南方人民的權利不該少於北方人民的權利，窮人的權利不該少於富人，有色人種的權利不該少於白人，女性的權利不該少於男性。

跟隨領導者

布萊恩：看吧，你們都弄錯了！你們不須要跟隨我或跟隨任何人！應該要想想自己才對！你們都是獨立的個體！

群眾：對！我們都是獨立的個體！

布萊恩：你們每個都不一樣！

群眾：對，我們每個都不一樣！

某人：我沒有……

群眾：噓！

——電影《萬世魔星》

農民爭取的食物主權，跟愈來愈多消費者的期望如此吻合，實在令人吃驚。每個人都希

望吃得更好的食物，也不希望吃得好是以犧牲窮人為代價。農民之路將WTO的用語改變成：「想打入市場嗎？是的，我們想要打入自己的市場。」印度的卡納塔克邦農民協會也是農民之路的一員，其成員南俊達斯瓦米（Chukki Nanjundaswamy）簡單說出他們的目標：「我們努力要剔除中間人。我們的口號就是『生產者多拿一盧比，消費者少花一盧比』。」爭取食物主權即在推動政治運動，解決糧食系統在農村和城市這兩端、在全球窮苦地區所造成的貧窮。因為農村和都市的問題是緊密相繫的，而且終究會變成同一個問題。要解決此問題，我們需要採用政治手段。

這些政治手段會是什麼樣貌完全依賴當地的環境和力量，因為它取決於人人是否都能發表意見。食物主權意味著解決方法各式各樣，沒有唯一的答案，也不是單一企業獨有或獨占的方法。這裡頭沒有各地適用的一套法則，而是能貼近歷史、生態和文化，也能尊重人權的一套觀念、政策和飲食方式。本書的網站 www.stuffedandstarved.org 整理了數百家在你周圍推動偉大工作的組織，還有判斷本地市場的商品是否當季、優質的指南。我們沒有簡單明瞭的答案，但這是諸多起點中的一個選擇。

至少，現在我們不僅知道要對食物的產地提出什麼問題，也學會質疑人與食物的關係究竟為何。要掌握食物主權，我們對食物的認知不能停留在童謠和童話的層次，也不能依賴直覺式的推論去解釋飢餓和肥胖。我們必須質疑糧食系統，質疑種子及其栽種的環境：經過基因

改造嗎？土地為誰所有？工人處境為何？我們還可以追問農作物生產需要什麼資源：資源從何而來？如何送達？生產過程需要多少水？生產和運送要用到多少化石燃料？我們也可以問自己是否有能力取得想要的食物：我們有多少時間跟家人共餐、自己下廚？願意花多少收入在食物上？有什麼食物想吃卻吃不到？我們更可以問國際性的問題：生產糧食的國家現在的情況如何？他們需要償還多少不合理的債務？當地人自己決定生活走向的自由度和權利有多少？消費者的行為如何支持或阻礙他們？這些問題是我們聽新聞時、面對民選領導人時、建立民主制度時都應該問的。但不管問了什麼，想要改善糧食系統，就要靠大家一起從事愈來愈常在這個體系中看見的其他不同方案。

人民雜貨店和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這類團體，在某個層面確實令人讚嘆。他們幫助大家了解糧食系統的不公並更加尊重教育、生態與各種政治運動。無地農民運動這類團體，是各式各樣原本就存在的組織拼湊而成的，他們十之八九離你家不遠，既了不起又很熟悉，致力創造一個更民主、更穩固、更幸福的糧食體系。他們做的每一件事都不簡單，但都秉持同樣的核心理念：爭取自由、相互扶持，還有法國大革命的第三大理念——平等。

抗爭是糧食體系的常態。其中沒有浩大的戰爭，沒有最後的勝利或失敗，只有不同類型的衝突。就在我們身邊或在遙遠國度，無地者或有地窮人已經發起了運動，他們已經開始想像並打造不同的飲食方式。在我們眼前，都市菜園在供應糧食給窮人，而游擊園丁正擴大我們對

於什麼地方可以種什麼東西的認知。這些抗爭的共同點是，他們爭取的不只是生產和交易糧食的空間，還有獨立思考進而挺身爭取平等的空間。各種抗爭運動彼此結合，匯聚力量。在糧食體系中的這些男女英雄，每個人都做出雖有限但重要的良知抉擇或良心消費，並且不停止改革的步伐。他們的運動歡迎所有人加入。

阿瑞茲曼迪烘焙合作社的貝爾德從零售端來看責任和領導的問題：「我們的烘焙方式沒那麼複雜，一天就可以把人教會。我們無法教的是怎麼對自己負責。大家說來這裡是因為『不想要有老闆』。他們不懂的是，其實也沒人想當他們的老闆。」在爭取食物主權的過程中，可以沒有老闆，只有堅定的、經過論辯的、大家認同的決定，這些決定有時對、有時錯，但絕不任由某個領導人來擺布，這是我們為自己開拓的社會空間，永遠屬於我們。社會運動也面臨了這個挑戰。勞工階層的標語「不要上帝也不要主人」在布賀的家鄉米洛被改成：「不要上帝不要主人，也不要布賀。」沒有任何先知、領導人或超市促銷能迫使我們接納某些選擇或決定我們身處什麼體系。我們要不是積極行動而參與，要不就是因為漠不關心而被捲入其中；不管是哪一種，我們都已在體系之內。

這些運動展現的團結力量，為我們指出的選擇比現有的選擇更多元。重新掌控糧食系統，重新掌握自己的選擇，都不是個人可以達成的。結合群體就能融為一體。這表示要結合地方、地區和各國的力量，更深入了解我們所做的選擇，以及在地生產和消耗的食物。就如無地

農民組織說的：「打倒野蠻，要靠教育；打倒自私，要靠團結。」該是我們組織起來、教育大眾、品嚐好食物、收回主權與建立新體制的時候了。

2 1

譯注：Cesar Chavez，美國勞工運動領袖。
譯注：指出現於世界各大城市，在荒廢或無人擁有的土地上種植蔬果，為土地注入新活力和新生命的一群人，在有些地方這種行為是非法的。

致謝

一本談全球糧食體系的書，需要一整個世界才能寫成。有時候，那個世界感覺就像康乃爾大學的發展社會學系。Bob Torres、Saadia Toor、Kelly Dietz、Dia Mohan、Malinda Seneviratne、Ayca Cubukcu、Anna Zalik、Rachel Bezner-Kerr、Kaifir Anyce Schafft、Tracy Agard、Yem Long、Mikush Schwam-Baird、直銷協會、《天主教勞工》雜誌、《水果派》的編輯群，還有絢色佳的全球公義聯盟，都幫助我想得更透徹，活得更勇敢。感謝 Rachel Schwartz 跟我分享她對超市的洞見。Shelly Feldman、Ravi Kanbur、Steve Kyle 和 Peter Katzenstein 把分析工具交到我手中，但我恐怕沒有好好利用。

在印度，「南方國家關注組織」的印度辦公室有群好人，幫我走上正確的方向，尤其是 Meena Menon 和 Benny Kurvilla。卡納塔克邦農民協會的 Chukki Nanjundaswamy 和 Sheshar Reddy 利用開會的時間，討論農民之路和他們對食物主權的渴望。另外，也感謝卡納塔克邦農民協會、印

度農民聯盟，還有永續農業中心的許許多多人特地找時間跟我討論。Devinder Sharma和他同事P. Sanath跟Ramanjanayulu，以及永續農業中心所有成員、農村及工業發展研究中心的成員、尼赫魯大學經濟系的Jayathi Ghosh和Utsa Patnaik，都為我指出珍貴無比的資料。一路上，Banubhai Patel、Swarn、Livleen、Gurtaj、Mila Kahlon、Jasveen和Vinod Jairath供我吃住，指引我下一步該往哪裡走，又該從何理解。Sajja Srinivas、Biju Mathew和Sangeeta Kanat餵飽我，教導我也質疑我。Shalmali Gutal也是，在全球化議題方面，他犀利透徹、坦率明確的思想，一直是大家的明燈。

沒有未來食物委員會，我絕對沒辦法「搜刮」義大利的豐富資源，所以要感謝Vandana Shiva、Miguel Altieri、Debi Barker、Wendell Berry、Marcello Buiatti、Peter Einarsson、Elena Gagliasso、Bernward Geier、Edward Goldsmith、Benny Haerin、Colin Hines、Vicki Hird、Andrew Kimbrell、Tim Lang、Frances Moore Lappé、Caroline Lucas、Jerry Mander、Helena Norberg-Hodge、Kristen Conselius、Sandra Sunane、還有Pery Schmeister、Caroline Lockhart和Chiara Boni。感謝慢食運動的Carlo Petrini和比薩大學的Gianluca Brunori花時間回應我一些難以回答、有關享樂文化的問題。Marco Flavio Marinucci和Alison Bing一直讓我處於這種享樂文化中，而Alana Ferry則在羅馬提供我一個舒適享受的家。

另一個思索糧食問題的小組，不久前才在巴西會合。我要謝謝Renato S. Maluf、Jorge O. Romano、Adriano Campolina、Claudia Schmitt、Jaques Berthelot、Roberto I. Escalante Semerena、Maria

Clara Couto Soares，還有Bruno Losch，他為我們的一些討論提供了迴響的圖地。尤其感謝Corinna Hawkes，行動救援國際組織、Brazil John Wilkinson為我指出黃豆的歷史，也謝謝Christine Dann挖掘出李京海的思想，以及積極參與正義、種族和環保的議題。Laura Carlsen給了我睿智的建議，並在最後一刻提供我一則引言，我感激不盡。Laura Davis和Robert Vint對英國有更進一步的洞察，那樣的英國似乎漸行漸遠了。Katharine Ainger在《新國際主義者》期刊上的文章，還有收在《Notes from Everywhere》文集裡的文章，是一定要參考的資料。

在巴西，Maria Rita Reis、Jason Pelemeyer和土地權辦公室的所有成員，為我指出基因改造黃豆的弔詭。無地農民組織之稻米強化系統的Geraldo和Dulcinéia，無地農民組織在庫亞巴和龍多諾波利斯辦公室的成員，還有八月十四聚落的居民，供我們吃、住、談天，還有把酒言歡。Maria Luisa和Zé一接到通知就熱情接待我們。也很感謝Cargill和Bunge兩家食品公司在巴拉那瓜辦公室的員工，提供我們黃豆製的好東西，還有設於庫亞巴的ADM公司讓我們參觀他們食品加工廠。

Razack Karim，特別是Emelie Peine騰出時間填補我的無知，當我的嚮導，陪我跋涉、修補並思考本書中最深入的一些問題。沒有她的跨國觀點和豐富學識，我必定會忽略巴西和美國之間的許多關連——事實上，大半巴西都會被我忽略。Hannah Whitman對無地農民組織的入微觀察和評價，也幫了我大忙，而且她對本書初稿的指教實在仁慈，我愧不敢當。

Ana De Ita還有墨西哥農村變遷研究中心的成員，Peter Rosset和Sofia Monsalve（和她的家人）一直指引我方向，在墨西哥從容不迫地給我幫助，看到完成的初稿時也一樣。在泰國，綠色和平組織、貧民大會和南方關注組織的成員，尤其是Nicola Bullard，為磨坊提供穀物，為手肘注入力量，即使唉，我實在擠不出多少力量。世界貿易組織的David Dunkley證明自己是人民的圖書館員。

在紐約，Radhika Balakrishna讓我在馬利蒙特曼哈頓學院發表初步的論點；另外Anwar Shaikh好心的支持，讓我得以在紐約新學院發表文章。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局的Mark Ash提供的黃豆生產資料，對我幫助很大。波耳森國際發展協會和特路萊協會康乃爾分會，保存了本書的早期版本並供應它養分；感謝Kolya Abramsky從賓漢頓提供寶貴的意見；Jeff Purcell從綺色佳提供參考資料；反擊團隊的成員Michael Watts、Iain Boal，尤其是Ignacio Chapela，激盪出各種想法。

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的Sharmila Rudrappa好心邀請我參加南亞協會的活動，我才得以從Jagdish Bhagwati身上學到沒有古加拉的馬克斯主義者這種東西。Lee Hall和Michael Dorsey在重要的種族和環保論述上給我幫助。Steven Schapin對食物的想法永遠叫人覺得餘韻無窮。Daryll Ray、Tom Hayden、Jan-Willen Grievink、Richard Watts和Elizabeth Saguy提供我有用的參考資料，引文、觀念，也幫我打通關卡。Harriet Friedmann為我提出溫暖、有趣，而且富有挑戰性的好問作成果。

題。

糧食與發展研究所／食物優先學會的成員和見習生持續推動我提出的論點，並對我的研究提供寶貴的支持，我尤其感謝Alexa Delwiche、Amanda Cassel、Sanaz Memarsadeghi、Max Eisenburger、Anders Riel Müller、Paulina Novo和Marilyn Borchardt准許我運用我在當地期間參與的工作成果。

Sandy Nichols針對加州的外籍勞工給我建議。Joe Costello、Brad Templeton、Ryan Ismert、Carol Park、Will Kopp、Kara Holstrom、Joe Quirk、Michael Courville、Anirvan Chatterjee、Barnali Ghosh、舊金山桑徹作家窟穴的居民、Tezomoc、Vaquero一家人，還有中南農場的所有成員、人民雜貨店的Brahm Ahnadi和Malaka Edwards、Terry Baird、Myriam Rahman、阿瑞茲曼迪麵包的好心人，還有美國烹飪協會的Chris Loss，都在西岸給我幫助，我由衷感激。

社會研究學會的Jun Borrass和Eric Ross，與我分享有關土地和基金會的精闢見解。農民之路的Paul Nicholson和Nico Verhagenhagen在多次對話中提出政治方面的透徹看法。Naomi Klein和Avi Lewis在寫作和運動領域給我同樣的幫助。

在韓國，謝謝Bokrae Seo Lee一家、Sohi Jeon、Kang Ki Kap，北韓人民軍、韓國反投資協定和世貿組織的人民運動組織，忠南省唐津郡丘達區的居民。Chul Kyoo Kim的想法尤其明澈，但沒有Chad Futrell和Hyunok Lee，我可能還在原地踏步，感謝他們不吝賜教，不管在我前往韓國

之前、之後或在當地期間都大方支持我；他們一直激勵我，對我初稿的意見也使文章大有進步。

雖然本書大部分是在南非德本寫成的，但沒有開普敦的南非研究團體的幫助，尤其是Dan Mostenbergh和Shereen Essof，一定進展不大。醫學研究委員會的Mickey Chopra為我指出重要的研究。Louis和Christi Van Loon在以索波精舍慷慨招待我，我才得以體會「靜食」的真義。無地人民運動的Mangaliso Kubheka和Thobekie Radebe，教會土地計畫、國有土地委員會的顧問團（尤其是Stephen Greenberg，他為我指出有關超市的珍貴資源），還有南非反對基金改造作物的運動者，都支持我，鼓勵我。

很少有地方比南非的納塔爾大學更適合研究、寫作，感謝那裡的所有人，尤其是Visvanu Padayachee、Julian May、Harald Witt。我和Harald Witt還有納塔爾大學的Matt Schmitt到馬哈地尼考察，得由Dumisani Nyathi、Nonhlanhla Dlamini和aoibheann O'Sullivan的支持。我也得助於公民社會中心的許多客座和常任學者，以及歷史、經濟史和發展研究科系的教職員。

指導Claire Ichou、David Nseng和Sally Smyth很有意思，我也從中學到很多。德本的生活少不了一Helen Poonen。Anthony Collins、Amanda Alexander、Tavera Kapuya、Bana Bose、Sharad Chari、Ismail Khan、Fazel Khan、Richard Ballard、Mark Hunter、Gill Hart、David Stanton、S'bu Zikode、System Cele，還有阿班拉里里大學，他們都有意或無意給了我支持。特別感謝Julia Brown辛苦讀過

我的手稿。沒有Richard Pithouse和Yashna Jagamath，我想在德本生活不太可能，他們熱情與人分享音樂、詩、美食和生活，使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Chris Brooke是我的摯友也是細心的讀者。他發現我有份初稿的一些段落，來自他幫我在牛津大學的公司權力社團安排的演講。沒有他和Josephine Crawley Quinn的編輯和繆思女神般的長才，還有聯合起來（儘管不太平均）的好酒力，這本書一定會一團亂。

書中許多精采但也最文不對題的軼聞趣談已被編輯的利筆刪除或逼退，但說到利筆，很少有人比得上Philip Gwynn Jones，多虧他有波托貝羅出版社的專業協助，還有David Watson當他的堅強後盾。

然而，那個吃素的狂熱神父，光著身子對著區區幾隻母牛「曉以大義」，幸好生意人朋友救了他一命，我死也忘不了。我還留著神父的代理人給我的名片（「他主持婚禮一級棒」）。更叫人讚嘆的是ICM出版社的Karolina Suttone，在寫作的世界中我無法想像有比她更好的嚮導和夥伴。另外，序言的部分要深深感謝Palash Davé。

向Phil McMichael的指導、支持和笑聲，致上我最深的感謝。他一直覺得我可以寫一本書，讀了一遍又一遍草稿之後，終於後悔自己說過這句話。沒有家人，我不可能完成這本書，謝謝爸、媽、Sanjeev、Ramona、Eshann，最要感謝Mini Kahlon的鼓舞、批評、修潤、擬出計畫、提出策略、餵飽我，還有一切的一切。